目　录

緒　言

曾經以上帝荣耀的灵光庇护过封建制度的罗馬教廷，在資本主义时代繼續保护着剝削阶級的利益。現代的梵蒂岡不仅是宗教中心，它在經济和政治利益上和最大的資本主义国家的資产阶級有着联系。为教廷鼓励着的有势力的教权派政党，現在在西歐活动着。其中的許多政党，在最近十年間曾經或目前仍掌握着政权（意大利，法国，西德，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奥地利）。天主教教会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反动政权的同盟者和支持者。在美国，天主教教会愈来愈甚地得到金融寡头的支持。天主教教会在拉丁美洲，亚洲和澳大利亚，积极地扩张自己的势力。

根据这些事实，梵蒂岡过去的和現时的活动經常受到关注，是可以理解的。西欧各国和美国以此为題的書籍愈来愈多，就是这种关注的表現之一。各式各样的称頌梵蒂岡的書籍，数量特別众多。

教会的頌揚者們否認教权派在大战后政治方面所得到的成功应該归功于資产阶級的支持，因为資产阶級看出教会在社会上所进行的蠱惑性宣传，是和共产主义影响作斗爭的最有效的武器。教会的頌揚者們断言战后教权派在政治方面所得到的成功，証明了在群众間教会的“新生”和“宗教复兴”。但是沒有事实証实这一論据。今天在資本主义世界內的教徒，要比过去任何时期为少。关于这一点，教会人士自己也写到和說到。1947

年法国枢密紅衣主教修尔在致教廷的豁文中——其上有一个动听的标題“教会能忍受住最后掙扎嗎？”——写道：“在現代无神論所有激烈攻击教会的言論中，我們坦白地承認一个事实：在全世界信仰衰落了”①。修尔接着以下面的論調来安慰自己，即宗教信仰衰落現象不仅在天主教教徒占优势的国家里发現，其他各国也如此，这种現象是“所有阶級和所有种族”所固有的。

彼得罗·巴比里神父——教皇庇护十二世的一位顧問——也发表同样的意見，他在梵蒂岡出版的“观念”杂志中写道：“信奉自己的信仰和經常上教堂的信徒正在减少这一事实，客观的观察者不会看不見；社会广大阶层不奉行宗教仪式和上教堂的情形在各国不一样，在同一国家的各个区域其发展程度亦各异——因此，不能不分皂白地同样对待；但是事实总是事实，对于一些民族来說这事实是无可爭辯的。”②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将俄国劳动人民从資本主义压迫下解放了出來，向全世界被剝削者証明了摆脫不合理制度的可能。苏联的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形成，更加强了資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和自己解放自己的信心。西方劳动群众今日期望改善自己的境况，不是依靠上帝和教会，而是依靠和資本家斗爭的胜利。在这种条件下談論宗教的复兴等于以願望代替現实。

虽然有宗教复兴这种奇談怪論，实际上梵蒂岡本身也无力巩固教会在群众間的影响。这本来不是秘密，当梵蒂岡在行动上成为保卫資产阶級社会的政党，以反共为自己的主要标志后，許多劳动群众就厌弃了教会。教权派政党的执政，使教徒們有权利要求教会不但賜与“天国”并且要求滿足人們在現实世界上的日常需要。尽管教权派和教会控制着西欧一些大国的国家机

① 修尔：“教会能忍受住最后掙扎嗎？”，罗馬，1948年，第59頁。

② 彼得罗·巴比里：“宗教的不安与可信賴的宗教”（載“观念”，罗馬，1955年1月，第33頁）。

器，仍然沒有能力滿足群众的期望——群众不問政治或宗教覌点如何一致要求和平、进步和社会公平。可是不能說阿登納、皮杜尔和謝尔巴这三位西欧教权派最有权威的代表人物，也表达了上面所列举的理想。大家知道，在国际关系上他們曾經是和現在仍旧是“冷战”的支持者，在內政問題上是“强硬政策”的执行者。然而今天这种路綫在教权派本身的陣营內引起了愈来愈大的不滿，这有許多事实証明，意大利、法国和西德的报刊差不多每天都有这种报道。

当进步陣营的代表人物指出：在天主教的工会、政党和其他群众性組織，以及在天主教的知識分子队伍中，爭取一切善良人們的团結、拥护和平共处政策、拥护裁軍和禁止原子武器、爭取殖民地各民族获得自由的呼声愈来愈雄壮时，梵蒂岡的刊物恼怒了。梵蒂岡的刊物断言左翼分子企图用这种方法把信教群众和他們的神父隔离开来，断言左翼分子感兴趣的只有一点：破坏梵蒂岡在教徒心目中的威望。

不言而喻，在这些断言中沒有一点眞实。只要提一件事就够了，罗馬教皇在1955年的圣誕文告中表示賛成停止試驗原子武器，得到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报紙的广泛反应。这种証明进步陣营以客观态度对待梵蒂岡的事实，还可以举出許多来。

但是梵蒂岡繼續和国际反动势力最侵略性的集团一起，联合反对社会主义陣营。教皇在1956年不止一次地煽动波兰、匈牙利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天主教徒反抗政府。全世界都知道，梵蒂岡委派在匈牙利的紅衣主教明曾蒂，是1956年反革命暴乱的首魁之一。梵蒂岡刊物一貫地歪曲苏联的和平政策，把苏联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每一个爱好和平的行动，說成是“宣传”。

我們可举这一事实为例。庇护十二世在致1956年在科隆举行的全德天主教77届大会的信函中，支持阿登納总理的侵略政策，并且不顧事实，硬說教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在同一信函中，罗馬教皇号召天主教教徒不要相信“和平共

处的海市蜃楼”。难道这不是号召繼續进行今天为每一个正直的人，不論其哲学或宗教观点如何，所指責和憎恶的“冷战”嗎？

但是，梵蒂冈今日的首脑人物們对早已破产了的“冷战”政策的偏爱，和他們对社会主义陣营的仇恨，毫不意味着所有的天主教教徒，甚至于天主教教会所有的主教，都同意这一路綫。

現代天主教思想著名的代表約瑟夫·馬廸写道：“天主教教会的存在决定于它善于适应新的历史条件”①。今天的“新的历史条件”，首先就是差不多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存在。号召“消灭”共产主义的天主教僧侶們，早应該認清这一事实，并且从而作出相应的結論。

* * *

在現代的进步書籍中，苏联的和国外的，有不少著作是从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梵蒂冈的各方面活动的；例如梵蒂冈的外交政策，其代理人在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反人民罪行，耶穌会的历史以及其他等等。但是，关于梵蒂冈及天主教教会和統治阶級，特别是和金融資本的具体联系这一問題，研討得最为不够。

同时我們知道，列宁即認为这一問題有着重大意义。在“論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列宁写道：“凡屬包含有許多具体事实与比照，能把現代資产阶級底阶級利益及其阶級組織与宗教团体和宗教宣传机关間的联系揭示出来的書籍和小册子，都是我們特别必須利用的。

凡关于美国的一切材料都极为重要，因为那里宗教同資本发生的正式官場国家联系，还表現得不甚明显，但是另一方面，那里却又令人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所謂‘現代的民主制度’，不过是表示可以自由宣传有利于資产阶級的东西，而对資产阶級有利的东西却是最反动的思想、宗教、黑暗观念，为剝削阶級作辯护等等。”②

---

① 馬廸編纂：‘教会与社会’（天主教社会、政治思想和运动，1789—1950），紐約，1953年，第95頁。

根据列宁上述的指示，本書作者試图闡明梵蒂岡的至今尙不失却其現实意义的历史的各主要阶段及其在現代的活动。作者不仅仅引据用馬克思主义观点和用資产阶級观点編纂的史料，在相当程度上也引据教权派編纂的史料，适当地将其特点介紹給讀者。

大家知道十八世紀伟大的启蒙者們的著作和十九世紀进步学者和历史学家們的著作，給予教廷的頌揚者們一个打击，他們把教廷描摹成系出于神意而产生的理想組織。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胜利和工人运动的扩展，强烈地动搖了天主教和教廷所占有的陣地。从十九世紀下半叶开始，对馬克思主义进行斗爭和保卫資本主义制度原則便成为天主教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中心任务。

以科学态度批判宗教、天主教的哲学和历史的胜利，迫使梵蒂岡以自已的历史学者們出場应战，这些学者們似乎能从"科学"立場上来捍卫教会的利益和威望。于是世界上就出現了一个現代天主教（教权派）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任务是以伪历史方法将教会的历史理想化。

这一学派的鼓励者是里夫十三世，第一个浸透資产阶級思想的教皇。

教权派历史学派是如何体現里夫十三世的意图的呢？这可以根据这一学派最有权威的代表，德国人路德維希·馮·巴斯托尔（1854—1928）的例子来判断，他根据里夫十三世的提議，写有共十六卷的教廷历史③。和巴斯托尔共事的有一些耶穌会会徒为他提供为教廷辯护所需的文件和論据。从篇幅的浩繁和所引用的材料的丰富来說，巴斯托尔的著作可以說是博大精深的。

---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第205—206頁（俄文版）。（譯文見"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49年中文版，第460頁。——譯者）

③ 路德維希·馮·巴斯托尔："中世紀后的教廷史（XV—XVIII）"，第一卷至第十六卷，夫顯堡 1886—1933 年。

然而这位德国历史学家的著述不是客观的历史研究作品。巴斯托尔并不否認当时众所周知的一些教皇道德敗坏的事实，如西克斯脫四世、亚历山大六世、里夫十世等；但是巴斯托尔断言他們的敗行是时代所特有的，不是教会所特有的。巴斯托尔把教皇在文化、政治和外交上的活动加以美化，他贊揚反对宗教改革，称頌耶穌会。他对教会和統治阶級之間的物質联系諱而不言，对加以分析后会显出教廷眞面目和降低梵蒂岡威望的其他許多問題避而不談。巴斯托尔違背历史眞理，企图証明，不管天主教教会有着一切的“弱点”，它是人类社会所需的和有益的机构。他在十六世紀耶穌会的詭辯家培拉尔明的論据上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培拉尔明說：假使教会由品質优秀的神职人員主持时，那末教会命运的經久不衰可以解释成由于他們的賢明所致，这是很自然的；可是若由道德敗坏的神父領导着时，那末教会所得到的成功只能認为是由于不可思議的原因所致，不能作别的解释①。

培拉尔明的論据直到現在仍旧是梵蒂岡頌揚者們特别喜爱的武器，借以証明教会的“神意”的性質。例如，一位名叫保罗·卡立雅里的僧侶在他所写的“从近处看教皇——护教札記”一書中，承認过去有許多教皇是积习甚深的罪人，这还是客气的說法。这本書的出版是得到梵蒂岡当局的同意，赶上紀念“神圣的”1950年的。卡立雅里在談到中世紀的教皇时說：

“事实的确如此，当教皇刚才即位，立刻把自己兄弟姐妹的子女安插在自己的周围，好象他唯一关心的是使自己家族致富和显赫。亚历山大六世、烏尔朋八世、里夫十世、巴維尔三世、亚历山大七世等忘記了他們是教皇，而只記得他們是巴尔特齐亚，巴尔比林尼，密奇契，法尔尼什和基特齐。他們的侄子們，甚至

① 現在梵蒂岡还有人記得，庇护七世似乎在回答拿破仑消灭天主教教会的威吓时說：“陛下，假如我們僧侶在二千年間，以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尚不能办到这一点，那末您将也无法办到”。

年齡尚幼的和沒有任何优秀品性的，裁决着教会中重大和重要的事务。徇私这一污点(庇护亲属——作者)在教会历史上持續了三百年"①。的确卡立雅里說，教会的历史不是一部宁静的田园詩，而是戲剧；确确实实有許多卑鄙的教皇庄严地坐在"神圣的宝座"上；然而这事实本身就是教会系出于神意而产生的証明。因为教会假使沒有上帝的庇护，早已因不胜負担自己的罪孽的重荷而复灭了。"难道这不是奇迹嗎？"——卡立雅里及和他持相同見解的人質問道②。

罗馬教廷的現代頌揚者們就是这样地絞尽脑汁，将罪恶充作德行。

培拉尔明—巴斯托尔的"理論"在美国教权派历史学者中特别受到欢迎，因为依靠这一理論，不仅很容易証明天主教教会的"神圣的"性質，同时能証明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神圣性質。

美国教权派历史学家梅納德在所著的美国天主教教会史一書中指出："可以完全肯定地說，天主教教会中的杂乱无章証明教会是出于神意而产生的"③。梅納德的同行——爱德华·华金同样地写道："天主教在其具体的化身上(即指教会而言——作者)能够降低的程度和能升高的程度相同；天主教在最良好的状态时——是最好的，好到能表現出眞正的基督教，在最坏的状态时，比什么还要坏。因此(！？)天主教是所有宗教之中最好的和最眞实的宗教。"④

其他的教权派历史学家們，一方面承認許多中世紀的教皇是道德上的醜陋兒和欺詐者，說道：在非宗教的世俗事务上和在自己的私生活上，这些教皇确是那样的，至于触及宗教問題时，

---

① 保罗·卡立雅里："从近处看教皇——护教札記"，米兰，1950年，第45頁。

② 同样的观点見諸梵蒂岡当局同意出版的，供有文化的讀者閱讀的著作中，例如：蒋华尔德："罗馬教廷史"，巴黎，1946年；黎吉·斯蒂芬尼尼："天主教"，1952年。

③ 西奥图·梅納德："美国天主教史話"，紐約，1943年，第249頁。

④ 爱德华·英格仑·华金："天主教中心"，紐約，1943年。

他們仍然是形式上忠实于教会的信条的；作为人而言他們是有罪的，但是作为教会最高級神职人員而言，他們是无可訾議的。例如，意大利教权派历史学家保罗·勃立齐就是这样議論的，他把教皇的伪善提升为最高度的德行。他并不否認許多中世紀的教皇是些卑鄙的人。他同意象这些事实——如約翰八世的被勒死、謝尔塞三世对福尔摩兹教皇尸体的凌辱、約翰十二世淫佚的生活、貝尼奇克脫九世将罗馬教皇皇冠出卖給格里哥里六世等等——証明了中世紀教廷的腐敗。可是立刻又补充道："这些教皇中間沒有任何人破坏委托他們监护的教义，沒有任何人从教义的观点去批准不道德的行为……。总而言之，站在忠实于我們客观的(?)教理的立場上，对教廷历史上这一需愼重研究的和引起爭論的时期可以作出結論說：不論教皇有着个人的弱点，罗馬教会仍旧是彼得的教会。"①

虽然这种"論点"早被中世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嘲笑过了，特别是受到巴卡乔的嘲笑，可是教权派历史学者們(因为沒有更好的)在今天繼續弹着这一老調。

教权派历史学把封建时代教会的活动理想化。

这种观点在意大利教权派历史經济学者阿明托列·范范尼的著作中表現得特别明显，他現在是天主教民主党的总書記。他在1934年初版的"資本主义形成时期的天主教与新教"一書中，把封建主义說成是受天主教"公正"倫理道德思想鼓舞的一种制度，与資本主义作对比，而資本主义似乎是在新教的"利己"倫理思想影响下产生的。②美国的一位天主教神父，社会学者克劳宁持着同样的見解。③可是范范尼、克劳宁和其他一些和

① 保罗·勃立齐："罗馬教皇"，罗馬，1951年，第96—97頁。

② 阿·范范尼："資本主义形成时期的天主教与新教"，米兰，1934年，第105頁。范范尼的这本書已譯成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在西欧和美洲广泛流传。

③ 約翰·克劳宁："天主教社会原理，天主教教会的社会教义对于美国經济生活的适用"，密尔沃基，1951年，第11—12頁。

他們一伙的人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对于天主教倫理道德在如何尊崇封建剝削一事避而不談。关于这一时期的教会和僧侶的"社会"活动，他們往往保持緘默。

教权派历史学者以及許多資产阶級历史学者断言教会在殖民地中起过"积极作用"；似乎教会曾經保护过当地居民不受殖民者的压迫，在殖民地传播文化，以及介紹声名狼籍的"基督文明"。他們說天主教教会曾起了某种阻碍作用，減輕了殖民制度所造成的慘禍。

某些教会的頌揚者們甚至企图証明教会曾力图在殖民地，特别是在美国，建立起理想的"基督秩序"，它类似卡姆柏尼拉的烏托邦式的"太阳城"，如果說这一試图未获成功，則罪責在于世俗的殖民者們的反对。阿根廷历史学者茄迪亚断言，例如，甚至西屬美洲的从殖民者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一事实，应归功于僧侶們的传布基督教义和祠瑪·阿克汶斯基"伟大的"理想，据說它在当地居民中有着广泛影响。①

天主教历史学者企图把教廷为反对意大利統一而进行的斗爭，把梵蒂岡和法西斯和納粹的同盟，以及現在梵蒂岡投靠美国的路綫認为是正当的。同时他們隐瞞梵蒂岡和天主教会与資产阶級間的政治和經济关系，把教会打扮成超阶級的传播永恒眞理的，其活动有益于社会上一切阶級的組織。

教权派历史学派中的一个流派是由耶穌会历史学者組成的，其著名代表之一为耶穌会会徒彼得罗·塔基—汶都里，他曾为墨索里尼的懺悔神父，著有"意大利耶穌会史"一書。② 在其仿巴斯托尔体裁的也是受里夫十三世委命而写的書中，塔基—汶都里将教会历史分成两个时期：耶穌会成立前时期和耶穌会成

---

① 欧列斟·茄迪亚："殖民地和独立"（戴危地馬拉地理历史学会年鉴，第二十六卷，第7—8頁，1952年）。

② 彼得罗·基塔—汶都里："意大利耶穌会史"，第一、二卷，第二版，罗馬，1950年。

立后时期。他認为教会在伊納息・罗耀拉 (Ignatius-Loyola)之前的一切都是应被指責的，而在罗耀拉以后的一切都是可讚美的。塔基—汶都里引据了数以百計的原始資料，将罗耀拉以前的教会描繪成为污穢不堪的处所。他揭露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尤里二世和巴維尔三世“罪孽深重”的生活。可是当罗耀拉和耶穌会一出世，照这位前墨索里尼忏悔神父的断言来說，就出現了奇迹。罗耀拉和耶穌会会徒“治愈”了教廷所有的癰疽和毛病。在所有上述的耶穌会的这一概念中只发現一个“可是”，这是因为耶穌会本身的活动犯了如此深重的罪孽，以至于象巴尔特齐亚及和其他类似的一些罗耀拉以前的教皇們的行为，同它比較起来簡直象純洁无垢的少年們所干的淘气事一样。这禁不住要問了：在这种情形下，耶穌会能治愈誰和如何治愈他人呢？

教权派历史学派另一个流派是由所謂自由主义天主教拥护者組成的。这可以举意大利科学研究工作者阿多罗・卡洛・叶摩洛①和前已提及的美国人約瑟夫・馬迪为例，他們是从事研究現代教会的历史的。自由主义教权派历史学者們对教会的政治活动予以批判性的估价。然而他們总归是信徒，他們企图証明教会并沒有过时，教会是可以改正，适合現代潮流和健全起来的，同时教会是可能和应該在現代社会中起“积极”作用的。②

恩格斯說过，宗教乃是“人所創造的，在它特有的全部眞誠的狂热之中，即在初創时期，已非进行欺騙和歪曲历史事实不可了”③，当宗教在衰落时，更非捏造历史不可了。天主教在这一

---

① 阿多罗・卡洛・叶摩洛：“近百年来意大利的教会与国家”，都灵，1952年。

② 現代資产阶級“非宗教界”的历史学和自由主义教权派的这一观点相互呼应。大多数資产阶級历史学者也发表同“理想”教会拥护者們同样观点的文章，即教会不仅要宣揚善行，并且还要躬自亲行。資产阶級历史学者拥护“健康”的教会，反对腐敗的教会。实質上他們同教权派历史学者一样，是从理想的立場出发的。

③ 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莫斯科，1955年，第150頁(俄文版)。

方面并不例外，教权派历史学派理論上的立足点即証明了这一点。

然而天主教历史学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客观的样子，不得已引了大量資料来作科学研究，其中不少資料和作者本来的意图相反，它們把梵蒂岡和天主教会活动的眞正性質揭示了出来。

应該指出，近年来梵蒂岡的代表人物愈来愈甚地反对历史科学，反对历史主义。梵蒂岡在这一观点上是有它自己"重要的"原因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社会主义和民主力量胜利的影响，在天主教陣营內出现了所謂进步天主教徒一个派别，他們要求教会不要将自己的命运和必然要灭亡的旧世界联系在一起，而去和代表将来的共产党人結成同盟。我們看看和进步天主教徒进行辯論的耶穌会会徒安东尼奥·密西尼奥在梵蒂岡的杂志上是如何說明进步天主教徒們的綱領的：

"俄国領导的无产阶級群众和以美国为首的資本家之間的民主斗爭的結局，历史已經作出了。历史发展的結果必然是正滿怀信心地走向未来的和在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級获得胜利。新社会将声言劳动的胜利和劳动群众的胜利。所以除了投入历史的潮流之外沒有其他出路，为的是去竭力指导历史的流向，表达它的需要，将无产阶級的事业取过来掌握在自己的双手里，和它的領导力量联合起来，去了解共产主义以及接受它的观点。

在进步的天主教徒的理解中，教会和天主教徒对馬克思主义思潮的'伸手'政策应当不是一种多少有些謹愼的策略，而应是历史发展所导致的无上命令。拒絕这一政策，或更坏些是和保守力量联合在一起，意味着违反潮流开倒車，跳出历史圈子，从而宣告自己的毁灭。在这种情况下无情的辯証运动将会把教会推倒，只因为教会不願去理解历史精神和拒絕立即去領导历史的先进队伍。"①

这样，甚至連耶穌会会徒密西尼奥也被迫承認进步天主教

徒的观点是建筑在无可爭辯的事实上的。比事实还要坏的是，这位耶穌会的頌揚者答道，大家承認的历史是沒有的，因此也就沒有社会主义制度获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密西尼奥只承認一个“历史”，这个历史的主要人物就是上帝。沒有上帝的意志人甚至連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上帝創造历史；因此在密西尼奥的理解中，历史不会导至共产主义的胜利。假如将历史視作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一些发展較低的阶段为另一些发展較高的阶段所代替，又假如在历史事件中引用“肉体和物質相互关系的原理”，这就是說假如用眞正的科学观点来代替神秘論和宗教故事时，那么“历史消灭了”，消失了，而这显然是一个爭論的題目。[②] 这就是教权派历史学现代代表人物耶穌会会徒密西尼奥的“邏輯”。

馬克思主义者对梵蒂岡和教权派反动政策有系統的有充分文件作根据的批判，不仅在过去和現在对教权派陣营的下层有着巨大的影响，使他們看清事实。在这一批判的压力之下，教权派領导集团也被迫迂迴作战，有时裝得比他們实际上还要“民主”和“激进”。这也反映在教权派的書籍中，因为它无法对进步陣营的观点保持緘默，而是应該起来与之辯論。于是，不管革除教籍和被視为异教，先进思想传播到教会不准进步人士进去的处所：天主教学校和組織，天主教工会，甚至传播到僧侶和寺院中間，它喚醒了理智，打破了过时的理解和战胜了世世代代的偏見。

---

① 密西尼奥：“前进的历史”（載“天主教文明”，罗馬，1956年5月5日，第247頁）。

② 密西尼奥：“进步的預知”（載“天主教文明”，罗馬，1956年6月2日，第470頁）。

第一章

封建时代教皇的經济活动

中世紀教皇的“善行”和恶行，被唯心論历史学者解释成为罗馬教皇的个人品質問題，在实际上有着远为深远的根源。中世紀教皇所扮的角色特别因天主教教会是一个最大的大地主而决定的，教会所拥用的田产不少于全部天主教田产的三分之一。教会从思想上把西欧各国的封建社会联合起来，尊崇封建社会中的統治秩序，首先就是尊崇对农民大众的剝削和奴役，因为教会本身对此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

既然以教皇为首的“基督神秘的身体”——神学家是这样称天主教教会的——代表着封建制度的利益和作为它的产物，那末可以根据教皇的經济活动来研究它，准确地来說，是根据封建时代他的收入来源和支出項目来研究。

領导早期基督教公社的“先知”和“导师”們在布道时宣传穷困、节慾、蔑視世俗的財富和自我牺牲是进入“天国”的手段。他們和公社中的其他成員一样，不享受特殊权利。

二世紀末叶随着基督教中稳健派的胜利和教会組織的形成，主教便在教会組織中占首要地位，开始掌握公社中的財产和对外代表組織。主教們的威信和权力不是建立在他們的“道德声望”上的，而是建立在他們作为公社中的家政管理人，掌管它的物質財富上的。作为帝国首都罗馬的主教具有很大的經济和

政治势力。教廷是在罗馬主教教区的基础上逐漸形成的。

当基督教成为罗馬帝国的国教后（从公元四世紀初开始），主教的权力就愈加大了。皇帝和大地主們施与教会巨額餽贈，使它巩固起来，結果教会便成为拥有大量連带奴隶的田地的大地主和殖民地的所有者。

教会的財产由于餽贈而不断地增加。教会的田产在拜占庭和哥特族战爭期間也不断地增加，因为当时各处的无政府状态和內乱，甚至使許多貴族上层人物也躲到教会中和求教会保护。当犹斯蒂尼安統治时期，教会的財产增加得还要快，他經常庇护教会和帮助它增加財富。[1]

田产集中到教会手中的过程是在前罗馬帝国全境內进行的。

例如，在加列当法兰克人改宗信奉基督教时，国王們竞相比賽誰捐獻給教会多。他們捐給教会以土地、金錢、珠宝和貴重家俱等等。

在西班牙也是如此，当中世紀早期，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变成了大地主—封建主。西班牙的僧侶在自己的土地上收租，并且要求农民服劳役。[2]

意大利的教会特别富有。公元六世紀时，前罗馬皇帝們在西西里和卡拉勃利的大地产是归屬于教皇格里哥里一世的(540—604)。耶穌会会徒奥古斯丁諾·薩白在他的共三卷的“教会史”中，不无驕傲地写到格里哥里一世道：“他是罗馬帝国疆域內最富有的土地所有主”；然而又老实地补充道：“我們的教皇在对奴隶問題上采取了公正的措施，为了象人一样地去对待奴隶，他常常解放他們。然而不应当認为所有的奴隶都获得了自由。”[3]

---

① 路察蔦：“意大利經济史”，莫斯科，1954年，第167—168頁。

② 拉法爱里·阿里塔米拉与克立維阿：“西班牙史”，第一卷，莫斯科，1951年。

③ 奥古斯汀諾·薩白：“教会史”，第一卷，都灵，1927年，第463—464頁。

僧侶們为了把田产和其他物質財富弄到手，不惜施展任何手段。为此目的他們采用了各种把戏，詭計和作伪，包括編造奇迹。“为了繼續不断、花样翻新地喚起人們捐献的兴趣——德国历史学者洛特写道——我們看到，他們所采取的手段是多么卑鄙无耻啊！在天国极乐与地獄之苦这一类的渲染描繪不再見效的时候，他們就从遙远的地方搬来圣徒的遺骨，举行巡迴展覽，盖起新教堂来；这在第九世紀簡直成为一种正式的营业部門了……当薩松的圣弥尔修道院的使者，在罗馬費了极多的周折，乞求到圣瑟罢士梯安的遺体，并将格里哥里的遺骨也一同偸偸运走，而把两者放在修道院里的时候，跑来那么多的人們瞻仰新的圣者，那地方簡直象是飞来漫天遍地的蝗虫，对于求助者，不是一个一个地，而是成群結队进行治疗的。結果是，修士們只得用升子来量金錢了，所用升子共計 85 个，修道院的黃金儲藏量达到 900 磅。”①

許多神职人員，包括教皇，从事伪造文件以攫取財产，为了增加自己的財富他們毫无忌憚地利用伪造的文件。教皇和宗教会議热烈地保卫着教会接受饋贈的权利，并以革除教籍威胁与之竞爭的人。

中世紀初期的教皇不能控制罗馬范围以外的和意大利南部以外的教会。当地教会的上层权貴是由自己的牧师团体推选出来的，并由王国政府批准，王国政府要把教会收入的极大部分据为己有。公元八世紀时形成了教皇国——“教会区”。数世紀之久的时間內，教皇为爭取罗馬主教的权力居于所有基督教教会之上而进行了頑强的斗爭。这些計划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实現了。教皇成为大封建主，其势力远远超过教会領地范围以外。

公元十一世紀时教皇的地位大大地巩固了。在这方面克留尼运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克留尼运动发生在十世紀，它起源于法

① 恩格斯："德国古代的历史和語言"，莫斯科，1938年，第 65—67 頁。譯文根据人民出版社 1957 年刘潇然譯本第 76 頁。——譯者

国的克留尼修道院。克留尼修道院的僧侣要求进行教会改革以提高僧侣和教皇的声望和巩固教会的紀律。

在他們的影响之下，托鉢僧运动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托鉢僧为了“复兴”教会，却成了农民的灾难，他們以詭詐和强要对农民騷扰不休。1131年召开的宗教会議承認“貪婪的火焰焚燒着爱財的僧侣們；他們把眞理和謊話混淆起来，以便为自己掙得更多的金錢”。“金錢——法兰西斯教派的蓬那汶多拉在十三世紀时憤慨地說道——这是我們僧团最致命的死敌，金錢使我們的弟兄們激起如此可怕的貪慾，它使行人怕和我們遇見和象見了无耻的路劫者一般地逃跑。說我們貧穷乃是最可怕的謊言。我們象穷人似地在乞求布施，可是生活极其奢侈”。

当里夫九世(1041—1054)这位克留尼綱領热烈的信奉者执政时，教会所有的财产和收入都宣布为教皇的私产。这一决定使教会财产是穷人們的财产这一神話最終地埋葬了，而教皇則有可能不受监督地处理教会的收入，并利用它来巩固自己的世俗权力。

里夫九世的繼承者教皇格里哥里七世(1073—1085)开始和罗馬皇帝亨利四世爭夺“封圣职权”，即爭夺授与主教称号及其任命和撤换的权力。在此以前，这一权力是屬于世俗的君主的。国王和皇帝們可以出售主教和其他神职，从而得到不少的收入。格里哥里七世要从世俗君主手中夺取封圣职权和将教皇的权力凌駕于皇帝之上这一意图，反映在他公布的著名的教皇“通牒”一文件中。格里哥里七世在这一文件中宣布教皇有权废黜君王，授予和解除主教称号，設立新教区，把教区分开或合并，将主教从一个教区調至另一个教区，解除臣民对“坏君主”所作的效忠誓言等等。

教皇的神权政体的野心沒有完全实現，因为遭到世俗封建主和皇帝政权的反抗。封圣职問題在教皇和皇帝政权相互讓步下解决了；它巩固了教皇的威望和有助于教会手中財富的进一

步积聚。

格里哥里七世所实行的僧侣独身制度，对教会财富的保存和积累起了一定的作用。僧侣独身制使他人无法繼承神职和教会領地，阻止了教会財产的分散和漏失。[①] 然而事实上僧侶們从来不遵守这一制度。

十二世紀时建立了教会的中央行政机关——罗馬教皇厅。教会的中央行政机关由一些机构所組成——紅衣主教团和办公厅，其中大部分机构現在仍旧存在。教皇厅中的掌管教会收入的机构起着首要作用。应該指出，教皇厅所有的机构在或大或小程度上都为教廷国庫增加財富。按照德国历史学者貝藻立特的話来說，中世紀的教皇厅就象一架专門榨取金錢的巨大机器。它的唯利是图和貪得无厌令人惊异地为所有中世紀的資料一致提到。

"有一句諺語說道，在罗馬什么都可以卖，这一点也不夸张，因为事实上用金錢可以买到一切，从微不足道的乡村小教区直到紅衣主教的僧帽，从允許在斋戒期吃葷一直到杀人和血亲婚配"[②]。

教皇厅的主要机构是使徒署，它起着国庫和財政部的作用。使徒署的存在最初見于教皇貝尼奇克脫八世的自1071年起的訓諭中，可是只有当十三世紀时，因教皇的势力增长到能作用于基督教世界，使徒署才具有极高的地位，一直到中世紀末期为止。[③]

教皇的收入大部分归入使徒署。使徒署經理鑄造有浮雕的

---

① "宗教改革时期，教会的财产被世俗君主所攫取，而神职人員則轉而成为国家的官員，支領一定的薪俸，僧侣对保存独身制毫无兴趣是完全自然的。新教的神职人員只要自己願意，养育随便多少子女都可以：他們弄不到教会财产以据为己有和传給子女"（卡尔·卡烏斯基："最新的社会主义的前驅者們"，第一卷，莫斯科，1924年，第34頁）。

② 弗里德里赫·貝藻立特："德国宗教改革史"，第一卷，1900年，第7頁。

③ 尼哥罗·李："罗馬教皇厅"，罗馬，1952年，第265頁。

錢币和起着教会行政审判厅的功能。当烏尔拜六世时(1379)，所有牵涉到教皇利益的訴訟案件，都由它来解决。根据同时代人的証明，十七世紀时使徒署有权审訊"侯爵、大公、高級官員、主教、大主教、总主教、紅衣主教"。①

使徒署通常由特別得到教皇信任的有宫庭总管头衔的紅衣主教领导(稍后为事务总管头衔的紅衣主教)。担任这一职位的意义根据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了，即宫庭总管不止一次地被选为教皇(最近几十年中的教皇中有里夫十三世和庇护十二世曾担任过此职)。宫庭总管在教皇的宫庭中具有很大的权势。除了直接的职务外，他还管理教皇宫庭中的工作人員，証明教皇的死亡，在教皇死亡后繼承人未选出期間領导教会和主持选举教皇的紅衣主教会議。②

宫庭总管是教皇意志順从的执行者。使徒署眞正的領导人应該是教皇自己，教皇确定稅收和捐献額，监督这些款項的繳納，以及处理使徒署征集来的錢財。法國历史学者雷諾阿尔在研究过阿維尼翁时期(十四世紀)教皇的档案后，写道，財政問題在教皇信札中所占的地位和神学問題一样多。③

使徒署的工作人員由宫庭总管任命，由副宫庭总管領衔，副宫庭总管从十五世紀起兼任罗馬总督、收款签章和負責保管的出納員、書記和信使。

使徒署管理着一大批財政代理人，即負責在当地征收教皇所定的稅收、人头稅和其他进益的征稅官。通常整个国家受他的管轄。征稅官屬下設有副职，負責征收一个或数个教区的教皇稅收。征稅官的权力超过主教；征稅官有权把頑抗不向使徒署交稅的債务人革除教籍，并予頑固抗稅的人居住过的地方以禁

① 雷納杜罗："罗馬教廷关系史"，1950年，第96頁。

② 所有这些职务現在由事务总管—紅衣主教担任。

③ 伊夫斯·雷諾阿尔："1316年至1378年之間教皇阿維尼翁与財团間的关系"，巴黎，1941年，第4頁。

止举行宗教仪式的处分。① 教皇的特派使节起着全权征税官的作用，他們有权課处某个地区或国家以教皇制定的額外人头税。

十二至十三世紀时，使徒署有庙堂僧团为它貯存、运输和兌換繳入教皇国庫的金錢。德国历史学者普魯兹指出，这一时期庙堂僧团拥有巨額的財富。十四世紀初期，庙堂僧团的財产估价达2,500万至6,200万法郎，它带来200万法郎的收入，据普魯兹說，折换十九世紀时的市价，还要大上25倍。“教堂、寺院、庙堂僧团在巴黎的总部簡直成了一个国际交易所，远居各地的商人来到这里，甚至君王們也来到这里；法国国王們把自己的国庫搬到这里来了，并且命令在此付款和收款。很明显，庙堂僧团并不是仅仅因为对亲近的人的爱而从事这种业务，不想为自己謀取利潤的。庙堂僧团的軍事力量和拥有的大量土地沒有人能抗爭，循着这条道路发展，它最后成为財政上的强国。”② 庙堂僧团在十四世紀初被消灭，財产为法国国王攫去。

十三世紀上半叶使徒署开始利用意大利的大銀行和大商行，委托它們在基督教欧洲的各区和边区征收教会的税收。

“教会的收入通过銀行和商行来征收，工作就进行得远为快捷，而当需要的时候——教皇厅差不多經常是这样的——銀行和商行会予先支付教皇尙未收到的款項的全部，以图事后取得利息。存款会带来巨額利潤，因为教会在仅仅一个省的收入即达好几千里拉，有时达几万里拉。許多銀行为教会征收好几省的收入，有时要征收好几国的收入。”③

十三世紀时，有塞那銀行家庞西尼奥里和佛罗倫薩的莫茨和弗立斯哥巴立达公司为使徒署效劳。十四世紀时为教皇厅效

① 伊夫斯·雷諾阿尔：“1316年至1378年之間教皇阿維尼翁与財团間的关系”，巴黎，1941年，第12頁。

② 普魯兹：“中世紀泰西国家史”，第二卷，柏林，第49—50頁。

③ 路登堡：“意大利早期資本主义簡史——十四世紀佛罗倫薩的商行”，莫斯科—列宁格勒，1951年，第76頁。

劳的有以下这些銀行家：路加的里卡其和庇斯托雅的克雅積蒂；佛罗倫薩的斯宾尼、斯卡里、巴尔其、佩路兹、亚尔培蒂和悌契。

銀行家們为教廷效劳是有利可图的。他們可从使徒署的存款中賺取百分之三的利潤。教皇的庇护对于銀行家們有着不小的意义，教皇贈与他們尊号和特权，发給各种証書和介紹信。教皇重視同銀行家和高利貸者的合作，他以教会的各种处罰包括革除教籍威吓固执的債务人，从而帮助銀行家們收回貸款。在中世紀时期，为教皇服务能增加商号的势力和声望。

商号和銀行除了在財政事务上为教皇服务外，它們还为教皇作其他有价値的服务，包括提供政治和軍事情报。銀行家們的代理人和信使經常在各国旅行，他們收集了各种重要的政治和軍事情报送給自己的主人。教皇有自己的僧侶組成的情报网，然而連絡得不好。教皇从銀行家所得到的机密情报十分准确，并且定期送到，能从根本上补充教皇厅从其他方面搜得的資料。①

雷諾阿尔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公布一封教皇克里門特六世在1348年1月20日寄給佛罗倫薩銀行家雅柯夫·亚尔培特的信，在信中这位“上帝的全权代表”显然不期待神意的协助，而請求亚尔培特为他組織显然是諜报机关性質的搜集情报的机构。“朕現有热烈的願望——克里門特六世在上述信中写道——确知所有各种消息和进行着的事件，使有可能及时采取措施……关于此事和其他各事，朕完全信賴尔的謙恭。朕令尔立即写信与自己的工作人員，不論他們現居何地，命令他們急速将所知的一切有报导价値的新消息和新事件报告朕，或报告在教廷內的尔的亲信。当每有新情况发生，則立即补充。尔亦毋忘以書面列举他們的姓名报朕。至于尔及尔的亲信因此事而耗費的款項，将根据尔在教皇厅中的代表的請求而償还，朕将为此发出指示。”②

① 伊夫斯·雷諾阿尔：“1316年至1378年間教皇阿維尼翁与財团間的关系”，第395頁。

文艺复兴时期教皇和銀行家們及高利貸者的关系特别密切，当时在罗馬有欧洲大銀行梅奇契和富盖洛夫等的办事处。这一时期銀行家們常常是眞正的教皇选举人，他們供給教皇宝座的候选人以金錢，借以收买紅衣主教投自己一票。

佛罗倫薩銀行家梅奇契一家，不止一次地以这种方式保証自己的家族成員被选为教皇。里夫十世，克里門特七世和庇护四世——梅奇契的旁裔——的被选为教皇，有賴于梅奇契銀行为他們买得了必需的紅衣主教的票数。

紅衣主教和主教們也經常利用銀行家和高利貸者的效劳。

使徒署是教皇厅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財政机构。許多教皇尙有私人的帐房，其活动不受宮庭总管的干預。

紅衣主教团亦有自己的宮庭总管（最初的文献紀載为1289年），他管理使徒署撥来的基金和其他屬于紅衣主教支配的收入。

教皇办公厅同时經管着充实教皇国庫的数目可观的教皇的私房收入，最早的关于教皇办公厅的資料是叙說八世紀时的情况的。办公厅发給需要的人以教皇的詔書、保护状、褒奖状、証書和其他文件，根据"使徒办公厅稅册"規定的价格征收代价。

办公厅的官員分别編入各局，規定以教皇某一采邑的收入归該局所有，并以这一收入支付官員們的薪俸。办公厅的收入則直接归入教皇国庫。

十五世紀末期建立日期签署局，在此以前其职务由办公厅担任。日期签署局在教皇厅所有的收文和发文上签注日期——如請願書、申請書和証明書等等，并为此征收費用。每一文件上要签注十次以上的日期，每签注一次日期应单独付款。例如在申請書上签注有呈文日期、批准日期、繳付費用日期等等。此外，日期签署局发給混血婚配和近亲婚配許可証，以及发給修道院

③ 伊夫斯·雷諾阿尔："1316年至1378年間教皇阿維尼翁与財团間的关系"，第397—398頁。

和牧师团体以享受特权的許可証；日期簽署局和教皇国庫的債务人之間訂有彼此照顧的友好协議。日期签署局另外还征收苛捐杂税，以作为自己效劳的酬謝費。

教皇厅的审判厅有：圣听悔审判厅、圣罗馬"洛脫"审判厅和圣使徒署名审判厅，也为教皇国庫带来收入。

听悔审判厅出現在十二世紀末。这一审判厅受理"恕罪"，每恕罪一次須根据特别价格付款。

"洛脫"审判厅出現在十三世紀。这是教会高級审判机构。审判厅的主要收入是从离婚得来的，依据教規信徒只有得到罗馬教皇厅的同意和准許才可以离婚。

圣使徒署名审判厅是在十五世紀时从办公厅分出来的。它审理呈給教皇的申訴書、申請書和請願書，并从訴訟人收取相当稅款。

教皇厅的其他机构也有着巨額进益。

常常因同一件事須向教皇厅的不同机构分别納費。根据隆脫公布的資料，德累尔大主教助理于十六世紀在教皇厅受了教皇的堅信礼后就付了 51 次款，其中的 19 次是付給办公厅的，4 次是付給日期签署局的，4次付給圣使徒署名审判厅的，等等。①許多款項直接上繳給宮庭总管，越过所有其他的各級（例如，十五世紀为十字軍东征而出售贖罪券的收入）。日期签署局的收入亦归宮庭总管支配。

教皇支配教皇厅的一切收益。部份收入得到他的同意划归紅衣主教。剩下来的款項由教皇自行裁夺如何花費。教皇在这方面过去和現在都是无須报銷的人。对教皇国庫唯一的"审查"是在教皇死后进行的，因为需要制作一份他遺留下的財物和金錢的清单。

有关教皇收入和教皇厅其他机构收入的确实数据在文献上

---

① 威廉·隆脫："中世紀教皇的稅收"，第二卷，紐約，1934年，第298—299頁。

找不到，虽然关于这题目有着大量的論文。只有对阿維尼翁时期(十四世紀)是多多少少經过仔細研究过的，所根据的是部分保存在法国的教皇厅的档案。有关該时期的資料在雷諾阿尔的主要著作中有着概括的介紹。

教皇厅的进益可以分成两項：教皇作为世俗的君王而得的收入；教皇作为"上帝在人間的全权代理人"，作为天主教教会的首脑，以教会的圣职和圣礼作买卖，并課处信徒以人头税和稅收而得的收入。因为教皇的权力有着双重性質，所以严格地把这两項收入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举諸侯进貢为例說明，諸侯进貢起于十世紀，数百年来西西里国王(4万佛罗稜)、阿拉貢国王(8千佛罗稜)、英国国王(8千佛罗稜)、波兰国王以及其他各国的国王都向教皇进貢。諸侯进貢按本身性質而言是"世俗"的，可是大家交給教皇却因为他是教会的首脑。

教皇征收的稅收和人头税名目极其繁多。中世紀后期时，据隆脫說簡直多得不可胜数。①

最古老的教皇稅收之一是"财产調查"税，这种税是从主教管轄之下掙脫出来而处于教皇庇护下的修道院和乡村小教区交納的。这种情形起于八世紀，很快就发展开了，因为寺院宁願处于教皇的保护之下，从而可以逃避封建主的侵害和主教們的貪婪。其后財产調查税扩大到所有的教区和寺院都得交納。②已交納这一稅款者的名单列入特設的淸册中——"查定書"中，淸单是欽岂奥(后为教皇高諾里三世)在1192年首訂的，以后在中世紀时又不止一次地增补过。

在这本淸册中尙紀載着著名的"圣彼得一枚"税。这一税收是十世紀起在英国实施的，其后扩展到斯堪的納維亚半島上。根据这一税例，每有一只爐灶应繳納一便士稅給教皇国庫。

---

① 威廉·隆脫："中世紀教皇的稅收"，第二卷，第58頁。

② 同上，第61—63頁。

十三世紀起，出售教会中的職位成为教皇国庫最能获利的收入来源。高級的教会職位被称作采邑——“肥缺”，因为主教区和修道院拥有領地和农奴，甚至拥有城鎮和手工业工厂，其收入是归屬主教和修道院长的。例如，英国当沒有土地的約翰（1199—1216）执政时，仅外国的采邑主每年要得到76,000馬克的收入，三倍于当时王国国庫的收入。在德国，仅根据十三世紀編年史的記載，大主教的收入年达20万1,000馬克，而当时薩克森大公的岁入为2,000馬克。十八世紀美因茲大主教岁入1,040万佛罗稜，而他的主教团中的24位成員岁入38万佛罗稜。[1] 在波兰，格尼茲諾大主教拥有两个城市，271个乡鎮，83个庄园和87个磨坊，而克拉柯夫則拥有21个城市，38个耕地面积总計25平方公里的村鎮。十四世紀时捷克的“教会几乎拥有全国所有土地的二分之一。捷克天主教首脑布拉格大主教世袭領地特别广袤。这位大主教不仅是大地主，他的权力差不多和一个独立的君王相同。他有着自己的武裝部队和劊子手，在自己广濶的領地上征税，有权审判和处决住在他領地上的居民。”[2]

西班牙的一些主教，例如赫隆的主教，拥有广大的田地、城堡、巨額資金和无数的农奴。教会在托勒多省拥有村庄和城市，甚至自己的軍队。十五世紀时七个西班牙大主教和40个主教每年“可賺”466,000德克（威尼斯鑄造的金币——譯者）。[3] 这些收入还不断地在增加。西班牙历史学者阿里塔米拉引証的資料指出，列昂和喀斯底里王国在1675年的岁入为2,294万6,000德克，而上述三国中的31个主教的岁入为2,158万德克，除了繳給王国国庫61万4,000德克外，淨入为2,096万6,000德克。

法国甚至在1789年大革命前夕，僧侶尙从自己的采邑上收

---

① 爱特布·亚历山大：“德意志的教会与社会”（1789—1950）（“教会与社会”，第351頁）。

② 罗勃佐夫：“胡斯战爭”，莫斯科，第74頁。

③ 拉法爱里·阿里塔米拉与克立維阿：“西班牙史”，第一卷，第457頁。

到巨额的进益：11 个大主教和主教每年为 850 万法郎，副主教和大寺院的祈祷牧师——1,300 万法郎，15 个修道院长——900 万法郎，700 个修道院主持——150 万法郎。①

采邑在中世紀时代被認为是最可靠的搖錢树，所以教廷竭力要把买卖采邑权攫到自己手中。十二世紀以前，在大多数情形下主教和修道院长是由自己的牧师团体选出，再由国王批准的。这种选举照例只具有形式而已，事实上国王們是把教会中的职位出售給世俗間的和僧侶中間的人物的，只要誰价錢出得高。教皇自己的領地上也是采取这种做法。

教皇們伪善地攻击国王出售教会职位（圣职买卖），借以捍卫自己从事圣职买卖的权利——即根据自己的願望支配自己的采邑。中世紀的神学家們在"学术"論文中曾引經据典地辯明教皇这一主张是正确的。②

教廷得到了封圣职权后，从而保証自己在出售采邑方面的垄断地位。封圣职是須花很高的代价才能取得的，即著名的"服务費"，也就是被教会宣布为异端的圣职买卖。却尔斯·李諷地說道，宗教审判厅从来不因为教皇們犯了这一异端罪而审訊他們，被审訊的却是控告教廷进行圣职买卖的人。③

通常服务費的范围如下："总服务費"等于采邑年入的三分之一，由教皇和紅衣主教团平分。除此而外尙須付等于"总服务費"一半的錢給教皇厅有关的审判厅官員；再須付上述数額的三分之一的錢給教皇厅的高級官員，以及"小服务費"，或称茶資，給那些服务人員。此外应該給呈請教皇封职的紅衣主教送些錢，作为酬謝。

---

① 弗里德立克·尼尔逊："十九世紀教廷史"，第一卷，倫敦，1906 年，第 141 頁。

② 貝尔納·琪里曼："教皇貝尼奇克脫十二世的功利政策"，巴黎，1952 年，第 21—22 頁。

③ 亨利·却尔斯·李："中世紀宗教裁判史"，第二卷，1912 年，第 581 頁。

总的来說，采邑主要将自己采邑所得的近半数交給教皇、紅衣主教和教皇厅的官員們。

十四世紀初期克里門特五世开始用一种統一的稅代替上述复杂的稅制，即著名的“年稅”，年稅等于采邑主的岁入。差不多中世紀的全部时期內服务費和年稅同时并存。通常服务費是在罗馬受封圣职的高級教士交納的，而年稅則是当地受封圣职的教士交納的。交納过服务費的毋須再交納年稅，反之亦然。起初修道院每 8 年或 20 年交納年稅一次，从 1469 年起，根据庇护二世的决定改为每 15 年交納一次。如果采邑的收入特別可观，并且有几个候选人在覬覦这一位置时，使徒署除了要求交納年稅而外还要索取額外的費用。

教皇約翰二十二世(1316—1334)采用的清册称为“全世界所有教会和修道院定价表”，表中注明所有天主教世界采邑的收入。这张定价表是計算服务費和年稅的基础。采邑的价格經常上漲。十四世紀时某些采邑的年稅达 12,000 盾。

捷克在十四世紀时主教区的价格如下：布拉格主教区值 2,800 元金币，奧洛摩茲主教区——3,500 元，里頓茂契尔主教区——800 元；要知道交納的不是別的，而是金币。捷克在十四世紀上半叶时有 600 个采邑向教皇交納年稅。①

康斯坦丁会議上(1414—1418)法国的僧侶訴苦說，教皇国庫从法国的主教和修道院长身上得到了 697,000 元金币。

根据德国历史学者齐梅尔孟的資料，宗教改革前的德国“每一个高級教士在就职时应納費 15,000至 20,000盾，甚至更多些。有这种情形，例如在拜塞烏八年之中主教換了三次，而在十八年之中有四次发生空缺；因此在此期間只得交納四次年稅。在美因茲七年之中(从 1505—1513)，大主教职位有三次发生空缺，每发生一次空缺就得向早已因苛捐杂稅而破产了的臣屬人民征

① 約瑟夫·瑪采克："胡斯革命运动"，莫斯科，1954 年，第 16 頁。

收金币两万盾"①。

捐买教会职位者的道德面貌，教皇是毫不关心的。

教皇任命未成年的孩子为主教，因为他們的父母已預付了年税，并且任命高級教士和貴族的非婚生子为主教，从教規观点而言，他們因自己的出身关系而被認为是"不端"的。例如，貝尼奇克脫七世登上教皇宝座的第一年就准許将采邑卖給 374 个"非婚生子"，其中的三分之二是僧侶的兒子，而其余的則为貴族的私生子。②

尘世俗人的被授与圣职，被認为是正常的事情，这在教皇領域內一直实行到 1870 年为止。德国在宗教改革前，教皇把收入最好的采邑以中等价格出售与大商行，特别是富盖尔的銀行家。

文艺复兴时期采邑的买卖特别兴隆。按照一位神父的話說，教皇象买卖"猪和牛"一般地进行交易。

"在罗馬进行的各种乡村小教区的交易——貝藻立特写道——其公开标价和五光十色实实在在酷似某一个喧鬧非凡的交易所中的賭博。"③

根据法国历史学者吉里曼的計算，阿維尼翁时期的教皇从出售采邑所得的进益占岁入的三分之二④，他們特别貪婪地追逐年税。现代的史料指出，在阿維尼翁的宗教法庭仅在一年之間把一个总主教，五个大主教，三十个主教和四十六个修道院院长解职和革除教籍，因为他們沒有交納年税。

这些高級教士償清了服务費和年税后，不等于对教皇的錢庫应尽的財政义务已尽完。1245年在里昂会議上由于英諾肯提四世的堅持，通过了一个决定，要求所有拥有采邑的教士（紅衣主教和教皇厅高級教士除外），如果他們每年有六个月不住在自

① 齐格尔孟："德国农民战争史"，第一卷，莫斯科，1937 年，第 113 頁。

② 貝尔納·吉里曼："教皇貝尼奇克脫十二世的功利政策"，第 34 頁。

③ 弗里德利赫·貝藻立特："德国宗教改革史"，第一卷，第 79 頁。

④ 貝尔納·吉里曼："教皇貝尼奇克脫十二世的功利政策"，第 150 頁。

己的教区內，則应在三年期間中繳納給教皇征稅官自己的一半收入。①

采邑主必須晋謁罗馬，虽然三年一次也行，算是为了朝拜“神圣”的地方。

伴随着晋謁罗馬就得备份厚礼送給教皇和紅衣主教，这就是晋謁的主旨所在。

十三世紀时实行一个规定，根据这規定采邑主可以豁免罗馬之行，只要交付給教皇国庫巡礼稅即可，稅額等于自采邑主居住地至罗馬及回原地的路費。

此外，主教們必須定期視察自己教区內的乡村小教区。当視察时主教們向教士征收特別的稅。十三世紀时教皇准許主教們不必进行視察即征收此稅，条件为稅金的半数应归教皇国庫。

教皇使节在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教区內居住和旅行期間的一切耗費，責成主教和修道院长担負。教皇使节从主教和修道院长那里得到的金額，通常远远超过他們的实际需要，教皇使节应将其中的一部份移归教皇国庫。

凡違反教規而保持自己職位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非婚生子”，已結婚者等等），应繳納非法运用收入稅給使徒署。

所謂“遺骸权”，准許教皇占有主教的遺产。隆脫說，这一項收入在十四世紀特別可观。②

教皇国庫尙把空缺着的采邑的收入据为己有。

为十字軍东征和宗教战爭奖励金基金而征集的捐稅是教皇国庫的一宗大收入。

十字軍东征稅常常占僧侶年入的十分之一。有时候六年接連着征收。經常十字軍东征稅也向俗人征收。例如，格里哥里九世在1235年要求法国的每一个教徒每星期为当时的一次东征

① 吉塞普·馬丁尼："十三世紀中叶教皇在法国的財政政策"，罗馬，1950年，第20頁。

② 威廉·隆脫："中世紀教皇的稅收"，第二卷，第107頁。

軍交納一个德克。当然，教皇的这种奢望只能部份地得到满足。

教皇为十字軍东征和与“不信者”作斗爭而征集的金錢，常常被他們花在其他的用途上。这些錢的一部份落到教皇亲屬和宠臣的口袋中去了，另外一部份用以償淸教皇厅的債务，收买和陷害反对基督徒的君王。

“全欧洲的僧侶阶級——意大利历史学者馬丁尼指出——抗拒和反对罗馬教皇及其代理人在經济上的奴役行为和可耻的貪慾……”①。教皇对这种抗議毫不在乎，同时繼續想出各种新的借口以榨取金錢。在每一个国家中，除了通常的苛捐杂稅而外，教皇的征稅官还征收数以十計的各种各样的当地稅收。例如，捷克教廷在十五世紀时征收著名的“慈善补助金”特別稅。②西班牙在十六世紀时有下列各种教皇制定的稅收：十字軍东征稅（或称“詔書稅”）；寺院稅，其数額根据1529年詔書的規定等于僧侶所有进益和收入的四分之一；庇护四世在1529年批准的制造兵船补助金（这笔費用每年达42万德克，从僧侶收入中征收，用以建立艦队与土耳其人和摩耳人作战），以及庇护五世在1561年批准的收入富裕稅。此外还有教会軍团上繳給教皇支配的錢，这笔錢年达20万德克。③

高級僧侶們不仅从信徒身上榨取他們应該交納給教皇的金額，并且还要为自己掙些賺头，否則就不必打算买进采邑了。就是这样，供养生活得极其奢侈的教皇、紅衣主教和他們周围的人的重担，就压在人民群众的肩膀上。正如却尔斯·李所說的“用現金买进的采邑是一只空閑和安稳的位置，应該在这一位置上尽可能地捞些收入，不耻于作重利盘剝，也不耻于耍各种各样的阴謀詭計；至于基督牧人眞正的职責早已縮減到最小范围了”④。

---

① 吉娛普·馬丁尼：“十三世紀中叶教皇在法国的財政政策”，第31頁。

② 約瑟夫·瑪采克：“胡斯革命运动”，莫斯科，1954年，第16頁。

③ 拉法爱里·阿塔米拉与克立維阿：“西班牙史”，第二卷，第179頁。

耶稣会会徒塔基一汶都里引了許多事实証明：主教职位常常由紅衣主教和显貴的子弟們所僭据，并且一代又一代地传給同一家族的成員。为了奉行符合他們圣职的宗教职务，主教們雇有“最下賤和不学无术”的僧侶——根据十六世紀一个紅衣主教喀斯巴拉·康泰里尼的話說——来代替自己；这些教士被授“主教执事”的称号，所有的宗教仪式都委托他們办理。主教本身只关心如何从自己的下屬处榨取更多的金錢。

宗教法庭为主教們带来了巨額的收入：遺产繼承案件，发給証書时所收的苛捐杂税，宗教法庭强加在信徒头上的各种罰金。

教会的显貴学习教皇的榜样，剝削自己采邑中的农奴，把乡村小教区和圣礼当作商品进行买卖。显貴們下面的僧侶和乡村小教区的教士們，同样地竭力設法从自己的信徒身上榨取更多的錢。

中世紀德国神学家彼得·康托尔談到主教时說，他們是錢財的猎手，而不是灵魂的猎手，他們的从者則是——“葡萄酒的过滤器，把掠夺所得送給了高級教士，留給自己的却是罪恶的沉渣”⑤。

僧侶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为什一税——税額为田間收获量的十分之一，教会尙在四世紀时即开始征收此税。封建主們是不交納什一税的。这税的全部重担落到佃农和农奴的肩膀上。什一税应分成相等的四份。一份为主教所有，另一份归乡村小教区的教士，第三份用以支付教会日常开支，第四份捐贈給穷人。事实上主教和乡村小教区的教士把税收的极大部份据为已有。教皇国庫同样也分得在教会領地上征得的什一税的一部份。

不繳什一税被認为是重罪，有时被認作是异端。教会寺院不止一次地将不付这税的信徒革除教籍。

---

④ 亨利·却尔斯·李：“中世紀宗教裁判史”，第一卷，第18頁。

⑤ 同上，第14頁。

摩尔頓写道：英国在十四世紀时，“公众的意見是这样的，教士对于什一稅所感覚的兴趣远較拯救自己信徒的灵魂为大。有一张列举农民典型‘罪孽’的表証明上述意見的公正性；这张表是教士听取懺悔时用的。这张表中列举的第一宗罪是拒絕交納什一稅，其下的二宗罪是不按期交納什一稅和不繳全此稅。其余的十九宗罪几乎都是因为破坏教会制定的法規和不繳納人头稅，以及农民不向庄园主服劳役”①。

教士們在向农民勒索什一稅的时候，同时还关心着封建主的利益。在西欧各国“什一稅”一名詞，已成为用暴力和威胁非法强行征税的同义詞，对于这一点不应惊奇——英国历史学者亚历山大·考尔麦克指出。②

僧侶們另外一个收入来源是作宗教礼拜和奉行宗教仪式。浸礼和婚礼，忏悔和忏悔礼，塗膏礼和葬礼，追悼祈祷——所有这一切都为僧侶带来收入。教皇經常在自己的詔書中提到信徒有奉行各种宗教仪式的責任，特别是要奉行僧侶从而可以得到費用的宗教仪式。信徒从搖籃到棺木一生都有教士和僧侶貪婪的手向他們伸着。“这是忏悔費，这是弥撒費，这是圣餐礼費，这是恕罪費，这是传道費，这是祝福費，这是埋葬費，这是圣水費，这是祈祷費。甚至于老太婆为了使强盜和窃賊找不到起見而藏在头巾布里的最后一枚銅元，連这枚銅元也被他們夺去……”③——楊·胡斯在評論僧侶們的貪得无厌时这样写道。

教皇約翰二十二世（1316—1334）使忏悔礼成为所有信徒必須奉行的仪式。他禁止医生探視事前未曾忏悔过的病人。起先僧侶接受忏悔是收費的，由于許多信徒抗議的結果，后改为随願輸助。事实上僧侶們在接受忏悔后总是要索取相当的报酬的。④

---

① 摩尔頓："英国史"，莫斯科，1950年，第112—113頁。

② 亚历山大·考尔麦克："商业与农业"，倫敦，1930年，第52頁。

③ 約瑟夫·馬采克："胡斯革命运动"，第13頁。

普通僧侶极端不学无术。耶穌会会徒塔基一汶都里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乡間教士連讀書和写字都不会。他們的特点是貪婪和好色。意大利人民說，当教士是入地獄最可靠的办法。修道士的行为和教士同样地不成体統。塔基一汶都里被迫承認："否認这一点意味着反駁很明白的和不容爭辯的証据。"⑤ 他还引援了許多文艺复兴时期寺院中道德敗坏的事实，当时道德墮落在寺院中占压倒优势地位。

管理着"慈善机关"——养老院、医院和教养院，这些机关有着自己的領地——的修道士和教士們在孤兒、病人和老年人身上大发其財，关于这一点十六世紀西班牙神学家路易斯·維凡斯在自己的論文"論救济貧民"中巳予証实，塔基一汶都里是經常引証他的文章的。⑥

由此可見整个教会，上自教皇下至修道士，是靠劳动人民負担其生活費的。教会同所有的封建主們一样地剝削劳动人民。

买卖贖罪券在数百年期間內是教皇国庫最有利可图的收入来源之一。教会有权寬恕信徒的"罪"，即真正違背教規的要求或仅是被認是違背教規(不仅限于宗教問題)，予"罪人"以处罰。早在十一世紀时巳利用"恕罪"来賺錢。十一世紀初法国主教庞蒂答应所有該受重罰的人将忏悔費的三分之一移贈蒙脫瑪茹尔寺院以代替捐献和在寺院命名日朝謁他的教堂。庞蒂的贖罪券正如我們現在所說的那样，有着很大的財政效果。接着法国以及与法国邻近的国家中的其他主教們，也开始頒发类似的贖罪券。

十二世紀时，法国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阿培列尔抱怨道："利

---

④ 亨利·却尔斯·李："拉丁教会的忏悔与赦罪史"，第一卷，倫敦，1896年，第408頁。

⑤ 彼得罗·塔基一汶都里："意大利耶穌会史"，第一卷，第一篇，第52—62、70—91頁。

⑥ 同上，第373頁。

慾熏心的主教們在建造教堂、祭坛祓除式、墓地祝福礼或举行其他类似仪式的借口下，召集群众集会，答应所有参加集会的信徒其忏悔費可以較規定日期迟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时間交納，从而达到他們自私的目的”。

由于十字軍东征的缘故，赎罪券得到了很大的推广。起先教皇答应予十字軍东征的参加者以恕罪。其后，所有交納了与到巴勒斯坦所需旅費相等金額的人都可以得到恕罪。

教皇逐漸地将恕罪的原則推广到以金錢贖买一系列罪恶上面去。例如，格里哥里九世在1240年准許法国布道僧团住持寬恕因殴打神职人員而被革除教籍的信徒的罪，代价相等于旅行罗馬并在那里滞留所需的費用。① 問題在于包括殴打教士在内的各种重罪，是可以得到恕罪的；不过须亲自到教皇厅央求，就是說得付給教皇国庫相应数目的一笔錢。这类罪称为由教皇审判的重罪。正如完全忠实于教廷的天主教历史学者巴斯托尔所承認的那样，教皇一走上以恕罪来換取金錢的迷途以后，便使頒发贖罪券贬低到商业交易的地位。

十三世紀时神学家亚历山大・茄列斯基首創“过剩神恩宝藏”說，并由福瑪・阿克汶斯基发展了这一学說。他們肯定地說一滴基督的血已足以贖取人类所有的罪恶，而基督所流的其余的血，他的痛苦和死亡，以及“圣徒們”与“德僧們”的功績組成了“神恩”的額外部份，而这一部份神恩是由基督的全权代理人教皇負責处理的。教皇可以将这一部份神恩施舍給或者出售給有罪的人或功績少的人，从而保証这些人进入天国。

“过剩神恩”說比較此前存在过的“理論”对僧侣更为有利。此前的理論也曾为教会带来了不少的收入，根据以前的理論，占有圣徒遺骸和遺物的可以进入天国，罪人所占有的圣徒遺骸和遺物愈多，他就愈有希望避免在死后受懲罰。貝藻立特曾举勃

---

① 吉奧普・馬丁尼：“十三世紀中叶教皇在法国的財政政策”，第18頁。

兰頓堡紅衣主教阿里勃立赫脫为例，这位紅衣主教會蒐集了8,933份和42付"完整的"遺骸，据他自己計算可以保証贖39,245,120年220日的罪。[①] 然而不管制造和銷售圣徒遺骸和遺物对于僧侶們是如何地有利可图，可是和用贖罪券来做交易一比較就显得太手工业化了。因为贖罪券(一块羊皮，当发明印刷机后为一小张紙)比起"圣人"的遺骸和遺物来，其制造、携带和保存不可比拟地要容易得多。贖罪券使恕罪这个交易較前大为簡便，并且甚至使这一交易高雅化，因为在此以前僧侶出售的是这一类能为罪人打开通入天国大門的"圣物"，例如"圣母的奶汁"，上帝用来塑造亚当的大馬士革的泥土，"圣灵的手指"等等。

梵蒂岡出售贖罪券的事务是由听悔审判厅經营的，并由它規定贖罪券的价格。貝尼奇克脫十二世(1334—1342)把听悔审判所变成为一只吮取信徒金錢的眞正唧筒。他頒行了著名的"圣使徒听悔价目表"，表中列举只有教皇厅才能恕免的特别重的罪孽。这张罪孽价目表的本文在上世紀末第一次为修道院院长琼斐里所公布。

听悔价目表中經常有各种新的罪孽添进去。現在已經有近十种十五世紀的上述价目表的初版为众所周知。其中的一份这种初版被苏联教廷史学者斯·格·罗洵斯基在列宁格勒的薩尔蒂柯夫—謝德林公共图書館发現，并于1954年公布。[②]現在列举一些这张与众不同的价目表上的价格，不需要作任何解释："饒恕写了虛伪的証明文書的人——7个格罗斯"；"饒恕在教堂內接触女人(肉体上)及有其他淫乱行为的人——6个格罗斯"；"饒恕强奸少女的人——6个格罗斯"；"饒恕弑父、弑母、杀兄弟姐妹妻子以及其他血亲的人——5或6个格罗斯"；"饒恕重毆自己妻子，以致她流产的丈夫——5个格罗斯"；"饒恕和特别恕免对

① 弗里德利赫·貝藻立特："德国宗教改革史"，第一卷，第105頁。

② 罗洵斯基："教廷的'忏悔部'"；拉姆："教廷的恕罪价目表"(見"历史、宗教和无神論問題"第二卷，莫斯科，1954年，第320—350，412—454頁)。

俗人进行掠夺、縱火和凶杀的人——8个格罗斯"等等。

贖罪券在罗馬制造，裝在箱子內运往欧洲的各个角落，由当地被授全权出售贖罪券的教士和修道士在講經坛上和在广場上采用小販的方式四处兜售，同时硬塞給市集上的商販。

"中世紀时期內——却尔斯·李写道——如洪水般泛濫于整个欧洲兜售贖罪券的教士，是社会最致命的灾难；这些圣物的持有者和特权者，滿腹詭計和桀聒不休地强要为人免罪，打开进入天国的大門。他們种种欺騙行为都干得出来，毁損了教会的名譽同时使輕信他們的人傾家蕩产。有时他們是罗馬或某一教区主教的全权代理人；有时他們用一定数目的錢或收益的一部份，买得在某一区买卖贖罪券的包办权；有时他們从教皇厅或当地高級教士买得經商的許可証。"①

十五世紀时德国成为銷售贖罪券的主要市場。教皇使节、征稅官和贖罪券經售人的貪得无厌不但引起了德国封建主們的抗議，并且也引起了当地教会貴族們的抗議，因为教皇官員們把信徒的財物席卷一空，使他們收入的主要部份被剝夺了。美因茲大主教总管馬丁·馬耶尔写給紅衣主教爱涅紐·西里維紐·庇克柯洛米尼（后为教皇庇护二世，1458—1464）的信，是这方面特出的一封信。馬耶尔写道："罗馬教皇为了精确地从我們野蛮人身上擠出金錢，已經发明了数以千計的办法……可是現在我們的大公們已經从酣梦中惊醒，他們开始考虑如何从压迫我們的灾难中解脫出来，并且已經最終地决定完全拋掉罗馬的羈絆和重新建立起自己古有的自由。假使大公們眞的实現他們的計划，那么这对于罗馬教皇厅将是一个不小的不幸"②。

罗馬教皇不管愈来愈大的抗議，繼續发明新的苛捐杂稅以及在德国扩大推銷贖罪券。十四岁便任紅衣主教的里夫十世

① 亨利·却尔斯·李："中世紀宗教裁判史"，第二卷，第578頁。

② 卡尔·卡烏斯基："最新社会主义的前驅者們"，第二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5年，第7頁。

(1513—1521)，在这方面特别勤奋。里夫十世在1514年和德国銀行家富盖尔和二十四岁的美因兹及馬格德堡大主教亚尔培脫(亚尔培脫是通过富盖尔买到大主教称号的)，签訂了一张在德国銷售价格总値五万德克贖罪劵的合同。亚尔培脫在富盖尔的領导下派遣修道士和传教师到德国各地，用尽一切正当的和不正当的手段将贖罪劵銷售給信徒。贖罪劵推銷員修道士瓚采里特別"聞名"于四海，他的行径是引起馬丁·路德发表演說攻击教会的导火綫。

里夫十世在1519年曾派遣法兰西斯会徒貝尔納金·薩松作为銷售贖罪劵的"总全权代表"到瑞士去。事后这位法兰西斯会徒自夸道，他在瑞士为三位教皇弄了18万德克的收入。虽然十七世紀时贖罪劵的大規模銷售由于受到公憤而收束了，然而交易并未完全断絕，并且一直繼續到今日，虽然已无十五——十六世紀时的規模。

教廷在过去和現在还用庆祝所謂"圣年"名义进行恕罪以搜括金錢，在这些年份中当朝参圣地者来罗馬参拜"圣地"时，卖給他們贖罪劵，信徒們来朝拜罗馬时显然对教会的捐助、餽贈和送礼是不会吝嗇的。

被迷信的人認为是"凶年"的年份，他們預言要有灾禍，而教会則把这样的年份宣布为"圣年"，例如——末尾数字为100，50，13的年份。在人民的思想中这些数字是和瘟疫、战争和天灾連結在一起的。僧侶們在他們自己散布的"世界末日"已經到来这謠言上特別发財。黑格尔写道，在九世紀末"整个欧洲籠罩着普遍的恐惧，因为預期可怕的审判将要来到和相信世界行将毁灭。恐怖的感觉促使人們干出毫无意义的行为。有一些人把自己所有的財产贈給教会而自己終身在忏悔中度日。大多数人沉溺于淫佚生活中和将自己財富耗尽。而只有教会由于接受贈与和遺囑发了大財"①。

西班牙历史学者考尔美洛指出，中世紀时"当一开始有死亡

枕籍的瘟疫或流传世界末日来临的謠言时，人們对教会和修道院的捐献，远远超过最狂热最虔誠的信徒所为”②。

第一个“圣年”——1300年——是教皇波尼法齐八世(1294—1303)宣布的。宣布1300年为“圣年”追求着双重的目的。从一方面来說，教会此举防止了在这“宿命的”一年“威胁”人类的灾难，教会的这种威力应該予以显示一番；从另一方面来說，預期朝參圣地者到了罗馬后一定会在罗馬各教堂的祭坛上堆滿大量的献金。在公元1300年正如众所周知根本不曾发生过什么世界末日；至于談到贈礼，如果相信編年史的話，那么教士們在整个“圣年”期間日以繼夜地連数也不数，用耙子耙集献在圣彼得大教堂祭坛上的錢币。③ 在这一个异常幸运的开端之后，教皇們愈来愈經常地宣布“圣年”或者“紀念年”，有时为此找寻出十分荒唐的借口，例如教皇烏尔拜六世(1378—1389)規定每33年举行一次“紀念年”，“由于我們的生命短促”和“耶穌之死”正在三十三岁的緣故。

“神圣的”1450年，根据同时代人的証言，将如此众多的黄金吸收到罗馬，以致于在意大利其余地区差不多不再剩留下金子了。④ 教皇不滿足于到罗馬朝圣信徒們的捐献，他在一些城市銷售所謂紀念年贖罪詔書，贖罪詔書似乎能够解除信徒們的所有罪孽，他們可不必长途跋涉耗費大量金錢到罗馬去。1392年慕尼黑要花500格罗斯来买一张这种詔書，而布拉格則花100格罗斯。梵蒂岡在今日仍旧奉行“圣年”(最近的一次“紀念年”为1950年)。

---

① “黑格尔全集”，第八卷，莫斯科—列宁格勒版，1935年，第352頁。

② 瑪紐尔·考尔美洛：“西班牙經济政策史”，第二卷，馬德里，1863年，第148頁。

③ 柯里林：“中世紀教廷史中最重要的一些时期”，1901年，第131頁；卡尔·卡烏斯基：“最新社会主义的前驅者們”，第二卷，第142頁。

④ 庞蒂：“罗馬教廷的圣灵銀行及其經济职掌(1605—1870)”，罗馬，1951年，第7頁。

創始于八世紀的宗教审判是“起发現、战胜和防止异端作用的”，它也是教皇国庫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尚在英諾肯提三世时（1198—1216），曾命令“在隶屬于朕的世俗法庭管轄的地区，异教徒的財产予以沒收；至于在其他各国，朕命令：使世俗君主因畏惧受到宗教处罰而接受朕的这一措施。已背弃异端的异教徒的財产，如果因怜憫他們而于某人有所不便时，可不必归还”①。

逐漸地在意大利，不論是教会地区或其范围以外，确定了由“洛脫”审判厅、宗教审判厅和教皇办公厅共分沒收財物的慣例。教皇办公厅用发給被法庭起訴的人或恐怕被传訊的人、因規避宗教法庭审判而被革除教籍的人或居住在教皇轄区外而受到宗教法庭审判的人以保护状，从而得到大量金錢。

被宗教审判厅逮捕的人应詳尽地供述自己的財产情况，指出自己債务人的姓名，使宗教审判厅可以向他們追还欠款，以遂私利。从另一方面，宗教审判厅决不煩劳自己代异教徒偿清債务。为了撤銷异教徒亲屬在法律上所受的各种限制，宗教审判厅得征收特別的費用。假如被視为异教徒的嫌疑犯在交納保証金后获得释放，那么保証金一般是不归还的。宗教审判厅为了渴望拥有雄厚的資財，它甚至經常宣布死者为异教徒。仅西班牙宗教审判厅的沒收所得，在十六世紀初期每年超过 100 万德克。

英諾肯提八世（1484—1492）在日尔曼境內大兴問罪之师，討伐“巫女族”，其目的則在于鎮压反罗馬教廷情緒，这場战争据同时代人証明最后变成为教皇国庫的“肥湯”了。“巫女族”的財产由宗教审判厅所沒收，每一个妇女因身怀妖术有罪而罰其向教皇国庫交納 2.5 盾錢币。无怪乎中世紀有一位牧师考尔涅里·劳斯称这場討伐“巫女族”的战爭为炼金术，靠了这場战爭

① 亨利·却尔斯·李：“中世紀宗教裁判史”，第一卷，第 317 頁。

从人的血液中炼出銀子和金子。①

由此可見，和"异端"及"巫女族"斗爭是教廷和教会的一宗可观的收入来源。

教皇們为了追逐金錢，大肆买卖教皇厅中的职位，因此，教皇厅官員的数目不断地增多。

教皇西克斯脫四世(1471—1484)建立了由72人組成的縮写局(职务为将教廷的公文压縮成为短文)，并从卖出这些职位中赚了38,400德克。他在此后还設立了怪异的职务，如羽林軍校尉、近卫軍和近卫騎兵。尤里二世(1503—1513)設立了一个称作档案局的新机构，从而卖得7万德克。里夫十世頒定了1,200个新职务，赚了90万兹庫提。里夫十世并还建立由401人組成的圣彼得僧团，他用这位置奖賞人，总共得了1,000兹庫提。庇护四世将可以出售的职位增加到3,500个，等等。

教皇厅职位的价格不断地增高。根据洛洵斯基的資料，"在十六世紀中叶的短短一个时期內，羽林軍校尉一职从300德克漲到1,250德克，在1503年时司書的职位值700德克，而到1541年时为1,300德克；'誓約收集人'在1486年为500德克，而在1514年則为1,400德克。卡里克斯脫三世时代(1455—1458)司書的位置值1,000德克，过五十年后当尤里二世时則值2,000德克，而当尤里二世的侄子里夫十世为教皇时，漲到3,000德克。定价人一职的价值也同样如此，在短短的时期内从2,000德克漲到5,000德克。'誓約部'主任的位置在十六世紀初期值5,500德克，司閽——2,600德克，信使——800德克。申請書收发員一职在庇护二世时只要50德克，而在1514年則达1,450德克。因此，教皇厅的每一个官員尽力設法捞回自己的投資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得不到薪俸，于是便将麕集在罗馬請求各种'恩典'的信徒們的所有血液吮尽。教皇办公厅中的这些职位常常售給那些

① 許柏林格、英斯錫托里斯："巫女的鎚子"，莫斯科，1930年，第41頁。

完全不曾在教廷中服务过的人們。这些人們用金錢买得职位，每年从中得到一定的利息(一般为百分之一百)，經过十年后本金就全部償还了”①。买得教皇厅中职位的人往往顧人代他工作和收取賄賂。

根据天主教历史学者阿道尔夫·戈脫劳勃的估計，自西克斯脫四世起至庇护四世止近百年期間，教皇們因出售职位总共得了 192万3,000兹庫提。

出售职位制度将教皇厅变成了貪污和賄賂的淵藪，官員們毫无忌憚地掠夺“教皇宝座”的被保护者們的錢財。教皇厅中所有的人，自司書到紅衣主教并包括教皇在內，都收取賄賂和要求納賄。关于这一点有同时代人和教会的历史学者无数的証言，以及寺院的决議和其他文件可以証明，这里沒有必要引述，因为上述事实甚至連教会的頌揚者們也不想反駁。

教皇們出卖自己私有产业的方法很巧妙。他們組織了独特的股份公司以管理某些采邑的收入。持有这种公司股票的股东保証可以得到公司平均年入的百分之十。这一制度的創始人是克里門脫七世，他在1526年創办“信心公司”，資本額为20万兹庫提。其后創办了經营制盐，磨粉和其他壟断性行业的公司。当格里哥里十三世时(1572—1585)已有十二个这样的公司，資本額共达472兹庫提，公司年入的4%—12%作为股息分給股东。②

巴維尔五世在1605年創立“圣灵”儲金銀行，这家銀行直到今日还开設着，其投資出自拥有无数田产的圣灵修道院。

十五和十六世紀时教皇国庫因壟断白矾的买卖而得到了不少的收入，对明矾买卖的壟断教皇們是在十五世紀下半叶才建立的。在此以前是从土耳其人那边購买明矾用于染織物、鞣制

① 罗洵斯基："教皇的‘忏悔事务局’"("宗教与无神論历史問題"第二卷，莫斯科，1954年，第338—339頁)。

② 法兰契尼："十七世紀罗馬經济的方向和史实"，米兰，1950年，第3031頁。

皮革及其他用途。当在教廷的土地上发現埋藏着明矾后，在一个名叫托里夫的小地方，教皇用革除教籍威吓信徒，不准他們从“异教徒”那里买明矾，同时責成将在教廷土地上开采到的明矾归还教会。教廷在1461年建立了买卖明矾为业务的“鋁业公司”，教皇将这家公司租給各种商人和銀行家(基特齐、密奇契以及其他銀行家)。买卖明矾为教皇国庫每年带来了10万德克的利息。

在罗馬和教皇地区对粮食买卖的垄断，也是教皇国庫的一个收入来源。例如，西克斯脫四世在意大利南部以每斗一德克的价格購进粮食，卖給罗馬人时每斗为四到五德克，败坏的粮食也要卖到三德克一斗。尤里二世創办的“阿諾娜”从事粮食的投机买卖，供应和出售粮食制品給罗馬居民是該机关的官定职責。“阿諾娜”被教廷的頌揚者們描摹成为一个慈善机关，商人們可以从它那里买到許可証，抬高粮食的售价。尤里二世从出售上述許可証得到91,000德克。

根据荷兰駐教廷大使勃林維里(十七世紀)的話，“阿諾娜”的仓庫是一个小秘魯，它和秘魯一样繳納銀子和金子給其主人——罗馬教皇。“将这些仓庫称作为公共的粮仓是完全錯誤的——勃林維里写道——这些仓庫仅仅是追求通常商业利潤有利可图的商行而已，并且它常常使教皇国挑起重担，因为教廷縱容某些自己的宠臣們使教皇国瀕于灭亡和使教皇国庫破产。空虛的教皇国庫反正是要靠各种苛捐杂税来充实的，而这些税收終于使教皇領域內的居民完全破产”。

除上述而外，以下各种收入在中世紀的各个不同时期也是教皇国庫的收入項目：1.信徒遺贈給教皇的财产和珍宝。2.罗馬各教堂祭坛前的捐献(半数归該教堂的僧侶，半数归教皇)。3.信徒給教皇的各种贈与、捐献和贈礼。4.庇护五世(1566—1572)实行的瀆神罰金；因辱罵上帝和圣徒得交納罰金25—100德克。5.以罰金代替监禁。6.出售貴族称号或批准貴族称号使其

合法。7. 修建教堂和修道院的捐款，捐款的三分之一(有时更大些)归教皇国庫。8. 教皇厅的顧客因直接从教皇那里得到恕罪或准予作从教规观点認为是不合法的行为(收养"非婚生子"或异教徒子女等)而繳納的費用。这笔費高于教皇办公厅和教皇厅其他机关的普通税額，其数額根据請求人的財产状况和得其同意而定。① 9. 垄断食盐买卖的所得。10. 向住于教廷领地上异教徒征收的税。11. 偶尔鑄造成色不足的錢币。12. 妓院税，妓院在十五世紀时每年为教皇国庫带来两万德克进款。13. 彩票和打賭税；其中包括賭任命新紅衣主教、教皇的死期和新教皇的名字等，这税为西克斯脫五世頒布的(1585—1590)。14. 輪盘賭税，这种賭博是克里門特十二世在1732年采行的，以及其他等等。②

进入教皇国庫的巨額財富究竟往哪里去了和如何耗費的呢？雷路阿尔在研究阿維尼翁时期的財政情况后，根据不完备的資料制了一张收支表。下面我們援引克里門特六世和英諾肯提六世統治时期(十四世紀中叶)的材料(以佛罗倫薩的弗罗稜計算)，这些材料能部份地回答上述所提的問題：

收入	克里門特六世	英諾肯提六世
1. 服务費……………………	501,270	455,870
2. 巡察税……………………	293,792	223,800
3. 十字軍东征税……………	98,359	24,840
4. 征税官收得的税(年税等)…	680,102	581,765
5. 什一税及其他税…………	——	221,356
6. 各种收入包括借債在内……	405,154	1,030,636
总共	1,978,977	2,536,267

① 威廉·陸鋭："中世紀教皇的税收"，第二卷，第129—132頁。

② 庞蒂："罗馬教廷的圣灵銀行及其經济职掌(1605—1807)"，罗馬，第11—13頁。意大利政府从教廷繼承了輪盘賭税这一份遺产，直到今日仍为意大利預算中的一項收入。

支出項目	克里門特六世	%	英諾肯提六世	%
1. 飯菜	174,718	10.11	76,838	3.84
2. 面包	13,138	0.73	8,668.5	0.40
3. 酒	40,647	2.30	38,851	2.20
4. 車馬費	23,421	1.27	15,628	0.89
5. 服裝	95,907 (五年之間)	12.00	—	—
6. 艺术品	39,573	2.50	9,729	0.56
7. 書籍	2,290	0.13	319.5	0.01
8. 修建房屋	202,537	12.20	35,755	2.00
9. 法庭維持費	2,358	0.14	969	0.05
10. 武器	20,820	1.18	1,150	0.05
11. 軍队維持費	213,155	12.00	176,676	8.80
12. 宫庭維持費	340,806	20.10	282,482	14.12
13. 房租	2,414	0.14	3,144	0.16
14. 不动产購置費	42,656	2.86	1,441	0.7
15. 慈善事业費	287,027	17.00	144,529	7.20
16. 战爭开支	161,806	9.80	797,605	40.00
17. 巩固阿維尼翁城堡的费用	—	—	124,737	6.20
18. 教皇个人的貪污	—	—	240,915	12.00
总計	1,663,373	100	2,122,728	100①

甚至于这些远不完备的資料也大可借鏡。这些資料說明教皇因个人的需要而耗費掉了罗馬教皇厅过半数的收入。至于教皇对貧苦人的施舍，那是不得已的事，一方面为了巩固自己在信徒中的威望，另一方面为了使居住在教皇領地上貧困不堪的人民大众不致騷动起来。克里門特六世耗費在自己的飲食和服飾上的錢比施給自己所有的貧苦的臣下为多，而"俭朴的"英諾肯

① 伊夫斯·雷諾阿尔德："1316年至1378年間教皇阿維尼翁与財团之間的关系"，第32頁。

提六世放在自己口袋中的錢則为施舍給自己領地上穷人們的两倍。

教皇們是生活上极为放蕩不羈的人。他們的慾壑远远超过教皇厅的收入。除以慳吝聞名的約翰二十二世及巴維尔二世外，其余大多数教皇遺給自己的繼承者的只有債务。約翰二十二世在死后遺有1,700万盾的現金和价值达700万盾的銀器和珍宝，而巴維尔二世死后則遺有价值100万德克的珍宝，30万德克的珍珠和7,000德克現金。新即位的教皇即刻开始自己的事业，請求高利貸商人帮助，使有可能支付加冕礼的各項耗費。教皇馬丁五世(1417—1431)为此目的在当选教皇以后曾以教皇皇冠作为抵压品抵押給别人。人們譏論馬丁五世时說他一文銅枚都不值。可是他的繼承者叶夫根尼四世为自己买了一項价值38,000德克的新皇冠，制造这項皇冠曾用了15磅黃金和5.5磅珍珠。巴維尔二世也为自己定制了一項价值13万德克的皇冠。

教皇們爱好豪华和奢侈，如帝王般地賞賜自己的情妇和宠臣，在建造和裝飾自己的宮殿方面耗費了以千百万計的金錢。甚至僧侣比拉依奥曾对吝嗇鬼約翰二十二世說，教会的財富被教皇們花在小丑和狗上面了。西克斯脫四世的同时代人在写到他时說，

城市的毁坏者，天国的羞辱
掠夺孩童的強盜，淫夫和小偷①

他曾以宮庭、别墅、田产和公国贈給自己的宠臣。根据亚历山大六世的司礼官波尔哈尔特的証明，亚历山大六世在梵蒂岡的宮殿內广設盛宴，将所有的財产都吃光。人們在談到里夫十世时說，他将三朝教皇的財产都花得蕩然无余：自己的、前人的和繼承者的。如波尔哈尔特所叙述，里夫十世为了搜求金錢甚至到了这种地步，他把自己宮庭中的地毯、銀器、甚至教廷小教堂

① 斯蒂芬諾·英菲苏拉与約翰·布哈尔特："日記"，莫斯科，1939年，第90頁。

中的使徒圣象都交給高利貸者作抵押品。

里夫十世遺下的債务如此众多，甚至为了償清債务而拍卖教廷的珍宝，其中教皇宝冠也在內。拍卖所得的金額仍旧不敷应用。"罗馬教廷的所有銀行家——柯里林写道——都因圣彼得揮霍无度的繼承者破产的緣故而破产一半"。①

塔基一汶都里引据巴維尔三世同时代人的証言說，巴維尔三世在"使徒"宮設宴庆祝謝肉祭，紅衣主教們屆时戴着假面具身背裸体妇女参加。耶穌会会員塔基一汶都里被迫承認，教廷圈子內的放蕩和腐化行为是早已肯定和无可爭辯的历史事实。②

教廷中的任用私戚的风气象不知饜足的吸血蛭一样不断耗費着"宗座"的国庫。照例，教皇們是从年迈的紅衣主教中选出的。他們知道自己已經风烛残年死期不远，所以急忙設法使自己的家族发財。教皇們贈与自己的亲屬(特别是侄子)巨額的金錢、土地、庭院和艺术杰作。

按照当时的传統，教皇們任命自己兒子、兄弟和侄子們为紅衣主教，授与他們教皇厅的重要職位：紅衣主教团的首領、国务卿、罗馬总督、教皇各行省的总督等。教皇的亲屬們在身居高位后，始終受他們的庇护者不久就要逝世的威胁，因之积极展开搜刮財富的活动。他們如同蝗虫一般，以惊人的速度把从基督世界四面八方汇集到梵蒂岡的財富充实私囊。

西克斯脫四世时，其侄子彼耶罗·洛維列、柴凡宁·洛維列和朱里亚諾·洛維列差不多把教皇厅的所有收入都据为已有和蕩尽了。彼耶罗·洛維列用四万德克为自己买下了依摩拉城。柴凡宁从教皇处得到西涅茄里公爵头銜和教会在蒙泰維奧的領地及与之毗邻的地区；教皇尙逼迫弗列德里各·烏尔宾諾的女兒嫁給柴凡宁，因此烏尔宾諾公国就归屬于洛維列家族。

① 柯里林："中世紀教廷史中最重要的一些时期"，第157頁。

② 彼得罗·塔基一汶都里："意大利耶穌会史"，第一卷，第一篇，第33頁。

英諾肯提有着七个他承認的兒女。他被称为罗馬"眞正的爸爸"，因为大家認为"永恒城"的街道上充斥着他的孩子。英諾肯提贈与自己的兒女們以庭院、田产和巨額金錢。

热那亚駐罗馬教廷的使节鮑卡巧在談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亲屬时写道：他們是如此貪婪，即使有十位教皇也无法塡滿这群餓狗的肚皮。里夫十世把自己的四个侄子擢升到紅衣主教的尊位。他們的慾壑难塡，以致于里夫十世的繼承人巴維尔三世不得不判处他們死刑。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本人任命自己年幼的孙子为紅衣主教（十四岁的亚历山大·奥尔西尼和十六岁的格維杜·斯福尔蔡），和把巴尔姆和比雅欽茨公国給自己的孩子們操縱。尤里三世将卡梅林諾公国贈与自己的兄弟巴尔杜維諾·蒙悌。格里哥里八世封自己的兒子柴柯摩·庞康帕尼为維尼奥拉的侯爵并为他在那不勒斯王国物色了四位有女公爵銜头的小姐。西克斯脫五世使自己的两个侄子成为紅衣主教，每年付以10万兹庫提年金，另一个侄子則封为侯爵，其后升作公爵，两个侄女則嫁給公爵为妻。格里哥里十四世使自己的侄子成为蒙悌·瑪尔却諾公爵。

利奥普·朗盖在研究罗馬教廷的档案后写道，根据他所发現的文件，克里門特八世在統治教会的十三年期間曾贈与自己的亲屬百万以上的"現錢"。①巴維尔五世的侄子斯切邦·鮑尔蓋澤一个人就从自己叔父那里拿到这样大的款子。格里哥里十五世任命自己的侄子路德維柯·路德維希大公为教廷总管，当教皇国庫年入为150万兹庫提时，他的年俸达20万兹庫提。根据同时代人的証言，烏尔拜八世曾交給自己的亲屬神話般的款項，达一亿零五百万兹庫提。他巧妙地把考里齐宮的全部大理石剝下来，为自己的家族建造庭院。罗馬人因此說，"罗馬不是野蛮人破坏的，而是巴尔比林尼破坏的。"

① 利奥普·朗盖："最近四百年来的罗馬教皇"，1847年，第363頁。

烏尔拜八世无比的徇私引起了罗馬显貴社会的极大不滿，他們畏惧巴尔比林尼家族势力过份强大。为了緩和敌视他的情緒，烏尔拜八世在1640年召集了一些有权威的神学家組成委員会开会，并授权委員会解释教皇是否有权庇护自己的亲屬。委員会議决說，教皇可不受拘束地使自己的亲屬們享受长子繼承权，其年入不超过八万兹庫提現金，而其女兒們(!)——贈与价值18万兹庫提的嫁妆。烏尔拜八世死前不久曾向另一个神学家委員会提出問題說"教皇庇护自己的侄子們是否过份了?"。委員会在回答这一問題时說："教皇侄子們的敌人十分众多并且势力雄厚，为了宗座的荣誉，給与他們其数量足以保持自己尊严的財富，使敌人的阴謀詭計不得逞，这是公正的甚至是必要的，而他們的尊严在教皇崩駕后不应有所降低。"①

英諾肯提十世时，梵蒂岡的国庫是由其弟妇奥琳庇阿·瑪依达奇尼掌管的，她是一个貪財的屬于上流社会的风流貴妇。②

教权派历史学者讚美庇护六世(1775—1799)把庞济区块澤地抽干了，然而他們对下列事实却不好意思說出口，就是这位庇护六世封自己的侄子为公爵，并且把用教皇領地上千万农民服苦役抽干的庞济澤地的最好部份贈給了他。

和教皇們搭挡的是紅衣主教們，教皇就是从中选出来的。紅衣主教的职位是和采邑密切联系着的，因此也是这項交易的客体。紅衣主教們是教会中最富有的采邑主。他們拥有田产、森林、河川和城堡，向隶屬于他們的修道院、寺院和乡間小教区斂錢。

紅衣主教除了采邑的收入外，还要参加分取教皇厅的利潤。戴上紅衣主教僧帽的价格异常昂貴。后面一个事实說明了教皇为什么要不断地增加紅衣主教团成員的数目。紅衣主教团在中世紀早期时由12人組成(根据神話中使徒的数目)，至西克斯脫

① "意籍教皇"，巴黎，1860年，第76—77頁。

② 馬利·倍尔："教皇簡史"，倫敦，1951年，第355頁。

五世(1586)时增为70人。教皇对待紅衣主教职位的态度，和对待其他的采邑相同。教皇們常常解除已成为紅衣主教的僧侶們的这一头銜，重新把它卖給別人。里夫十世曾控告以紅衣主教彼得路契为首的四个富有的紅衣主教以阴謀罪。教皇命令处彼得路契以絞刑，并把他的財产据为己有。其余的三个紅衣主教受到了严刑拷問，同时被迫交納巨額贖罪金。紧接着这件事，里夫十世以一笔交易卖出了39个紅衣主教的头銜，共得了22万9,000德克，其数額超过教皇厅的年入。

塔基—汶都里驕傲地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紅衣主教都出于欧洲最有权势的貴族家庭。他們是在王宫的奢侈和豪华的环境中熏陶成长的；他們耽于犬馬声色之娱，对旅行和战爭的爱好远較对宗教礼拜为深。作为他們是教士的唯一标志祗有僧衣僧帽，可是也不是經常穿戴的，他們把主教区和修道院視作为享用不尽的財源。塔基—汶都里就是这样描写他們的。[1]

紅衣主教們則在选举教皇时出卖自己的选票攫取教皇厅的巨額款項，收受賄賂——一句話，他們的"嘉言懿行"同教皇及其亲屬們的如出一轍。

紅衣主教們的行为不但与"公正"一詞无緣，甚至連最起碼的体面也不顧。关于这一点有中世紀时期的一个慣例可以証明，根据这一个慣例，教皇在灵床上举行特別仪式赦免紅衣主教們的盜窃行为，但所盜窃的財富不得超过600盾！

十六世紀时天主教教会虽然失掉了英国和德意志，然而教皇厅的收入却不断地增加着，主要是由于从美洲和亚洲殖民地流入黄金(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部份通过法国)。但是教皇国庫的債务增加得还要快，因为教皇及其周围人士的貪慾是以几何級数增加的，而收入却是以数学級数增加的。教皇們对于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风格頗为欣賞，于是为自己建筑了宫殿，为自己

---

[1] 彼得罗·塔基—汶都里："意大利耶穌会史"，第一卷，第一篇，第10頁。

建立紀念碑、巍峨壮丽的寺院(例如罗馬的圣彼得大教堂)、宗墓等，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大量資金。

結果是教皇厅的債务不断增加和經济上长时期入不敷出。这有下列数字可以証明。里夫十世时教皇国庫年入为32万兹庫提，而債务为100万兹庫提；当尤里三世时收入增为35万兹庫提；巴維尔三世时年入增加为70万6,000兹庫提；至1576年时已为100万兹庫提，至1587年时增至135万8,000兹庫提，可是在这一年債务却为750万兹庫提；1592年时为158万5,000兹庫提，而債务为1,224万2,000兹庫提，因此教廷收入的三分之二是用以償付高利貸者和各种教廷企业股票持有人的利息的。烏尔拜八世时(十七世紀上半叶)債务增为3,000万兹庫提；到1672年英諾肯提十一世債务达70,200万兹庫提，这个数目在当时是神話般的。利奥普·朗盖在教廷档案中发現这些数据后，幽默地作出結論說：“假使中世紀票据交換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教皇收入的性質，因为从世界各国都有金錢交到教皇厅，那么教廷在国家推行公債制度方面的功績亦不在其下，現在公債是和每个人有关的并为所有商业服务，因为这一制度也是首先在教会領域內发展起来的。”①

随着专制政体的巩固，王国政府开始限制教会的收入，由于这一緣故外国上繳給教皇国庫的金錢也开始減少。教皇們为了弥补損失，就增加教会領域內的稅收和加强对居民的剝削。关于教会領域內居民的穷困状况有同时代人的无数証言提到。薩凱蒂在1664年写給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信中說：“根据我昨夜的計算，使徒署的債务已經超过5,000万。不但沒有任何希望使它減低，还确信它将不断地增加。不幸的臣民們(教皇領地的臣民——作者)因为无力挑起沉重担子和失去了对債务总有一天会減少的希望，大批地抛弃了自己的房屋和故乡逃往异乡，举家流

① 利奥普·朗盖："最近四百年来的罗馬教皇"，第一卷，第321頁。

浪，以乞食度日；他們或因精疲力尽而倒斃道途，或逃往罗馬境外，希冀作其他領主的臣民，这是我們的耻辱。因为这个缘故，罗馬境内居民已减少了一半……圣父啊，这些灾难（教皇臣民遭到的——作者）要比犹太人在埃及遭受到的还要坏；这些不是被刀剑所征服的人民，而是隶屬于或者自願地臣服于罗馬教皇宝座之下的君主們的百姓，所受到的待遇比在叙利亚或者非洲的奴隶还要不人道。”①

但是在专制制度的土壤上却生長起新的力量——資产阶級。可是教会和整个封建制度的經济地位对于資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主教区以及小的公国拥有自己的領地，城市和乡鎮，它們和其余世界相隔絕，并且还有自己的税卡和千百种其他奇特的規定，这些都妨碍民族市場的建立和資本主义的发展。教会領地大多数都不納税，这是引起城市資产阶級对僧侶不滿的另一个原因。民法和宗教法規承認教会財产的永不割讓权。財产祗能落到教会手中，而不可能从中解放出来。而这些“僵死的手”使經济发展滞緩，使資本活动的場所变得狭窄。十八世紀时天主教僧侶們（新教徒們要早上二百年）在資产阶級的积极支持下，开始“减輕”教会的財产負担。在葡萄牙有庞巴里，在西班牙有卡尔三世的大臣阿朗达、卡姆巴馬尼斯和弗洛里达—勃兰卡，他們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以限制教会的权利。耶穌会被逐出“天主教”国家。十八世紀时教皇的威望降落到如此地步，甚至克里門特十四世（1769—1774）被迫解散他异常珍爱的“耶穌会”，况且即使这样做了，还不能从中取得金錢方面的利益；他将耶穌会的將軍李奇囚禁在圣安琪兒城堡的监禁室里并下命令拷問他，要他交出耶穌会的庫存。李奇正象貪財的耶穌会会徒所应做的那样，宁可把生命交給上帝，不願将黃金献給“教皇陛下”。

---

① “[illegible]教皇”，第170頁。

意大利启蒙学者安东尼奥·杰諾維奇(1713—1769)以憤怒的言辞痛斥这一时期的教廷道:"教会早已变成为政治的和經济的企业了。請你来到罗馬和熙熙紅衣主教的宮殿,童話般的别墅和堆滿純金做的器皿的桌子。唉,不幸的教会,唉,你已經成为庸俗和肮脏的娛乐場所!你的主教們早已成为說謊和詐欺的教授,在以上帝的法律作买卖。誰在說宗教,事实上是在說財富……"①。

法国資产阶級革命前夕教皇領地中的情况就是这样。

上述的事实指出,教廷領导着的天主教教会不仅保护着封建主的利益,并且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封建剝削者。以教皇为首的僧侶大軍依賴劳动群众为生,而农奴在劳动群众中占最大多数。他們以自己的血汗承担着教皇厅的一切开支,同时最起碼的修道士的生活亦由他們負担。

教皇和在他屬下的教会各教阶的僧侶对財富是毫不客气的,拚命从信徒身上榨取金錢。舞弊、謊話和欺詐,在宗教偏見上做的投机买卖——所有这一切都为上述目的服务。罗馬教皇厅的全部机构,教皇厅高級教士的所有才干都用来撈取万恶的黃金。教皇們的本領駕凌于中世紀炼金士之上。他們确确实实是从空气中炼出黃金来的。教会以圣徒遺骸和遺物,以"圣餐"以及恕罪作交易。教会从宗教审判和十字軍东征,从"圣徒"和"巫女",以致于从为信仰而殉教者的血及异教徒的尸灰中,都能得到利益。教会对明矾买卖和向妓院征税也沒有忽視。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放弃世俗的幸福和非难"罪恶的肉欲"这种伪善的表里不一致的說教掩盖下进行的,但这并不妨碍教皇本人和教会显貴們的奢华生活和耽于罪恶的淫乐。

教会对封建制度和封建剝削备极尊崇,認为是合法的,并奉之为"最高的荣誉"。

---

① 劳察:"意大利恢复統一的开始",第二卷,米兰,1948年,第725—726頁。

随着专制政体的巩固，教会成为王国政权的工具，与王国政权处于平等地位地繼續参与剝削劳动人民。教会在群众間传布信仰現存制度的神圣性質和不可动搖性，号召服从“罗馬皇帝”不得稍違。教会宣传对恶势力不要反抗，它答应給受苦受难的人入天国，以之麻醉人民群众，教他們如同奴隶般的俯首听命。因此权力和法律总是站在教会一边的。

但是应該指出，教皇和教会在数百年期間在群众中所以拥有势力，并不是因为他們保护了剝削者的利益，而是因为他們在信徒的心目中是神奇力量的代表——上帝的代表。而在注定过穷困生活和无教育的普通人之間，对上帝的信仰是特別强烈的。僧侶們应許在“来世”解脫所有的苦难，然而被蒙蔽的农民群众却是相信地接受了这个虛妄的和神話式的解脫。

亚当·斯密斯在十八世紀时不无嘲諷地写道：假使对这一个在封建时代形成的天主教教会，对这一个机构，不是由人类理性它的这一敌人来攻击的話，那么它将会永久存在。这一个庞大而精密的組織，根据这位英国經济学家的說話，是人的全部智慧所不能震撼的，更不用說推倒它了；可是它起先被封建社会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所削弱，后来部份地被破坏了。“正如富裕的男爵們一样——斯密斯指出——僧侶們也力图从自己的田产上收取更高的田租，以同样的方式揮霍，滿足个人的虛荣心和怪癖。然而只有将田地租与自己的农民才能保証提高田租，租得田地的农民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独立的农民。因此把下层各阶級人民束縛在僧侶身上的枷鎖，逐漸地松开和完全地断裂了……。下层阶級的人民不再象从前那样把这一阶层視作为自己需要时和生病时的助手和治疗者。相反地，他們被更富裕的僧侶們的空虛无益、奢侈和揮霍无度所激怒了。因为这些僧侶現在似乎在耗費一向認作是穷人們的財产，以滿足自己的慾望。”①

宗教改革是天主教教会危机的第一幕，这一次危机是声势

浩大的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教会的人民运动所引起的；第二幕是1789年的法国資产阶級革命。宗教改革动摇了教廷的势力，然而幷沒有摧毁它，特别由于西班牙和法国的支持，教廷仍旧保持了自己的部份地盘。“天主教”强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成为殖民帝国，这些强国的侵略美洲和对其居民的奴役，以及他們的势力滲入东方——亚洲、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对于宗教改革后时期內天主教教会的巩固和統一起着不小的作用。在揭露天主教教会参与对新大陆人民的奴役和剝削方面，研究上述情况也有着很大的意义。闡明教会的殖民者角色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資产阶級历史学，更不必說教权派的历史学，显然是站在頌揚教会的立場上来說明这一問題的。

由于上述原因，在分析法国資产阶級革命后所发生的事件之前，首先将教廷和天主教教会在十六、十七世紀期間参与扩展殖民地的情形詳細地介紹給讀者。

---

① 亚当·斯密斯：“对于自然和各民族財富原因的研究”，第二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35年，第322—323頁。

第二章

天主教教会在殖民地(十六至十八世紀)

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在美洲的殖民侵略，以及欧洲各强国势力的滲入亚洲、非洲和菲律宾，是在教廷和天主教教会的积极参与下进行的。

菲迪南和伊薩培拉在得到哥倫布首次出海航行結果的情报后，即要求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巴尔特齐亚)頒发給他們詔書，使西班牙对新发現陆地的权利合法化。西班牙需要这种詔書以保护自己不受葡萄牙人的排挤，因为葡萄牙人也在哥倫布活动的同一区域內进行探險。

1493 年亚历山大六世頒发了四张詔書，两张是 5 月 3 日頒发的，第三张是 5 月 4 日頒发的，第四张是在同年 9 月 25 日頒发的。詔書之多說明西班牙与葡萄牙竞爭之烈。如果說最初两张詔書是为了确認西班牙对哥倫布所发現的島屿和陆地的“权利”，第三张詔書則是規定西班牙的势力范围的，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是在离綠角 100 里格(約 550 公里)的子午綫之西。教皇将这条綫以东的“土地占有权”归于葡萄牙。①

由于葡萄牙人的抗議，第四张詔書将分界綫稍微推向西一

---

① 根据西班牙和葡萄牙在 1494 年訂立的托尔杰西里亚条約，規定以离綠角 370 里格的子午綫作为分界綫。1493 年 5 月 4 日的詔書和托尔杰西里亚条約的譯文見“哥倫布旅行記”，莫斯科，1956 年，第 240—243，375，377 頁。

些。

教皇将欧洲人已发現的和尙未发現的土地划分成西班牙和葡萄牙势力范围这一举动，引起了与这項决定无緣的天主教国家君王們的不滿。法国国王弗兰西斯克一世拒絕承認教皇的决定。“太阳照射我也如照射着别人一样——他声言道——假使給我看亚当的遺囑，而遺囑中有条款規定瓜分世界与我无份，我将是幸福的。”①

教皇是在什么权力的基础上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侵略者分攤新发現的土地的呢？詔書中說，这是基于全能的上帝的权力，这一权力是由圣彼得传給教皇的，同时还由于教皇是耶稣基督在人間的全权代理人而有权这样做。教皇們是在为自己爭取教会和平民社会中的首要地位而斗爭的期間，开始把这种权力归諸己有。

然而教皇为何如此急急忙忙地将差不多整个大陆“贈与”西班牙呢？当时有着各种原因。主要原因显然在于当教会的威望在德意志和英国显著地下降的时候，作为天主教教会在欧洲的主要堡垒之一的西班牙，其巩固对于教廷有利。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这一情况越发有着重大的意义。罗馬希望天主教势力在新发現土地上的扩大，会抵消天主教教会在欧洲所受的損失，它不但巩固了西班牙，同时也巩固了教皇宝座。十六世紀的天主教神学家們曾不止一次地披露了这个主意。其中之一的侵略美洲的参加者盖洛尼英·梅杰泰認为，墨西哥征服者考尔戴斯的行动是上帝亲自領导的，并且認为这一次侵略补偿了“万恶的”路德为教会带来的損失。②

宗教改革的威胁迫使教廷以一系列重大讓步的代价，来巩

① 雪尔維奥·柴伐拉："西班牙殖民主义在美洲的新基点"，費城，1943年，第27頁。

② 倍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化"，哈里斯堡，宾夕法尼亚，1945年，第247頁。

国与西班牙之間的关系，其中包括把对美洲殖民地的保护权移交給西班牙国王。保护权使西班牙国王成为殖民地中的教会和僧侶的实际首領。根据保护权，高級僧侣的任免由王国政府决定，而罗馬教皇厅仅予以批准而已。教皇祗能通过設在西班牙的塞維尔的經管殖民地一切事务的印度公司，和在殖民地的僧侶作正式的联系。教廷供給殖民地僧侶的物質需要的全部責任由西班牙国王取代，特别是保証征集什一稅。其后教皇又被迫将保护权讓与葡萄牙和法国的国王，他們也同样成为自己殖民地中的"基督在人間的全权代理人的助理"。

出讓保护权并不意味着教廷不再干預殖民地事务。从1568年起教廷对殖民地事务的干預是經常性的，特别是当庇护五世根据耶穌会将軍弗兰西斯哥·鮑尔特奇亚的提議建立"宣传信仰"主教会后，名义上它是組織传教士的活动，实际上这个主教会实現的是对殖民地教会的控制，繞过保护权为教皇厅利益而服务。关于这一点有下列事实証明，即組織这一主教会的决定是在菲利浦二世拒絕教皇圣使进入西班牙殖民地以后施行的。[①]巨額金錢和大量貨物通过"宣传信仰"这一机构从殖民地流入罗馬。为了管理"宣传信仰"主教会迅速增加着的收入和財产，在1632年成立了一个专門經济机构，它一直存在到1908年为止。[②]

教皇因不得已而将保护权讓与他人，从而损害了"天主教的尊严"，但是仍坚决地捍卫着殖民地中教会权力应駕凌于世俗权力之上的原則。当十七世紀时西班牙神学家兼法学家薩洛尔山諾·毕莱拉在"印地安的政治"一書中宣称在美洲殖民地中王国政权应領导教会时，他的著作立刻被罗馬列入"禁書目录"之中。[③]

---

① 尼哥罗·李："罗馬教皇廳"，第81頁。

② 同上，第86頁。

③ 馬格納斯·莫納："耶穌会徒在拉柏拉达区域的政治与經济活动"，斯德哥尔摩，1953年，第87頁。

教廷不敢采取更为激烈的行动，因为和西班牙合作，一起剝削殖民地，为教皇国庫带来了利益。十六世紀时，当美洲被开发后，黄金和珍宝如同泉水般地湧入西班牙。因此西班牙国王贈与教皇的金額也增加了，同时循其他途径自西班牙流入教皇国庫的进益也增加了。众所周知，教皇从西班牙国王那里得到巨額款項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并收到黄金以作裝飾之用，此外还有部分珍宝。这些珍宝現在还保存在梵蒂岡博物館中，是考尔戴斯在墨西哥和庇薩洛在秘魯掠夺得来的。根据十七世紀西班牙历史学者刘易斯·卡勃萊拉的証明，教廷錢庫在三十年期間內（从十六世紀末期至十七世紀初期），从西班牙得到160万德克，这还仅仅是根据西班牙和罗馬教皇之間签訂的宗教条約而每年支付的王国补助金。①

前面已經叙述过，黄金是直接从殖民地通过"宣传信仰"主教会流进教皇国庫的。虽然西班牙国王禁止私人，包括僧侶在內，自殖民地运出黄金和珍宝，然而"宣传信仰"主教会仍能找到千百种方法規避上述的禁令。关于这一点在西班牙国王向教皇抗議僧侶非法自殖民地运出黄金的抗議書中可以看到。② 特別是許多珍宝是通过耶穌会交到教皇厅的，耶穌会在殖民地的代表人物不顧教皇已經出讓保护权，它直接隶屬于罗馬，并和罗馬保持直接联系。

西班牙占有殖民地为僧侶們带来了巨大的物質利益。差不多有三百年期間內，殖民地的僧侶都是西班牙的教士和修道士。甚至生于拉丁美洲的白种人（即生于殖民地的西班牙人）也无法得到教会的进身之阶。1493年期間，在369个在殖民地的主教之中，生于拉丁美洲的白种人連10个也不到。③ 西班牙人和美

① 狄圭·拉米萊斯·加巴渥："墨西哥与梵蒂岡之間的关系"，墨西哥，1928年，第48頁。

② 路卡斯·阿拉茄罗："美洲的教会与西班牙的統治"，布宜諾斯艾利斯，1935年，第43—44頁。

③ 倍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264，569頁。

洲印第安人的混血兒祇在十七世紀末叶才开始可能得到神职，但也有一个条件，他們須能証明自己是“白种人”，就是說有西班牙血統。在整个殖民地时期黑人和黑白混血兒是不准成为教士的。因此，西班牙的僧侶完全統治了殖民地的教会。

从西班牙国王的利益观点来說，天主教的僧侶、教会和宗教是成功地征服和鎮撫印第安人，使他們甘于戴上殖民者的枷鎖所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国历史学者派克斯指出，“传播天主教是西班牙殖民制度的一个組成部分，而教士們实际上是王国官僚政治的成員”①。許多教会的显貴人物被授以殖民地的官职——总督。

曾經尊崇欧洲封建制度的教会，也尊崇在美洲的残酷的殖民地制度，因此西班牙国王認为僧侶的活动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在卡尔一世給新西班牙（墨西哥）总督梅陀西（1535年）的訓令中說：“当您刚到一个国家和开始了解它的时侯，您首先要知道在宗教和政府事务方面已經和現在采取了那些措施，这主要是关于教堂的建造，宗教仪式的奉行，使印第安人改信基督教和以基督精神教导他們一方面的事情。”② 二百余年以后，在署期为1786年7月3日的印度公司的批示中写道：“在如此遙远的国家里严格遵守宗教义务是最坚牢的繩索，它使人民能够循規蹈矩，在印度的主要法則就在于此。”③ 然而，能够証明宗教和教会对于殖民者的意义的最清楚不过和最雄辯的文件，要推著名的“要求書”。这一文書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中南美开拓者在征服美洲时，作为最后通牒讀給和呈交給印第安人的。这张独树一格的檄文的作者是西班牙神学家劳毕斯·德·派拉西奥斯·罗皮奥斯。“要求書”通知印第安人說，他們本人以及他們的土地已

---

① 派克斯：“墨西哥史”，莫斯科，1949年，第109頁。

② 倍萊·迪非：“拉丁美洲的文明”，第251頁。

③ 李嘉图·考涅兹克：“西班牙美洲社会形成历史文件彙編（1493—1810）”，第一卷，馬德里，1953年，第17頁。

由教皇交給西班牙国王了，并且要求印第安人承認教会是“圣母和宇宙的主宰”，承認教皇和西班牙国王是“这些島屿和大陆的主人和君王”。印第安人被通知道，如果他們抗違命令，則将受到“不能言喻的灾禍和損失，如同不願承認自己的君主并起来反抗的諸侯所应受的那样”①。

在西班牙国王的圣旨中，命令中南美的开拓者将这篇神学家和殖民者的深奥奇文为“大海和大洋中各島屿和大陆上的所有居民”高声朗讀，令其知悉，并命令根据“要求書”进行行动。侵略行动的参与者拉斯·卡薩斯在事后写道，当他知道“要求書”的內容以后，他不知道究竟对它哭好还是笑好。至于印第安人的态度又如何呢！他們說教皇显然是个醉鬼，他把不是他所有的东西贈了人；而接受贈礼的西班牙国王則显然是个疯子。②

然而，印第安人不是常有可能对殖民地开拓者发表自己对“要求書”的意見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殖民地开拓者一讀完上述文書，立刻对印第安人施以“不能言喻的灾禍和損害”。因为西班牙文的“要求書”印第安人反正是一点不懂的，而殖民地开拓者手下又不是經常有翻譯人員。

墨西哥历史学者柴伐拉指出，“要求書”中所宣布的原則虽然极为荒謬，它在长时期內是作为西班牙王国的官方政策的，侵略墨西哥和秘魯就是根据这些原則。③ 梵蒂岡、教会和僧侶們曾贊許这一可耻到极点的文件。直到今日，当教会的頌揚者們被迫記起“要求書”时，他們还为它辯护，他們断言不是“要求書”的內容不好，不好的是拒絕屈从它的印第安人！西班牙耶穌会会徒康斯坦丁諾·巴萊在不久以前干脆这样写道：“‘要求書’的

① “发往海外的文件”，第二集，第二十卷，馬德里，第311—314頁。

② 琼那洛·茄尔西亚：“西班牙征服美洲和墨西哥之性質”，第二版，墨西哥，1940年，第56頁。

③ 西尔維奥·柴伐拉：“西班牙殖民主义在美洲的新基点”，第45頁。

不好在于它是为人而写成的，可是被讀給半动物听了。"①

如果在今日教会的代表人物尙且捍卫着这种殖民者和种族主义者的观点，那末很容易想象在四百年以前，殖民地开拓者及伴随着他們的僧侶們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

在殖民地开拓者的意識中，上帝的观念和宗教是紧密地与掠夺和发財的观念編結在一起的。考尔戴斯的一个兵士名叫貝尔納·琪阿斯的，当他一登上墨西哥的土地就欢呼道："我們是为发財和荣耀上帝的名声而来到这里的！"。他的司令官考尔戴斯在侵占墨西哥和进行有系統的掠夺和屠杀印第安人的时候，却一再声称他不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而这样做的；而是由于"理想的驅使"，他的唯一任务是"消灭偶象和使当地土著改信基督教"②。

教会以其威望巩固这一謊言，它尊崇殖民者的劫掠行为，因之从掠夺者手中分得部分贓款。貝尔納·琪阿斯在其回忆录中不胜羨慕地說到，在瓜分印第安人阿兹台克族(墨西哥土著)最高領袖蒙蒂苏木的贖身金时，除了西班牙国王和考尔戴斯之外，僧侶們分得最多。这种情形在有殖民地开拓者出現的地方，到处都发生。僧侶不仅仅認可侵略者們的邪恶行为，他們还亲自积极参与其事。僧侶們的活动，与殖民地开拓者的侵占土地、消灭有組織的抵抗中心印第安人的"帝国"等行动，相輔而行；他們到处杀戮印第安人的祭司，毁坏他們的庙宇、手稿、裝飾物、圣象、壁画和其他印第安人的文物和崇敬物品，力图在精神上使印第安群众无抵抗能力。当印第安人的圣庙根据僧侶的命令被燒成灰烬的时候，成群的印第安人弯着腰在修建着雄伟庄严的天主教寺院和教堂，仅其外表就应該迫使印第安人战慄在侵略者的威力之前。在保存下来的十六世紀瑪雅族(居住于北美和墨

① 刘易斯·亨基："西班牙在征服美洲时为正义而斗爭"，費城，1949年，第35頁。

② 罗伯尔特·里查："墨西哥之精神征服"，巴黎，1933年，第23頁。

西哥南部)的文籍中談到修建教会时，如同談到可怖的大灾祸一样。然而西班牙世俗的和宗教界的編年史者，对以印第安人的奴隶劳动修建教堂一事并不諱言。梅杰泰、李密薩尔以及許多其他进行殖民地侵略活动的参与者們在写到这一点时，如同写某种应該如此的事一样。下列数字說明修建教堂的規模，从而也說明了为此目的而采用奴隶劳动的程度：在西班牙及葡萄牙人开始开拓殖民地以后至1623年間的一百余年中，僧侶以被奴役的印第安人的劳动在西班牙美洲建造了总共7万所教堂和小礼拜堂。①

为了保証基督教的成功，在美洲的僧侶如同在非洲和亚洲的僧侶一样，把当地居民中流传的偏見和迷信普遍地加进到基督教的教会仪式中去。教堂照例是修建在印第安人認为神圣的处所，新的庙宇飾以印第安人的图案，耶穌和圣徒們的形象塑成印第安人模样，甚至教会的节期也使之与印第安人的宗教节日相符合。圣母的奇迹和显圣等等更是不計其数。

僧侶对于印第安居民的残酷不逊于世俗的掠夺者。我可以举十六世紀下半叶在于加敦橫行霸道的法兰西斯会徒季叶伏·德·朗达的事业为例。朗达把古代印第安人的手稿焚毁，破坏印第安人的庙宇和艺术品，并且用酷刑折磨他們。有叛教嫌疑的印第安人根据朗达的命令要受二百皮鞭，作为"最初的儆戒"。受朗达拷問和被处肉刑有6,330个印第安人，其中157个印第安人在受肉刑之后立刻死去，而大多数則終身残废。1562年7月12日朗达在馬尼設了一个盛大的火刑会，参加的有西班牙当局和印第安族的显貴。在这一次"节日"中有許多瑪雅族古代文化遺物——象形文字書写的手稿、立象、繪有花紋的器皿——都被消灭了。被审判的印第安人在火刑会以前在獄中自杀而死

---

① 上述数字引自可以征信的耶穌会会徒季米特里奥·阿馬斯·庇里茲所著的"西班牙殖民史"一書，馬德里，1947年，第459頁。

或受酷刑而死。他們的尸体被僧侣們抛入火中烧成灰烬。①

根据同时代人証明，寺院中設有特别为拷問印第安人而准备的房間，其中备有老虎凳、鐐銬、鞭子和其他刑具。② 僧侣阶級的代表人們要求对印第安人施行强暴。墨西哥主教苏馬拉茄等在1531年写信給国王說，印第安人之所以降服祇是因为恐怕受刑罰。③ 开拓殖民地的参与者修道士盖洛尼莫·梅杰泰宣称"教士們为了印第安人的幸福应該鞭打他。鞭子对于他們（印第安人——作者）是如此地必需，犹同面包对于他們的嘴巴一样"④。

西班牙学者安东尼奥·烏魯阿偕同霍尔黑·璜在十八世紀上半叶考察了美洲各殖民地后，得出結論說，在所有西班牙領地上鞭撻印第安人是普通的懲罰。烏魯阿在叙述对印第安人施行体罰时指出："从前祇有'爱康梅迪罗'⑤才这样干，而現在市政官、地主、种植园主，特别令人憤怒的是——連祭坛的神职人員都可以鞭打印第安人。所有这些人，包括僧侣在内，以对待黑奴們的残酷手段对待印第安人。"⑥

殖民地开拓者不仅把僧侣們作为自己的同盟者，并且还把他們視为剝削和掠夺印第安人的竞争者。考尔戴斯和其他一些规掠殖民地的魁首們曾不止一次地向西班牙国王訴苦，要求管束一下这些上帝的侍从們，因为他們过分貪嘴了。⑦ 僧侣們馬上

---

① 克諾洛索夫："作为人文学史料的季叶伏·德·朗达的'关于于加敦事件的报导'"（季叶伏·德·朗达："关于于加敦事件的报导"，莫斯科—列宁格勒，1955年，第31—32頁）。

② 琼那洛·茄尔西亚："西班牙征服美洲和墨西哥之性質"，第65頁。

③ 同上。

④ "关于管理新西班牙的印第安人的研究"，第三卷，巴克萊，1938年，第21頁。

⑤ "爱康梅迪罗"是拥有連同隶屬于土地的印第安人的田产的殖民者。

⑥ 霍尔赫·璜与安东尼奥·烏魯阿："有关美洲的秘密資料"，第一卷，馬德里，1918年，第301—302頁。

⑦ 却尔斯·勃兰頓："征服墨西哥时的宗教面貌"，却波尔山，北卡罗来納，1930年，第15、219頁。

以牙还牙，控告殖民地开拓者的残酷和貪得无厌，这就是說控告他們自己也犯的罪行。我們应当感謝留传到今日的大量揭发性材料为我們提供了这种相互責难的資料，資料中有叙述殖民者的行为的（主要是僧侶代表們提供的証据），也有关于僧侶們行为的資料（主要是非僧侶殖民者們提供的証据）。

开拓殖民地的参与者拉斯·卡薩斯（1474—1564）曾起来反对殖民者和僧侶們的横暴行为，他是在1510年第一次到美洲的。殖民者和伴随他們而来的修道士和教士們的兽行和貪婪，使他极为憤慨。

拉斯·卡薩斯在墨西哥时恐受殖民地当局的迫害，因而加入了多米尼加教派，这个教派是不受殖民者的干預的。拉斯·卡薩斯勤奋地搜集有关殖民者和僧侶罪行的資料，其后运用了这些資料写成了許多使他得到美誉的揭发性著作。

1542年拉斯·卡薩斯写成了著名的“关于印第安人灭亡的簡短报告”，[1] 这本書十年后在西班牙的塞維尔問世。他在这一著作中叙述了殖民者和教士們駭人听聞的暴行，叙述了对印第安人的大規模屠杀，以及他們所受的慘无人性的剝削等等。

教权派和反动历史学者在不久以前仍企图全力摆脫拉斯·卡薩斯。他們断言拉斯·卡薩斯把殖民者的残暴行为夸张了，扩大了牺牲者的数目，說他“誹謗”教会，憑空写出关于教会在殖民地活动的“妖害”。

随着历史科学在拉丁美洲的发展，随着开拓殖民地参与者的証言和新的档案文件的发表，这些資料証实拉斯·卡薩斯所援引的事实都是确凿不移的，因此甚至連耶稣会会徒們也无法反駁拉斯·卡薩斯。此后，在教权派陣营中出現了一个新的正与前相反的企图：即将拉斯·卡薩斯認作为教会和殖民地真正的代表人物。現在有一些教权派的和反动的历史学者在說：請看

① 巴尔托洛美·拉斯·卡薩斯：“关于印第安人灭亡的簡短报告”，塞維尔，1552年。

拉斯·卡薩斯，殖民者是怎样的啊，天主教僧侶是怎样的啊！他們还可以同样“成功地”断定布魯諾和卡姆柏尼拉是十六世紀时教会的典型代表。当拉斯·卡薩斯生时，僧侶們辱罵他和損害他的名誉，因为他不仅揭露了“爱康梅迪罗”，同时还揭露了僧侶。拉斯·卡薩斯在逝世前不久曾写給罗馬教皇一封信，信中說：“新地的主教、修道士和教士們的行为，使我們神圣的基督信念蒙了无比的詬辱和受了不小的損失；他們神話般地在发財，而他們的不久前接受信念的屬下却处于完全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穷困状态中，以至于每天有許多人由于横暴行为、飢渴和过度的劳动而寃屈地死去。我謙恭地懇請陛下命令这些教士們应在自然的和上帝的法律的基础上，把他們掠夺来的所有金銀和宝石归还原主，这正是他們事实上应該这样做的。因为他們是从遭受着极端貧困和目前正因而受苦难的那些人手里得到和夺取来的，而根据上帝的和自然的法律教士們正应該把自己的財产分发給他們。”① 因此，殖民地僧侶們极为仇視拉斯·卡薩斯，称他为基督之敌，那是毫不奇怪的。

拉斯·卡薩斯是一位殖民地制度不容情的揭露者，他不是西班牙僧侶中的典型性人物，而是規例中的例外：占压倒多数的僧侶們如同一切殖民者一样残酷地对待印第安人。

“教会如同其他西班牙机构一样地依靠印第安人的劳动为生——美国历史学者里斯萊·辛浦逊写道——僧侶們的利用印第安人的强制劳动，和其他阶层的作法(殖民者——作者)沒有任何根本性的区别。无数教堂和修道院的修建工作及其維护，大量僧侶的供养——所有这一切都落在印第安劳动者的肩上……此外，僧侶們还非法地参加商业活动，許多教士为了个人利益而入了魔道，他們在印第安人中間利用自己的势力。”②

① 奧斯汀·du湼兹："巴尔托洛美·拉斯·卡薩斯神父传"，墨西哥，1942年，第12頁。

② 里斯萊·辛浦逊："新西班牙和危地馬拉土著的租佃制度"("管理新西班牙印第安人之研究"，第三卷，巴克萊，1938年，第82—83頁)。

教会成为殖民地中强大的物質和宗教力量。到处最好的土地照例是属于僧侣的。"殖民时期末期——墨西哥保守派历史学者罗卡斯·阿拉芒宣称——差不多墨西哥①、秘魯、哥倫比亚和厄瓜多尔所有財富的一半左右，和其他拉丁美洲各国財富的半数，掌握在教会和有錢的天主教僧侣手中"。其余部分的大部分也抵押給教会了。②

富裕的"爱康梅䢖罗"們以大量田地贈与教会。誰不給教会捐献，就可能蒙上异教徒的嫌疑。根据一位十八世紀末期住在委內瑞拉的人的証言，"誰在遺囑上沒有記載給与寺院遺贈，那末作出这种錯誤的人其灵魂应否被超度就会引起疑問……"③。

教会的显貴除了田地外，还在城市里拥有不动产。墨西哥、利馬和其他殖民地中心城市的最好街坊是属于教会的。利馬在十七世紀初期，寺院所占的地面比市內非僧侣区为大，而利馬的大多数居民被迫向僧侣付租金租屋或租土地。

僧侣們普遍做高利貸生意。在墨西哥，"教会是高利貸机构，它拥有的資金至少为活动資金的三分之二。教会借債給地主們，并取得田产作为抵押"④。希姆博尔特說，十八世紀末叶时墨西哥教会所拥有的抵押品共值 23,365 万法郎。⑤

僧侣們精通商业。許多教派組織联合成为資本雄厚的进口公司。他們以批发价格从西班牙、菲律宾、甚至从亚洲大批購进貨物，然后以高价售出。根据保存在梵蒂岡"宣传信仰"主教会档案庫中呈給教皇的报告，僧侣們广泛地在西属殖民地的居民

---

① 关于教会在墨西哥領地的詳細資料，參見法兰西斯·歇瓦里尔："墨西哥大領地的形成(16—17世紀的土地及社会概况)"，巴黎，1952年，第301—344頁。

② 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莫斯科，1955年，第125頁。

③ 倍萊·迪非："拉丁美洲的文明"，第264、569頁。

④ 派克斯："墨西哥史"，第114頁。

⑤ 亚历山大·希姆博尔特："新西班牙王国政論集"，第一卷，巴黎，1825年，第441頁。

中間，特別是在印第安人中間，販卖酒类。他們还常常强迫印第安人买酒。[①] 僧侶們在圣地亚哥(智利)，当斋戒日时在市集上購进所有的魚，然后在寺院的大門前以高价卖出。[②]

教会自1569年起在西班牙殖民地实施的宗教审判的罪恶行为中得到不少进益。[③] 宗教审判厅拥有自己的种植园和田产，然而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出售被控为"异教徒"們的被沒收的財产。在墨西哥有几年間宗教审判官因沒收所得达300万比索(1649年)。[④] 1665年宗教审判厅在哥倫比亚的喀大吉納因沒收被控为异教徒及有异教徒嫌疑的人的財产，除去所有开支之外淨得430,414比索。殖民制度还存在着的时候，宗教审判厅就年复一年地繼續着"自已的审判和沒收財产的独占行业"。[⑤] 当墨西哥在1813年废除宗教审判时，宗教审判厅从沒收財产中賺得1,775,676比索(其中有1,394,628比索投資于各种企业)。[⑥] 与此同时当秘魯废除宗教审判时，宗教审判厅沒收了近2,500,000比索的財产。[⑦]

什一稅是教会收入的另一个經常性来源。根据法律作为上繳給王国国庫稅收之一的什一稅，应以下列比例分配：四分之一归主教，四分之一作寺院資金。其余的一半分成九份，九分之七

① 路卡斯·阿拉茄罗："美洲的教会与西班牙的統治"，第43頁。

② 倍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595頁。

③ 在西班牙殖民地中宗教审判的犧牲者是教会所不滿意的西班牙移民及其后代——生于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宗教审判厅不审訊印第安人，因为他們完全在殖民者的控制下，殖民者可以自由处置他們，沒有煩劳宗教审判厅的必要。同时一有控告印第安人为异教徒的事就会造成大屠杀，因为印第安人远非信奉一切教会仪式和教規的。这种屠杀对于作为大封建主的教会既无利，对于非僧侶的殖民者也沒有好处。

④ 亨利·却尔斯·李："西班牙附庸国中的异端裁判"，紐約，1908年，第219頁。

⑤ 柏納·靡西斯："南美的西班牙附庸国"，倫敦，1914年，第348頁。

⑥ 亨利·却尔斯·李："西班牙附庸国中的异端裁判"，紐約，1908年，第288頁。

⑦ 同上，第354—355頁。

归乡村小教区的僧侣，而九分之二则入王国国庫。在实际上正如許多資料所指出的那样，王国国庫不仅把它份下的九分之二金額献給僧侣，并且还撥給教会巨额津貼費。[1]

教会还出售以所謂十字軍东征詔書名义出現的贖罪券，从而得到大量金錢，贖罪券的价格等于往巴勒斯坦参拜“圣地”的旅費。“在美洲每年或每二年买一张詔書已成为宗教上的义务，是天主教教徒忠貞的証明。”[2] 1786年教会仅在墨西哥一地从出售十字軍东征詔書而得了416,883比索。[3]

下面有关新西班牙国总督的一些数字，給我們一个关于教会在殖民地收入規模的概念。根据一位对教会有好感的历史学者伐斯康錫洛斯的計算，十八世紀末叶时，在这一殖民地每年有近2,200万比索的款項进入教会的錢庫。我們可以根据下列事实来說明这一数目所具有的意义，即在同一时期王国国庫在墨西哥的收入为2,000万比索，其中只有350万比索是上繳給宗主国的，而其余部份是用于当地殖民地行政当局的开支。因之，西班牙国王在墨西哥的收入总共只等于教会收入的15.5%。

其他教区的收入，例如庫斯科（秘魯），年达40万比索（1781年）。[4] 墨西哥和危地馬拉教区的收入和庫斯科同样的高。

教会收入的最大部分落入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其他宗教界显貴人物的荷包中去了。

十八世紀末期，墨西哥大主教的年入将近13万比索。任何一个西班牙总督都会羨慕这个数目的。拍布拉主教（墨西哥）——11万比索，法拉多利主教（西班牙）——10万比索，瓜达拉哈拉主教（墨西哥）——9万比索。其他的主教們，宗教审判

---

① 琼那洛·茄尔西亚：“西班牙征服美洲和墨西哥之性質”，第64頁。

② 培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592頁。

③ 却尔斯·却普曼：“殖民主义西班牙的美洲：史实”，紐約，1933年，第159頁。

④ 季米特里奥·庇里兹：“西班牙殖民史”，第439頁。

厅的法官以及教会的其他权貴們都有这样高的收入。在1799年訪問过美洲的希姆博尔特說，高級僧侶的收入比許多德国的大公为高。① 根据亨利·李的計算，十八世紀僧团的修道院院长在抵达殖民地后三年期內可以“賺进”30万至40万比索。②十八世紀末期僧侶們在委內瑞拉数年間即可为自己积聚6,000—8,000美元家产。③

无論教士或者修道士都过着飽食終日无所事事和荒淫无耻的生活。整个十六世紀期間內，总督們在关于殖民地状况的定期簡报中經常指出：僧侶們納妾，进行盜窃，不服从当局，講究奢侈豪华和忽視教会清規等。托立杜总督在1569年的一份簡报中写道，秘魯的僧侶們以全部时間从事商业、进行賭博和寻花問柳等勾当。④

烏魯阿在二百年以后在談到秘魯的僧侶时論道：“秘魯的僧侶們的生活是如此荒淫无耻和丑恶不堪，什么寻欢作乐的事都干，虽然在世界上的所有的人——包括秘魯居民在內——都有弱点，可是这些僧侶的乱七八糟的生活和淫佚的恶习却超过了所有其他人。”⑤

僧侶阶层耗費了巨額財富以裝飾教堂、寺院、修道院和主教私邸。教会中显貴們的寺院和私邸，其奢侈和豪华，比起其他殖民者的宫庭决不逊色。里面經常举行盛宴、晚会和謝肉祭。牧师协会的会所中堆滿着銀子和各种珍宝。有时候仅仅三个修道士就占据了一所拥有大片土地的寺院。

乡村中的教士們也过着和修道士們同样自由自在的生活。

---

① 亚历山大·希姆博尔特：“新西班牙王国政論集”，第一卷，第439—440頁。

② 亨利·却尔斯·李：“西班牙附庸国中的异端裁判”，第515頁。

③ 弗萊德·列比与琪恩·湯麦斯·納尔逊：“热带丛林中的十字軍”，却潑尔山，北卡罗来納，1936年，第320頁。

④ 倍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266—267頁。

⑤ 霍尔赫·璜与安东尼奥·烏魯阿：“有关美洲的秘密資料”，第一卷，第169頁。

印第安人在拷問和革除教籍的威胁下，被迫挑起重担，使僧侶們能过着养得肥头肥脑的安逸生活。

印第安人在教皇的領地上服劳役作为奉行圣礼，給教士送各种的礼品，然而他們老是被認为未償清債务。“尽管債务人已經把自己的母鷄、洋山薯甚至女兒(!)送給教士們以清償債务，可是不幸的印第安人仍旧还欠他們的債。”② 关于这一点还必須补充的是，教士的妾(教士的情妇)剝削着印第安人的妻子和子女，强迫他們为自己工作。乡村小教区的住持根据已定的慣例，通常在乡村小教区自己的“圣节”里，举行每年一次的印第安人极簡单的日常生活用具的总清除。“每当乡村小教区的圣节来到的时候——烏魯阿写到——教士将印第安人一年間儲集的东西，其中包括印第安人的妻子和子女在自己的陋屋中养育起来的家禽和家畜，全部囊括而去。印第安人因而无粮可食，祗能以野草和草根充飢。”①

怪不得印第安人要这样說了：公牛得提防它正面冲来，騾子得提防它后腿踢人，可是神父得从四面八方提防他。

耶穌会在剝削印第安居民和积累財富方面成績特别卓著。

耶穌会会徒在西屬美洲的僧侶中居領导地位。耶穌会与白种人僧侶以及自己的对手——多米尼加教派、弗兰西斯教派和奧古斯汀教派不同，它在各殖民地有着統一的組織和配备着有毅力的和有进取精神的干部。同时耶穌会是殖民地中唯一和罗馬教廷保持直接联系的教会組織，它代表着和保护着教廷在殖民地的利益。

耶穌会在殖民地中的領导人物和其他教派不同，并不是由王国当局任命的而是罗馬直接任命的。迪菲指出，美洲的耶穌

---

① 罗米利奧·罗美洛：“秘魯經济史”，布宜諾斯艾利斯，1949年，第162頁。

② 璽尔赫·璜与安东尼奥·烏魯阿：“有关美洲的秘密資料”，第二卷，第10頁。

会徒經常寄給設在罗馬的总部以巨額金錢。①

各省的省长、市政局和"爱康梅迪罗"們慷慨地以田产贈与耶穌会会徒。当新城市奠基的时候，臨近中央广場的一些地段是留給他們的，此外还有大片已开墾的土地。耶穌会会徒既拥有巨額資金，他們同样也从已破产的殖民者手中以低廉价格大批地买进田地和不动产。

所有在他們的种植园中种出来的和在他們的采購站中所制作成的东西，都是奴隶劳动和印第安农奴劳动的产物，而耶穌会会徒則在当地市場上銷售它們或者裝运出口。耶穌会在殖民地中建立了分支众多的商业組織，其下有仓庫、小店和运輸系統。

迪菲說，奴隶組成了耶穌会在美洲的动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②耶穌会会徒不仅拥有奴隶，并且还参加奴隶买卖。"为了滿足設在喀大吉納(哥倫比亚)和基多(厄瓜多尔)間自己的大企业对劳工的需要——格里齐盖尔指出——他們每年派遣几只船到非洲西海岸的哥拉去，因为那边奴隶十分便宜。他們将一部分黑人卖給墨西哥的种植园主，因此，在抵銷購买和捕捉黑人的費用以及奴隶船的开支外还有盈余。"③ 法国販卖奴隶組織的經理庞夏脫林(十八世紀初期)的一封信至今尙保存着，他在信中通知巴黎說，耶穌会会徒运了两船共800名"健康的和有病的"奴隶到了布宜諾斯艾利斯，这些奴隶由他經手以每名250和150泰立尔售出"④。

根据罗耀拉制訂的至今尙遵行的耶穌会章程(宪法)的規定，地方領导人(修道院院长)每年应向罗馬耶穌会将軍作三次报告。这就是所謂"秘密名冊"，其中載有会員的名单及其行为的鉴定；"总目录"，或耶穌会掌握的財产和其他珍宝的清单；以

① 信莱・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584頁。

② 同上。

③ 西奧图・格里齐盖尔："耶穌会徒"，第一卷，1868年，第338頁。

④ 薩尔伐杜・馬德里阿格："美洲西班牙帝国的复亡"，紐約，1948，第265頁。

及每年的关于收入、商业和其他經济行为的財政报告。瑞典历史学者莫納尔在研究了一些考尔杜巴城耶稣会的"总目录"后宣称，1686年当地共有66名会徒的耶稣会組織拥有300名奴隶，11、000头羊，5、000匹馬和13、000头家畜。同年考尔杜巴的耶稣会的新信徒会，其中有29名耶稣会会徒和新皈依者，拥有300名奴隶，30、000头羊和13、000头家畜。至1692年时，作为公共財产的奴隶增为455名。①

根据1767年的材料，在智利有50个大种植园，数目众多的农奴和黑奴是屬于耶稣会会徒們的。②

耶稣会在西班牙屬地的主要活动中心是秘魯、墨西哥和巴拉圭。耶稣会会徒在西班牙屬地中最富裕的地方秘魯拥有土地、采購站和种植园，1767年有数万名印第安农奴和5，200名奴隶在上述場所工作。"在秘魯和在其他各处一样——根据美国历史学者摩西斯的話——耶稣会会徒們力求达到世俗的积聚財富的目的。他們覓求贈与和追逐遺产，同有錢人打交道，并利用祇有僧侣才有机会运用的使人深信这一手段；他們攫取无数的田产，以其产品做买卖；他們寄給在欧洲的企图征服欧洲各国政府的同行們以巨額錢財；他們使在教会和国家中有声望的人士屈从于他們的势力之下，以及在社会生活中利用他的財富的力量。"③

許多耶稣会会徒一投机商人从各个殖民地湧往利馬，因为利馬是耶稣会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最高領导机关所在地，耶稣会的最高司庫(检察長)常到那边。他們的活动引起了当地商人的抗議，亚馬脫总督在听取了商人們的控訴之后，在十八世紀初期签发了一张要求所有非常住在利馬的耶稣会会徒出境的命

① 馬格納斯·莫納："耶稣会徒在拉柏拉达地区的政治与經济活动"，第789頁。

② 高德麦斯："智利史"，1941年，第86頁。

③ 柏納·摩西斯："西班牙在南美垂亡的政权(1730—1806)"，巴克莱，1919年，第128—129頁。

令；其根据是，他們"在光天白日之下在广場、街道和市場上，甚至在小酒肆和其他公共場所，連最下等的处所也在內，施展着肮脏的商业上的詭計"①。

墨西哥耶穌会会徒拥有田产、制糖厂、农場和其他不动产。关于耶穌会在墨西哥的財产，大主教兼总督璜·派拉福克斯在写給教皇英諾肯提十世(1644—1655)的信中說道："他們的家畜群和羊群是数不尽的。我知道两个耶穌会分支，其中一个拥有30万头羊，而另一个拥有六万头牛。所有的普通教士总共祗有三家不大的制糖厂，而屬于耶穌会会徒的——墨西哥首都就有十个耶穌会分支——有六家中美洲最大的制糖厂，每家厂价值在50万到100万比索之間。其中的一些制糖厂的純利大于10万比索，甚至最小厂的純利亦不低于25,000到30,000比索。此外，耶穌会会徒还拥有連綿不絕以英里計算的广袤的土地，这些土地是出租給別人的；所有这些土地特別肥沃，盛产玉蜀黍、烟草等等。还有产量丰富的銀矿也是屬于他們的，总而言之，他們的資財是如此雄厚，普通教士很快就不得不向他們懇求布施了"②。

法国学者法兰西斯·歐瓦里尔不久前在墨西哥档案庫中所发現并由他公布的"对掌管財产的耶穌会弟兄的訓令"(是十八世紀初期的)証明，在墨西哥的耶穌会的田地上到处采用奴隶劳动。③ 耶穌会会徒无論对兒童、对妇女都毫不怜惘。訓令中指示利用五岁起的印第安人做工。另有专門一章列举耶穌会領地上印第安人所受的各种肉刑，及其采用的方法。訓令中說，宗教应該有助于更有效地剝削奴隶，訓令教导道："你們要把奴隶改造成为忠誠的基督徒，那末你們也就将因此得到很好的工人。"④

① 倍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585頁。

② 派拉福克斯与曼陀薩："著作集"，第十一卷，馬德里，1762年，第30—32頁。

③ "对掌管財产的耶穌会弟兄的訓令"，法兰西斯·歐瓦里尔作序并注释，墨西哥，1950年。

④ 同上。

上面援引的文件是耶稣会罗馬領导机关发往新西班牙的。因此，訓令証实了耶稣会在殖民地的活动是罗馬直接領导的。

耶稣会会徒在美洲最富的和果实累累的搖錢树是他們在巴拉圭的領地。反动的历史学者們（例如阿根廷的洪特拉）費了許多笔墨，企图証明耶稣会在巴拉圭的領地乃是"公平理想"的体現处。实际上这个理想又是怎样的呢？

十七世紀初期，耶稣会利用西班牙人对巴拉圭不特别重視的机会——因为在那边不曾发現金子和其他珍宝，将这一居住着勤劳的印第安古阿拉尼族（居住南美和巴拉圭）自然資源极为丰富的地区攫取到手。耶稣会对印第安酋长（世袭的領袖）以威胁利誘和佯予縱容和略施小惠的手段，达到了奴役古阿拉尼族的目的，建立了一个居民人数約15万，土地面积为20万平方公里眞正的奴隶制国家。耶稣会会徒使印第安人聚居一处，規定他們的行动，依靠起着奴隶监工角色的酋长，驅使印第安人在种植园、牧場和采購站从晨曦初現到日落不断地工作。工余时間内，印第安人被迫去做祷告和奉行宗教仪式。被驅入集中地区的印第安人甚至禁止有自己的衣服或家禽。伏尔泰諷刺地指出，耶稣会的領地实实在在乃是理智和公平的"标本"：領地中"神甫們"拥有一切，而人民却什么都沒有。[①] 古阿拉尼族在耶稣会的淫威下由于过度的劳动、精力疲竭、飢餓和經常作战，很快地就絕种了。集中地区的居民在十六世紀时为15万人，至十七世紀初期降为12万人，而至1739年則减少到74,000人。[②]

耶稣会建立的奴隶制国家拥有自己的軍队、兵工厂和无数的采購站和工場。許多印第安人集中地区有着5万至10万头牛羊。皮革、巴拉圭茶叶、干肉和咸肉的出口，是巴拉圭耶稣会的一宗主要收入項目。皮革的輸出在十八世紀时年达29万件。

---

① 伏尔泰："哲学札記"，莫斯科，1954年，第129頁。

② 米赫涅維奇："天主教反动派簡史（耶稣会徒）"，莫斯科，1955年，第204—205頁。

巴拉圭茶叶的采植和輸出是耶稣会的独占事业。耶稣会会徒还从巴拉圭运出烟草、糖、羊毛、棉花、玉蜀黍、大米、棉織品、地毯及其他許多产品和商品。他們从欧洲以走私方式运入大宗各式各样的貨物(就是說不給殖民地行政当局付关税)。

巴拉圭的耶稣会徒还在巴西、智利、秘魯和阿根廷等地經商。他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圣大非有着自己的商业基地和仓庫。法国旅行家法朗索阿·科里尔在十七世紀下半叶訪問阿根廷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差不多布宜諾斯艾利斯和整个巴拉圭的商业，全部掌握在耶稣会徒的手中。他們要多少利潤就可以得到多少利潤。耶稣会徒是如此地資本雄厚和有势力，不久以后将沒有人能够和他們竞爭。他們多次强迫政府赶走妨害他們的官吏們，因为他們有能力付出巨額賄金，經过这些事耶稣会徒們知道如何逃避政府的管理。"①

巴拉圭世袭的奴隶制領地为耶稣会徒們带来了神話般的利潤。耶稣会每年的純益达1,000万比索之巨，②这一数目远远超过十七和十八世紀时教皇厅的年入。

耶稣会徒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中的势力十分雄厚。当他們在1767年被赶出去的时候，經查明在2,260名耶稣会修道士名下有717,000名印第安人供其驅使。③

当討論到西班牙美洲的僧侶时，特别应該提提传教士們的事业，他們在所謂殖民地內地活动，所謂內地是指尙未被征服的印第安部落所屯处的地区。

西班牙殖民地中的传教士是在軍事当局部門中服务的，薪俸由軍事当局支付。殖民地中传教士僧团的領导人不是由教会当局任命的，而是由王国政府任命的。在殖民地尙未被征服或

① 法朗索阿·科里尔："东印度游記"，記述作者在1666年至1697年在东印度逗留期間印象最深刻的見聞，第一卷，阿姆斯特丹，第203頁。

② 西奧图·格里齐薩尔："耶稣会徒"，第一卷，第337頁。

③ 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第138—139頁。

者尚未平定的地区内，传教士会建造得象要塞或城堡一样。这种地区很多，說明印第安人对殖民者的侵略是坚决抵抗的，传教士会数目之多即其証明。1780年（殖民制度将沒落时！），传教士会的数目超过600个，其中的120个屬于耶穌会。①

同时代人的无数文件和証言，揭穿了所謂传教士和平地滲入殖民地这一神話，証明了传教士会的軍事性質。在新西班牙地方国庫的一个官吏于1758年写的报告中，可以讀到下面的話："在大陆上特别强固的軍事設施的修筑和传教士会的建立是在下列情形下才进行的：即当必需保护已占領的地区不受敌人的侵略（外国人）和武装的野蛮部落的袭击，以及在必須巩固和传播我們神圣的信仰的时候，这一般是軍事—經济会議上所討論的議題。"②

換句話說，传教士是受殖民地軍事当局領导的。传教士們照例是由駐防軍保护和支持的。传教士罗摩阿里杜·卡泰兴那在一封1772年写給殖民地首长的报告中指出，在沒有駐防軍支持的一些居民点內，印第安人杀死传教士，抛弃了村落逃到森林里去。"沒有兵士的地方——卡泰兴那恨毒地写道——就沒有成功可言。印第安人是恐怖之神的子女，对他們来說，閃閃发光的馬刀所产生的印象，远較最善于宣道的传教士的辞令为深。"③耶穌会徒历史学者埃蓋阿·路易斯承認传教士們是和西班牙的軍队合作的，因为"运用这一种或那一种武器的最終目的是同样的，为上帝爭取臣民"④。然而这样的"利他主义"的目的并不妨碍传教士們掠夺印第安部落，以极可耻的手段为自己积聚財产和使自己教派的財产增加。

---

① 季米特里奥·庞里兹："西班牙殖民史"，第469頁。

② 赫伯·布尔頓："美国通史"，紐約，1939年，第129頁。

③ 同上，第131頁。

④ 馬格納斯·莫納："耶穌会徒在拉柏拉达地区的政治与經济活动"，第285頁。

根据同时代人的証言，传教士以抬得不能再高的价格卖东西給印第安人。传教士們为印第安人举行宗教仪式时要求他們付出自己的劳动果实作为代价，然后卖出，以所得的金錢据为己有。①

印第安居民仇視传教士。耶穌会历史学者邓是贊美在加利福尼亚和其后被美国攫去的新西班牙其他各地的传教士的活动的，他所写的一些書几乎有一半文字是叙述传教士会区域內印第安人的起义和暴动的。② 教会在这些事件中得到的独树一格的好处是：教会宣告在和印第安人冲突时被击斃的传教士是“神圣的殉教者”。

西班牙人統治了墨西哥凡三百年，在这期間，按照最保守的統計，教会向当地居民榨取了60亿比索，僧侶总共創办了29所教育机构，其中10所是小学。③ 宗教审判厅严密地注意着，不使革命書籍流入殖民地。

在西班牙人統治期間和他們被逐出后的长时期內，教会一直是殖民者的同盟軍。对1810年爆发的独立运动表示同情的祗有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所生的混血兒教士，他們在教会阶层中是被視作賤民的。④ 教会中的显貴們差不多和世俗的殖民者們一致反对爱国者。普通教士們，如墨西哥的混血兒依达里各和馬立洛斯，参加爱国者的一方，被教会詛咒和革除教籍。例如，墨西哥总督和宗教审判厅对爭取独立而斗爭的英雄馬立洛斯的

---

① 倍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582頁。

② 彼得·邓：“西海岸神职人員的前驅者”，1940年；“墨西哥北部的耶穌会前驅者”，1944年；“塔拉希瑪拉的早期耶穌会传教活动”，1948年；巴克萊—洛杉磯。

③ 拉法哀尔·潘特路查：“墨西哥历史中的阶級斗爭与被歪曲的史实”，墨西哥，1935年，第31頁。

④ 墨西哥为独立而斗爭的年代中（1810—1821），在六千名教士之中祗有140名站在爱国者的一边。犹་桑吉纳：“天主教对美洲的兴趣”，第二卷，墨西哥，1863年，第253頁。

联合判决書中宣称，他被处极刑因为他是一个“异教徒和异端的传播者，教会首长的压迫者和迫害者，圣餐的亵瀆者，分离派信徒，淫乱者，伪善者，基督难以教化的敌人，霍布斯、格林威治、伏尔泰和路德以及与上述諸人同样患麻疯病的作者，唯物論者和无神論者的信徒；上帝、国王和教皇的叛徒”①。甚至于資产阶級历史学者密欽，他力图在自己的“拉丁美洲的教会与国家”一書中为教会的活动辯护，但被迫承認道，“美洲教会史中沒有比僧侣对待独立运动更为黑暗的史实了。”②

教会显貴們对西班牙殖民地中独立运动的态度是符合教廷堅决捍卫殖民者統治的立場的。著名的阿根廷社会活动家罗道尔福·基奥尔奇写道，梵蒂岡为反对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而斗爭。③庇护七世在1816年1月3日給新西班牙僧侣的詔書中，頌揚西班牙国王菲廸南七世“非凡的德行和才干”，要僧侣号召信徒“順从国王和向其表示应有的忠誠”④。一直到1827年西班牙人已被驅逐出美洲的时候，教皇在当地有建立独立教会可能的威胁下，不顧保护权已經讓出——当时西班牙国王菲迪南七世对保护权还仍旧不肯放弃——逕自任命一些拉丁美洲共和国的主教。可是当时庇护七世还急于使西班牙国王相信，他——教皇——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关心教会的利益，同时也关心国王的利益，因为“宗教联系是唯一能够号召已經掙脫臣民桎梏的人（即指拉丁美洲的人民）重新归順于您的保証”⑤。

梵蒂岡任命前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中的主教这一举动类似事实上承認这些新的共和国。西班牙国王对这一举动不能容忍。

---

① 汶逊蒂·桑兹：“馬立洛斯与彼里伐”，墨西哥，1947年，第87頁。

② 劳依特·密欽：“拉丁美洲的教会与国家”，却波尔山，北卡罗来納，1939年，第47頁。

③ 罗道尔福·基奥尔奇：“天主教与联合行动的政策”（“文化的捍卫者”，布宜諾斯艾利斯，1955年5月号，第12頁）。

④ 路卡斯·阿拉茄罗：“美洲的教会与西班牙的統治”，第179頁。

⑤ 同上，第262頁。

由于菲廸南七世的抗議，新教皇——庇护八世暫时停止任命主教和对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在罗馬的非正式代理人予以百般冷淡和侮辱。

祇是因为害怕丧失自己的地盘和企图在前西班牙殖民地重新博得收入才迫使梵蒂冈——这也仅在解放运动开始之后25年——承認拉丁美洲各共和国。但是教会在承認之后，在拉丁美洲繼續依靠未完全推翻的殖民者、地主、种植园主和买办以及其他反动分子，鼓励他們和进步力量斗争。

教会在墨西哥曾进行战争，反对华累士总統領导的宗教改革进步运动。天主教僧侣在1861年时欢呼麦克西米倫和法兰西—西班牙的干涉。梵蒂冈和天主教会同国內和国际反动势力一起，企图扼杀墨西哥1910年的革命。

教会在其他拉丁美洲的各共和国中也奉行这种反动政策。十九世紀及其后美国的侵入拉丁美洲各国，照例也得到教会阶层的支持，教会阶层为了保存自己的特权和財富，总是准备背叛民族利益的。拉丁美洲的反动独裁政权在今日仍然依靠着教会的支持。天主教教会在許多共和国中繼續拥有土地和其他不动产，如同在殖民时期时一样。天主教教会与当地的反动势力，与国际垄断資本，特别是与剝削着拉丁美洲的美国垄断資本，有着密切的联系。

*

* *

天主教教会在西班牙統治菲律宾期間所起的作用，本質上和它在西班牙美洲殖民地所起的作用沒有什么不同。西班牙人是在十六世紀下半叶开始侵略菲律宾的。1564年从墨西哥港口拿維大特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开拓殖民地探險队在罗柏斯·德·兰茄斯拔率領下开往菲律宾。同行的有一群以安德逊·德·烏尔大涅达为首的屬于奥古斯丁教派的僧侣，烏尔大涅达曾在西班牙軍队中混过30年，并且参加过西班牙侵略者的許多次征

战。烏尔大涅达領导的奥古斯丁教派的僧侶們帮助罗帕斯·德·兰茄斯掖侵略菲律宾。不久以后，在菲律宾出現了其他教派的代表（1575年——法兰西斯教派，1581年——耶稣会，1583年——多米尼加教派，1606年——列可立特教派）。“西班牙传教士这种异常敏捷地脫下袈裟換上盔甲和放下十字架拿起宝剑的本領，在菲律宾全部施展出来了。在侵略菲律宾期間我們遇見的西班牙僧侶，特別是耶稣会徒，他們不仅是进一步扩张殖民地的倡議者，而且还是軍事討伐的直接領导者。”① 王国当局奖励僧侶移居到菲律宾去，付給他們旅费（約700比索），并且保証其年俸达100比索。

行政上菲律宾是受墨西哥总督統制。西班牙殖民者們把他們建立在美洲殖民地的一套秩序，拿到菲律宾如法炮制。殖民者在菲律宾設立监护区，而僧侶們得到的权利和特权与他們在美洲殖民地所享受的相同。

西班牙統治菲律宾时期的特点是各教派僧侶的飞揚跋扈，教派之間虽然为爭取优势而进行残酷斗爭，然而在对付偶尔有时企图抑制僧侶的貪欲的殖民地当局时，是团結一致的。僧侶和殖民地当局的冲突通常是以僧侶得到胜利而告終。

天主教会直至十九世紀时，尙不准菲律宾人担任圣职。甚至在十九世紀中叶时，792个菲律宾乡村小教区中祗有181个教区是由菲律宾人或混血种領导的，其余的都在西班牙人掌握之中。

菲律宾人是不被接受为僧侶的。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菲律宾人阿波里拿利奥·德·克罗斯因不准成为僧侶而脫离天主教，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基督教会。1841年西班牙人在僧侶的支持下，对克罗斯的拥护者們大肆毒打。

各教派在菲律宾攫取土地和当地居民的不动产。耶稣会徒

① 古貝尔：“1898年間的菲律宾共和国和美帝国主义”，莫斯科，1948年，第26頁。

們积聚了大量的財富。1767年当耶穌会被查禁时，虽然耶穌会的大部分財产已被藏匿起来和逃避了，正如美国历史学者巴罗斯指出的那样，可是从耶穌会沒收到的財产仍值132万比索之巨。① 十九世紀末期各教派在菲律宾占有42万5,000英亩头等的田地，其中27万2,000英亩在馬尼拉地区。②

指控信奉异端和犯了反对西班牙国王的罪行，是教会沒收当地居民土地和財产的借口。各教派为了占夺大片土地，他們設法在菲律宾上层阶級中找寻"异教徒和犯罪者"，起先許多菲律宾的地主和資产阶級因而被迫逃往国外，后来却推动他們参加解放斗爭。③

菲律宾的农民群众是受僧侶剝削的主要牺牲品。成千成万的农奴在寺院的种植园里工作。他們的劳动果实被僧侶卖給西班牙和其他国家，从而得到巨額利潤。十九世紀菲律宾爱国者霍山·列薩尔在他曾起过解放运动旗帜作用的"不要冒犯我"那本書中，叙述到僧侶对农民的史无前例的残酷剝削。列薩尔的著作被梵蒂岡列入"禁書目录"之中。④

在整整三百年期間內曾作为西班牙殖民者支柱的天主教僧侶，当十九世紀末叶美国軍队占領菲律宾后，便轉而为新的奴役者服务了。"当地僧侶唯一考虑的是教会的物質利益，唯一关心的是教会在西班牙已失去的殖民地中的前途——俄国駐馬德里大使在1899年报告道——当他們确信西班牙欲保存自己殖民地的努力是徒劳无益时，就公开地站到新的征服者的一边，既忘記了自己的国籍，又忘記了自己对西班牙政府应表示感謝的义务，正因为由于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他們才能够在殖民地橫行霸道达三百年之久。"⑤ 从美国政府一方面为了希望得到天主

① 台維·巴罗斯："菲律宾史"，修訂本，芝加哥，1925年，第257—239頁。
② 同上，第40—42頁。
③ 古貝尔："1898年間的菲律宾共和国和美帝国主义"，第67頁。
④ 霍山·列薩尔："不要冒犯我"，柏林，1887年。
⑤ 古貝尔："1898年間的菲律宾共和国和美帝国主义"，第300頁。

教僧侶的支持，所以对待他們极其友好。在签訂巴黎和約的前夕，梵蒂岡国务卿滿意地在罗馬对俄国的代表却留柯夫說，“美国公正地对待罗馬天主教会在他們新領地上的利益。”① 1903年美国政府向寺院买得属于它們的部分田地，付与723万7,000美元补償費，这笔数目在当时是十分巨大的。1908年美国国会拨付403,030美元附加費給天主教会，作为美国軍队侵占菲律宾时教会所受损失的賠償費。②

* * *

天主教会积极参加葡萄牙的殖民地侵略活动。这首先还是那些耶穌会徒。当1549年时，即耶穌会成立后二年，耶穌会在葡萄牙的科英布拉設立了一个訓練传教士的学院。耶穌会利用葡萄牙殖民地的庇护，以当时惊人的速度在巴西、非洲和亚洲奠定基础。1542年他們出現在印度的果阿，1543年——錫兰，1546年——印度尼西亚的摩鹿加群島，1547年——刚果，1549年——巴西，1555年——埃塞俄比亚，1560年——东非洲、安哥拉和日本，1565年——澳門，1579年——中国，1598年——緬甸的庇固和印度的孟加拉，1604年——綠角地区和几内亚，1613年——馬达加斯加島，1616年——柬埔寨，1624年——西藏，1626年——东京湾和暹邏湾地区，1642年——老撾。③

1551年葡萄牙国王从教皇处得到保护权，然而教皇通过耶穌会仍旧繼續控制葡萄牙殖民地中的僧侶。

由于人員的不足，迫使葡萄牙人在殖民初期主要依靠僧侶和传教士們的“外交”才干，他們用誓約和欺詐騙得当地居民的信任，从而使殖民者能长驅直入。

葡萄牙历史学者刘修·德·阿齐維杜宣称，十七世紀初期巴西葡萄牙当局的預算中，撥給传教士的补助金是最大的一个

① 古貝尔：“1898年間的菲律宾共和国和美帝国主义”，第300頁。

② 台維·巴罗斯：“菲律宾史”，第303頁。

③ 安东尼奥·馬托索：“葡萄牙史”，第二卷，里斯本，1939年，第56—57頁。

支出項目——6,500克罗薩杜斯。上述补助金的分配方法如下：在巴羲亚(薩尔瓦多)的耶穌会得3,000克罗薩杜斯，在里約热內卢的耶穌会得2,500，在华尔南埠柯的耶穌会得1,000。阿齐維杜在評論这些款項时指出："撥給传教士的津貼是最合算的支出項目。为土著举行洗礼照例是奴役低等民族的前奏曲。在宣講基督福音之后，經常是与此同时地出現了寻找利潤的兵士和殖民者。改信基督教为强占田产、甘蔗种植場和驅使土著为殖民者服劳役开辟了道路。"①

依仗着殖民当局的庇护，耶穌会徒在巴西强占了大量的土地和奴役着成万的印第安人。十七世紀在馬拉雅姆、巴拉、华尔南埠柯、亚馬森和圣保罗各省中有广大地区是在他們掌握之中。甚至对耶穌会徒殖民时期的活动抱好感的巴西历史学者吉布多·弗萊列，也称他們的政策为"宗教帝国主义"。耶穌会徒一方面奴役印第安人，同时又反对世俗的殖民者，要求以奴役黑人代替奴役印第安人。提出这一要求有着两种原因：一方面耶穌会徒力图把当地居民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由他們去剝削；另一方面他們企图增加販卖黑奴的收入，他們是积极参与販运黑奴的活动的。②

要想把在巴西的耶穌会徒描繪成为使印第安人不受殖民者横暴虐待的保护人的种种企图，是經不起批駁的。主张用黑人代替印第安人的耶穌会会員諾勃立加、安基塔以及其他一些人，他們同时号召自己的同行們对印第安人施加有意的残暴行为。印第安人的"使徒"耶穌会徒諾勃立加在1559年教导他人道："不可予印第安人以自由，因为他們是原始人。"③另外一个"使徒"安基塔教导他人道："宝劍和兵器是最好的传道工具……由

① 刘修·阿齐維杜："葡萄牙經济史"，里斯本，1947年，第256—257頁。

② 耶穌会徒們甚至强迫印第安人和黑人同居，为了要把他們的子女——混血兒——卖出为奴。

③ 倍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725頁。

于恐怖而改信基督教，比由于爱的緣故应該快的多。”①

“耶稣会徒旣是印第安奴隶們的主人，又是黑奴們的主人——殖民地美洲史学者迪菲指出——早期的移民們認为他們的反对奴役印第安人是出于伪善，同时責难他們說，耶稣会徒們的传道可以用下列几句話来总括：“不要触犯印第安人，因为我們要利用他們。”②

馬拉雅姆省的总督在1751年給里斯本的报告中說，耶稣会的传教士們“使受自己监护的印第安人处于极可怜的被奴役、无教育和貧困状态中，而自己則靠他們发財致富。他們的权势慾和貪婪心同样可怕；他們不仅力图管理，而且还企图占有整个馬拉雅姆省”③。

传教士在葡萄牙殖民地对待印第安人的残酷程度，和奴隶主对待黑人一样。“传教士会中的暴虐无道絲毫不逊于奴隶制种植园”④——弗萊列承認道。

巴西的教会全部掌握在葡萄牙僧侶的手里。印第安人不准担任圣职。

乡村小教区的教士們为种植园主—奴隶主服务。随着十七世紀末叶在米那斯—才拉易斯省发現宝石矿后，許多世俗殖民者和僧侶殖民者蜂湧而往，希望能輕易发財。甚至葡萄牙的教士和修道士聞訊后，亦急忙前往巴西搜寻宝石。“僧侶們忘記了他們所作的甘于貧困的誓言和被可耻的貪慾所攫住了，他們的行径十分醜恶，以致于政府命令禁止他們进入矿区。可是政府的法令仍旧无法阻挡他們。占有黃金的貪慾比禁令更有力量。圣保罗省总督最后的对策是要求主教革除几个僧侶的教籍。然而教規的处罰是否比王国政府的命令更有效果，这是有

① 吉布多·弗萊列：“主与奴”，紐約，1946年，第136頁。

② 信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724頁。

③ 海利魁·汉特曼：“巴西史”，里約热內卢，1931年，第297頁。

④ 吉布多·弗萊列：“主与奴”，第174頁。

問題的。"①

僧侶們的道德异常敗坏。僧侶們和情妇共居。"放縱"的风气在寺院中占統治地位。迪菲在談到巴羲亚(薩尔瓦多)——巴羲亚在二百年期間內曾为巴西殖民当局的行政中心——的修道院时写道:"修女大多数是富裕阶級的玩物,她們雇有許多女僕。有时候四个女僕侍候一个修女。修女通过女僕和青年人保持联系,因此"醜聞"迭出。裝着鉄檻的窗戶底下演奏小夜曲、讀情詩和种种殷勤献媚,对于修女来說是慣常的事,正如对于沒有拋弃慾念的人世的少女們一样……不管教会是如何地庄严,然而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教会在巴西的活动同它所宣布的理想毫不相称"。②

* *

天主教僧侶是在葡萄牙侵略者的支持下滲入亚洲和东方各国的。如同在巴西一样,在这里活动着的主要是耶穌会徒,其代表人物法兰西斯克—克薩維尔(其后他被列入"圣徒画象"之中)在十六世紀中叶在印度、日本和中国建立了最早的耶穌会据点。法兰西斯克—克薩維尔兼有殖民地开拓者、商人和宗教狂热者的性格。美国耶穌会徒历史学者林說,法兰西斯克—克薩維尔极其了解商业对于宗教滲入的意义。③当时經常有一大群葡萄牙商人跟随着他。

在亚洲葡萄牙人的活动不得不更为狡滑,同时他們不得不进行更多的欺騙,因为他們的人数不足以用武力来征服这些大国,如印度、中国或日本。所以对于葡萄牙侵略者来說,耶穌会的帮助是极为重要的,尤其是因为耶穌会徒在传教士的假面具下,已經深入到亚洲和馬来亚群島的最偏僻的角落。

---

① 刘修·阿齐維杜:"葡萄牙經济史",第310—311頁。

② 倍萊·迪菲:"拉丁美洲的文明",第735頁,以及吉布多·弗萊列:"主与奴",第447—448頁。

③ 乔奇·林:"远东的宗教",密尔窝基,1950年,第123頁。

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是耶稣会在东南亚的主要据点，而澳門則是亚洲东北部的主要据点。耶稣会从果阿把他們的触鬚伸向印度、錫兰、暹邏、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耶稣会以澳門为据点在中国和日本进行活动。梵蒂岡曾宣称葡萄牙国王为东方的“信仰的捍卫者”。葡萄牙駐果阿的总主教是印度和亚洲其他各国所有天主教僧侶的最高領袖。这种情况持續了将近四百年，直到1953年梵蒂岡为了要保持自己在印度的势力，任命印度人伐梁·格拉西阿斯为紅衣主教时为止。梵蒂岡这一措施引起了葡萄牙政府的抗議，葡萄牙政府在其大西洋彼岸庇护者的支持下繼續死守着果阿不放，同时对这一地区的解放运动予以恐怖鎮压。

美国历史学者潘罗兹指出，自从法兰西斯克—克薩維尔起，“耶稣会徒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进行賄买、恐吓和拷打，以达到使亚洲人改信基督教的目的”①。印度天主教士阿尔浦达塞米在他所写的“印度天主教会”一专論中，承認在印度活动的包括天主教徒在內的传教士們，追求着自私的目的，正如从經济上和政治上剝削印度的列强一样，屬于不同牧师协会和不同国籍的欧洲传教士們，大多数也祗考虑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光荣。”②

英国人出現在印度以后，在印度活动的耶稣会徒和天主教其他教派的代表們轉而为东印度公司效劳，东印度公司承担付与僧侶們經常俸給的义务。1720年5月27日教廷駐印度的使徒助主教（教皇的代表和当地僧侶的首脑）馬里齐以天主教会名义举行隆重的宣誓仪式，表示以信仰和正义为英国人服务。他保証“印度的天主教僧侶将对大不列顛陛下表示忠誠，并拒絕作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害大不列顛陛下和尊敬的公司（东印度公司）的利益与声望的行动，天主教僧侶将服从总督及其繼承人的一切命令”③。

① 布依斯·潘罗兹：‘1602—1639年間在东印度的海战’，剑桥，馬薩諸塞州，1936年，第14頁。

② 霍契尔·阿尔浦达塞米：‘印度的天主教会’，弗利堡，1948年，第48頁。

③ 同上，第60—61頁。

耶稣会徒从印度以殖民地出产的貨物与欧洲市場进行貿易。1697年法屬东印度总督馬丁从本地雪里报告自己的政府道："除了荷兰人以外，耶稣会徒的生意做得最大，在这一方面英国人、丹麦人、法国人、甚至使耶稣会徒在这里安頓下来的葡萄牙人都不及他們。"[①] 馬丁还指出："从沒有一艘从欧洲来到这里的船只不載有耶稣会徒們的貨物的"。

耶稣会徒在中国从事商业和財政活动的积极性并无逊色。在十八世紀初期游历过中国的教皇使节法国人李多尔农的报告中談到："耶稣会在北京开設三家錢庄做高利貸生意。每家錢庄拥有五万到六万串錢的流动資金。"[②]

在中国的耶稣会徒以达到对皇帝宮庭中人士能产生决定性影响为其目的。为了易于博得中国人的信任，耶稣会徒以"科学"活动作为伪装，以掩盖住自己眞正的意图；他們从事天文、数学、炼金术和妖术；繪制地图，充当譯員，严格遵行一切中国人的仪式和礼节。十七世紀的一个时期中，他們打算把罗馬教皇的亲屬嫁給中国皇帝，使两个"天朝"結为亲戚。

*
* *

現在我們簡要地叙述天主教僧侶在法屬殖民地中的活动。

十七世紀时法国人滲入加拿大、新奥尔良地区和美洲的圭亚那，占据了安的列斯群島，并在本地雪里(印度)扎下了根。由于这种殖民地的扩张，1659年在巴黎成立了外国传教士协会，該协会的任务之一为訓練在殖民地特别能保护法国殖民者利益的法籍传教士。

1664年在考尔貝尔的倡議下，成立了法国东印度公司，其任务为在东南亚侵占殖民地。法国东印度公司广泛利用传教士們的服务，后者为公司創造了深入这一地区的条件。法国历史

---

① 西奥图·格里齐盖尔："耶稣会徒"，第一卷，第330—331頁。

② 阿諾尔特·洛柏逊："传教士与官僚"，巴克萊—洛杉磯，1942年，第154頁。

学者托馬吉写道，"法国的传教士們'如果'不是已經成为法国殖民地扩张政策的决策者的話，則至少已成为最好的助手"。① 葡萄牙人阻碍法国传教士們向东深入，把他們看作自己的竞爭者。法国传教士莫脫一朗培尔和巴蕾曾在十七世紀下半叶出发前往暹邏，但是由于受到葡萄牙人的阻挠，被迫不是經海路而是經陆路，也就是經过小亚細亚、波斯和印度而抵达暹邏。由于莫脫一朗培尔、巴蕾和其他传教士們的奸計得逞，法国人終于获得了在暹邏經商的自由，法国人在暹邏設立貨物采購站和得到在曼谷和馬尔共駐扎卫戍部队的权利。②

同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竞爭的法国人不得不运用更为狡黠的手段和詭計。法国传教士的策略比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士更具有弹性。他們准許当地居民的代表人物加入僧侶阶层，广泛賄买当地領袖。传教士在当地居民間販卖酒类，在法国殖民地中酒是被称作法国国王的"牛奶"的。在其他方面，法国僧侶和西班牙或葡萄牙僧侶沒有什么多大的区别。

教会在加拿大是一个最大的土地所有主，如同教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中一样。法国統治加拿大期間，教会攫得所有已开墾土地的三分之二(2,096,754英亩最肥沃的土地)，其中的891,945英亩屬于耶穌会会徒)。③ 甚至今天的加拿大天主教会也仍旧是一个最富有的土地所有主。蒙特累尔市将近三分之一的不动产是屬于各教会机构的。这就无怪乎人們将蒙特累尔称为美洲的罗馬了。

耶穌会徒是法国人侵入加拿大的响导員。耶穌会徒是加拿大的最初的殖民者，最初的一些总督就是依照他們的指示而任命的。对于在加拿大的殖民者而言，收購和銷售皮貨是具有首要意义的事业。殖民者把印第安部落的財产洗劫一空，在收購

① 托馬吉："印度支那之征服"，巴黎，1931年，第11頁。

② 同上。

③ 法兰克·格兰脫："作为宗教的俘虏的加拿大"，莫斯科，1930年，第24頁。

皮貨时欺骗他們，用酒灌醉他們。1632 年时印第安衣洛克族起义反抗法国殖民者，这場战爭延續了 30 年，直至 1665 年結束。僧侶們，特别是耶穌会徒，积极参与鎮压印第安人，宣称这場与印第安依洛克族的战爭为十字軍战爭。①耶穌会徒在各地遍設分支进行皮貨貿易，他們对于鎮压印第安人的反抗特别感觉兴趣。十七世紀下半叶新法国(加拿大)总督写信給考尔貝尔說，耶穌会徒追逐皮貨的热忱不下于捕捉奴隶，传教士会大多数是貿易据点。②

十八世紀中叶，传教士賴伐立脫領导下的耶穌会徒們在安的列斯群島的馬提尼克島上的势力很大，他們拥有棉花、烟草和甘蔗种植园。数千个奴隶在馬提尼克島上的种植园中工作。耶穌会徒把食糖、烟草和棉花販至法国。当賴伐立脫还沒有从事各种投机事业之前，一切都进行得很順利，賴伐立脫最后因为不能使他所开出的金額共达 250 万法朗的票据兌現而破产了。賴伐立脫与法国各大銀行有往来，他的破产在法国引起了一場风波，同时促使耶穌会徒在 1764 年被逐出法国。

* * *

綜合上述，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殖民地的历史証明了教廷协助殖民侵略，和以"天主教"的君王們奴役殖民地人民。

教会本身在殖民地就是当地居民残酷的剝削者。教会以掠夺所得的不少一部份繳給教皇国庫，从而使教廷也成为殖民者的同謀。

天主教僧侶和教廷支持殖民者同解放运动作斗爭，而在殖民者被逐出以后則轉而捍护当地反动派的利益。

---

① 里昂·潘琪欧脫："对新法兰西与耶穌会徒之間的关系的研究(1632—1672)"，蒙特累尔—巴黎，1940 年，第 263 頁。

② 克劳第·朗納尔特："法屬加拿大史(1534—1763)"，巴黎，1950 年，第 85 頁。

第三章

梵蒂岡走向資本主义

天主教会把法国革命看作启示录中的灾难。在法国，政教分离了，教会的财产被沒收了。① 教会的管理机关遭到严重的破坏。教会在人民中的威望降低了。

天主教历史学者庫尔脫被迫承認，教会只配遭受这一命运。"教会和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他写道——因此教会已成为它的支柱，同时社会輿論認为教会对当时制度下的一切缺点应負責任，因为教会是这一制度的組成部份。教会同社会精神毫无联系，它缺少激动人心所必需的內蘊力量，理想世界不会屈从于它的影响。"②

当时教皇庇护六世認为欧洲反动力量将会把革命扼杀，所以把法国人民及其革命領袖革除教籍。教皇在1791年6月30日致所有隶屬于他的教会的通諭中，号召反动派不要垂头丧气。"我們将来援助你們"——天主教会的首領这样好战地宣告。"而你們这些法国人，王位的敌人，为全世界所厌弃的暴虐者，发抖吧！——庇护六世威吓法国人民道——我們的力量将联合起来反对你們。我們为了提醒你們担負起你們的义务，已經祈祷得

① 法国革命时期所沒收的教会財产估价値2,000万法郎(尼尔逊·弗里德利克："十九世紀教廷史"，第141頁)。

② 庫尔脫："历史轉折时期的教会"，布雷斯劳，1929年，第176頁。

太长久了。而你們却不断地愈加强硬，比岩山还要硬……你們敗坏的議会沒有得到你們統治者的批准，就决定使宪法生效，这一宪法将在你們的民族史上永远留下可耻的污点……”。①

1792年2月25日庇护六世写了一封諂媚奉承的正式信函与叶卡特琳娜二世，号召俄国女皇加强反对法国革命的干涉。教皇在感謝叶卡特琳娜二世对反动派的支持时写道：“您不会相信，不可战胜的女皇，您的同情的赫赫明証是如何地鼓舞着我的灵魂，我是多么地应該感謝您。我对女皇陛下的真誠感情无法隐藏在我的心头，所以决定那怕就利用这一封信来表达也好。請您接受我最深切的感激之意，接受我的謝忱，我沒有适当的辞彙来表达出我所体驗到的亲切之感。”②

“上帝的全权代理人”以同样的正式信函向奥地利皇帝法朗士二世呼吁。庇护六世在其中的一封信函中(1792年8月8日)曾为将反对法兰西的战爭进行到底而祈祷。教皇感謝法朗士二世时說到：“您具有这种精神，上帝已經以秋收丰盛的神恩証明了这一点，因为自从您一开始执政，您就仅致力于以武器的力量征服您强大而頑固的敌人，致力于在他們的国家中重建教会和重建法兰西，把所有用武力从我們手中夺去的东西归还給我們。”③

可是无論僧侶們为此目的而如此热心地在祈祷，无論对革命的法国如何詛咒和以革除教籍来威胁，都不能使历史倒退。1796年法国軍队进入教皇区，强迫教皇付出 2,100 万兹庫提賠款。1798年，拿破侖以法国将軍裘福在罗馬被杀为借口，命令自己的軍队占領这一“永恒”城。同年根据托兰蒂条約，教皇应該付与法国人1,000万兹庫提补充賠款。拿破侖取消了教皇世俗的权力，庇护六世本人則命令放逐到法国去。1799 年庇护六世死

① “伟大的法国革命时期內的无神論和同教会进行的斗爭”，資料彙編，第一部，莫斯科，1933年，第69—70頁。

② 同上，第76頁。

③ 同上，第78頁。

于异国，然而他始終不懂得自己目击的那些事件的意义。

出而拯救教廷的却是教廷对他期待最少的人。拿破侖在背叛革命以后，决定利用教会和教皇为他效劳。拿破侖認为宗教麻醉剂能为他作出有益的服务：帮助他使法国人民群众和他所征服的国家順从和听話。

“沒有社会不平等，社会就不能存在——拿破侖議論道——而缺少宗教时，社会不平等也无法存在。当一个人在另一个正在大嚼大喝的人面前因飢餓而将要死去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容忍这种不平等的，假使沒有一个权威者指示他說：这是上帝所希望的，有穷人和富人同时存在是必要的，而在死后的另一个世界上財富的分配将按照另一种方式。”①

从同样的“原則”出发，拿破侖在1801年同新教皇庇护七世(1800—1823)签訂了宗教条約，以这一条約为根据在法国重建天主教会，从而僧侶与官吏和宪兵同列，轉而成为新制度的支柱。内政部开始掌管教会的一切事务。内政部不仅发給僧侶俸給(大主教—15,000法郎，主教—10,000法郎，神父—1,000至1,500法郎，这还不包括公家房屋和菜园在内)，它还指示在宣道文内該写些什么。拿破侖有充分根据把三者联在一起說：“我的地方官吏，我的主教，我的宪兵”。宗教条約签訂以后，教会奴才般死心踏地为新主子效力，宣称新主子是“上帝所賜的为人类謀福祉的人”。②法国的教会采用了拿破侖亲自审定的新的教义問答，新的教义問答頌揚拿破侖的独裁政治和号召信徒遵行帝国当局的命令。“基督徒对統治他們的君王，特別是拿破侖一世，我們的皇帝，負有那些义务呢？”——这是新的教义問答中的問題之一。答案是这样的：“基督徒应該对統治他們的君王，特別是拿破侖一世皇帝陛下，表示爱戴、尊敬、順从和忠誠。他們为了

① 罗吉尔·加罗提："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教徒"，巴黎，1939年，第35頁。

② 安德列·拉特勒依耳："天主教会与法国大革命"，第二卷，巴黎，1950年第126頁。

保卫帝国和皇帝陛下应該服軍役和納稅，为他的健康和国家在精神上的和世俗的福祉而热忱地祈祷”。“为什么我們应該履行所有这些义务呢？”——教义問答在其后提問道。“首先因为上帝是依据自己的意志創立各帝国和分配各帝国以使命的，上帝不論在和平时期或战爭时期都以神恩保佑我們的皇帝。这是上帝使他成为专制君王的，上帝使他成为自己形象在人間的体現者和表現自己威力的工具。”①

拿破侖对教廷的支持极为重視，因为教廷的支持有助于他的独裁政权的巩固。他不仅在法国恢复天主教，还千方百計地在德意志新教区域内袒护天主教，在这些区域內，天主教在宗教改革后首次获得同新教处于平等地位进行活动的可能。拿破侖准許庇护七世住在罗馬，規定給他一定的补助金，可是这位“神圣”的人为了要增加补助金还想出了各种办法。庇护七世本人和通过自己的使者，以值得人們好好地去学习的鍥而不舍的精神，一再地提醒拿破侖說，仅仅依靠补助金是“完全不可能过活的”，同时恳求就是归还从前屬于他的领地的一部份也行，似乎这些領地对維持教皇的威望是异常必需的。②

然而恢复教皇国一事不在拿破侖的打算之中。他希望教廷屈从于自己的政策。庇护七世及其最亲近的顧問們（紅衣主教亢柴尔維等人）对这一点极为了解。表面上庇护七世表示服从法国皇帝，經常向他央求增加补助金和施以小惠，同时又和英国人秘密地交往。当时英国人的艦队在特拉法加角一役后已称霸地中海，这一事实經常提醒教皇說，拿破侖的威势已不如昔了。

1807—1808年間拿破侖重新占領教皇領地，而这一次是正式将这些地方并入法国，1809年剝夺了教皇的世俗权力，最初把他流放到意大利的薩窝那，随后流放到法国的枫丹白露；所有梵

① 安德列·拉特勒依耳：“天主教会与法国大革命”，第二卷，巴黎，1950年第127頁。

② 茄秦諾·塞而茨米尼：“外交家孔澤里尼”，巴黎，1952年，第275頁。

蒂岡的档案也运至該地，庇护七世的两面把戏就此告終。

1813年拿破侖强迫庇护七世签訂新的宗教条約，根据条約教皇应定居法国，拿破侖則答应每年付与教皇200万法郎补助金。然而新条約沒有实施。联軍的迅速迫近巴黎，迫使拿破侖放庇护七世回罗馬去。

維也納会議恢复了教皇国。“神圣同盟”的参加者把教皇看作与革命作斗爭有价值的同盟者并非沒有根据。庇护七世一回到罗馬，就急忙重建宗教审判厅和耶穌会。“如果我們在基督教受到威胁时拒絕神賜与我們的有益帮助，推开圣彼得在狂暴风浪中顚簸前进的独木船，推开那些准备冲破随时都会吞沒我們的海浪的堅强的和經受过考驗的橈夫——庇护七世在恢复‘耶穌会’的詔書中写道——那么我們在上帝面前将是有罪的。”①

“堅强的和經受过考驗的橈夫們”很快地就把教会的管理机构攫取到自己不肯放松的手里，并滲入到教会生活的所有毛孔中。1814年1月，即在耶穌会正式恢复前几个月，耶穌会徒在巴黎建立了“法兰西传教士协会”，这一組織似乎以使法国的“不信者”信奉基督教为其宗旨。实际上“法兰西传教士协会”是波旁王朝警察的一个分支机构，它帮助警察查明革命活动家和把他們一网打尽。

耶穌会的“长手”在意大利特別活跃，意大利反动的保皇党极願利用罗耀拉僧团耶穌会的效劳。同时代人指出，僧侶势力在披也蒙脫区特別跋扈，上世紀三十年代間在这一不大的区域內有600个寺院在活动着。

教会在托斯加那、巴尔馬和那不勒斯王国帮助恢复“秩序”。然而教皇国居民的境遇比誰都还要坏，他們从1814年起，重新得嘗嘗“上帝的全权代理人”残酷的刑具的滋味。自从庇护七世返回罗馬时起，以前的秩序和慣例又在教会区域內占統治地位：

① 古贝尔：“耶穌会徒”，1899年，第314頁。

买卖職位和圣物，教廷的横暴和縱慾无度……政治上不可靠分子每十五天要向警察所指定的教士作忏悔。“事情甚至于发展到这般地步——法国历史学者索林說——在罗馬街上禁止点煤气灯，因为这一有益的发明使人联想到异教徒来到罗馬；根据同一理由接种牛痘也被禁止。”①

梅特涅的秘密代理人在1822年，即庇护七世統治教廷的末期，报告維也納說：“可以肯定地說，今日的罗馬在宗教方面是心灵荒蕪的中心，在世俗事务方面則一团糟。居民大多数习于偏見，而不是眞正的信仰。在这一个由紅衣主教、高級僧侶和教士們組成的政府中，其政策可以总結为不断地要弄法利賽人的把戏和玩权术。經济生活混乱透頂……財政情况到了言辞无法形容的恶劣地步。部长的貪污和不学无术为教皇国庫带来可观的損失……在所有教皇的区域內，法庭是公开行賄的……。”②

里夫十二世（1823—1829）統治期間，对异端份子的迫害愈发厉害，税收层出不穷，对劳动居民的剝削更加强了。教皇的宗教审判厅审判官之一紅衣主教里伐罗洛，在1825年一年間就判处了568个“自由主义者”以死刑。1825年紅衣主教裘斯济阿尼尼，依馬拉教区主教，命令把被控“瀆神罪”的犯人的舌头刺穿（所有意大利的为教会所疾視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者都被控犯此罪行），他允諾发給告密者有效期为10年的贖罪券作为奖励。甚至于梅特涅的代理人也对教皇区域內的各种制度表示不滿。1825年10月間他报告自己的主子說：“巴比倫，这才是和罗馬相称的名字。这里什么事都能用黄金办到……罗馬的僧侶足足有三分之二是伪善的，可收买的；教士大多数对自己的職务漠不关心或者是不信者。这个政府（即教会——作者）是土耳其神权政体政府。”③

---

① 索林：“意大利史（1815年起至維克托·爱麦虞埃死为止）”，1898年，第36頁。

② “意籍教皇”，第84頁。

③ 同上，第86—87頁。

为了恐怕这种制度会引起革命，列强在1831年当格里哥里十六世(1831—1846)被选为教皇之际，向梵蒂岡呈递了一份备忘录，建議梵蒂岡进行某种改革。可是格里哥里十六世的統治方法和他的前人沒有多大区别。格里哥里十六世是一个"愚蠢而酗酒的恶棍"，由于过度酗飲馬尔薩拉葡萄酒而死，赫尔岭談到他时这样說，格里哥里十六世并且还是他"全能的"僕人茄当諾·莫洛尼手掌間的玩物……

紅衣主教們是能和教皇搭配的人物……"这是怎样令人可怕地僵硬而多疑的臉(使人联想起宗教审判厅和火刑的慘状)，这些透露着死意的头髮寥寥无几的禿頂；在他們衰老的面貌中可以看出独身老人的冷酷无情和外交官一祭司的残忍性情。是呀，他們是宗教审判厅和反动陣营中的人物……"①——赫尔岭在其著名的"来自維阿·德·考尔索的書信"中这样描述紅衣主教們。

赫尔岭显然沒有夸大。当时还有一位正統的天主教徒拉美涅在1832年参拜罗馬以后写道，格里哥里十六世的同事們是些"追求官爵者、吝嗇鬼、墮落者、耽于幻想的白痴"②。

教皇領地內遍布暗探。祗要根据簡单的告密就可以逮捕人。那些在教会一警察机关的文件上被列入"所謂思想阶級"的人，特别受到迫害。

"乡村小教区的住持們——意大利历史学者台馬尔珂写道——有权在白天或夜間的任何时間內闖入居民的家中，检查是否有破坏誡規和教規的行为……教士們以未奉行宗教仪式为借口，可以举行搜查和逮捕人。"③

① 赫尔岭"法兰西、意大利書信集，来自彼岸"，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第87頁。

② 胡华特："关于欧洲保守主义的三篇专論（梅特涅、基佐、十九世紀的天主教会）"，倫敦，1929年，第268頁。

③ 多明尼珂·台馬尔珂："教廷的沒落(教皇格里哥里十六世)"，都灵，1949年，第97頁。

成千个政治犯在宗教审判厅的刑訊室中和监獄的囚禁室中被折磨着。“罗馬和教皇領地中的監獄在教皇陛下死前(即格里哥里十六世)——赫尔岑証明道——已經是滿坑滿谷的了，以致于开始在所有的公共建筑物中囚禁政治犯。”①許多人逃往国外以免受到迫害。

“参加秘密会社的会議被視作叛乱行为，因而会招致死罪和沒收財产——金格写道——任何人协助秘密会社的会員逃亡則被判处終身服苦役，任何吸收新会員的企图其罪与上相等。盜窃圣物虽然和政治风馬牛不相关，也算作叛乱行为并得处以死刑。”②

論述經济問題的書籍被認为是反上帝的和危險的，因此被教会检查机关禁止发行。書刊上不准提到地球是在迴轉着的。教会当局灌輸蒙昧主义，其原因正如梵蒂岡的一个高僧阿捷利奧所說的那样：“无学識的人民容易管理”。

然而“无学識的人民”仇視教皇当局，仇視那些穿袈裟的官吏和警察，把他們看作是自己的压迫者和剝削者。教皇区域內到处都有烧炭党的組織和地下会社在活动着。

“这不可能有别种結果——金格在評論教廷的臣民的共同的情緒时指出——所有这些严厉的防范性的法律，与护法者道德敗坏的行为是如何駭人听聞地矛盾着。当时虽然在复活节期間要求信徒上教堂做礼拜，但僧侶經常用行圣餐礼做买卖和以終身免罪符作投机生意，其无耻程度同路德时代相同。当时虽然对拒絕行圣餐礼的人不准予以治疗，但是在罗馬僧侶閒暇中的自由思想很活跃。检查机关正在关怀着戏劇节目的道德純洁性时，而当时的教会却是淫乱和阴謀的中心。兒童在学校中被迫严格奉行宗教仪式，可是他們在教堂中听到的却是对虔信的强

① 赫尔岑：“法兰西、意大利書信集，来自彼岸”，第84頁。
② 鮑尔頓·金格：“意大利統一史”，第一卷，莫斯科，1901年，第82頁。

盗的贊美，这些强盗还受到圣徒的保护而免受絞刑。教会由于財政上的需要公开在礼拜天卖彩票，而小酒店和咖啡店在这一天却应該关門停止营业。”①

教皇国的前途由以教皇为首的僧侣阶层和“黑色”②貴族們决定。黑色貴族就是教皇的后裔和紅衣主教的亲屬，其首要人物有柯隆那，奥西尼，罗斯保里，阿尔杜勃朗奇尼，杜里亚，奥德斯卡尔基，鮑尔格什，洛斯披尔奥西，麦西莫和托尔洛尼；正是他們及其妻女和情妇們，决定着“宗座”的政策。統治着各省的紅衣主教們，其权限无边，因此他們可以横行霸道无所不为。最好的田产、宮庭——总而言之，所有的財富都归屬于教会的显貴們和“黑色”貴族，而广大群众则忍受飢寒和穷困。“不論哪个地方的无业流民、失业者和乞丐，都沒有罗馬这样多”③——台馬尔珂指出。居民們长期地挨餓。1837年时，面包房得在兵士的保护下分送面包到店鋪里，因为怕受到飢餓的群众的拦刼。罗馬城内窃賊十分众多，而在郊区則强盗十分猖獗。为了保护旅客起見，道路两旁的树木尽行砍去，这种情景和英国在八世紀时相同。

教皇領地在經济方面是欧洲最落后的封建国家。至于要筑造鉄路一事連想也不曾想到过。教皇格里哥里十六世宣称筑造鉄路是魔鬼的事，是上帝为了亚当和夏娃的原罪对人类誘惑。每一省都有自己的度量衡单位；各省都設有关卡收稅。沒有开办过工厂。教皇国庫把酒类、食盐、魚类和糖食的买卖交給投机商人包办。

虽然教皇国庫仍旧象从前那样地繼續收进黄金，可是教廷

① 鮑尔頓·金格：“意大利統一史”，第一卷，莫斯科，1901年，第86—87頁。

② 在意大利，人們把数百年間和教廷有着联系的保皇派家族（貴族）称作“黑色”貴族。

③ 多明尼珂·台馬尔珂：“教廷的沒落”，第97頁。

的财政却处于“长期的混乱状态中”①。六十年代时，仅每年收进的“圣彼得一枚捐”就达800万兹庫提。意大利統一前夕，教皇領地的收入超过5,000万里拉。即使有了这么許多錢，然而“上帝的全权代理人”还嫌不够用。教廷收入的大部份照例被教皇的亲属、宠臣和紅衣主教們归入私囊。赤字和国債每年都在增加。格里哥里十六世在重新把犹太人赶进犹太区以后，就不以为向巴黎的洛希尔銀行借債度日是降尊紆貴了。1831年、1832年及1837年，教皇向洛希尔借得1,200万兹庫提。②其他較小的銀行家和高利貸者也为教皇效劳：托隆尼亚(罗馬)、派洛奇(热那亚)、以及其他等等。格里哥里十六世統治教廷的最后一年，教皇国的債务超过2,600万兹庫提，而每年的赤字达90万兹庫提。

所有这些事实証明，教廷同法国的波旁王朝一样，在复辟以后什么也沒有学到。最后的一个教皇兼国王——庇护九世統治时期(1846—1878)在这方面是最特出的。

麦斯泰·弗立蒂大公，后来的庇护九世，最初选择軍界为立身荣名之途。他在十九岁时投身軍界为拿破侖效劳，以中尉軍銜在拿破侖皇帝的羽林軍中服役，在巴黎逍遙度日。拿破侖失敗以后，这位未来的教皇脫下法国制服換上奥地利的制服，其后又轉而在教皇庇护七世的近卫軍中服务。③不久后这位年青的軍官由于患羊癲疯被迫拋弃軍职。他輕而易举地脫下軍服披上袈裟。麦斯泰·弗立蒂在成为高級教士后得到了一个重要任务：以教皇厅非官方代表的身份訪問拉丁美洲，与大西洋彼岸各共和国中的天主教僧侶进行接触。1823—1824年間他在

---

① D·A·宾契："法西斯意大利的国家与教会"，倫敦，1937年，第304頁。

② 多明尼珂·台馬尔珂："教廷的沒落"，第145頁。教廷向洛希尔借的最后一次著名的債，是在教廷世俗权力被剝夺的前夕——1870年7月，債額为20万兹庫提。

③ 索林："意大利史"，第123—124頁。

美洲各国旅行，回到罗馬后晋級很快。麦斯泰·弗立蒂在三十余岁时已是主教了。外面有流言說他对自由主义精神并不抵触，甚至于說他同情于統一意大利的思想。1846年当格里哥里十六世死去和空气中能嗅出革命风暴的气息的时候，自由主义化的麦斯泰·弗立蒂主教是被选为“上帝的全权代理人”最合适不过的候选人了。虽然当时他祇有50岁，这一年龄对于教皇而言是“不体面”的，但是紅衣主教們投票选他，因为教皇厅需要一个年青的、有进取精神的首领，他能够在正在迫近中的新的革命风暴面前，强有力地保护教皇厅的利益。

新教皇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是向所有屬于教廷管轄的教会发出一张詔書，他斥責共产主义为罪恶的学說，从而取得梅特涅和俄国沙皇的欢心。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最初的几行里，把教皇和旧欧洲联合在一起为“神圣地驅除共产主义”的势力列在一起，所指的就是这张詔書。可是无論是恐怖手段，是咒語，都不能阻止革命。1847年时庇护九世恐怕人民起义，不得不对社会輿論作了某种讓步：允許发行报紙和筹組国家会議——类似議会性質的組織。教皇向民主势力献媚的时間并不长。1848年庇护九世反对同当时占領着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奥地利作战，他还企图撕毁自己宣布的改革方案。这事在罗馬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憤慨。教皇逃往海他島。人民在罗馬宣布成立以馬志尼和加利波的为首的共和国。

逃亡在海他島上的教皇向那不勒斯国王菲廸南二世，向未来的拿破侖三世，向西班牙和奥地利求援，他們派遣了自己的軍队攻打罗馬共和国。① 祇在罗馬共和国被扼杀和罗馬人民被鎮压下去以后，庇护九世才回到自己的首都，他在外国刺刀的保护之下又作了长长二十年的世俗君主。

庇护九世依靠了法国駐軍和瑞士雇佣近卫軍，后者实际上

① 庇护九世为了感謝拿破侖三世的武装干涉，其后称他为“先知”（尼蒂：“沉思与紀录”，米兰，1953年，第20頁）。

是类似现代外籍軍团的由国际冒險家組成的五花八門的杂膾部队，在人民面前經常惶恐不安地度日。

紅衣主教柴柯摩·安东尼里在将近三十年期間是庇护九世的左右手和他的政府的首脑。虽然安东尼里有着紅衣主教的头衔，然而他甚至連神父都不曾当过。教皇的全权代理人极端憎恨所有的进步事物，他对金錢的貪欲永无饜足的时候，并且好色如命。安东尼里的非婚生女在他死后和梵蒂岡涉訟多年，企图得到被里夫十三世所侵吞的他父亲的遺产。安东尼里的兄弟之一菲利浦領导着梵蒂岡开設的"罗馬銀行"，該銀行的資本不但全能的紅衣主教能自由应用，連其人数众多的亲屬也可以自由应用。紅衣主教的另一个兄弟路德維格掌管着教皇区域的經济事务。在庇护九世其余的同事之中，应該提提作为警察总监的高級教士菲利浦·那杜尼，他曾經是刑事分子，年青时曾因盜用公款而坐过监獄。

庇护九世領导反动势力与意大利統一运动作斗爭，因为意大利的統一威胁着"宗座"的中世紀特权，威胁着教廷在亚平宁半島上的势力。教廷是意大利封建反革命势力的主要急先鋒，耶穌会徒們根据庇护九世的指示組織了为宗教狂热所鼓动的圣菲奇斯脫匪帮，以恐怖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匪帮在意大利南部施行恐怖政策，为了"圣父和上帝"的名义搶圾和杀戮意大利爱国者。意大利全国統一后的一个长时期內，政府还得和这批暴徒作斗爭。

教皇把馬志尼、加利波的和一切为統一意大利而斗爭的爱国者都革除教籍。教皇为了詛咒意大利的爱国者們，用尽了一切的詈駡辞彙和穢言。狠、叛徒、法利賽人、賊、謊言者、伪善者、酒魔、不洁者、撒旦的后代、死亡、罪恶、上帝的敌人、地獄的精灵、現世的恶魔、发臭的尸体、变节者、犹大——以上这些还远非"圣父"用来咒駡为自己祖国的統一而斗爭的人的全部形容詞。①

庇护九世在1864年公布的“异教謬論”，或称“現代的各种謬論目录”，是他的思想上的信条。庇护九世不仅詈罵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对現代文明統統詛咒。庇护九世特别詛咒那些断言“教会在其活动中不应使用暴力和具有世俗当局的特权（謬論之二十四）；教会沒有自然的和合法的权利占有人世間的財产（謬論之二十六）；教皇应該同进步思想、自由主义和現代文明和解，以及贊同这些观点（謬論之三十）”和其他等等的人。庇护九世在“异教謬論”中——梵蒂岡直到今日还沒有把它废止——把信仰自由称作疯狂，把言論自由称作发恶臭的謬論。

庇护九世为阻挡历史发展的掙扎是徒劳无功的。独立的教皇国的存在及其古代的封建制度、宗教审判厅和披着袈裟的警察，乃是統一意大利的主要障碍，意大利人民最后終于剝夺了教皇的世俗权力，而教皇国的領土成为統一的意大利的一部份。1870年9月20日意大利人民对准通往罗馬的要冲“圣門”（庇护港）而发的几次排炮，結束了教皇国的存在。接着举行的全民投票中，全罗馬只有42个人投教皇的票，即反对把罗馬归并入意大利。庇护九世最后一次专制的行动是宣布教皇絕对无謬說，这一信条是在罗馬被意大利軍队占領前不久教皇召开的“全体基督徒”会議中，在耶穌会徒們的压力下通过的。会議的参加者之一，克罗地亚主教約瑟夫·許脫劳斯馬耶尔不願投票贊成教皇絕对无謬說，他說：流經罗馬的台伯河的全部河水，都不足以洗清教廷可耻的历史上最短一时期內所沾的污点。这些話可以作为具有千年历史的、終于在1870年可耻地結束自己时代的教皇国最确当的墓志銘。

① 威廉·格拉斯哏：“罗馬和教皇在良知和历史的法庭前”，莫斯科，1903年，第193頁。庇护九世在各方面都是庸庸碌碌的一个人。他爱好舞会和盛宴，喜欢听上流社会間的流言蜚語。在他的官方传記中驕傲地記載着：他每天都得換衬衣和噴上大量香水（凱騰莱：“罗馬与教皇国”，第一卷，罗馬，1907年，第140頁）。

意大利資产阶級在达到剝夺教皇世俗权力的目的以后，就此罢休，对天主教会本身不再攻击。用意大利历史学者法皮奥·柯新的話来說，經济实际产生了意大利資产阶級的反对僧权扩张运动，可是也限制了这一运动的发展。[①]事实上的确如此，意大利資产阶級如同法国資产阶級在这种情形下一样，大量購进从教会处沒收得来的田地。意大利資产阶級幻想将資本和十字架結成同盟，因为他們发現了宗教、教会和教皇"有益于社会"的部份。卡扶尔在1850年时就在披蒙蒂地方議会中发表了这个思想，他說："为了現代社会的进步，必須有两个对社会能产生强大影响的道德力量参加工作：宗教和自由，"[②]所謂自由他指的是資产阶級政权。这就是为什么根据意大利議会在1871年通过的"保障法規"，意大利政府不仅保証教皇和教皇厅的行动自由，不去冒犯梵蒂岡和其他教皇所使用的宫殿和建筑物，还要規定每年付給教皇322万5,000里拉的补助金（1,622,425美元），这笔补助金等于教皇国最后的几年中教皇宫的支出費用。自由主义还表現在对待教会財产方面。意大利政府将94万英亩教会領地充公，然而其中主要是收益甚少的生地；1906年教会田产大傾銷以后，在僧侶手中还有40万以上英亩的上好田地，其中包括在劳列縻、阿西澤和派陀哀最富裕的大地产。換句話說，教会在被意大利資产阶級"搶刼"以后，梵蒂岡仍然是意大利最大的大地主。

在政治方面，柯新說，"意大利政府对待繼續在向它进攻和号召全世界仇恨和敌視它的教权派对手，态度同样地軟弱。所有这一切都使安东尼奥·葛兰西有权利作出推論說，統治阶級是如此地傾向于保守，他們几乎是滿意地瞧着自己敌人得到成功，而从本質上来看教会不是什么敌人。事实总是事实，不管左翼自由主义者們的尖銳抨击和唇焦舌敝的抗議，也不管抵制僧权扩张法的草案在每届会議上都交付議会审查，并且在1874年

① 法皮奥·柯新："統一的意大利，1860—1876"，罗馬，1952年，第62頁。
② 刘易奇·蘇尔伐多列利："教会与世界"，罗馬，1948年，第115頁。

还采納了一部份，天主教会仍旧可以享受殉教者的一切特权，实际上这些殉教者生活得很逍遙自在。正如一位同时代人指出的那样，在意大利“人們象服侍一个期望她死去的疯老婆子似的，服侍着又可鄙又可恨的教会。”① 卡扶尔及其繼承者們“可怕地”反僧权扩张主义在事实上就是这样。

庇护九世在被剝夺世俗权力以后，一直到死为止，对依靠法国或奥地利的刺刀来收还他所失去的东西沒有失却过希望。他拒絕接受政府的补助金，因为接受补助金意味着承認意大利国家，教皇把他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意大利很快的复灭上。

然而当时教皇不十分需要錢用。罗馬和世俗权力的丧失使教廷的財政得到巩固，虽然初看起来这事非常奇怪。随着世俗权力的被剝夺，教皇几乎立刻从全部自己的債务中解放了出来，在此以前教皇的一半左右的收入，是用以償付这些債务的；因为“囚徒”不負担义务，同时也由于“非取决于他的情势”而无力償淸債务。其后教皇厅用以維持一般警察和秘密警察、軍队和官員等的开支大为减少。意大利政府为教会保留了价值达10亿里拉的財产（約为今日的五亿美元），这些財产繼續为教会带来可观的租金。此外，当教会財产大出售的时候，一部份財产为梵蒂岡的亲信人士所买得，因此仍旧是梵蒂岡的領地。許多教会开設的經营面粉食盐等业务的企业，在罗馬归并入意大利之前不久，改头换面地成了“私人”股份公司，繼續在梵蒂岡的控制下做买卖。② 庇护九世被“幽禁”以后，“圣彼得一枚捐”（自 1860 年起在各国征收）的收入仍不断地增加着。1866 年时，“圣彼得一枚捐”的收入等于 180 万美元，而在七十年代之初則已經超过 400 万美元。③ 梵蒂岡的收入还不限于此。通过“宣传信仰”主

① 法皮奥·柯新：“統一的意大利，1860—1876”，第126—127頁。

② 亚尔倍托·卡拉基奥洛：“罗馬首都——从意大利的恢复統一到自由国家的危机”，罗馬，1956，第121—122頁。

③ 米海尔·威廉士：“行动中的天主教会”，紐約，1934 年，第 153 頁。

教会有大宗款项上繳給梵蒂岡，例如在1850年时即达3,309,646金法郎。①

根据美国教士威廉士所著的"行动中的天主教会"一書中的材料——这本書的出版得到教会当局的同意——除了上述各項收入以外还应加上：教皇办公厅和日期签署局的收入，出售教廷各种勛章和貴族头銜的收入，因准許血亲結婚和"洛脫"审判厅准許离婚所得的費用，巡礼者的捐献，信徒巨額的贈与和遺囑中規定給与教会的遺产等。② 意大利历史学者薩尔汶米尼指出，有价証券的股息也是收入的一項，梵蒂岡尙在庇护九世統治时期即开始积累有价証券了。③ 此外还应該加上出售贖罪券所得，梵蒂岡虽然命运多乖，可是繼續以此为业。

如果考虑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时，根据英国紅衣主教伏庚的正式声明，梵蒂岡的开支祗在200万美元左右，那么显然梵蒂岡是不会經受任何財政困难的。④ 然而教皇經常为自己的"穷困"而訴苦。教皇厅的哀泣和叹息，几乎把教皇描繪成一个身穿破旧衣服和行将餓死的人（在天主教各国中，僧侶們在信徒間散发一种粗制濫造的图片，图上所印的教皇是一个睡在牢獄中草秸上的囚徒），其目的正如柯新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即要求全世界的天主教徒把錢袋张得更开些，而事实上这和教皇国庫的实际情形毫无共同之处。⑤ 由于所有这些情况，"貧穷的"庇护九世創造了眞正的"奇迹"：他不但沒有給自己的繼承者留下債务，甚至还留給他3,000万里拉的遺产（約1,500万美元）。

世俗权力被剝夺后所产生的另一个对教廷而言意义不小的后果，亦必須指出。世俗权力的被取消，从而把教廷在社会輿論

① 艾德崇特·卜瑞聚司："法国的天主教"，巴黎，1851年，第35頁。
② 米海尔·威廉士："行动中的天主教会"，第155頁。
③ 茄索茄·薩尔汶米尼："外交家墨索里尼"，第269頁。
④ 乔治·賽尔特："梵蒂岡——过去、现在与未来"，紐約，1934年，第248頁。
⑤ 法皮奧·柯新："統一的意大利"，1860—1876，第116頁。

間最醜陋最可耻的标志也"清除"掉了：恐怖鎮压机构(警察、监狱、战争机器)，职位的买卖和整个經济部門操縱权的出讓等，"經济"政策的表现，各种税收。教皇只是教会的首脑，这有助于教皇个人威望以及教会威望的提高，有助于"基督教的美德"这一幻想在群众間复活起来，似乎这种美德是僧侶所固有的，特别是教皇所固有的。为了巩固梵蒂岡的威望，尙在庇护九世时教会的宣传机构就沒有忘記利用所有这一切手段。庇护九世繼續是一个典型的教皇兼封建主。

十九世紀中叶，当欧洲为最初的資本主义大危机所震动的时候，当資本主义生产和国际交换的法則調整着各国人民的生活和决定着战争与和平的命运的时候，当美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和角逐殖民地的斗爭具有狂热性質的时候，当在巴黎燃烧起了无产阶級革命的火焰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庇护九世所統治的教廷，不仅从它所捍护的地位一方面而言，同时也从它在保护自己的地位时所使用的武器方面而言，基本上仍旧是一个封建政权。教廷把自己和意大利政府的冲突，看作封建主之間和王朝之間的冲突。① 庇护九世幸灾乐禍地迎接巴黎公社的建立。梵蒂岡的报刊为"普遍的群众騷动"而欢呼，因为教廷期望資产阶級将会懂得强有力的教会对他是如何地需要。"用火炬和煤油武裝起来的工人国际——这是上帝憤怒的工具。請你們选择吧，和教皇在一起或者和工人国际在一起！"② ——70年代之初耶稣会在意大利的机关报"天主教文明"上疾声大呼道。

但是政治和物質利益不断地推动教廷，某些国家中的天主教会和教权派組織同資产阶級合作，吸引他們走上資本主义的途径。教廷和資产阶級共同把社会主义运动視作他們的敌人。随着这一力量的增长，随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各政党的发展，

---

① 爱珂里："'罗馬問題'的結束"，"工人国家"，1929年2月，第125頁。

② 菲特列克·知鮑："意大利外交政策史(1870—1896)"，第一卷，巴黎，1951年，第407頁。

教会和資产阶級亲密起来了，他們彼此忘却了多年的宿怨和旧帐。

法国的天主教会和資产阶級的联盟是在1848年初次公开的，当时这两股力量为了共同和工人阶級作斗爭而联合起来了。当时退耳欢迎教会的支持，他說"祇有教会能够教导穷人們順从，答应給他們永世得救"①。国民議会中教权派的首脑蒙泰朗倍尔就把这一論据用各种調子到处唱。"基督教的人民——这个現代天主教理論家劝說他的資产阶級同事道——除了用刺刀以外，还可以用其他方法去恫吓他們：凡是得遵守上帝法律的地方，上帝本人就在执行着警察的职务。"②他声称，宗教不但应該服从政权，并且应該衷心地尊敬它。"我沒有必要重复地述說宗教对于私有財产的意义——蒙泰朗倍尔感叹道——現在的問題是什么呢？使沒有私有財产的人养成尊敬私有財产的习慣。我不知道除此而外还有其他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强迫他們去信仰上帝！不是去相信各派折衷論者的泛神論，而是去信仰制訂十誡和教义問答的上帝，去信仰詛咒不信者永世为賊的上帝。这是唯一切实可行和有效的保护私有財产的办法。"③

教会公开地通过蒙泰朗倍尔的嘴宣称，教会准备以上帝荣耀的灵光护佑資本主义制度，和作为这一制度精神上的警察。

資产阶級和教会的联盟是拿破侖三世帝国的基础。

在德国天主教会和資产阶級的亲密关系也是在1848年革命期間开始的，当时最初出現了一批专事討好工人的天主教联合会和联盟。这些組織的理論家是美因茲的大主教凱脫雷。凱脫雷在其1864年刊行的"工人問題与基督教"一書中以憤怒的言辞抨击資本主义剝削，但只不过是为了号召工人們信仰天主教求

① 馬迪："天主教社会与政治运动（1789—1950）"，（"教会与社会"，第134頁）。

② 罗吉尔·加罗提："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徒"，第34頁。

③ 同上，第37頁。

上帝拯救而已，这是完全能使資产阶級滿意的。馬克思在德国旅行以后，在1869年写信給恩格斯說："这次旅行，經由比利时，小住亚亨，溯莱因河而上，使我确切相信，必須大力地，特别在天主教盛行的地方，对神甫进行斗爭。我将按照这意思通过国际去努力。这些狗(比如美因茲主教凱脫雷，杜塞尔多夫大会上的神甫們等)，只要覚得有机可乘，就和工人間題眉目传情。我們在1848年事实上为他們辛苦了一番，只有他們在反动时期享受了革命果实。"[①] 天主教会因工人阶級已經覚醒而惶恐万状，它力图贏得工人阶級的信任，同时又孝身于資产阶級，以馴服无产阶級为自己的职守。

天主教会和資产阶級的亲密过程在意大利进行得較慢些，同时所遇到的困难也較其他国家为多。但是甚至于在70年代当庇护九世对他所仇恨的自由主义者特别抱恶感的时候，教权派仍力图扩大自己对劳动群众的影响以与社会主义者相抗衡，这种意图不能不博得資产阶級的同情。1874年，意大利教权派組織的联合組織"行动会議"通过了一項决議，决議号召建立天主教工人联合会，联合会应以"基督教爱人精神"和"对恶不予反抗"等原则为行动准则，所謂对恶不予反抗就是說不要反抗資本主义剝削。至于在农民問題方面，会議責成天主教組織保护他們免受"反宗教、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罪恶的熏染"，教会就这样又一次地討得意大利資产阶級的欢心。

如果說教廷和意大利資产阶級在政治和思想領域內的爭执持續得較长久，那么在物質关系方面由于梵蒂岡进行企业活动，所以两者之間的意見紛歧克服得不可比拟地迅速。

1830年成立了梵蒂岡的"貼現銀行"。1834年梵蒂岡建立了"罗馬銀行"，資本为30万茲庫提，从事不动产的投机买卖。同年創立"圣灵銀行"。1836年高級教士泼·米里尼和克·勒·莫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四卷，第236頁(俄文版)。譯文采用武剑西譯"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14頁。——譯者

里尼尼在罗馬建立了儲金所，十年以后其存款已达1,000万里拉。1852年梵蒂岡增加“罗馬銀行”的資本，并吸收罗馬最大的金融家参加。① 1845年成立了至今犹在的梵蒂岡股份公司“安济加·瑪尔却圣水公司”，該公司經营罗馬的自来水。1871—1875年間該公司的股息增加了十倍。1852年梵蒂岡在英国資本的参加下組成了“英吉利—罗馬煤气公司”。1875年該股份公司的資本与股息分别为325万里拉和289,683里拉，而在1890年时分别为1,400万里拉和1,928,366里拉。1883年从“英吉利—罗馬煤气公司”中分出梵蒂岡的另一个企业——“英吉利—罗馬电气公司”②。

从40年代起出現了数量众多的天主教刊行的杂志和报紙，其中包括“罗馬观察家”，后来这张报成为罗馬教皇厅的半官方报，梵蒂岡“理論”机关耶穌会的杂志“天主教文明”，这本杂志在第一期就号召同“社会主义可怖的禍患”作斗爭。就在当时已經出現了教权派群众性政治組織的萌芽。

所有这些是梵蒂岡走上和資本主义亲密途径的最初的几步路。庇护九世死后这种亲密关系就一日千里地发展着。

新教皇里夫十三世（1878—1903）是坐在圣彼得宝座上的第一个“資本主义的”教皇。他的統治教廷在教会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和資产阶級合作的时期。甚至教权派历史学者馬迪在談到在他以前的十九世紀的教皇們时写道：“他們既落后又愚蠢，沒有能力去管束政治力量，反而去抵抗它們，特别因为他們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力量。正在改造着欧洲面貌的各种經济因素，不在他們的視野以內。总的来說，他們不能提出建設性的办法，以解决因政治和社会发生变化而提出的种种問題。結果在欧洲各古老的天主教区域內，宗教所受的損失异常重大”。③

① 凱薩萊：“罗馬与教皇国”，第一卷，第51頁。
② 亚尔倍托·卡拉基奥洛：“罗馬首都——从意大利的恢复統一到自由国家的危机”，第126—127頁。
③ 馬迪：“教廷”（“教会与社会”，第47頁）。

梵蒂岡轉向資产阶級这一轉变是里夫十三世实行的。

天主教历史学企图把里夫十三世描繪成社会正义的捍卫者，工人的朋友和一个正直的教皇。实际上庇护九世的这个繼承者是一个反动分子，他的所有計划都是为了和資产阶級結成联盟以反对劳动群众。中世紀教皇們的敗行和資产阶級政客的慣技在他身上已溶为一体了。里夫十三世和大多数他的前任者一样，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們一样，他热心地庇护自己的亲屬。他任命自己的兄弟朱席庇为紅衣主教，侄子路德維格和李卡图为秘密侍从，侄子卡密洛为教皇宮庭羽林軍的上校和宮庭警卫队的首长，侄子米开列为教皇办公厅的高級官吏。甚至于圣彼得教堂的祭司长也是里夫十三世的侄子。他另一个侄子斯丹尼斯拉奥·毕琪得到大公的称号，被任命为屬于梵蒂岡的罗馬儲金所的經理。其后他成为美国大康采恩"奧立佛·勃拉席尔斯公司"的意大利代表。①

里夫十三世在被选为教皇之前曾为駐比利时的圣使，他在比利时多年居住期間看到了資产阶級天主教运动的产生經过，这使他确信在現代条件之下，教会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应当采取較庇护九世时代更灵活的办法。庇护十三世認为，教会应該同欧洲主要强国的政府取得协議，特别是和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反对意大利的国家取得协議。根据他的意見，意大利的削弱是教廷的"复兴"必不可缺的先决条件。斯福柴說，里夫十三世梦想意大利分裂成为許多由罗馬教廷領导的小共和国。②

里夫十三世在25年期間內玩弄着錯綜复杂的国际把戏，旨在使"神圣同盟"复活，这一同盟理想的領导者当然是梵蒂岡。里夫十三世期望俄国沙皇政府能在同盟中担起重責，因为他看出俄国是欧洲最可靠的反革命堡垒，他力图和俄国建立起密切

① 安特列·路威斯基："巴契里的梵蒂岡銀行"，华沙，1952年，第13—14頁。

② 卡罗·斯福柴："現代的意大利"，倫敦，1946年，第96頁。

的友好关系，建議沙皇支持波兰和巴尔干半島諸国中的天主教会。1931年时E·A·阿达莫夫公布的俄国駐梵蒂岡外交代表的部份报告，其中包括A·伊兹伏里斯基的报告，詳尽地說明了里夫十三世的外交計划。

在1888年3月第一次和伊兹伏里斯基談話时，里夫十三世"列举了他所采取的各种旨在維护秩序与和平的原則以及制止破坏性企图的行动之后"，便开始使人相信，"他得出一个結論，即在俄罗斯帝国范围內沙皇政府和罗馬教廷的联盟祗能有助于前者达到高貴的国家目的"①。伊兹伏里斯基接着說："教皇热烈地声明，教导僧侶和信徒們順从合法当局是他的不变的原則，他准备在事实上証明他对主教們的影响总是和俄罗斯当局的利益相一致的"。里夫十三世在結束談話时建議亚历山大三世和梵蒂岡締結同盟。"为什么象俄罗斯这样一个竭力支持自卫原則和希望在欧洲出現持久和公正的和平的国家，沒有这一种力量(指天主教会——作者)作为自己的同盟者呢？"②——教皇向沙皇外交官問道。同年9月伊兹伏里斯基又和里夫十三世会見，教皇"照常即席发表长篇累牘的政治演說"。这篇演說的主要思想是証明"在兢兢业业地为維护欧洲道德和政治秩序而工作着的伟大的保守派强国，特别是俄国和教廷，其同心协力和联合一致的必要性"。在触及波兰問題时，教皇声明，他的声望将永远用于"教导波兰的天主教徒服从他們君王的法律，和对他們君王表示忠誠"。③

里夫十三世以同样堅忍不拔的精神謀求和德国威廉二世結成同盟。

里夫十三世認为与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作斗爭，是天主教

① 阿达莫夫："帝国主义初期梵蒂岡的外交"1877—1900，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第72頁。

② 同上，第73頁。

③ 同上，第89頁。

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倘在最初一批致所属教会的通諭中，他号召統治阶級“确信教会和国家的目的是密切地結合着的”，“基督的教会比起人間的法律、法庭的鎮压和武裝的力量，在与社会主义灾害作战时更有力量”①。在1891年时意大利为群众性罢工运动所籠罩，里夫十三世公布了自己的通諭“新事物”，这一通諭直到今天仍旧是天主教会在社会政策方面主要的綱領性文件。②在“新事物”中里夫十三世并不諱言資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們的穷困状况。他指責資本家过份地剝削工人。然而他又說，世界上总是有穷人和富人的，将来也是如此。工人們不应該和資本家作斗爭，而应該和他們合作，因为他們缺少資本家无法生活，正如資本家不能缺少工人一样。里夫十三世宣称私有財产是上帝賜与的和神圣的。里夫十三世故意把个人財产和資本主义的私有財产制的概念混为一談，他劝說工人們說，废除私有財产制对于他們所产生的害处和对于資本家的相同，因为工人失却了增加自己的財产的可能，即失却成为資本家的可能，否則的話，如果工人能够忍受剝削、勤奋工作和节俭持家，他似乎有可能达到这一目的。里夫十三世搜索枯腸找出各种最最难以想象的論据，为資本主义制度辯护。例如，他断言废除私有財产制将会使人和动物相等，因为动物是沒有私有財产的！里夫十三世同样还非难土地国有化。“甚至如果土地在私有主之間进行分配——他肯定說——土地还是为所有人的需要而服务，因为大家是依靠土地上的产物为生的”。至于大部份田地落在剝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手中一事，里夫十三世認为不广为宣传的好。里夫十三世号召劳动人民参加基督教工人协会，去保护上述原則。

“新事物”公正地被人們称作“反共产主义宣言”，它为国际

---

① 菲特列克·却鮑：“意大利外交政策史（1870—1896）”，第一卷，第407頁。

② “新事物”是里夫十三世的顧問、紅衣主教齐尔雅里和高級教士鮑卡里和伏尔比尼受教皇的委托而写的。（法兰契斯哥·馬格立：“意大利的天主教行动”，第一卷，米兰，1953年，第82頁。）

資产阶級所热烈欢迎，因为在这个文件中資产阶級得到了同工人阶級斗爭的思想武器，而这武器資产阶級本身却是无法想出来的。

当里夫十三世統治教庭的时候，教会开始积极参加欧洲各大国的政治生活：在里夫十三世的同意下，在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法国成立了資产阶級天主教政党，并开始活动。意大利的一个群众性天主教組織“行动会議”在教皇支持下获得了发展，这一組織由于梵蒂岡不承認意大利国家而不能参加竞选，虽然如此，可是它在全国进行着积极的鼓动宣传活动，在教会机关的支持下网罗反动力量。“不承認”意大利国家事实上意味着与这一国家的进步力量作斗爭，意味着和該国的反动力量結为同盟，但并不意味着放弃政治活动，如同某些自由主义和教权派的历史学者所称的那样。

梵蒂岡的巩固与資产阶級联盟的政策遇到一定的障碍，这种障碍既来自畏惧教权派势力扩张的某些資产阶級集团的一方，也来自教权派本身陣营內某些主张从“异教謬論”立場出发，反对資产阶級民主的个别派系的一方。里夫十三世在位时，这些彼此矛盾着的傾向不止一次地引起了資产阶級政府同教会的冲突。1898年时他在同意大利政府的关系問題上发生过尖銳的危机，最后他把“法兰西問題”留給自己的繼承者庇护十世去解决，这个問題在最后以教权派的失敗和二十世紀初期的政教分离而告終。欧洲的資产阶級准备同梵蒂岡和教会合作，共同反对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这一点是欧洲資产阶級所爭取的，然而它要求教会服从于自己。

意大利資产阶級打的主意也是这样。然而里夫十三世期望革命的浪潮早晚会迫使意大利政府向教会求援，因为教会是有群众基础和实力的唯一反动力量，依靠它能保存現有的社会秩序。当資产阶級向它乞援的时候，梵蒂岡可以提出解决“罗馬問題”① 的条件了。这种情緒在1897年举行的“行动会議”大会上

有着充分明显的表現，大会的主席薩凱蒂預先关照自由主义者們說，如果他們“希望教会把他們从社会主义中挽救出来，那末首先讓他們向教会投降，讓他們匍伏在教会的旗帜面前”[②]。但是意大利政府不想屈服。

如果說里夫十三世的政治策略使天主教会和意大利政府間友好关系的建立迟緩了，那么他的金融投机活动則恰巧相反，它巩固了梵蒂岡和統治阶級的关系。里夫十三世不遵照庇护九世的榜样，他是屬于自己的时代的。他对于証券投机、股票和支票簿几乎有着病态的嗜好。他被选为教皇后最初的命令之一，是吩咐在他私人的小礼拜堂內安置防火保險箱，在这只“上帝的全权代理人”的保險箱中貯存着股票和其他有价証券——奥地利的、巴伐利亚的、法兰西的和比利时的。几年以后一只防火保險箱不够用了，于是他命令再添置第二只。[③]“里夫十三世对于証券价格的行情总是消息灵通的——一个直接熟悉他的法国記者約瑟夫·茄尔脫回忆道——我敢担保說，教皇是經常就此問題和埃尔涅斯脫·巴契里先生商議的。巴契里是罗馬的市政顧問和‘罗馬銀行’行政会的主席。”[④]

至今犹在的“罗馬銀行”是根据里夫十三世的倡議在1880年創办的。这一机构的首要人物除了上述的巴契里外——他是現教皇庇护十二世的伯父，还有龐康巴尼公爵和罗斯比尔奥西公爵，薩凱蒂侯爵和琪奥杜里侯爵，以及“黑色”貴族的其他著名人物。和他們在一起活动的还有罗摩洛·济托尼——意大利政府中一个部长的兄弟，他接受了大量股票作为礼物。济托尼的参

① 基奥尔奇·凱特罗洛：“意大利的天主教行动”，罗馬，1950年，第24頁。

② 茄勃萊列·罗薩：“意大利天主教行动政治史”，第一卷，巴里，1952年，第165頁。

③ 凱薩萊：“教皇里夫十三世和教皇选举会議”（“新文选”，第758期，罗馬，1903年，第358頁）；安特列·諾威斯基：“巴契里的梵蒂岡銀行”，第15頁。

④ 約瑟夫·茄尔脫：“梵蒂岡的金融財政”（“时代”，巴黎，1903年8月8日）。

与"罗馬銀行"的領导工作，标志着梵蒂岡和意大利資产阶級金融利益的結合。"罗馬銀行"开始从事証券投机，在中东和近东获得各种利益。同一时期内(80—90年代中)，在梵蒂岡的倡議下，意大利国內如雨后春笋地出現了許許多多的貸款处以及各种高利貸和投机組織。

梵蒂岡在保險业中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上世紀末，梵蒂岡的代理人在意大利全境遍設各种保險公司，其中有火灾、冰雹和其他天灾、不幸事故和人寿等保險公司。梵蒂岡的事业家們利用信徒們的迷信和宗教偏見，劝說他們加入天主教办的保險公司，因为可以得到上帝的庇护，并比加入与教会无关的保險公司更为可靠地保証自己免受各种灾难。

里夫十三世对意大利政府的詛咒，并不妨碍他利用罗馬被宣布为意大利首都后飞跃发展的有利局面做生意。除了上面已提过的自来水和煤气公司外，里夫十三世在位期內，还成立了梵蒂岡的电車和面粉公司——"电車与公共汽車公司"和"龐泰涅拉面粉公司"(后者至今尙开設着，是巴契里家族的私产)。"龐泰涅拉面粉公司"在"罗馬銀行"的貸款支援下，大批买进磨坊和面包房。90年代时，"龐泰涅拉面粉公司"已經能在罗馬訂定面包的价格。社会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在1897年写道："哀杜阿尔多·索杰里尼，埃尔涅斯脫·巴契里大公閣下及其'罗馬銀行'的朋友們，在紅衣主教冷巴拉的支持和里夫十三世的同意下，以'圣彼得一枚捐'的巨款将罗馬的所有磨坊收購下来。'龐泰涅拉面粉公司'被收購以后，接着买进'戴維列面粉公司'……自以上述的先生們达到垄断磨粉业的目的后，面粉的价格，面包的价格当然也不例外，就提高了。"①

当里夫十三世在位时，梵蒂岡撥出大宗資金在罗馬建筑房屋，积极地进行建筑地区的投机生意。除了"罗馬銀行"以外，还

① "前进报"，罗馬，1897年8月26日。

有其他的梵蒂岡信貸机构进行这項活动，如“罗馬通用銀行”、“信貸銀行”和“手工业者銀行”。下面两家梵蒂岡的企业直接經营房屋的建筑，不动产的买进和卖出业务，即“通用公用事业和农业不动产公司”（即著名的“不动产公司”，至今还在）和“貧苦者和劳动群众房屋建筑公司”①。

十九世紀末叶，梵蒂岡的資本控制了罗馬的自来水、照明（煤气和电力）、交通运輸、面粉和建筑工业。这些領域中，梵蒂岡的資本今日仍旧在罗馬占着主要地位。

教权派的金融集团在把首都的公用事业企业攫取到手以后——意大利历史学者亚尔倍托·卡拉基奥洛指出——依靠着“罗馬銀行”和其他梵蒂岡控制的信貸机构的支持，开始同其他資本主义团体取得协議，从而行动更为大胆。教权派和資产阶級的利益的結合在里夫十三世时到了如此密切的程度，甚至梵蒂岡的代表出席意大利政府国家銀行的經理会議。②

里夫十三世如醉如狂的金融投机活动并不是一帆順风的。关于这一点意大利历史学者薩尔汶米尼是这样說的：假如教皇在教义和道德方面是个“絕对无謬誤”的人，那么他在財政方面則不然。③ 罗馬在80年代起开始的不动产危机吞沒了不少梵蒂岡的資本（約2,000万里拉），差一点使“罗馬銀行”倒閉，从而証明資本主义的經济法則不論对于世俗的或对于“上帝”的資本，其作用相等，也証明了“宗座”的財政命运和普通資本主义公司的命运，同样地变幻无常。为了恢复元气，里夫十三世采取了久經考驗的手段：他曾两次庆祝“紀念年”——1888年和1893年（自己就位的十周年和十五周年紀念），当时他从各色各样的資本家手中“直接”收受了三、四千万里拉“作慈善事业之用”（每

① 亚尔倍托·卡拉基奥洛：“罗馬首都——从意大利的恢复統一到自由国家的危机”，第123，132頁。

② 同上，第162頁。

③ 茄索諾·薩尔汶米尼：“外交家墨索里尼”，第269頁。

次"紀念年"各为两千万里拉)，这笔款子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相当于两千万美元)。①

1893年間，臭名远揚的"罗馬拿銀行"的伪債券事件为梵蒂岡带来許多麻煩。"罗馬拿銀行"的舞弊案多年間激动着意大利的輿論，有許多著名的梵蒂岡和教权派金融集团的人物牵連在这件案子里。然而意大利政府——它的成員也牵連在这樁梵蒂岡銀行的伪造債券案中，作出了一切努力以使案子能暗中結束。結果只有"罗馬拿銀行"的小額存款人受到了損失，而舞弊的領导者則安然如故。

里夫十三世要求所有天主教的群众性組織，定期地为教皇国庫征集捐款。1892年举行的第十屆"行动会議"大会的决議規定：在举行天主教組織的会議、家庭的喜庆日和教会的节日时征集"教皇献金"；通过天主教的报紙以及在天主教徒家庭中設置"教皇錢罐"等方法搜罗金錢，此外要求信徒在写遺囑时也不要忘記教皇。②

里夫十三世从美国也得到大宗錢財，教会的僧侶們在教皇的贊同下积极地捍卫資本主义制度，巩固与百万富翁間的关系。教会和教权派組織名目众多的金融和經济活动，使里夫十三世有可能在身后留下一笔达1，500万法郎之巨的遺产，虽然他曾經因投机活动失敗而受到过数目不小的損失。③

如果說里夫十三世把教会机器轉向同欧洲和美洲的資产阶級合作的一方，則其繼承人庇护十世（1903—1914）完成了这一轉变。庇护十世祝福教会和教权派同意大利資产阶級的同盟，使梵蒂岡金融資本的利益和意大利金融資本的利益进一步地結合在一起。庇护十世繼續坚持自己的世俗权力，可是在实际上他同意大利政府是合作的。在1907至1910年間曾任意大利政

① 茄泰諾·薩尔汶米尼："外交家嘉索里尼"，第269頁。

② 安特列·諾威斯基："巴黎里的梵蒂岡銀行"，第11—12頁。

③ 同上，第15頁。

府司法大臣和宗教大臣的奥兰杜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这一期間內，教皇庇护十世通过他和意大利查立蒂政府保持着經常的秘密联系。当庇护十世时，奥兰杜写道："从法律方面来看，意大利政府和梵蒂岡之間的关系繼續是彼此敌視的，然而在事实上是彼此合作的，我难以想象出比它还要密切的合作来。"①

梵蒂岡在1954年时宣布庇护十世为"圣者"。其勛业被梵蒂岡宣传机关如此热烈地頌揚的这位"圣者"，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呢？如同里夫十三世一样，庇护十世兼有中世紀的蒙昧主义思想和資本主义社会中練达果断人物的素养和口味。庇护十世是"异教謬論"热烈的拥护者，在他的通諭中常常引用它們。根据斯福柴的話，庇护十世极端仇視主張教会应該和現代民主和解的人。② 这种傾向当时在美国、法国和德国僧侶之間特别流行，名为現代主义。庇护十世在1907年为了斥責"現代主义"，特别写了一篇通諭。他毫不忌諱地把現代主义称为"教会的花柳病"。

庇护十世在长时期之內受到西班牙紅衣主教維凡斯·杜托的思想影响。这个紅衣主教是个宗教审判厅的官吏和蒙昧主义者，最后死在精神病院里。

庇护十世出身于富农家庭，深深地熏染了尊敬財富和富翁的思想。在早年的宣教活动中他頌揚統治阶級，劝导穷人忍耐地和順从地担起自己的十字架，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类似的这种演說，使他的教阶升迁得很快。当他还是一个較年輕的高級教士时，他被任命为富饒的保皇派势力很大的威尼斯教区的总主教。未来的"圣者"在这职位上的杰出工作，是和一些威尼斯資本家合作在1895年創办了"圣馬尔加銀行"（这家銀行現在还开設着）。根据銀行的創立文書"圣馬尔加銀行"最初的股东除了未来的庇护十世以外，还有九个威尼斯教区的教士，其中包

---

① 奥兰杜："我向教廷所作的若干报告"，那不勒斯，1930年，第72頁。

② 卡罗·斯福柴："現代的意大利"，第84頁。

括“赤足的卡梅里教派”寺院的祭司长。①庇护十世被选为教皇后，他任命“圣馬尔加銀行”的經理、律师西利維奥·富米阿尼为教廷的首席司礼官。正如一个庇护十世官方传記的作者、本尼狄克会徒西格繆勒所指出，威尼斯的工厂主們（天主教徒和非教徒）慷慨地供給未来的教皇金錢作“社会活动”之用。这是当然的事情，因为他正如西格繆勒所說的那样，“为了拉住自己的教徒不参加社会主义运动而建立了天主教工人联合会”②。另一个庇护十世传記的作者波兰高級教士克歇开維奇指出：“沒有一樁罢工是由于他（庇护十世——作者）說要爱一切人而防止了的。”③

因国內社会主义运动高漲而惊惶不安的庇护十世解散了“行动会議”，因为該組織在阶級斗爭的压力下产生了以教士莫里为首的左翼。1904年，被意大利第一次总罢工吓慌了的教皇，允許天主教徒“怀着維护社会秩序而貢献自己微末力量的目的”，在議会的竞选中支持最反动的候选人。天主教徒的票数保証了反动势力在政府中得到优势，因之引起了工业家和銀行家們对梵蒂岡的狂热浪潮，这表現在对“罗馬銀行”的态度上，政府补助金和为各种財政投机而发行的公債証券紛紛湧进这个銀行中去。

天主教徒站在政府一方参加議会竞选，不仅意味着梵蒂岡公开走上同資产阶級联盟反对无产阶級的道路，把“罗馬問題”推至第二位，而且还意味着梵蒂岡本身在成为資本主义力量之一以后，它准备在資产阶級政权受到威胁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投入战斗保卫这个政权。

庇护十世积极反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政策，使梵蒂岡和俄国沙皇政府間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化，在沙皇政府方面则不反对利

① 安特列·諾威斯基：“巴契里的梵蒂岡銀行”，第17—18頁。

② 弗列特林·西格繆勒：“庇护十世”，罗馬，1926年，第47、87頁。

③ 安特列·諾威斯基：“巴契里的梵蒂岡銀行”，第30頁。

用梵蒂岡和革命作斗爭。沙皇政府外交大臣拉姆兹陶尔夫在1906年呈給尼古拉二世的短笺中写道："梵蒂岡能在提供集中于巴黎的欧洲馬松破坏性組織的报导，和上述組織及其分支的确实情报方面，为俄国政府作出价值无可估量的服务。因为梵蒂岡不能不极其警惕地注視着他們的活动。"① 尼古拉二世在拉姆兹陶尔夫的短笺上批示道："应刻不容緩地进行談判。完全同意上述意見"。

沙皇政府的期望沒有落空。实际情形是梵蒂岡在过去和現在都支持着資产阶級同革命运动作斗爭。为了监視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耶穌会徒根据庇护十世的命令建立了一个秘密的教会組織——"虔信同志会"，即著名的"塞宾涅尔"，由国务卿助理高級教士貝尼尼領导。"貝尼尼的活动是在秘密、密碼和阴謀的气氛中进行的"——意大利历史学者茄勃莱列·罗薩写道。②"塞宾涅尔"在1921年时正式解散，而在1923年时又重新恢复并利用各种名义和掩护一直活动至今。

庇护十世时天主教会对殖民地的剝削和奴役加强了。耶穌会徒无論在过去或現在，在殖民地活动得特别积极。他們帮助比利时国王利奥普二世奴役刚果，帮助法国殖民者剝削馬达加斯加島和印度支那，帮助英国人剝削罗得西亚。耶穌会徒在叙利亚、黎巴嫩及其他許多非洲和亚洲国家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耶穌会徒和其他的传教士們，为紧跟在帝国主义者后面深入殖民地的梵蒂岡金融机构作出了宝貴的貢献，有时候梵蒂岡比帝国主义者先深入殖民地。例如，的黎波里脫尼亚首先是被梵蒂岡資本通过"罗馬銀行"而"开拓"了的，随后被意大利帝国主义者所占領。

意大利帝国主义者对的黎波里脫尼亚的侵略行动是和該区

---

① "前外交部档案局秘密文件集"，No. 6，彼得堡，1918年，第270頁。

② 茄勃莱列·罗薩："天主教行动"，第二卷，巴里，1954年，第113頁。

域中"罗馬銀行"的活动，以及接受梵蒂岡指示的天主教传教士們的活动密切联系着的。

梵蒂岡銀行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开始滲入中东地区。

1902年，"罗馬銀行"在巴黎設立分支，同时和"金融信貸銀行"商定在中东地区互相支援。1904年"罗馬銀行"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設分行，1905年参与建立阿比西尼亚銀行，1906年在馬尔他島开設分行和在摩洛哥参与建立国家銀行，1907年在的黎波里設分行，1910年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1911年在康斯坦丁堡設立支行。"罗馬銀行"与意大利两个最大的銀行"商业銀行"和"意大利信貸銀行"不同，这两个銀行虽然参加殖民地剝削，但是大部分資金是集中投資在意大利的工业中，而"罗馬銀行"投資的主要对象是地中海沿岸各国，这是符合意大利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的。①

"罗馬銀行"在的黎波里脫尼亚占有特别重要的地区，有大批田地、采購站、輪船公司和其他企业在它的控制之下。国际垄断資本在土耳其帝国境內經营的所有各种行业，"罗馬銀行"都照式照样地重复地創办，这一企图在当时被称作"巴契里主义"，这名称取自現教皇伯父的姓氏，巴契里在1903年起任"罗馬銀行"总經理，他曾領导該銀行达20年之久。②

梵蒂岡通过"罗馬銀行"在的黎波里脫尼亚站牢脚跟后，便开始唆使意大利政府以武力侵占这些地区。查立蒂政府慑于意大利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情緒，被迫延迟发动軍事行动的日期。"罗馬銀行"于是故意示威性地和德国和奥国的資本家进行談判，提議把自己在的黎波里脫尼亚的全部利益出讓給他們。有关談判的消息在报紙上透露以后，梵蒂岡集团本身当然参与其事，意大利的金融家和資本家們极为震动，仿佛在他們中間爆发了一个炸弹，因为他們对于奴役非洲人民的兴趣不次于

① 基奥尔奇·凱特罗洛："意大利的天主教行动"，莫斯科，1955年，第373頁。

② 康德洛罗："意大利的天主教运动"，第374頁。

梵蒂岡。在这些集团和梵蒂岡的压力之下，查立蒂政府在1911年对土耳其宣战，并派遣軍队侵略的黎波里脫尼亚。

当时的意大利和世界各国报刊曾詳尽地論述梵蒂岡和"罗馬銀行"在发动利比亚战爭中——或又称作的黎波里脫尼亚战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俄国駐梵蒂岡代办伏康斯基在1911年10月10日发給涅拉托夫的紧急电报中报告道："公众輿論一致認为教皇厅在今日的危机中有着利害关系，在这一次几乎一致寄与教皇厅相当同情……然而梵蒂岡和'罗馬銀行'众所周知的关系，难道不就是这次战爭中举足輕重的法碼。只要提一个事实就足够了……上述的机构是以埃尔涅斯脫·巴契里先生为首的，他是罗馬教权派的代表人物，梵蒂岡外交界熠熠巨星高僧叶夫根尼·巴契里的伯父。这家銀行在这次冲突中所演角色的重要性是异常明显的，以致于此間輿論界对它估計过高，他們肯定地說，似乎战爭就是'罗馬銀行'領导者們的行动挑起的……

最后請允許我发表自己的意見，意大利軍事措施的胜利結束，将使此間的教权派有可能把世俗財物的取得和保持教会的中立态度两者結合起来。"①

当时的美国駐罗馬大使对本国政府的报告，其內容与上相仿佛。"消息灵通人士認为——他写道——梵蒂岡由于'罗馬銀行'在这一事件中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所以它发給报館补助金（要求贊成和土耳其作战——作者）"②。

"罗馬銀行"的領导机构对它参与意大利帝国主义殖民冒險一事并不掩飾。1913年初，埃尔涅斯脫·巴契里在銀行的股东面前发表演說，演說中提到："您們应当感到驕傲，当您們再一次地知道如果意大利的势力在北非获得巩固，則首先应該归功于

---

① "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关系"，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的档案文件，1878—1917年，第二集，1900—1913，第十八卷，第二篇，莫斯科，1938年，第126頁。

② 阿斯寇："欧洲和意大利对利比亚的掠夺"，1942年，第36—37頁。

您們的銀行資金的活动……您們銀行的势力不知不覚的深入，为意大利准备了这个龐大的猎物。"①

意大利帝国主义者在长期血战，牺牲了数万士兵之后才占領的黎波里脫尼亚。的黎波里脫尼亚战爭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然而这場战爭为意大利的資本家們，特别是在这場罪恶的冒險中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梵蒂岡銀行，带来了巨額的利潤。在战爭期間，"罗馬銀行"的流通資金增加到几乎为1910年的二倍：从1910年的21,753,021；812里拉增为1912年的35,201,502,895里拉。"罗馬銀行"的基金从1907年的4,000万里拉增为1912年的两亿里拉。② 由于这种变化的結果，依資金而論，梵蒂岡的"罗馬銀行"升为意大利的第二大銀行，下面一张表即証明这一事实。

意大利五家大銀行的資本③

1907年		1912年	
意大利銀行	24,000万里拉	意大利銀行	24,000万里拉
商业銀行	10,500万里拉	罗馬銀行	20,000万里拉
意大利信貸銀行	7,500万里拉	商业銀行	13,000万里拉
銀行协会	5,000万里拉	意大利信貸銀行	7,500万里拉
罗馬銀行	4,000万里拉	銀行协会	5,000万里拉

的黎波里脫尼亚战爭証明，梵蒂岡和意大利資产阶級的金融利益是密切地互相結合着的，这一事实也应当反映在他們之間的政治关系上。1912年时查里蒂被迫頒布扩大选举权的法律，由于他害怕新获得选举权的人将会加强社会主义政党的势力，因之和教权派締結了一个正式的选举法案(所謂杰济隆尼法案)。

查里蒂政府答应教权派不頒行反对宗教組織或可能"破坏国内宗教精神"的法律(如离婚法)，答应教权派使教会的經济組

① "意大利經济学家"，罗馬，1913年4月19日。

② 安特列·諾威斯基："巴契里的梵蒂岡銀行"，第97頁。

③ 安特列·諾威斯基："巴契里的梵蒂岡銀行"，第98頁。

織和社会組織同世俗的同类組織在法律上平等。1913年的竞选中，在64个选区中支持自己候选人的天主教徒，共掙得30万2,000票和选出了29个代表。此外，教权派們还夸口說，由于他們的支持，选出了228个反动代表和击敗了100个以上的左翼候选人（社会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急进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及与他們联合的一些团体选出了96个代表和得到了114万7,000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梵蒂岡期望德奥战胜，因为德奥战胜法俄将会使教权派在法国获得政权，同时为天主教会在俄国的活动开辟广濶的道路。梵蒂岡希望意大利在这次战争中保守中立。奥地利駐梵蒂岡大使給本国政府的紧急报告証明，梵蒂岡对奥地利的进攻塞尔維亚极表滿意。梵蒂岡国务卿梅里·華尔以庇护十世名义向奥地利大使声明："教皇为奥地利未能早日懲戒塞尔維亚人而表示遺憾。"①

庇护十世死于1914年年底。基查侯爵当选为教皇（貝尼奇克脫十五世，1914—1922），他和热那亚的金融寡头有着血肉般的联系。貝尼奇克脫十五世在年青时曾为律师。他在二十六岁时决定献身于宗教事业，正确地說，献身于宗教外交事业，而进入了教皇的外交学校（貴族教士学院）。这位热那亚的貴族，百万富翁和律师，在教会舞台上的宦途也未始不亨通。庇护十世統治教廷时他为国务卿助理。貝尼奇克脫十五世繼續执行自己前人的德奥路綫，他劝說德奥作出一定的讓步以使意大利保守中立。②

为了迎合发动战爭的帝国主义者們的意旨，貝尼奇克脫十五世在自己一篇最初的通諭中不是攻击帝国主义战爭的真正組織，而是攻击社会主义者。罗曼·罗兰关于这一篇演說在自己的日記中写道：

---

① 卡罗·斯福栄："近代欧洲的建立者"，巴黎，1931年，第148頁。

② 奥兰杜："我向教廷所作的若干报告"，第64頁。

"教皇使他的众所矚目的意見激烈化，最后激烈到譴責社会主义！在教皇新的通諭中說到：对富有者进行斗爭的生活不富裕的人們，他們不但违背公道和仁慈，并且还对理性横施暴虐，何况他們也能够通过誠实的劳动竞賽为自己創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如果他們願意的話……"。

基督的全权代理人談論同胞間的友爱当然是应該的。可是"……这种爱不应該导至消灭阶級差别的結果……然而这种爱毕竟应該导至使富裕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的生活与貧困的人相接近，不仅和貧困的人們保持公正的关系，并且对待他們仁慈、和藹有礼和忍耐；这种爱亦应导至使处于下层的人們为上层阶級的繁荣而高兴，并信賴他們支持，如同一家之中年幼的兄弟信賴他們的兄长庇护一样"。

这是怎样一种蔑視性的眷念！怎样一种貴族式的狂妄！——显而易見，写出上述話的人从来不曾嚐过穷苦的滋味。所以他很容易用梅涅尼·阿格里巴[①]的箴言来教訓人們，他是自行充当人类首領的：——全部这一思想是基于对无敌力量的崇拜，他可以这样地說：全部权力都来自上帝，所有現有的政权都是上帝奠定的。所有駕凌于人們头上的权力，不論是大公的或者是他臣下的，都受諸于上帝。"[②]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对全世界的巨大影响，欧洲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切引起了梵蒂岡的惊惶，梵蒂岡的領导集团动員教会的全部力量以保卫資本主义秩序。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波兰、法国和意大利諸国，天主教会在战后成为反革命最可靠的帮凶和反苏战爭的急先鋒之一。

前克倫斯基政府駐梵蒂岡大使留薩考夫斯基在1919年10月时，以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政府"派在教廷的代表身份通知在

---

① 梅湼尼·阿格里巴为公元前503年时的罗馬执政官，根据传說，他曾經劝說起义的平民返还罗馬，为他們述說了一篇規劝人們应該順从的箴言。

② "文学报"，1955年3月1日。

巴黎的沙仲諾夫說，教皇同情“与布尔什維克主义作斗爭，他最害怕布尔什維克主义”。貝尼奇克脫十五世在和留薩考夫斯基私人談話間，表示他希望“布尔什維克主义很快就灭亡”①。

战爭的結果是对梵蒂岡的金融事业不利的。法国的牧师团体在战前大量購进俄国的有价証券，这些証券由于十月革命的結果变为分文不值。由于这一情况，法国的牧师团体付与梵蒂岡的补助金(圣彼得一枚捐)，曾經一度中断。奥匈帝国天主教会的大部份資金投資在奥地利的有价証券上面，随着奥匈帝国的崩潰，这些証券也化为灰烬了，而奥匈帝国中的天主教会上繳給梵蒂岡国庫的錢，以数額計算占第二位。許多意大利的教会团体以及梵蒂岡本身，由于它們寄望于德奥获胜，所以在战争初期时把巨額資金也投在奥地利的有价証券上面，最后获得一个同样悲慘的結局。

战后的变化首先反映在梵蒂岡金融强国的中心——“罗馬銀行”的景况上面。二十年代之初，“罗馬銀行”必須拥有15亿里拉才能逃避面临的破产危机。然而梵蒂岡在这一次也不例外，它在散布消息时故意夸大自己的亏損，期望与梵蒂岡友好的政府和私人的贈款会增加，和获得无利息的貸款、租讓和減輕稅額等。梵蒂岡的財政状况故意被說得阴沉沉的，这从梵蒂岡集团传出的滑稽突梯的說法中可以看出——传聞在貝尼奇克脫十五世統治的末期，梵蒂岡的財政情况是如此地悲慘，以至于新教皇庇护十一世接收到为数仅一万里拉的現金。② 教权派历史学者湯珊企图使讀者相信，如果教皇庇护十一世的女管家浪奇太太不为他綴补袜子和衬衣的話，那么可怜的教皇将无衣可穿！③ 类似的胡話，其荒誕不經不用駁斥。梵蒂岡的金融业务在战后确是动摇不稳，然而沒有到迫使教皇穿着打补丁的袈裟跑来跑

---

① 歐曼：“两次世界大战間的梵蒂岡”，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第33頁。

② 宾契：“法西斯意大利的国家与教会”，第307頁。

③ 华特·湯珊：“庇护十一世传”，倫敦，1930年，第160頁。

去的地步。

梵蒂岡特別勤勉地恳求美国百万富翁发慈悲。1919年在費城，在得到当地大主教的同意之下，刊行了一本名为“梵蒂岡的政治独立与經济独立”的小册子。小册子的作者耶稣会徒格·阿·戈特萊斯描繪了“梵蒂岡財政的危急情形”，他号召信徒捐集2,500万美元，其利息可保証应付教廷日常开支。① 这一基金是否集齐我們不知道，此外有一件事是知道的，即在号召捐集的文告发布以后，梵蒂岡的国务卿助理高僧却利蒂到了紐約，天主教組織“哥倫布騎士团”交給他一张票額一百万美元的支票。

銀行的帐目和薩尔汶米尼提供的資料証明，庇护十一世在1923、1926和1928年从美国得到大宗借款。但是这些借款和梵蒂岡的日常开支显然无关，因为在1924年时，仅“圣彼得一枚捐”的收入已达1,800万里拉，而在1946年时則为2,500万里拉② ——这笔款項用以应付梵蒂岡的日常开支已是綽綽有余的了。所以推測教皇庇护十一世用美国借款作各种金融投机，以弥补因战后局势变化而造成的损失是完全自然而合理的。

1928年，梵蒂岡官方参考資料“宗座年刊”公布了下列声明：“庇护十一世陛下从1927年起改組了梵蒂岡的財政部門。从今以后使徒宫(即梵蒂岡——作者)事务的領导由特設的紅衣主教委員会負責。主教携至罗馬的信徒的捐献今后作特殊用途，并在教皇亲自监督下进行分配。任命可信任的人作司庫，其职責包括制作收支表。今后每星期作資产負債表。教廷的支出每年規定为2,000万里拉。会計制度将根据現代最新的規則制訂并受严格的监督。”③

由此可見，根据官方的声明梵蒂岡的开支在1928年时規定

---

① 茄泰諾·薩尔汶米尼：“外交家墨索里尼”，第271—272頁。

② 乔治·賽尔特：“梵蒂岡——过去、現在与未来”，第254頁。

③ 同上。

为每年 2,000 万里拉。然而收入呢！根据官方的材料，1929 年时的收入为 1 亿 8,000 万里拉。但是赛尔特在自己所著的書中当援引这一数字时着重指出，这一数字和梵蒂岡的实际收入远不符合，依他的估計每年为 10 亿里拉。① 根据这些数字可以得出結論，梵蒂岡在二十年代末的收入超过支出好几倍。

1929 年間，梵蒂岡和意大利政府签訂了拉特兰条約，这一条約的締結大大扩大了梵蒂岡的收入。梵蒂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立刻开始設法与意大利政府取得和解，因为正是应該最終地解决"罗馬問題"的时候了。1919 年，意大利正式的教权派政党"平民党"的建立，再次証明教会承認資产阶級国家，証明教会公开地保护这个国家的利益。教会和資产阶級的經济利益早已一致了，对工人运动的敌視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使他們結合在一起。因此，繼續冲突的現实原因已經不存在了。資产阶級和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分子把教会看作自己可靠的同盟者。从梵蒂岡一方面而言，它期望在和意大利政府签訂协議时可以得到一笔巨額款項，这就是意大利政府列入預算的应付給教廷的补助金，补助金的数額每年为 322 万 5,000 里拉，而梵蒂岡从 1871 年起就未曾向政府支取过。

1923 年 1 月，墨索里尼和梵蒂岡国务卿紅衣主教喀斯巴里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在当时"罗馬銀行"的总經理商都契伯爵的寓所里举行会談。墨索里尼和喀斯巴里对为解决"罗馬問題"而进行談判一事取得了协議。同时墨索里尼答应把"罗馬銀行"从当时面临的破产危机中拯救出来。② 根据墨索里尼前財政大臣斯蒂芬諾的証言，在墨索里尼和喀斯巴里会見后不久，梵蒂岡从意大利政府那里得到一笔約 15 亿里拉的无利息貸款，接着馬上开始了签訂条約的談判。

庇护十一世从而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給法西斯，因为教会在

① 乔治・賽尔特："梵蒂岡——过去、現在与未来"，第 253 頁。
② 斯泰諾・蘭尔沃米尼："外交家墨索里尼"，第 274 頁。

接受金錢以后，事实上負有义务对法西斯制度予以最大程度的支持。对于梵蒂岡而言，共产主义和民主的敌人墨索里尼是个理想的政治上的同盟者。庇护十一世为了博取自己保护者的欢心，他解散了“平民党”，这个党的許多活动分子变成了法西斯分子，并和墨索里尼合作，直到墨索里尼被推翻为止。

“罗馬銀行”領取到的数百万現金，祗是梵蒂岡从墨索里尼处得到的部分資金而已。根据1929年2月签訂的拉特兰条約的附录財政协定的規定，为了“賠償梵蒂岡因取消教皇国及因教皇国归并入意大利而所受的損失”，梵蒂岡从法西斯政府还得到了18亿里拉（10亿里拉以意大利国家有价証券償清，8亿里拉以現金償清）。因此，梵蒂岡因解决“罗馬問題”从墨索里尼处总共收得33亿战前的里拉。

这些資金对于梵蒂岡而言，来得再适时不过了，因为梵蒂岡和所有的資本家一样，在1929年底紐約股票交易所跌价停盘时遭到了慘重的損失。梵蒂岡靠了从墨索里尼那里得来的資金，調整了自己的財源，并把它置于“坚实”的基础上，直至今日梵蒂岡还是依靠着这个基础。部分資金投資于法国的股票、匈牙利的鉄路和其他有价証券上。① 根据某些資料，这些投資在战前每年为梵蒂岡带来約9,000万里拉的收入。

庇护十一世时，梵蒂岡的威望在資本主义陣营內显著地提高了。庇护十一世經常发表敌視苏联、敌視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言論，这使他成为法西斯主义眞正的同盟者。庇护十一世許多反对共产主义的通諭，他所組織的反对苏联、反对革命的墨西哥和共和政体西班牙的十字軍，支持反动政体的立場以及禁止天主教徒参加人民反法西斯陣綫的行动——所有这一切都使庇护十一世在資本家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值得尊敬和奖励的人物。

① 乔治·賽尔特："梵蒂岡——过去、現在与未来"，第252頁。

这就是梵蒂岡在六十年期間內所走过的道路——从 1870 年被剝夺世俗权力，从庇护九世詛咒資产阶級和发表"异教謬論"，一直走到和法西斯結成联盟和締結拉特兰条約。在这时期內天主教会从为封建制度服务的力量轉而成为資产阶級政治上的伙伴，而梵蒂岡則仍旧是宗教中心，它繼續捍卫着中世紀的神秘主义，并生长成为資本主义世界中一支雄厚的金融力量。天主教就是这样地从封建时代"突变"到帝国主义时代，它不仅在資产阶級的意大利是"值得尊敬"的宗教，并且在信奉新教的各国，例如英国、荷兰、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

第四章

罗馬教皇厅及其金融势力

現代梵蒂岡的意义首先在于梵蒂岡代表着天主教会的最高領导，天主教会在一系列西欧和美洲国家中是个重要的政治因素。

这个最高領导机关是如何組成的和它代表什么呢？罗馬教皇厅（教皇屬下机构系統的总称，教皇依靠着这些机构从梵蒂岡管理天主教教会）是世界上最反民主的政府之一。罗馬教皇厅除对自己的首脑罗馬教皇而外，不对誰負責。它不是通过选举而組成的，而是由教皇任命的。教皇和他的工作人員及罗馬教皇厅的活动是秘密的。

罗馬教皇厅由一网状的机构組成，它們根据传統或任务（或者为了偽裝起見）定名为主教会，管理局，办公厅，委員会，审判厅和各院。1929年成立的一个小小的“国家—城市”梵蒂岡，归罗馬教皇厅管轄。教皇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机构之一，在它存在的数百年期間曾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組織和所演的角色。現在它是一个完全現代化的行政組織。

教皇厅以教皇为首，根据教会的学說，他是“絕对无謬的”，是“上帝的全权代理人”。教皇是个独裁的僧侶。他亲自領导着教皇厅中特別重要的机构，其他机构則通过由他任命的紅衣主教会議或自己的全权代表——高級教士和俗間人士进行管理。

紅衣主教团（总数为70人）在今日已失去从前所具有的独立性。現在紅衣主教团仅在为了听取和形式上贊同梵蒂岡認为特别重要的教皇的声明时才召开。然而紅衣主教团倘保存着作为从自己的成員中选出新教皇的組織的意义。通常教皇們总是力图选出一个在各方面都能繼承自己政策的繼承者。新即位的教皇利用教会中的大公們不会再有多長寿命一特点（照例年令已大的高級教士才能被提升为紅衣主教），能在短短的时期內任命忠实于他的人塡补紅衣主教团的空缺。例如，庇护十二世即位的最初16年中死去了53个紅衣主教，即占紅衣主教团成員总数的三分之二，这样教皇就可能以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僧侶塡补空缺。被教皇挑选入紅衣主教团的，都是些得到資产阶級政府信任的高級教士。因此，具有进步情緒的教士要被选入紅衣主教团是极困难的，同时要在紅衣主教团中組成一个与教皇对立的有力的反对派也是极困难的。紅衣主教在受銜典礼上要庄严地宣誓忠誠于教皇，如違背誓言时，教皇可剝夺他的紅衣主教称号。在过去时代里，教皇可将不服从他的紅衣主教投入监獄或杀害。在現代条件下，梵蒂岡可迫使它不称心的紅衣主教回到僧院或放弃紅衣主教称号（这种情形非常少見）。例如，法国紅衣主教皮依奥因不同意庇护十世譴責“法兰西行动”的决定（关于这点以后将談到），在梵蒂岡的压力下被迫放弃紅衣主教的称号。

假如說紅衣主教团是一个只具形式意义的，并在教皇在世时沒有势力的机构，但不能認为个别的紅衣主教也是这样的，特别是認为教皇厅中的紅衣主教也是这样的。教皇厅中的紅衣主教是教皇直接的工作人員和顧問，他們領导着教皇厅中的各种工作。其中的某些人对梵蒂岡的政策起着重大的影响。例如，庇护九世时，紅衣主教安东尼里决定着教皇厅的前途；里夫十三世的亲信紅衣主教冷巴拉攬有大权；紅衣主教梅里·华尔事实上由他确定庇护十世的政治路綫。

一些在教皇厅外工作的紅衣主教，在某些情况下也能对教皇产生很大的影响。众所周知，例如在現在美国紅衣主教斯毕尔曼就有这种地位，他和本国的大資本家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

随着教皇的衰老和接近死期，在某种情况下有戴上教皇皇冠机会的紅衣主教們，他們的势力就更大了。意图被选为教皇的紅衣主教被称为"巴巴皮立"。甚至于老朽不堪的紅衣主教們，要当教皇的念头仍縈扰于心。因为在过去的教皇选举会議上，选票曾不止一次地分散在許多人身上，而选为教皇的是些中間派的，未曾預料到的和平凡的人物。

至今为止，只有意大利人的紅衣主教才有被选为教皇的現实性机会。最近几百年以来只有意大利人被选为教皇，意大利的高級教士們热烈地捍卫着他們对領导教皇厅的垄断地位。可是时代变了：在今日半数以上的紅衣主教不是意大利人了，虽然意大利人目前仍旧控制着教皇厅，至于将来选举新教皇时的形势又将怎样，則难于預測。

庇护十一世曾經把教皇称作为一个不再希望教皇死去的紅衣主教。在意图登上教皇宝座的紅衣主教之間，不断地进行着爭选票和爭势力的尖銳斗爭。教皇厅中照例总是有几个相互敌对的各自拥戴着一个教皇候选人的私党。"巴巴皮立""友爱地敌視着"，从不放过一个足以損害自己竞爭者名声的机会。

教皇厅中的紅衣主教只不过是梵蒂岡有势力集团之一而已。梵蒂岡和整个天主教会中的一个强大的力量是耶穌会，它早已在教会中占着統治地位。①假如說教皇厅的各机构是由教皇或紅衣主教們領导的，則这些机构中的重要行政职位是掌握在耶穌会徒手中。

耶穌会徒控制着梵蒂岡的宣传机器。他們領导着天主教教会的最高神学院——格里哥里安大学(罗耀拉創办的)。大学的

① 1955年年初时，耶穌会拥有32,899名会徒，其中的5,593名，或17%，在殖民地国家活动(参考"国际天主教通报"，第24期，1956年，巴黎)。

校长是耶穌会的将軍。大学的教員是耶穌会徒。几乎近百年来的所有教皇(里夫十三世，庇护十世，貝尼奇克脫十五世，庇护十一世，庇护十二世)都是格里哥里安大学的毕业生，即耶穌会徒的学生和走卒。①

耶穌会在罗馬的格里哥里安大学也为天主教会提供担任紅衣主教，主教和其他領导职位的人員。近百年来它的77名結业生后来成为紅衣主教，575名成为主教，成千名在教会領导机关中占据重要职位。1952—1953年間，在該大学中学习的有属于60个国家的2,373名教士和修道士。除了格里哥里安大学而外，耶穌会在各資本主义国家中还拥有115所大学，400所以上的学院和专門学校，和数以百計的其他俗界的学校。耶穌会徒在罗馬还領导梵蒂岡的这种"战略性"学校，例如"俄罗斯学院"(即圣戴列賽学院)，烏克兰学院(路登学校)，波兰，罗馬尼亚，匈牙利，立陶宛教会学院，拉丁美洲学院，为亚非两洲訓練传教士的"圣法兰契斯哥·薩維里奥"学院，美国神学院，圣佩达英国学院。根据意大利資产阶級杂志"今天"的报导，1952年时在英国学院中学习的有英軍退职将軍斯密斯，6个前英空軍飞行員，一个海軍艦长和一些其他的軍事专家。②

梵蒂岡的出版社"天主教文明"，它发行和社名相同的双周政治性杂志，以及政治內容的書籍和小册子，也是耶穌会的产业。"天主教文明"杂志被認为是天主教会主要的"理論"刊物。

① 虽然耶穌会徒根据会章不得接受教会所授的各种称号(主教，紅衣主教等等)，事实上这一规定未被遵守。例如，下列的美国耶穌会徒有着主教和紅衣主教的称号：西奥图·爱弥兒——京斯敦主教(英屬牙买加島)，华脫·菲茨什拉尔——費尔朋克斯主教(阿拉斯加)，菲立浦·柯德——前苏州主教(中国)，湯麦斯·罗伯逊——孟买大主教(印度)，費迪南·貝納尔特——加尔各答大主教(印度)。(参閱"美国天主教名人录，第十卷，1952—1953"，密执安)。然而耶穌会徒宁可通过仅作幌子的人，通过自己的学生，受业者和秘密的耶穌会徒管理教会。因此甚至在天主教会内部耶穌会也是臭名卓著的。

② "今天"，米兰，1952年12月6日。

所有該杂志的編輯和工作人員都是耶稣会徒。除了“天主教文明”杂志以外，耶稣会徒在米兰发行政治性的“生命和思維”杂志，在法国发行“学习”月刊，在美国发行名为“阿美利加”的周刊，在阿根廷发行“准則”月刊，以及在其他各国发行各种杂志。耶稣会徒总共发行1千种以上的报紙和杂志，用的文字有44种。梵蒂岡的无綫电广播事业也由他們領导，其首脑为耶稣会徒非立浦·索考尔西。

耶稣会徒在过去积极地帮助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地掠夺者，現在他們則进行反对殖民地和独立国家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他們控制着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錫兰的天主教会的活动，中国在人民政权建立以前的天主教会也是他們控制着的。耶稣会在貝魯特設有圣約瑟夫大学（黎巴嫩），在印度設有9所学院，在东京設有一所大学，在馬尼拉設有“阿戴尼奥”学院（菲律宾），墨尔本的“紐曼学院”（澳大利亚）——以及在阿根廷、智利、巴西、墨西哥、哥倫比亚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中都設有屬于耶稣会的天主教大学。人民政权建立之前，耶稣会徒在中国領导着两所大学和数十所中等学校。耶稣会在上海拥有大量不动产。

耶稣会通过許多輔助性机构，領导教会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思想上的工作。

耶稣会的組織与其他教派根本不同。耶稣会徒不是一般理解中的教士或修道士：他們沒有僧院，也沒有使他們能和一般僧侶区别开来的特别的服装。他們之間有鉄的紀律相互制約着，耶稣会的各組織不受当地主教管轄，而是直接听命于住在罗馬的耶稣会将軍，将軍則听命于耶稣会事实上的“将軍”——教皇。耶稣会徒所执行的任务与其他教派的不同，純粹是政治性質的：为反对“异端”而斗爭，所有的进步运动都是异端，其中包括殖民地各族人民和独立国家的解放运动在內。耶稣会徒力图使資产階級社会的統治集团服从于自己的势力。他們組成为教会內部

的警察，监督和审查僧侶們的政治观点。加入耶稣会的候选人是被謹愼地挑选出来的，大多数皆出身于資产阶級家庭。他們要經受为期十年的特別訓練。

实質上耶稣会是梵蒂岡的政治組織，它拟訂和推行天主教会的全部活动計划。所謂耶稣主义，即"耶稣社"的思想、規則和方法的总称，正如葛兰西很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耶稣主义早已成为天主教的同义詞了。[①] 耶稣会徒是促使梵蒂岡和意大利資产阶級和解的急先鋒，也是促使教廷和墨索里尼結成同盟以反对工人阶級的急先鋒。他們是群从性天主教組織"天主教行动"的倡議者和組織者。他們在过去和現在都积极参加天主教政党的活动。耶稣会徒是法西斯主义和納粹主义热烈的崇拜者。耶稣会徒塔基·汶都里曾作为墨索里尼的"忏悔牧师"达二十年，而耶稣会徒斯坦波弗萊尔则是希特勒"我的奋斗"一書的合著者。耶稣会徒曾与南斯拉夫的巴維里契法西斯份子合作，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悌索法西斯份子合作；他們曾暗中操縱西烏克兰东正教大主教霅波济茨基；他們在西班牙的弗朗哥和葡萄牙的薩拉査集团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耶稣会徒領导着罗馬教皇厅执行的亲美路綫。他們的組織和报刊繼續鼓吹"冷战政策"。耶稣会徒的报紙一貫地对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誹謗。例如，耶稣会徒安德澤罗·勃罗柯萊里，他写有大量反共的書籍和文章，曾在"天主教文明"杂志上号召"消灭共产主义"。勃罗柯萊里是拥有巨額資本的教会組織的代表，其成員为了掠夺更多的錢和发更大的財，是任何人也拦不住的，他为了反对苏联政府最大程度地滿足劳动者的需要这一政策，提出下列的"論据"："怎样的头脑，无論他是如何的愚蠢，竟会認为人类的幸福取决于物質福利的多寡！"[②] 苏联的和平政策使他暴跳如雷。他感到不舒服

① 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哲学"，都灵，1952年，第10頁。

② "天主教文明"，罗馬，1952年10月31日，第373頁。

的是苏联的政治活动家們正在为"民主、进步、自由、文化、祖国、和平"而斗爭。① 他宣布这些概念是"毒化国际气氛的毒药"。

現代耶稣会徒的"道德"箴言同他們中世紀的前輩們的箴言一样地厚顏无耻和不講节操。例如，我們引耶稣会徒渥泰維奧·麦凱蒂所著的叙述教士"灵魂上的完美"的一書來說明，这本書在1950年由梵蒂岡刊行作为僧侶們正式的"道德"指导書。麦凱蒂在这本書中公开地为变节、表里不一致和腐化这些为耶稣主义所特有的現象辯护。

麦凱蒂写道，所有的教士是上帝挑选出来的，坏的教士也是上帝挑选出来的，所以信徒对他們应該象对好的教士一样地表示听从。麦凱蒂使自己的同事們相信，道德敗坏的教士是根据上帝的意志而存在着的。这个耶稣会徒恬不知耻地宣称，对于我們僧侶而言，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是早已决定了的。麦凱蒂捍卫社会不平等現象，捍卫社会分成为剝削阶級和被剝削阶級这一事实。他确信，所有这一切是"上帝安排和証明"的。这种"哲学"从資本家的利益观点出发是理想的哲学。对于耶稣会徒麦凱蒂而言，貧穷乃是屬于永世不变的范疇之內的現象。为了証明这一論据，他引耶稣基督作証："当时有一个慷慨的妇人把她貴重的飾物贈給基督，有些人要求卖掉它，把得到的錢在穷人之間分，基督答道：'在你們之間穷人将总是有的，而我不是总在你們之間'"。麦凱蒂由此得出結論：教士的責任不是鏟除貧穷，貧穷是无法鏟除的，而应該想尽办法增加教会的財富！②

耶稣会在今日隶屬于教皇，它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能反映罗馬教皇的观点。"利用任何能为你們的事业带来利益的現代手段——庇护十二世于1940年写信給耶稣会将軍列道霍夫維基說——但注意使你我所宝貴的我們的組織要保持它过去那种使它的得以巩固的不变的秩序，保持原先滋养它的精神，最后，保

① "天主教文明"，1952年10月8日，第579頁。

② 渥泰維奧·麦凱蒂："牧师"，罗馬，1950年，第12、17、18頁。

持它的把你們牢固地和断然地同教廷联結在一起的絕对的崇敬和意志的絕对服从。"① 这些話对于耶稣会手段的热烈拥护者和罗耀拉教派的保护人——教皇庇护十二世而言，是相当典型的。

天主教会命运現今的决定者教皇庇护十二世，这个被教会的頌揚者們力图把神圣的灵光加在他头上的，和被称作为"天使般的"牧人的僧侶，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庇护十二世——在俗界他是爱华特澤尼奧·巴契里侯爵——于1876年生在罗馬的"黑色"貴族菲立浦·巴契里家族里。菲立浦·巴契里是个教权派的大銀行家和教廷中著名的显貴，他担任教廷首席法律顧問之职。巴契里家族尙在十九世紀时即在教皇厅中奠定其今日的地位。巴契里家族的亲屬之一紅衣主教康悌林尼是庇护七世的顧問，他在1819年时把現教皇的曾祖父安插在使徒署工作，后来成为教皇格里哥里十六世的司庫。爱华特澤尼奧·巴契里的祖父馬尔康东尼奧·巴契里在庇护九世的政府中曾任內政部副部长一职达19年之久（一直到教皇国在1870年被废除为止）。馬尔康东尼奧是紅衣主教一警察安东尼里的左右手，后者以对意大利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进行残酷和血腥的迫害而著名，数以百計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們根据他的命令，和在他的积极参与下在监獄中折磨或被处死。馬尔康东尼奧除了进行政治活动外，还从事金融投机事业。1864年时他創办了"罗馬观察家"报，其后以高价把报社售与罗馬教皇厅。从那时起一直到今天"罗馬观察家"以梵蒂岡官方机关刊物身份見諸于世。

馬尔康东尼奧的兒子菲立浦·巴契里侯爵为自己的大兒子法兰契斯哥安排了在教会行政上陞迁的前途，为小兒子爱华特澤尼奧安排了在宗教职位上陞迁的前途。法兰契斯哥后来繼承了父亲的梵蒂岡首席法律顧問的职位。法兰契斯哥·巴契里是

① "天主教文明"，罗馬，1940年12月3日，第167頁。

梵蒂岡在意大利各最大壟断資本和銀行的董事会中的代理人。其后他代表梵蒂岡和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进行談判，締結了拉特兰条約，由于簽訂了这一条約，墨索里尼付給梵蒂岡数十亿里拉，关于这一点我們在上面已經談过。意大利国王依照墨索里尼的提議，授予法兰契斯哥世袭的大公称号（公爵），以奖励他有功于使談判順利。

我們提醒一点，現今教皇的伯父埃尔涅斯脫·巴契里在二十世紀最初年代中曾領导“罗馬銀行”。

至于談到爱华特澤尼奥·巴契里在宗教职位上的陞迁，其輕易和快速不亚于他的哥哥法兰契斯哥在法律事务方面，和他的伯父埃尔涅斯脫在金融事业方面所达到的。

爱华特澤尼奥在罗馬的貴族中学“克維林諾·維斯康錫”和“卡普朗尼加”学院結束世俗的教育以后，随即又毕业于耶穌会的格里哥里安大学。此后他进了梵蒂岡的外交学校——貴族教士学院，这学院在不久以前还只接受貴族出身的神职人員为学生。① 爱华特澤尼奥从来不曾从事过眞正的教士的活动。他的全部工作，一直到被选为教皇为止，是在罗馬教皇厅的各种崗位上和在梵蒂岡派往国外的外交使节团中活动。1901 年时他是梵蒂岡国务院的官吏；1904 年时，当时只不过 27 岁，他已經是高僧和庇护十世“私人的高級教士”。1909 年时，庇护十世任命他为高僧会書記。显然，爱华特澤尼奥为了感謝庇护十世为他在宦途上的飞黄騰达提供了保証，所以一当选为教皇以后就宣布他为“德僧”，其后又把他列入“圣者”之中。在这一期間中未来的教皇为了梵蒂岡的事务，經常訪問巴黎和倫敦。不仅是爱华特澤尼奥的个人才干有助于他的迅速陞迁，他的在教廷中服务的父亲和当时为“罗馬銀行”主席的伯父的地位，也有助于此。

① 为了便利美国的教士們能参加梵蒂岡的外交工作，庇护十二世已取消了上述的限制。他把学校改名为“古字学，外交学，档案学高等学校”。現在領导該校的是前意大利軍队中的上校，耶穌会徒格里瑟。

众所周知，1911—1912年間的利比亚战争为“罗馬銀行”和梵蒂岡带来不小的利潤。由于这个緣故，巴契里家族的地位愈为巩固了，而爱华特澤尼奥高僧也步步高陞；貝尼奇克脫十五世任命他为国务卿助理和編纂宗教法典委員会的委員。

貝尼奇克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期望与意大利政府敌对的德奥同盟获得胜利。巴契里家族中的人員是积极反对意大利統一的，出身于这家庭的爱华特澤尼奥也同样期望德奥获胜。亲德永远是未来教皇——庇护十二世政治信念方面的特点。貝尼奇克脫十五世因巴契里也抱着与他同样的願望，所以在1917年授他大主教之职，并任命他为駐巴伐里亚的圣使，其后任命他为駐德国的圣使，巴契里在德国一直住到1929年。在此期間他公开地干涉德国的政治生活。美国高級教士夏盖关于巴契里在慕尼黑期間活动的性質曾說，当工人們在1919年已經取得政权时，“他在中央寺院的讀經坛上經常宣传反对共产主义”①。

巴契里在德国期間和下列后来使希特勒执政的德国反动派代表人物，有着私人的交往，如克虏伯、兴登堡、赫斯、伯魯宁、巴本、沙赫脫等等。

高僧爱华特澤尼奥·巴契里不仅干涉德国的內政，使德国的各种反革命力量联結起来，同时他还对年青的苏維埃共和国特别感到兴趣。“有一次——他的官方传記的作者道尔写道——巴契里在柏林的大主教私邸中来到了一个学者——罗馬圣經学院的教授。他給圣使(即巴契里——作者)带来了梵蒂岡的秘密命令，要求巴契里授与使者以主教之位，随后用某种方式把他运送到俄国去，以巩固极度零落的僧侶队伍和繼續适合神意(?!)的工作。授位礼是在圣使的宮庭中秘密进行的，在場的只有受位者，巴契里大主教和他的二个助手。其后弄到了合适的护照(显然是伪造的——作者)，于是新主教就奉着特别使命到俄国

① 唐·夏盖：“梵蒂岡上空的白烟”，密尔窝基，1943年，第28頁。

履任去了。”[1] 这个新主教不是别人，而是梵蒂岡的反共专家耶穌会徒寶宾尼。

从梵蒂岡的观点看来，巴契里在德国的活动是十分成功的，因此庇护十一世于 1929 年擢升他为紅衣主教并任命他为国务卿助理，在此以前尙委他参加由其兄法兰契斯哥領导的与墨索里尼締結条約最后談判工作。拉特兰条約的締結为紅衣主教巴契里带来了新的荣誉；1930 年他被任命为梵蒂岡的国务卿。

接着庇护十一世任命他为教皇使节派往葡萄牙，比利时，和阿根廷。1936 年时巴契里兼任事务总管(教会金庫的总管)，同年啣命赴美，用墨索里尼根据拉特兰条約付給教廷的錢購买新的股票和有价証券。[2] 巴契里在美国会見了最著名的資本家和銀行家，如摩根，洛克斐勒，杜邦，福特和泰勒。他在紐約时不是住在什么僧院里，而是住在紐約銀行家和石油商人勃兰奇豪华的別墅中。勃兰奇曾于 1926 年在經济上支援教权派狂热份子“克利斯节洛斯”反对墨西哥政府的反革命暴动。[3]

作为梵蒂岡外交政策决策人的巴契里，亲自参加了与希特勒之間的談判，签訂了宗教条約(1933年)。1939年庇护十一世死后，巴契里被选为教皇，定名为庇护十二世，好象以此强調他将繼續执行前任教皇的反动路綫的决心。順便提一提，庇护十一世在死前曾建議选举巴契里作为自己的繼承人。[4] 墨索里尼时代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諾說，巴契里是法西斯和納粹提名的竞选教皇的候选人。齐亚諾于 1939 年 3 月在他的秘密日記中写道：“我在泰尔維西奥获悉巴契里被选为教皇。对于我而言这不是意外的消息。我記得和他在 2 月 10 日时的談話。談話是异

---

① 却尔斯·道尔：“庇护十二世的生平”，紐約，1954 年，第 48—49 頁。

② 伴同巴契里訪問美国的，有当时領导梵蒂岡全部商业金融企业的埃里哥·茄列亚齐公爵和貝納尔奇諾·諾茄拉男爵。

③ “拉丁美洲問題”，第 11 期，墨西哥，1956 年 2 月 1 日，第 83 頁。

④ 湯麦士·摩根：“监視哨”，紐約，1944年，第 158 頁。

常亲切的。似乎他在这次談話以后异常努力地改善了和德国間的关系，以至于比尼雅蒂（当时意大利駐梵蒂岡的大使——作者）昨天对我說，巴契里是德国提名的候选人……元首（墨索里尼——作者）对巴契里被选为教皇很滿意。元首再一次答应为他出一些主意，为了有利于管理教会的事业（有利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作者），他应該做些什么。"①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第一天起，庇护十二世就企图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与西方强国和解，使他們轉而反对苏联。1939年12月25日，庇护十二世在紅衣主教团会議上宣称："讓我們結束这个兄弟互相残杀的战爭，讓我們联合努力来反对共同的敌人：无神論。"②

战后庇护十二世不止一次地发表演說支持"冷战"，号召团結"基督"世界的力量来反对共产主义。

庇护十二世和他的前任教皇們一样，是先进科学的敌人，因为科学上每一个新发現都証明辯証唯物主义的正确，和揭穿宗教上各种概念是毫无根据的。的确，教皇由于考虑到科学所获得的成功和在人們意識中所具有的力量，他声称教会是欢迎科学和进步的。然而庇护十二世只承認其結論不与教会的教理相抵触的科学。

現今的教皇不是屬于狂热型的人物，他不是死守着陈旧的遺訓和福音書的每一个字不放。这样的教皇在二十世紀时代未必对天主教会有益处。庇护十二世极为明白，科学已推翻了圣經上的神話。虽則如此，他仍旧求助于各种詭辯主义以挽救圣經的威望和使它同科学"相調和"。他在1950年名为"Humani generis"的通諭中承認，"希腊和拉丁的作者不是用历史方法写成"現存的陈旧的遺訓的。据說，是上帝設意要这样做的，因为否則原始的犹太人就无法理解这陈旧的遺訓了！于是得出結論

① "团結报"，1953年12月23日。

② 罗吉尔·加罗提："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第65頁。

說，不应該逐字地去理解圣經，既然如此，那么圣經据他說来就不与科学相抵触了！教皇断言，圣經中重要的不是六天創造出世界，重要的是世界确是創造出来的。

庇护十二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方兴未艾的时候宣称，"人类的理智否定上帝"是这次灾禍降临到各族人民头上的原因。当时庇护十二世說："在我們的时代里，常常可以看到人类的理智以自己的强有力而驕傲，不予上帝以应有的尊敬，因此人們忘記了自己对上帝的責任，或者甚至輕視他，他們力图使人間充滿着舒适、財富和各种享受，而忘記了永生的幸福。"① 現代社会的灾难原来其根源不在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制度中，这些制度产生了法西斯主义和掠夺性战爭，而却应該归咎于人类的理智，归咎于劳动者要求象人一般地生活这种願望！

历史証明，过去所有的教皇都是任用私戚的。現今的教皇庇护十二世也患着这一恶疾。他的三个侄兒（法兰契斯哥·巴契里的兒子）——卡尔洛大公，馬尔康东尼奥和朱里奥，不消說还有他的近亲和远亲，都不能抱怨他們的叔叔对他們不关怀。

教皇最大的侄子卡尔洛大公是梵蒂岡国家的"首席顧問"（第一个非僧侶出身的部长）。他同时是格里哥里安大学、"宣传信仰"主教会、高僧会和一些教派的首席法律顧問，以及担任宗座財产管理局的主席之职。此外，他还是教皇的朋友茄列亚齐領导的梵蒂岡意大利新教会修建事务局管理处的成員之一。卡尔洛开設着意大利最大的通心粉工厂和肥皂工厂，这位教皇的侄子把通心粉和肥皂推銷給各僧院、神学院和中等神学校。虽然卡尔洛經营着許多各色各样的事业，但是他和教皇的其他的亲屬一样，不付稅給意大利政府，因为他們算是梵蒂岡的臣下。

教皇第二个侄子馬尔康东尼奥大公是教廷羽林軍中的上校，一家航空公司理事会的主席和"意大利煤气公司"理事会的

① "宗座的活动"，梵蒂岡，1944年，第90頁。

理事。此外，他还是其他 30 家股份公司和托辣斯理事会的理事。

教皇的第三个侄子朱里奥特别得到教皇的宠爱，显然因为他是巴契里一族中唯一有后裔的人的缘故。朱里奥大公和著名的意大利軍火工厂老板庞勃利尼·柏劳迪的女兒結婚，她是柏劳迪遺产的繼承人。以下是朱里奥所担任的一些职位（远非全部职位！）：“罗馬銀行”理事会理事，“罗馬銀行”比利时分行經理，“东南鉄路公司”付經理，梵蒂岡商船管理局主席，“意大利煤气公司”理事会理事，“宣传信仰”主教会法律顧問；此外，他是教廷羽林軍的上校，甚至是哥斯达黎加共和国駐梵蒂岡的外交代表。

教皇侄子們的职位一覽表証明，“基督的全权代理人”对自己亲人們的命运的关心，远已超出偏爱的范围。当然，二十世紀不是亚历山大·巴尔特亚（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譯者）的时代，現在教皇已不能把世袭領地和公国贈給自己的侄子們了，可是派給他們一些厚俸的挂名职位，和安插他們到梵蒂岡控制的銀行和垄断資本的理事会和管理部門去，这事还在他們的权力之內，所以不应該說教皇不可以利用这一权力。[1]

埃里哥·彼得罗·茄列亚齐公爵和教皇的侄子們一样地得到庇护十二世特別的眷顧，茄列亚齐公爵占据着梵蒂岡民政总督的高位（他的伯父李卡图·茄列亚齐·里齐是庇护十二世的私人医生）。美国新聞記者湯麦士·摩根把茄列亚齐称作为庇护十二世的亲信顧問。茄列亚齐是美国紅衣主教斯毕尔曼的亲密朋友，他的美国朋友比梵蒂岡中的任何人为多，并以此馳名。有有一个时期茄列亚齐在梵蒂岡中代表着美国亲法西斯組織“哥侖布騎士团”的利益。摩根还說，茄列亚齐被認为是美国天主教当局的亲信人士。1936年时他伴随現今的教皇赴美，和他一起

① 关于教皇侄子們的投机活动參閱罗吉尔·加罗提：“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徒”，第 333 頁；雅罗斯拉夫·加兰：“东方曙光已白”，莫斯科，1954 年，第 282—337頁。

参加同美国百万巨富間的談判。巴契里被选为教皇以后，根據摩根的說法，茄列亚齐开始“受新教皇的委托执行秘密任务和进行各种金融业务”①。

茄列亚齐除了是梵蒂岡民政总督外，他在梵蒂岡行政系統中还占着其他許多职位：梵蒂岡总督府經济管理局的总裁，梵蒂岡新教堂修建事务局的局长。此外，他在許多股份有限公司的理事会中代表梵蒂岡的利益。

除了巴契里家族的后裔和埃里哥·茄列亚齐公爵以外，屬于教皇私人“家庭”的，即屬于得到教皇信任的（从而能在梵蒂岡上层集团中具有势力）人士集团之中的，还有一批称为“德国帮”的高級教士，其所以称为德国帮是因为其中都是德国籍耶穌会徒的緣故。这就是莱依别尔——庇护十二世的私人秘書，威廉海姆·汉特里赫——教皇的文書，教皇的大部分演說、信函和通諭都是他写的，以及阿芙古斯脫·裴雅——教皇的私人信仰声明者。屬于这一集团的还有前德国天主教政党中央党首領高僧卡斯。当他的党帮助希特勒攫得政权以后就定居在梵蒂岡，二十年来他是庇护十二世的政治顧問。

美国教士麦克·勃朗也是教皇私人集团中的一个有势力的角色。他的正式职位为教皇宫庭中的卫戍司令，可是勃朗和美国在罗馬大使館之間的密切关系，使人推测他还从事着其他工作。②

罗馬教皇厅中的机构可以分成三类：政治的，金融—經济的

---

① 湯麦士·摩根："监護哨"，第209頁。

② 除勃朗而外，美国的各教派和各教会机构还派有下列代表經常駐在梵蒂岡：乔治·海茨曼——"梅利諾"教派的代表；杰姆士·凯宁亨——圣保罗教士，传教士协会的代表；爱德华·蘇斯頓——圣十字牧师協会的代表；派曲里克·勃兰尼亨——受难兄弟会的代表；多米尼加教派修道士倪爾蒂·斯派克斯；奧古斯汀教派修道院主持約瑟夫·希凱；卡密里脫教派修道士肯涅脫·列琪；耶穌会副将軍汶生·麦考米克及其他等人（"教廷年鉴"，梵蒂岡，1955年）。

和教会行政的。政治机构中包括：国务院，它包括教会非常事务主教会和俄国事务委員会，此外还包括"圣办公厅"（宗教审判厅）主教会，东方教会主教会和"宣传信仰"主教会。屬于金融財政机构的单位有：宗座財产管理局（管理梵蒂岡的不动产），宗座特别行政局（財政部，金庫），宗教事务院（梵蒂岡的銀行），使徒署（管理空缺的主教区和大主教区，"圣彼德一枚捐"和教皇国庫的其它进益，在教皇死后开列梵蒂岡所有財产的清单）。"宣传信仰"主教会，听悔审判厅和教皇厅其他一些机构也从事金融—財政活动。教会行政机构由一些主教会，审判厅和委員会組成。①

意大利人的紅衣主教和主教管理着主要的政治、教会行政机构，和所有的金融部門。虽然在1954年时，为数70人的紅衣主教团中的意大利人只有27个，但是正是他們在天主教会的最高領导机关中占着統治地位，不讓外国人占据梵蒂岡的要职。这从一点就可以看明白，即27个意大利紅衣主教中有19个在教皇厅，他們直接地参与梵蒂岡事务的管理工作，而其余43个非意大利籍的紅衣主教中，在教皇厅工作的只有两人：法国人戴西朗和阿尔美尼亚人阿茄柴讓，他們以"东方"和"俄国"两个如此重要的問題的专家馳名。在教皇厅的意大利籍紅衣主教中，以卡拿里、庇雅察、披薩尔杜和米加拉最有势力（根据1956年的資料）。

① 屬于教会行政机构的有：高僧会（掌管授与僧侶以主教称号和其他僧阶，并領导他們的活动）；圣餐主教会（制定典礼程序）；教会寺院局（管理乡鎮小教区教士活动）；僧团主教会大典局（主管宣布"德僧"和"圣者"）；礼仪局（掌管圣彼得大教堂各种祝典的仪式和外交議定書）；中等神学校和大学局（管理天主教会学校）；圣彼得大教堂局（管理罗馬圣彼得大教堂的行政事务）。审判厅：听悔审判厅，經管贖罪券；使徒署名审判厅（現在为最高的公証所和上訴审判厅）；圣罗馬"洛脫"审判厅（主要受理离婚案件）。各办公厅和委員会：使徒办公厅（起草梵蒂岡的通諭和其他官方文件）；使徒日期签署局（金融主管机关之一）；致各国元首信函秘書处（官方从事起草和发送致各国元首信函和国書的机关，实际上是从事密碼和运送外交邮包的机关）；拉丁文書信秘書处（翻譯梵蒂岡官方文件为拉丁文的机关）；教皇的梵蒂岡国委員会（梵蒂岡国最高行政机关）；教皇的保卫信仰、管理意大利境內新教堂修建事务和教会房屋事务的委員会，以及其他等等。

虽然他們的年令加起来早已超过三百岁，可是仍极活跃：接待来宾，出席梵蒂岡的各种典礼，发表演說。总而言之，仍旧希望有一天能戴上教皇的三重冠。庇护十二世所以能够保証自己被选为教皇，因为事先取得了这些“巴巴皮立”及其朋友們的选票。教皇为了表示感謝，把教皇厅中的肥缺配給他們，委任他們領导最富有和最有势力的主教会。他們之所以有势有权，其原因就在于此。①

---

① 下面是关于这几个紅衣主教的簡單資料。卡拿里（生于1874年，1935年起为紅衣主教）是个貴族，侯爵头銜。他是教皇的梵蒂岡国委員会的主席，馬尔他騎士团的最高祭司，以下各主教会的成員："圣办公厅"主教会，东方会主教会，圣餐主教会，僧团主教会，"宣传信仰"主教会，大典局，礼仪局，教会非常事务主教会，中等神学院和大学局。他同时是使徒署名审判厅的成員、宗座特別行政局和宗教事务院的成員。庇雅察（生于1884年，1937年起为紅衣主教）是卡梅里教派的首領（約有4500名僧侶），前威尼斯总主教。他是高僧会的書記和以下各主教会的成員："圣办公厅"主教会，圣餐主教会，教会寺院局，僧团主教会，"宣传信仰"主教会，大典局，中等神学院和大学局，教会非常事务主教会，以及宗教事务院会議等。庇雅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先为騎兵团中的首席随軍牧师，其后为意大利軍队中的总牧师。庇护十一世时他曾領导过意大利"天主教行动"的活动。披攊尔杜（生于1877年，1937年起为紅衣主教）是耶穌会徒，中等神学院和大学局、"圣办公厅"的書記，格里哥里安大学的校长。他同时是下列主教会的成員：高僧会，僧团主教会，"宣传信仰"主教会，礼仪局，教会非常事务主教会，宗座財产管理局和宗教事务院紅衣主教委員会的委員。米加拉（生于1879年，1946年起为紅衣主教）是罗馬和罗馬教区的总助理司祭（教皇的全权代理人）；他是下面各主教会的成員："圣办公厅"，高僧会，东方教会主教会，圣餐主教会，僧团主教会，"宣传信仰"主教会，大典局，宗教非常事务主教会。他同时是使徒署名审判厅，宗座財产管理局和宗教事务院紅衣主教委員会的委員。米加拉控制着一些有势力教派的活动，其中包括法兰西斯教派（2万5千名会徒）和卡普青教派（1万5千名会徒）。米加拉是一个热烈的保皇党分子，許多年来他以圣使身份在比利时和捷克斯洛伐克做外交工作。二十年代时，因干涉捷克內政被捷克政府坚持令其出境。米加拉虽然年令已极大，他仍然認为自己是"巴巴皮立"。从上述四个紅衣主教的职位一覽表上可以看出，他們在梵蒂岡机构中担任着最有关鍵性的职务。同时，其中的許多职务并不要求他們化多大力气，可是收益却很好。正因为他們是极端反动的，所以他們領导的机构的活动也是如此。

除了紅衣主教而外，还有一些主教和其他的高級教士也在教皇厅中占着要职。梵蒂岡国务院不久以前的領导人高僧塔基尼及其以前的同事高僧蒙悌尼，就是这种在梵蒂岡被称为“灰色閣下”的人物。

国务院是梵蒂岡教会机器最重要的环节。通常它的首脑所担負的責任等于內閣总理一样。在梵蒂岡他是仅次于教皇的第二位人物。

国务院分成为两个行政单位。第一个称为教会非常事务主教会，它負責領导梵蒂岡的政治活动和意大利境外天主教会的政治活动。实际上是梵蒂岡的外交部。它以国务卿为首，在它的下面有一个由十个紅衣主教組成的諮議机关。第二个是教会日常事务管理局，也是由国务卿領导。它起着內閣总理的秘書处作用。它管理着不直接受教皇領导的各机构的工作，領导意大利的主教会以及群众性的教会組織，例如“天主教行动”。庇护十二世执政后，自1944年起国务卿一职空缺着（虽然庇护十二世自己以前也做过国务卿）。巴契里不願意把教会机关中如此重要的权柄交給一个紅衣主教，他設了两个国务卿助理，或付国务卿的职位，被任該职的是高級教士多美尼哥·塔基尼和柴伐尼·巴蒂斯达·蒙悌尼。塔基尼至今仍領导着教会非常事务主教会，而蒙悌尼则在被任命为米兰大主教以前一直領导着教会日常事务管理局。1956年起蒙悌尼一职由高僧德·阿士阿所接替。

塔基尼是教会非常事务主教会的老官僚，被認为是梵蒂岡最反动路綫的拥护者。他对于所有新鮮事物都抱敌視态度，他認为进行社会性蠱惑宣传，玩弄自由主义对教会而言是一种危險。他的左右手是大主教安东尼奧·薩莫萊。薩莫萊曾在梵蒂岡派在华盛頓的一个非正式的使节团中工作过許多年，是斯培尔曼和麦卡錫的好朋友。塔基尼除担任国务卿助理一职外，尚在教皇厅的其他机构中担任职务。

在塔尼基領导之下有一个臭名远揚的“俄国事务委員会”，它籌划梵蒂岡的反苏活动。这个机关的历史是这样的。十月革命以后，教皇貝尼奇克脫十五世在罗馬組織了一个东方学院，它的領导人是法国耶穌会徒米契尔·賨宾尼，以訓練在苏联活动的天主教“传教士”。当时亡命国外的白匪的主要力量麕集在法国，梵蒂岡于是在他們之間募集拥护者。这項工作首先是由巴黎大主教的顧問賨宾尼担任的。东方学院其后改名为“俄罗斯学院”，既为現在著名的圣戴列賽学院，或直呼为“罗斯柯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其中“培养”梵蒂岡募集到的白匪份子，而現在那边在訓練从各种国籍的“移民”中特别挑选出来的人。“罗斯柯姆”的学生学些什么样的“学科”呢？这一“神学校”的首脑耶穌会徒威脫在1949年直認不諱地对一家罗馬报紙的編輯說，在“罗斯柯斯”中学生学习拳击、跳伞以及其他类似的課程。①

1926 年时，庇护十一世在东方教会主教会中設立了俄国事务部，其責任为：領导“罗斯柯姆”及其分校（当时在比利时的阿曼依·修耳·芒的貝尼奇克脫僧院中，和在波兰的亚尔倍汀的耶穌会神学院中設有分校），收集关于苏联的情报和在白匪亡命者之間进行天主教宣传。俄国事务部的活动，是在特别建立起来的或与之相配合的“传教士协会”的掩蔽下进行的。在美国的这种协会有紐約的“天主教东方福利会”，在法国有“东方僧团”，在瑞士有“天主教同盟”，在意大利有“基督教东方协会”。在荷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有这种組織。②耶穌会徒米契尔·威廉士宣称，他們活动的經費来自“創造奇迹的地方”罗尔特和黎士育（法国）。③

庇护十一世于1930年宣布发动反对苏联的“十字軍”时，他

---

① 关于俄罗斯学院的活动可参閱湯迪：“耶穌会徒”，莫斯科，1955年，第305—306頁。

② 馬利奧·裴迪沙利：“宗座的政治（1918—1938）”，佛罗倫薩，1939年，第161—163頁。

③ 米海尔·威廉士：“行动中的天主教会”，紐約，1934年，第154頁。

是期望帝国主义强国很快就会武装干涉的，当时俄国事务部改組成为独立的委員会，它以耶稣会将軍列道霍夫斯基为首。1935年时，委員会的領导人改为彼得·阿茄柴讓主教（生于1895年，1946年时擢升为紅衣主教），他是阿尔明尼亚的反革命份子，尙在內战时期他就和英国干涉者在南高加索搭上关系。同年“俄国事务委員会”成为教会非常事务大主教会的一个部門，直接从属于国务卿。1955年时委員会的成員除了塔基尼和阿茄柴讓以外，还有紅衣主教戴西朗，大主教彼得·喀其讓，大主教亚历山大·叶夫林諾夫（白匪，后来改宗天主教的），高僧基利尔·柯洛列夫斯基（白匪），耶稣会徒威脫以及其他等人。①

教会日常事务管理局的前領导人柴伐尼·蒙悌尼被認为是塔基尼的竞敌。蒙悌尼是典型的貴族出身的高級教士、政客，他是“平民党”的一个有势力議員的兒子。蒙悌尼曾指导过意大利“天主教行动”的青年組織多年。蒙悌尼認为梵蒂岡如对工人問題予以相当注意的話，即从事社会性蠱惑宣传，是能在群众間保持它的影响的。他和天主教民主党的上层領导人物有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兄弟路德維格就是該党的議員，“天主教行动”著名的活动家，“罗馬銀行”理事会的理事和一系列受梵蒂岡控制的股份公司的理事会理事。1954年时蒙悌尼被任命为米兰大主教。

“圣办公厅”主教会在教皇厅中按其意义来說是第二个政治性机构。它是天主教会的內政部，旧宗教审判厅，尙在教皇巴維尔三世时就采用現在的名称。“圣办公厅”是梵蒂岡与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斗争的主要机关。它迫害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士和信徒。“圣办公厅”的首脑是教皇本人。組成主教会議的八个紅衣主教会是意大利人。

根据“圣办公厅”的正式規章，它領导着与教士的活动、与書

① “俄国事务委員会”自1955年起以意大利文出版名为“俄国宗教公报”的月刊。“罗斯柯姆”則以法文出版“俄国新聞”通报。参閱“国际天主教通报”，第19期，巴黎，1956年。

籍和出版物的統制(由"圣办公厅""禁書目录"处管理)、与反信仰和反对教会团結的"罪行"斗爭(反异端和反分裂)有关的一切事务。梵蒂岡竭力使社会輿論不知悉自己的警察机关——"圣办公厅"——的活动，梵蒂岡依靠着这个机关使教士和修道士大軍服从它的意志。"圣办公厅"拥有广泛的遍及全世界的秘密情报网，其职責为监視僧侶和信徒的私人生活和政治情緒。

"禁書目录"处的工作是人所尽知的。"禁書目录"的印数不多，分发給教会当局，后者通过各种途径抵制被梵蒂岡"判罪"的書籍，和攻訐不称教会心意的作者。

被列入"禁書目录"的書籍有，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用說了，所有唯物論哲学家的書籍，文艺复兴时代人道主义者的作品，十八世紀启蒙家的著作，世界上最伟大的进步作家的書，以及所有为爭取意大利的統一而斗爭的意大利爱国作家們的作品。

最近以来，"圣办公厅"开始把为美国反动份子所不称心的欧洲作家的書籍列入"禁書目录"。例如，法国作家讓·保罗·薩特；他的夫人女作家茜蒙·倍戈尔；著名的意大利反法西斯作家亚尔倍托·莫拉維亚，美国政府曾拒絕发給他护照；庫西奥·馬拉柏尔德，他有一本小說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美占領軍当局在意大利的作威作福恶行，此外还有一些西欧文化界代表人物的作品也被列入目录之中。

教皇的第三个政治性机构是东方教会主教会，它負責梵蒂岡在人民民主国家和近东、中东国家內进行反动活动(其中也包括南斯拉夫，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这个主教会的首长是教皇本人，而書記是前法軍上校紅衣主教叶夫根尼·戴西朗。戴西朗(生于 1884 年，1936 年起为紅衣主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在法国駐中东的軍队中服务，并且是該地区第二处(諜报处)的領导人之一。[①]戴西朗是紅衣主教会議的首席牧师，礼仪

① 罗吉尔·加罗提："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第 182 頁。

局的首长和教皇厅中一系列主教会和委員会的成員。

东方教会主教会的成員除了戴西朗而外，还有18个意大利的和外国的紅衣主教，后者之中有阿茄柴讓、斯毕尔曼和塞姆哀·斯脫里契(芝加哥大主教)。这个主教会的顧問名单中可以見到大主教叶夫林諾夫和喀其讓，大主教凱萊，大主教斐立罗·卡代萊里翁(意大利軍队中的总牧师)，耶穌会徒揚·霍达契克以及其他等人的名字。

“宣传信仰”主教会的活动也具有政治性質，它的組織遍設于亚非两洲以及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主教会領导着殖民地和附庸国中的传教士。根据1946年的資料，有74个大主教教区，297个使徒付主教教区和126地方教区隶屬于它。它拥有211所印刷所和出版506种杂志，以及每次印刷数达141万8千份的报紙。

在1956年时，这个主教会的首长是紅衣主教彼得罗·富馬索尼·皮昂琪，他被称作为“紅色的”(即尙武的)教皇。[1]他的付手是曾在中国工作过15年的紅衣主教却尔索·康斯坦丁尼。[2]康斯坦丁尼也在梵蒂岡駐华盛頓的非正方使节团中工作过。康斯坦丁尼的侄子朱里奥是罗馬著名的股票經紀人，“宣传信仰”主教会的金融投机活动是由他經手的。

“宣传信仰”主教会最高会議由30个紅衣主教組成(其中的14个也是东方教会主教会的成員，包括以斯毕尔曼为首的所有四个美国紅衣主教，以及戴西朗、阿茄柴讓、米加拉和卡拿里。

在談論罗馬教皇厅机构的时候，不能不提及梵蒂岡的間諜

---

① 在罗馬，人們說，有三个教皇管理着天主教会："白色的教皇"——即眞正的教皇，"黑色的教皇"——耶穌会的將軍，和"紅色的教皇"——"宣传信仰"主教会的首脑。

② 康斯坦丁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是意大利軍队突击部队阿尔卑斯軍团"貝薩尔叶里"的总牧师。請注意紅衣主教中有許多人是有軍事經驗的。

活动問題。

讓我們来看看，梵蒂岡的朋友們和天主教会的权威人士是如何談及这一問題的。美国总統杜魯門在1952年建議国会任命美国前諜报机关領导人麦克·克拉克将軍为駐梵蒂岡大使，他列举理由說明美国利用梵蒂岡所掌握的“珍貴情报”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梵蒂岡对杜魯門总統如此不寻常的声明沒有表示任何抗議。这种保持緘默的态度，祇能認为梵蒂岡承認这一事实，即罗馬教皇厅确实掌握着美国政府感觉兴趣的資料。“宗座”的代表对梵蒂岡拥有分枝繁密的諜报机构一点，并不否認。美国天主教主教拉揚于1940年在“紐約时报”发表文章，列举理由証明美国和梵蒂岡建立外交关系对美国有利，他断言“梵蒂岡的諜报机关是世界上最好的”。拉揚主教驕傲地写道：“成千名有很好訓練的教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人員和外交人員，根据梵蒂岡的給予的任务，每个人在自己的地区內无間断地搜集有关社会輿論的資料。[①] 英国天主教高級教士爱尔兰特·格兰亨在其所著的，得到教会当局贊同的“天主教和今日的世界”一書中，声称教皇必需有自己的情报机关，因为“梵蒂岡为了領导有方起見，要求經常掌握着从教会的地方机关汇集到中央的情报”[②]。

湯麦士·摩根說得还要坦白，他与梵蒂岡的領导集团有联系，曾以美联社記者身份在梵蒂岡工作过18年。摩根在他所著的标題醒目的“监視哨”一書中（这本書曾得到教权派报紙的热烈欢迎），詳細地述叙已搜得的情报通过什么途径从全世界各地汇集到梵蒂岡去。“好的消息和坏的消息——他写道——昼夜不停地从全世界各个角落传給罗馬教皇，向他报告在他广袤的領地中，无論地方或中央，所发生的事件。传送来自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僧侶处或其他源泉的消息的綫路好象动脉和靜脉一

① “紐約时报”，1940年5月12日。

② 爱尔兰特·格兰亨：“天主教和今日的世界”，倫敦，1953年，第178頁。

样，它們多得不可胜数，組織得异常灵活，并且日益完善和包罗万象。教会力图干涉人类的全部活动。教会的主要組織，特别是它的輔助性血管，已經深入各处。"①摩根列举了一些梵蒂岡賴以传送秘密情报的途径。这首先是和全世界天主教僧侶联系着的修道士团和牧师协会。摩根繼續提到，高僧会和全世界各国中的教会当局保持着联系，每个主教必須定期地向它报告自已教区內的情況。东方教会主教会和"宣传信仰"主教会則搜集特别重要的情报。"在东方教会的指揮下，有着一个由修道士、修道尼、牧师和主教組成的大軍，他們注視着正教教会占优势的国家中的各种情況。"②

至于說到"宣传信仰"主教会，那末"如果需要获得关于最偏辟遙远地区的社会、政治或宗教情况的情报，无論这地区是在热带或寒带，都应当到这个主教会来找"。③

国务院通过梵蒂岡駐在64个国家中的正式和非正式代表，获得更有价值的情报。"宗座的外交人員們——摩根确信——沒有必要去打听軍事秘密，虽则这种情报他們也极易获得……教皇外交人員的任务在于获得对教会重要的情报。他懂得，尽快得到情报决不会有坏处。"④

上面所援引的得到梵蒂岡信任的人士的供詞，已經足够說明罗馬教皇厅在另一方面的活动。

現在讓我們来認識一下領导梵蒂岡財政經济活动的各个机构。

1955年美国現代工业管理方法研究院院长馬丁台尔应梵蒂

① 湯麦士·摩根："监視哨"，第108頁。

② 同上，第109頁。

③ 同上，第110頁。

④ 同上，第110—111頁，关于梵蒂岡的諜报活动可参閱：阿·斯伐鮑达，阿·吐契老娃，烏·斯伐鮑达娃："梵蒂岡反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阴謀"，莫斯科，1950年；烏·米納也夫："必遭灭亡者的秘密武器"，莫斯科，1952年；烏·别良也夫，木·罗特尼茨基："冒名頂替"，莫斯科，1954年。

岡的邀請对教皇厅的各机构进行了考察。在熟悉了教皇厅的金融机关以后，他声称梵蒂岡拥有的金融机关“如此多种多样和支分繁多，簡直象大英銀行一样”①。

前已指出，教皇厅中設有三个主要的領导梵蒂岡財政經济活动的机构。这就是宗座特別行政局，宗教事务院和宗座財产管理局。这些机构的領导人之一为高僧亚尔倍托·德·齐阿里奥，他是梵蒂岡宮廷中最神秘的人物。德·齐阿里奥还領銜着使徒署。

在上述的机构之中，宗座特別行政局占着首要地位，“教廷年鉴”透露道，这机构是庇护十一世于1929年創設的，其任务为监督梵蒂岡根据拉特兰条約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处收到的一笔基金的使用情况，和执行“其他行政任务”②。

梵蒂岡的財政部就在这块謙虛的招牌之下活动着。

特别行政局的活动受到一个由三个紅衣主教組成的委員会的监督。貝尔納奇諾·諾茄拉侯爵从特别行政局成立时起直到1954年为止，一直是它的“委員”(实际上是財政部长，他在1954年时因过于年迈而退职养老)。他的助手們有前瑞士“瑞士銀行”經理亨利·馬叶尔杜西侯爵，和梵蒂岡“圣灵銀行”經理柴巴济斯太·薩凱蒂侯爵，薩凱蒂侯爵是意大利最大的大地主之一(在拉齐奥省拥有2万5千公頃的田产)，并且还是教皇的“馬夫长”。他同时还是罗馬教权派圣彼得俱乐部的主席(黑色貴族的俱乐部)，和耶穌会俗界組織“耶穌圣心会”的主席。除了上述諸人而外，有一些意大利的和瑞士的銀行家們以工作人員和代理人的身分在特別行政局中工作。

領导梵蒂岡財政多年的諾茄拉侯爵的个人身份是很典型的。諾茄拉和意大利最大的銀行“意大利商业銀行”有着密切关系，他从1925年起就是該行监察会的副主席。这家銀行和法国

① S·B·A，“梵蒂岡的財政”(“新生命”，罗馬，1956年2月12日)。

② “教廷年鉴”，梵蒂岡，1955年，第1016頁。

洛希尔財团有着密切的关系，洛希尔金融集団在最近50年来在法国代表着梵蒂岡的金融利益。諾茄拉和梵蒂岡的交往是这样开始的，当二十年代之初他担任"意大利商业銀行"土耳其分行的經理时，曾根据教皇庇护十一世的命令做了一笔买卖土耳其公債的投机交易使梵蒂岡賺了錢。銀行家的一个兄弟巴尔托洛密·諾茄拉很早以前就担任着梵蒂岡各博物館的总館长，而另一个兄弟是主教，这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这个有进取精神的銀行家和庇护十一世亲近起来。同时，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也不止一次地利用諾茄拉的效劳。"他曾率領意大利代表团根据道威斯計划参加談判，并且是墨索里尼的私友"① ——德国經济学家鮑曼关于諾茄拉写道。当庇护十一世于1929年設立特别行政局以后，即付托諾茄拉領銜該局。諾茄拉在新职位上最初需要解决的任务之一，就是利用庇护十一世从墨索里尼手中收到的众所周知的几十亿里拉，在美国为梵蒂岡安排財政准备金，或者如有些人所說的黄金貯备。諾茄拉把部份款項和貯藏在梵蒂岡地下室中的黄金，儲存到紐約的摩根的銀行中去。1936年时，諾茄拉和茄列里齐伯爵一起伴随現今的教皇(当时为国务卿)到大西洋彼岸，他們和美国政府談判后，就梵蒂岡放在美国的基金的貯存条件問題达成了协議。美国政府保証不限制梵蒂岡使用这一基金的自由，同时給予各种特惠条件，其中包括以比卖給其他政府为低的价格把黄金卖給梵蒂岡。根据意大利資产阶級的杂志"今天"和美国"透視"杂志的报导，1952年时梵蒂岡的貨币和黄金貯备为11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的黄金貯备，美国为250亿美元。② 根据同一資料，当时意大利的黄金貯备为7亿美元，法国——14亿美元，而英国則为50亿美元。

---

① 鮑曼："垄断資本的大西洋公約"，莫斯科，1953年，第200頁。

② "透視"，1953年8月7日；同时可参閱維克多·勒杜克："人民共和党——进行反共和反法兰西阴謀的政党"("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巴黎，1955年，第1531頁)。

换言之，1952年时梵蒂岡的資本已大大超过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三国的黃金貯备总值。[①]“透視”杂志指出，梵蒂岡相当大的一部份基金是金块，它們貯藏在美国联邦儲备銀行的保险庫中。

梵蒂岡的特別行政局和世界上最大的銀行有着联系。在美元地区有摩根的銀行为它服务，在英鎊地区有“汉布罗斯銀行”(倫敦)，在欧洲有“瑞士銀行”(苏黎世)，在法国、中东和近东有法国洛希尔財团控制的銀行。

特別行政局投資于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业和各种利潤高的企业中的金額，以数十亿美元計。甚至于要約略地估計一下也是异常困难的，因为梵蒂岡对自己的金融业务极端保密，它照例是通过化名的人和世俗的組織进行的，后者与教会間的关系是謹密地隐蔽着的。

然而，甚至于根据偶尔在报紙上透露出来的关于梵蒂岡金融业务的少量資料，就可以得到一个清楚的，虽然远非完备的，关于“圣父”的金融帝国巨大規模的概念。

列举有諾茄拉在其經理部門中代表梵蒂岡特別行政局利益的一些股份公司、托辣斯和銀行的一张清单，就是属于这类資料的。德国經济学者鮑曼編了下列一份表，其中列举这些組織的名称和諾茄拉所担任的職务。

諾茄拉在意大利是“費杜却利亚动产与不动产公司”和“通用公用事业和农业不动产公司”(不动产公司)监事会的主席。这两个公司經营不动产的买卖、抵押貸款、建筑貸款、田产投机业务。根据罗吉尔·加罗提提供的資料，“不动产公司”的資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最初年代时为1亿7百万里拉，而其准备金为2,140万里拉。“不动产公司”的主要股东为：

1. 梵蒂岡特別行政局　　34,605,000里拉

① 这些資料言过其实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資产阶級刊物也承認向劳动者宣传要安于貧穷的梵蒂岡，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家之一。

2. 宗教事务院	204,500 里拉
3. “宣传信仰”主教会	132,000 里拉
4. “通用保险公司”	6,608,000 里拉
5. “不幸事故保险公司”（无記名股票有限公司）	3,094,000 里拉

最后的两个公司也是隶屬于梵蒂岡的。“通用保險公司”由特别行政局的代理人契路蒂領导，而諾茄拉則出席該公司的监事会。加罗提指出，“不幸事故保險公司”的經理部好象是梵蒂岡的家庭会議一样，它的主席是諾茄拉，副主席是工程师古阿里齐，成員有路易澤·蒙悌尼（米兰大主教蒙悌尼的兄弟），茄列亚齐伯爵，麦尔康东尼奥·巴契里大公和薩凱蒂侯爵。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不动产公司”在埃塞俄比亚和其他的意大利殖民地內設有分公司。战爭时期內，它的分公司曾設到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和南斯拉夫的薩格勒布。由此可見，梵蒂岡的資本象豺狼般地追随着法西斯侵略者的足迹前进。

我們再列举一些諾茄拉在意大利担任的职务。他是下面两个不动产抵押放款銀行监事会的监事——罗馬的“意大利农业銀行”和罗馬的“圣灵銀行”；下列一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监事：“蒙特卡提尼公司”（化学工业），米兰；“意大利南方鉄路公司”，佛罗倫薩；“罗馬不动产公司”，罗馬；“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卡法罗电气与电化学公司”；“亚得里亚电力公司”，威尼斯。

諾茄拉还是一些法国銀行监事会的监事：“法意銀行”，以南美为投資对象；“私有不动产公司”，巴黎——上述两家企业都和法国洛希尔財团有联系。

在瑞士諾茄拉是下列組織监事会的监事：“瑞意銀行”，罗茄諾；“SAGEP”（不动产經售处），伯尔尼；和其他五个設在洛桑的不动产公司。諾茄拉还是蒙的卡罗的“蒙的卡罗俱乐部”监事会

① 罗吉尔·加罗提：“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徒”，第347頁。

的监事。①

关于梵蒂冈在意大利的投資情形更为具体的資料，可参考1948年在罗馬出版的"意大利金融資本組織"这一参考手册(資本数以意大利战前的里拉計算)。②

"亚德里亚电力公司"，威尼斯；資本額45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75亿里拉)。梵蒂冈掌握有价值为7千5百万里拉的股票。諾茄拉侯爵为該公司监事会的监事。

"安济加·瑪尔察圣水公司"，(自来水)，罗馬；資本額——1亿6千5百万里拉，梵蒂冈掌握有价值为820万里拉的股票。埃里哥·茄列亚齐伯爵出席該公司的行政会議。經理为勃柳敏斯泰尔伯爵，他是梵蒂冈特别行政局不露眞正身份的在外工作人員之一。

"国家电力事业开发公司"，威尼斯；資本——8亿4千万里拉，梵蒂冈掌握有价值为2,600万里拉的股票。

"意大利南方鉄路公司"，佛罗倫薩；資本額——42亿9千万里拉，梵蒂冈掌握的股票未詳，然而可以推测，梵蒂冈已完全控制这家公司。該公司监事会副主席是朱里奥·巴契里，监事有貝尔納奇諾·諾茄拉和其他梵蒂冈的代理人。这家公司还控制着資本总額达63亿5千万里拉的31家股份有限公司。

"罗馬不动产公司"，罗馬；資本額——34,152.5万里拉，梵蒂冈名下3,749.9万里拉。这家公司也完全受特别行政局的控制。貝尔納奇諾·諾茄拉为該公司行政会的成員。

"西西里通用电力公司"，巴勒摩；資本額——12亿里拉，梵蒂冈名下的股票——732万里拉。

---

① 飽曼，"垄断資本的北大西洋公約"，第200—201頁；同时可参閱高尔金："梵蒂冈有利可图的事业"("新时代"，1949年，第25期，11—14頁)。

② RADAR，"意大利金融資本組織"，罗馬，1948年，第9、15、28、34、56、61、64、67、68、72、107、114、168、179、182、195、204、223、227、239、274、301、302、356頁。

“中央”，（电話电报企业向它貸款），里窝那；資本額——15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46亿5千3百万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550万里拉（法兰契斯哥·巴契里在銀行的行政会上代表梵蒂岡的利益）。

“罗馬电力公司”，罗馬；資本額——10亿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260万里拉。行政会主席为克里門蒂·阿里杜勃兰迪尼大公，他和梵蒂岡关系密切；經理部成員有埃里哥·茄列亚齐伯爵。

“謝里特·瓦利达尔諾电力公司”，佛罗倫薩；資本額——10亿5千万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1亿里拉。

“泰蒂电話公司”，佛罗倫薩，資本額6亿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7百万里拉。亚尔倍托·西奥图里侯爵在其行政会上代表梵蒂岡的利益。

“爱廸生”（世界最大的电气托辣斯之一），米兰；資本額100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225亿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份——7千2百万里拉，米兰大主教舒斯脫个人就拥有价值达1千万里拉的股票。

“南方海岸电力事业开展公司”，薩窝那；資本額——4千5百万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31万5千里拉。

“都灵电話公司”，都灵；資本額——44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77亿8百万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450万里拉。

“披蒙蒂水力发电公司”，都灵；資本額——100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140亿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3千8百万里拉。

“維契奥拉公司”（电力），米兰；資本額——19亿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46万里拉。

“金屬加工金融公司”（冶金），罗馬；資本額——72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200亿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

2,420万里拉。在行政会上代表梵蒂冈的为法朗哥·拉悌·台齐奥伯爵，他是庇护十一世的侄子和特别行政局的代理人。

“达尔明尼公司”(制管)，米兰；資本額——7亿5千万里拉，梵蒂岡的股份不詳。行政会主席为拉悌·台齐奥伯爵。

“达尔明尼—英諾森蒂公司”(冶金)，米兰；資本額——1百万里拉。行政会成員之一为拉悌·台齐奥伯爵。

“工业企业投資公司”(冶金)，米兰；資本額——3千万里拉，梵蒂岡的股份不詳。拉悌·台齐奥伯爵在該公司行政会代表梵蒂岡。

“鉄尔尼公司”(冶金)，罗馬；資本額为52亿5千万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1,820万里拉。

“薩宾那航运公司”，洛維列；資本額——1百万里拉。行政会主席为拉悌·台齐奥伯爵。

“金屬貿易公司”(銷售金屬零件)，罗馬；資本額——1亿里拉，梵蒂岡的股份不詳。拉悌·台齐奥伯爵又是这个公司行政会的成員。

“法尔克冶金工厂”，米兰；資本額——5亿里拉(发售股票的控制数字——22亿5千6百万里拉)。它是意大利最大的冶金托辣斯之一，与梵蒂岡有着联系。該厂資本的73.12%归法尔克家屬所有。該厂主要股东的一个兒子勃魯諾·法尔克是耶穌会徒，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作为“法尔克”工厂的股东。这个托辣斯的首領埃恩里哥·法尔克是天主教民主党的参議員，法尔克家屬經常捐大宗款項給天主教民主党。梵蒂岡投資在“法尔克”托辣斯中的正式数字为4百万里拉。

“蒙的尼齐奥工厂”(冶金)，都灵；資本額——5千6百万里拉，梵蒂岡名下的股票——50万里拉。

“菲亚特汽車工厂”，都灵；資本額——40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100亿里拉)，梵蒂岡正式的股份——1千5百万里拉。

“蒙蒂飽尼公司”(采錫、鋅、水銀和銀)，都灵；資本額——6亿，梵蒂岡名下的股票——2250万里拉。

“意大利煤气公司”(煤气的开采和利用)，都灵；資本額——29亿4千6百万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37亿2千万里拉)，梵蒂岡正式的股份——7亿1百万里拉。然而这个数字尙不能正确地說明梵蒂岡与公司間的关系。“意大利煤汽公司”的股票分散在数百个股东的手中，其中以梵蒂岡为最大，因此梵蒂岡有可能控制整个企业。庇护十二世的哥哥法兰契斯哥·巴契里在許多年間曾担任“意大利煤气公司”的付經理一职。現在有教皇的侄子馬尔康东尼奥·巴契里和朱里奧·巴契里，在公司的領导机关中代表梵蒂岡的利益。三十年代时，“罗馬煤气公司”并入“意大利煤气公司”，前者的全部股票是归梵蒂岡所有的。拉悌·台齐奥伯爵曾在“罗馬煤气公司”中代表梵蒂岡。

“布尔諾造紙工厂”，凡尔佐奥洛；資本額——6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8亿6千5百万里拉)。梵蒂岡的股份不詳。梵蒂岡派諾茄拉侯爵在监事会中代表其利益。

“斯尼亚—維斯科薩公司”(意大利最大的制造人造纖維的托辣斯，和美国的杜邦公司有联系)，米兰；資本額——42亿里拉(发售股票控制数字——56亿2百万里拉)，梵蒂岡正式的股份——1千1百万里拉。然而梵蒂岡通过倫敦的汉布罗斯銀行和瑞士洛卡諾的“信貸銀行”，控制着値4亿里拉的增資股票。公司的經理为鄂大索教授，他是“罗馬銀行”理事会的理事，和“天主教行动”机关报“每日日报”行政会的成員。

上面列举的梵蒂岡为正式股东的各股份公司、托辣斯和垄断資本的資本总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等于680亿里拉，而这些公司股票的最高控制发售量达1000亿里拉。已确定的梵蒂岡的股份(祗能部份地反映出梵蒂岡在这些公司中的投資数字)，已超过9亿里拉(根据战后的行情为450亿里拉)。梵蒂岡資本占优势的一些公司的資本总額等于77亿4千2百万里

拉，这些公司股票的最高控制发售量达100亿7千万里拉(根据战后的行情则为3,871亿里拉和5035里拉)。

以下援引一些关于意大利其他企业和公司的資料，众所周知，梵蒂岡資本或在这些企业之間已占优势，或者对之表示兴趣。

“意大利电报公司”是一家資本額为7亿里拉的国际电报公司。这家公司的領导者为梵蒂岡的亲信人士——亚尔倍托·西奥杜里侯爵，卡尔洛·阿里杜勃兰廸尼大公和其他等人。“东南鉄路股份有限公司”，付經理为朱里奥·巴契里。“阿尼也涅化学公司”，經理为巴蒂斯戴利。“翁勃拉化学品公司”，經理为鄂大索教授。“意大利橡胶工业金融公司”，經理为薩凱蒂侯爵。“吉列利亚·拜黎兹公司”——出售意大利教会用腊烛的垄断企业，經理为法兰契斯哥·拜黎兹；他又是罗馬市政厅天主教民主党的委員和罗馬歌剧院的經理，三个兒子都是耶穌会徒。“不記名股票自来水公司”，資本額——3亿里拉；参加該公司理事会的有諾茄拉、薩凱蒂、鮑尔格澤大公和曾在天主教民主党許多內閣中担任工业部长的彼德罗·康貝利。

梵蒂岡所控制的一些保險公司的資本以数十亿里拉計算。除了上面提到过的“通用保險公司”和“不幸事故保險公司”而外，还应該加上“生命保險公司”、“意外事故保險公司”、“泰勒保險公司”、“雪柯里太斯·爱斯泼利亚联合保險公司”、“国家保險公司”(經理为安尼巴列·吉拉尔杜尼)，以及“天主教保險公司”(味罗那)。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梵蒂岡在上述大部份保險公司中的資本大为增加。梵蒂岡还攫到了其他一些企业的股票。特别行政局在法西斯政权崩潰后，以低廉的价格从許多法西斯首魁的

① 資料摘自——阿尔杜·納托列：“金融資本与梵蒂岡”，“复兴”，第2期，1948年2月，罗馬；阿里奇洛·东迪：“耶穌会徒的秘密权力”，罗馬，1952年，第102—103頁；同时参閱雅罗斯拉夫·加兰：“东方曙光已者”，第282—337頁。

手中买得股票，因为法西斯匪徒們害怕人民的审判，急于将有价証券換取現金逃到拉丁美洲和其他国家中去。

美国金融集团的眷顧，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助于战后梵蒂岡投資額的增漲。华尔街的銀行家們为了事先取得梵蒂岡对其奴役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政策的支持，供給梵蒂岡特别行政局以貶价的外汇，以优惠的价格将他們攫得的各种企业的股票讓与梵蒂岡，引誘它参加各种买卖和投机。結果梵蒂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意大利最发达工业的业主：紡織工业、化学工业和电力工业。①

如果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梵蒂岡是以小伙計角色参加各种股份有限公司、托辣斯和垄断企业的話，那么在战后时期，在某一工商业领域中高視濶步睥睨一切的大公司，其資本或全部属于梵蒂岡所有，或者受它的控制。特别是建筑业（建筑房屋、旅館以及其他等等），梵蒂岡自教皇里夫十三世时代起就积极投資于建筑业。

梵蒂岡在建筑业中拥有象“吉泼尔杜披里公司”这样資本雄厚的企业。“吉泼尔杜披里公司”的資本額达12亿里拉，它控制着10个女兒企业。它的行政会有下列梵蒂岡的金融家們参加：諾茄拉，茄列亚齐，馬尔康东尼奥·巴契里，薩凱蒂和古阿里奇工程师。古阿里奇同时又領导着“不动产公司”，該公司是一个控制着意大利許多城市中数十个企业和商号的大托辣斯，其資本額达330亿里拉。②

---

① 罗吉尔·加罗提：“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徒”，第333頁。

② 下列为“不动产公司”控制的一些公司：“蒙倪·瑪丽奥西部地区公司”，“新佛拉斯卡第公司”，“西弗臘尔公司”，“康雪里阿齐昂尼公司”，“米兰人民金融公司”，“大旅館建筑公司”（热那亚），“匹桑不动产公司”，“罗馬人民建筑金融公司”，“維拉·維利建筑公司”（米兰），“罗馬地区建筑公司”，“宾柯宫庭建筑公司”（热那亚），“罗馬卡尔合里尼不动产公司”，“罗馬宾士黎基奥建筑公司”，“复兴投資公司”，“民用农业不动产公司”（米兰），“大旅館管理公司”（意大利大旅館托辣斯）。

根据意大利报刊的資料，梵蒂岡在意大利的投資額，于1956年时为9,000亿里拉。①

特別行政局通过以高僧阿尔宾諾·加立蒂为首的天主教中心供給电影业以資金，摄制宗教题材的电影。梵蒂岡也供給“奥尔皮斯电影公司”和“圣保罗电影公司”以資金，庇护十二世的侄子們和意大利前內閣总理加斯貝利的女婿是这两家电影公司的主要股东。

梵蒂岡拥有广泛的自己的影院网以上映自己的新片。1938年时，梵蒂岡在意大利拥有450所电影院，1948年——2,500所，1951年时，意大利全国11,500所电影院中有4千所是屬于梵蒂岡的；1952年时，某些省份中新登記的屬于教会的影院，比屬于俗間的为多，②而在1955年时，根据“意大利通訊社”的报导，梵蒂岡已拥有1万5千所影院，其座位总数达6百万；几乎所有农村地区內通常采用的窄銀幕放映設备都是梵蒂岡所有的。

由于梵蒂岡与統治意大利的教权派政党有着联系，并得到它們的支持，梵蒂岡广泛利用国家机器为自己的金融和企业的利益服务。梵蒂岡的亲信人士和意大利垄断資本的代表們，并排地坐在意大利所有最重要的經济机关里。例如，管理分配政府定单給各工业企业的內閣复兴委員会中，就有下列托辣斯的代表：“爱迪生”、“菲亚特”和“法尔克”——梵蒂岡是它們的股东；以及“天主教行动”的首領之一和特別行政局工作人員的費拉利·阿卡迪。在政府的工业撥款委員会（它分配所謂“美援”基金）中，有着下列企业的代表：“維尼亚—維斯柯薩公司”，“法尔克”，“菲亚特”，“庞勃里尼—巴洛蒂”以及特別行政局的工作人員台齐奥伯爵和格伐尔尼里。政府的中央工业委員会的情景也是如此。意大利經济学者馬利奥·列納在引証这些事实时指出，在战后的意大利大商人同时代表着梵蒂岡、教权派政党和大业主的利

① S·B·A·，“梵蒂岡的財政”（“新生命”，1956年2月12日）。

② “世界报”，米兰，1953年11月10日。

益是极为典型的。[①] 这一事实是饒有兴趣的，就是在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会的領导机关中(解决股份有限公司与政府之間稅收方面爭端的机构)，又有这位梵蒂岡金融业眞正的費加罗[②]——諾茄拉侯爵和意大利垄断資本的代表并肩地坐在一起。[③]

梵蒂岡除了在意大利投資而外，它还在最大的資本主义国家，以及許多附庸国和殖民地国家中投資。上面已經提到过，諾茄拉是法国、瑞士和卢森堡的一些銀行和企业經理部的成員。梵蒂岡特别行政局的保險柜中尙藏有下列外国企业的股票和有价証券：亚尔馬頓水銀公司(西班牙)，“电业銀行”(瑞士)，“多倫多国际电力公司”(加拿大)，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电車、自来水、煤气和电力企业，“联合水果公司”(美国)，“大西洋輪船公司”(西班牙)，“阿拉伯—美国油公司”(“美孚”油公司中东的分公司；梵蒂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美国大使梅隆·泰勒从美国政府手中得到这公司的股票的，其交換品是拿破侖三世的妻子贈給庇护九世的苏彝士运河的股票)，“辛克萊石油公司”(美国)，“安那康达銅矿公司”(智利)，“法国石油公司”，“华比銀行总行”(西欧最大銀行之一)，“老山鋅矿开采和冶炼公司”(比利时)。比利时工商界巨子艾德蒙·卡尔登·維亚尔侯爵在最后两个企业中代表梵蒂岡的利益。[④] 梵蒂岡在西德的金融利益，也与大銀行和大工业康采恩的利益混在一起难解难分。梵蒂岡与这些集团間的中間人是紅衣主教弗林格斯的堂兄、阿登納女兒的公公——銀行家威廉·維尔汉。[⑤] 法国最大紡織业托辣斯

---

① 馬利奧·列納：“天主教民主党政府为大資本服务”(“复兴”，第三期，1953年3月，罗馬)。同时可参閱阿尼西莫夫：“現代意大利的主人”(“眞理报”，1955年3月8日)。

② 費加罗为露西尼歌剧“塞維利亚理发师”中的主角，意为忙人。——譯者

③ 馬利奧·列納：“意大利經济侵略中的教会僧侶”(“复兴”，第五期，1953年5月，罗馬)。

④ 鮑曼：“垄断資本的大西洋公約”，第168，177—178頁。

⑤ 鮑曼：“一小撮西德垄断資本家”，莫斯科，1954年，第39—43，169頁。

“裘·諾尔紡織公司”的百分之七十股票屬于特别行政局所有。梵蒂岡在多米尼亚共和国，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和哥斯达黎加共和国中拥有植物园(怪不得朱里奥·巴契里是这个国家駐梵蒂岡的大使!)。梵蒂岡拥有法国鉄路的股票，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危地馬拉、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亚和土耳其发行的国家有价証券。它在加拿大有巨額投資。梵蒂岡的商船队在1955年年底时已有远洋航輪20艘，由加拿大的銀行在与梵蒂岡特别行政局平等基础上提供資金。

梵蒂岡另一个进行广泛金融活动的机构是宗教事务院，它起着天主教会中央銀行的作用。“宗座年鉴”謙虚地指出，宗教事务院的任务为“保管和指导用于宗教事业的資金”。宗教事务院是另一个梵蒂岡机构的繼承者——宗教事务管理局，后者是教皇里夫十三世于1887年創立的，在特别行政局未誕生以前起着梵蒂岡国庫的作用。特别行政局成立以后，国庫的职司移交給它，而宗教事务管理局轉而担起銀行的职务。宗教事务管理局在三十年代时其作用大为提高，因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銀行，包括梵蒂岡所控制的銀行在內，均处于破产的边緣，危危欲墮(这些銀行的大部分股票被法西斯政府以比市价为高的价格購进)。梵蒂岡的两家大銀行“圣灵銀行”和“罗馬銀行”亦被政府的財政机构“工业复兴局”所控制。“罗馬銀行”和“圣灵銀行”轉入政府手中一事，并不意味着梵蒂岡失去了对这两家銀行的影响，梵蒂岡的亲信人士至今仍在其中占据着领导职位。然而这两家銀行的功能則在很大程度上轉与宗教事务管理局，管理局当时得到了一笔因法西斯政府購买上述两銀行股票而积起的資本。1942年时，即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方兴未艾的时候，根据教皇庇护十二世的指示宗教事务管理局的編制大为扩大，并改名为宗教事务院。

宗教事务院的工作受一个由5个紅衣主教組成的委員会的监督。宗教事务院首席領导人为紅衣主教克萊莫里斯(数年前

已死去)，他是法西斯罗馬总督菲立浦·克萊莫里斯的兄弟。希特勒的銀行家沙赫特自1952年起是宗教事务院的顧問，他經常訪問梵蒂岡。

宗教事务院的总办事处設在梵蒂岡，它不受意大利財政机关的管理。許多意大利的資本家、外汇投机家和其他商人利用这一点，向意大利財政机关隐瞞自己的收入，把資本变成活期存款放在宗教事务院中，并通过它进行交易。因为放在宗教事务院的活期存款可以不受意大利現行外汇条例的限制。任何一个資本家都可以在宗教事务院开立帳戶，祗要他保証在死后把一定比例的自己資本贈与宗教事务院，或者立即捐出一定数目的錢，数目的大小根据存款人的經济情况而定。存款人应該立書面声明，声明他对宗教事务院所承担的义务不得在遺囑中予以改变，或者被其后自己的任何决定所改变。存款人的遺产繼承人与宗教事务院的官司，无論在意大利或者在其他資本主义国家中，結局总是有利于后者的，即有利于梵蒂岡的。

宗教事务院的主要任务为确定和經理資本受梵蒂岡控制的意大利信貸銀行的业务。意大利的大多数这些机构联合成为“中央信托公司”一个集团，其中有“維尼多省天主教銀行”(威尼斯)，其資本額为2亿1千万里拉，准备金为2亿7千7百50万里拉，“圣杰米揚諾与圣普洛斯彼罗銀行”(摩登納)，“威尼斯銀行家信托銀行”(威尼斯)，“不动产金融公司”(維欽察)，“罗馬奥洛信托公司”(波倫亚)，其資本和准备金为5亿2千8百万里拉，行政資本为310亿里拉。①

同时这些銀行也控制着一系列其他企业和供給它們資金。

米兰的“安勃洛齐亚諾銀行”也是宗教事务院的分支机构，其資本額为10亿里拉，由台齐奥伯爵領导。这家銀行的部份股

① 罗吉尔·加罗提：“教会，共产主义与基督徒”，第349頁；同时可参閱“学习”，第1期，1955年1月，罗馬，第81頁。

票在耶稣会徒手中。下列一些銀行均在某种程度上从屬于宗教事务院："斯加里蒂銀行"，"烏格·那托利銀行"，"公用事业企业信貸銀行"，"社会事业联合信貸銀行"（最后两家銀行由梵蒂岡亲信人士安尼巴列·吉拉尔杜尼負責），"那伐拉人民銀行"，以及1956年耶稣会創办的以銀行家卡尔洛·巴尔迪尼为首的"社会倡議金融公司"（米兰）。①

在宗教事务院的监督之下有130家以上的儲蓄銀行，联合在"圣保罗銀行"的周围，它的資本額在1955年时为339002.6万里拉，而存款为1110亿里拉。②

宗教事务院通过自己的信貸机构控制着下列的不动产抵押銀行（主要是省銀行）："援助"公司（都灵），"阿戴新納不动产公司"（味罗那），"那瓦列齐不动产公司"（諾瓦拉），"亚得里亚納不动产公司"（米兰），"不动产联合公司"（那不勒斯），"爱米利亚不动产公司"（热那亚），"里德桑那不动产公司"以及其他。

宗教事务院与許多梵蒂岡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資本表示兴趣的外国銀行和信貸公司有着密切关系。例如，下面的一些企业就是其中的一部份：在法国有"巴黎荷兰銀行"（不久以前該銀行的領导人还是披埃尔·戴高乐，戴高乐将軍的兄弟），这家銀行在所有的法屬殖民地以及比利时和荷兰都設有分行；"国家票据貼現所"（巴黎），它被"圣心"宗教协会所操縱；"通用工商信貸銀行"（巴黎）；"美西銀行"和"烏尔吉霍銀行"（西班牙），它們在拉丁美洲設有分行；"烏里脫拉馬利諾銀行"（里斯本），它在葡萄牙殖民地拥有矿山租借权和种植园，包括在莫三鼻給和安哥拉；柴尼尼銀行，即"美意銀行"（美国旧金山，它在拉丁美洲和欧洲設有分行），以及其他。宗教事务院和沙赫特在杜塞尔多夫的銀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梵蒂岡的資本主义活动是受到天主教会最高的法律——教

① "天主教文明"，罗馬，1956年6月2日。

② "观念"，第12期，罗馬，1955年12月。

会法典所奉为神圣的。

教会法典第1495条宣称："天主教会和教皇有权自行酌定和不受世俗当局的拘束，取得、保存和使用世間的財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論在这一条，或者在其他的条文之中，"世間的財富"一詞无明确規定，也不受任何限制。第1496条規定："天主教会(意指整个教会，也指教会的个别环节和代表人物——作者)有权不受世俗当局的拘束，要求信徒捐錢以供教会开支和供养僧侶，以及用之于教会固有的其他目的上"。"其他目的"一詞在法典上既无解释，也无限制。第1499条的規定具有特別的意义，它声称教会有权"以任何自然法和民法所規定的公正的手段取得世間的財富，如同其他人根据这些法則取得世間的財富一样"。[①] 甚至于未得眞传的人一讀第1499条內容以后就会立刻懂得，教会为自己預先保留的不是以"公正的手段"取得財富的权利，而是为自己保留以"其他人"，即所有的資本家，利用的手段以取得財富的权利。因此，梵蒂岡将自己能拥有資本，能參加資本主义制度中以剝削劳动者为利潤来源的金融投机事业，以及参加殖民地掠夺的这种"权利"奉为宗教了。

教会法典不但不禁止寺院，甚至不禁止"托鉢僧"从事金融事业，并且还特別准許他們对信徒們在遺囑中規定捐献給寺院的錢的用途可自行酌定——即肥私囊，而不必按照立遺囑人的意图(用作宗教礼拜，慈善事业等等)。祗要得到上級教会的裁可就行(第151—533条)。[②]

不但如此，根据一张教皇厅命令所有寺院(修道院和尼院)毫无例外地都得按期填写的表格(第378—181号，1948年)，我們知道梵蒂岡还責成修道院院长要使原来的資本生利，和采用"别人在利用的手段"以攫取各种財物。这从表格的下列数部份的內容上可以極明显地看出：

---

① "宗教法典大全与补充数据"，馬德里，1951年，第562—563頁。

② "宗教法典大全与补充数据"，第213—214頁。

經济制度部份

第 38 节：甲）寺院在报表年度內得到了那些不动产和財物，价格多少；乙）取得的方式：贈送的还是通过其他（！）方式得来的，无償的还是直接买来的；为最后情形时，則注明是用現款購进的还是賒帐得来的。

第 39 节：从民法观点来看，所得的財产和財物是如何登記的，以及用誰的名字（！）登記的。所立文据是否可靠（！）（这一节的注介說明，在訂立文据以前应該征詢法律专家的意見和上級天主教的意見——作者）。

第 40 节：这些特別費用是如何支付的：从寺院的一般收入項下支付的，还是从非一般項下支付的（前者指捐献、餽贈和为各种宗教礼拜而募集的錢，而后者則指不动产和各种投資所得的錢，投資是以假戶名出面的——作者）。

金融投資部份（！）

第 53 节：在报表年度內是否曾以寺院有权处理的基金，作过合法的（！）、可靠的和有利的投資。

表格的第 56 节命令寺院报告因遗产或捐献所得，总值多少。①

这些章节的內容不喻自明，不需要作注释。

現在讓我們看看宗座財产管理局做些什么事。对天主教会在意大利的不动产和屬于梵蒂岡的在国外的不动产的管理，在其职权范围之內。

宗座財产管理局的活动受一个由三个紅衣主教組成的委員会的监督。数年以前，管理局最后一任的領导高僧朱里奥·格維台蒂因經常盜用公款而被撤职后，他的职务暂时由教皇的侄

① 上述表格摘自梵蒂岡官方刊物"寺院僧侶的新教規"，罗馬，1950 年，第 245—246 頁。

子卡尔洛·巴契里代理，卡尔洛是該机关的首席法律顧問。

除了宫庭、古城堡、寺院、教会建筑物和各种属于教会的房屋而外，宗座財产局經管着教会在意大利的农业田地。必須指出，梵蒂岡一方面拥有巨額資本和經营資本主义企业，它同时是意大利最大的地主。根据意大利国家农业經济局 1946 年的資料，全国有 464,800公頃土地，或全部可耕地的 8.2%属于梵蒂岡所有。教会的田地主要集中在意大利最富饒的地区。例如，假如在加拉勃利亚(意大利南部)每郡之中平均有 60 公頃的田地为梵蒂岡所有，則在翁勃利亚(意大利中部)为 370.3 公頃，在托斯康为 201.1 公頃。按照 1948 年的市价，梵蒂岡田产总值超过 3,500 亿里拉。①以上所援引的資料还不足以全部說明教会在意大利究竟有多少田地，因为有数十万公頃属于梵蒂岡的田地不曾計算在內，这些田地化在受梵蒂岡控制的假戶名和各色“慈善”机关的戶名之下。与此同时，数十万农民則失去了耕地。

信徒們、各种商人和政客的遺产和捐献，使梵蒂岡不动产的总数不断地增加。例如，前美国駐梵蒂岡大使泰勒曾把自己在佛罗倫薩的一所价值 50 万美元的別墅送給了教皇。

梵蒂岡除了上述各項收入来源而外，尙有其他的收入。

各种捐献、为传教活动而募集的捐款以及“圣彼得一枚捐”等，每年巨額地进入梵蒂岡的国庫。这些收入的极大部份在很早以前就是来自美国的。例如，“宣传信仰”主教会在 1924 年从美国收到的錢为 680,483美元，在 1927年时为 1,126,807美元，而法国在同一时期交給梵蒂岡的錢仅为上述款項的五分之一。②

梵蒂岡的出版事业也为它带来了不少好处。根据教会法典，信徒們祇准使用教皇厅設在罗馬的官方出版社印刷的祈祷書和礼拜文。于是梵蒂岡为整个資本主义世界印刷教会書籍，在这

① 維西奥·泰勃列脫：“意大利僧侶的田产”(“复兴”，第 5 期，罗馬，1953 年 5 月)。

② 卢干：“美国的天主教”，巴黎，1950 年，第 65 頁。

个領域内不受到任何竞爭。

梵蒂岡效法列支敦士登、安道耳和圣馬力諾这些袖珍国的榜样发行邮票出售給集邮家，从而博得巨大的利潤。梵蒂岡每年发行数百套邮票，上面印着“圣者”、“創造奇迹者”、教皇以及类似題材的图画。仅售邮票一項的收入就能够抵銷教皇国全部行政开支，而且还有余。

如同在中世紀时代一样，梵蒂岡現在繼續利用信徒的宗教感情，从中剝削他們：出售贖罪，和圣者的遺物，为信徒举行免罪仪式和制造奇迹，宣布“圣年”和尊崇“圣者”，以发給离婚准許状作买卖等等。

制造“圣者”仍旧是梵蒂岡有利可图的一宗事业。天主教会創立至今宣布了約 2 万人为“圣者”。十六世紀起，当为“圣者”們立了正式的清册后，至 1954 年时总計有 4394 人被奉为“圣者”。此外教会宣布了約 20 万人为“德僧”。教皇們在近数十年来特别热心地制造“圣者”和“德僧”。庇护十一世在执政的 17 年期間宣布了 34 人为“圣者”和 496 人为“德僧”，而庇护十二世每年平均宣布 5 个“圣者”和 40 个“德僧”。教会法典要求每一个作为“德僧”的候选人至少自己要有二件“被証实”的奇迹，对于作为“圣者”的候选人则要求有四件奇迹。① 除了奇迹而外，还要求証明候选人的基督德行已达到“壮烈的程度”。大典局負責审查这些“証据”，它审查每一个候选人的宗卷。然而首先被审查的不是候选人的奇迹，而是他的政治面目。

制造“圣者”的手續被称为尊崇式，而制造“德僧”的手續则称为加福式。参加礼式的除了有以“圣者”与“德僧”厅主任为首的大典局官員外，这位主任通常被人称为“魔鬼的检察官”，似乎因他对候选人的証据审查严格与苛刻而得此綽号，还有代表推举“圣者”和“德僧”候选人的宗教組織的法律顧問。法律顧問們

① “德僧”只有地方意义：他們在本教区或本寺院中被人尊崇。“圣者”则到处受到天主教会的尊崇。

被称作为“圣者的律师”。他們的職責是使“魔鬼的律师”相信，“圣者”的候选人确实具有教会法典所規定的标准。提名“圣者”候选人的宗教組織在物質上和政治上对这件事均极为关心。因为宣布新的“圣者”可以提高信徒們的宗教情緒，而信徒們紛紛到新的“圣地”去祈祷又是和教会收入的增加相联系的。

这就是最成功的“圣者的律师”为什么能从自己的委托人手中得到神話般的律师公費的原因，因为候选人的被列为“圣者”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圣者的律师”的才干和长袖善舞。因此期待奇迹是用不着的。因此希望自己的候选人得被奉为“圣者”的寺院和教区必須考虑到这一点，不吝嗇律师公費。

前述的尊崇圣者的手續，是十八世紀时教皇貝克奇克脫十四世（1740—1758）在启蒙学派和百科全書派的反对者們的影响下制訂的。这一套手續据說在宣布“圣者”和“德僧”时，能保証避免“錯誤”和濫竽充数現象。不久以前庇护十二世宣布一个十五世紀的瑞士人尼古拉斯·佛罗为圣者，因为他在二十年期間内“只是”以神秘的灵感为营养(!)，甚至于連滴水也未曾进口过。奉为“圣者”的还有庇护十世，因为向他祈祷可以治愈癌病！这些事实証明，現代的梵蒂岡仍旧如同中世紀时代一样，是蒙昧主义的溫床。

梵蒂岡是如何从宣布“圣者”和“德僧”一事中取得商业利潤的呢？第一，提出候选人爭取这些“称号”的有关教会組織，为举行尊崇或加冕仪式事应該付給大典局巨額款項，并在各种文件、証件和其他項目的名义下也得付錢，此外还須作各种捐献和饋贈。尊崇仪式的价格常常超过2万5千元美金。例如，英国的天主教徒們在1935年为了湯麦士·摩尔的尊崇式就付出了这笔数目的錢。① 第二，梵蒂岡从出售遺骸、遺物、新的“圣者”和“德僧”的画象上也得到不少进益。在举行例行的“圣者”尊崇式时，

① 霍威尔·斯密斯：“你是彼得”，倫敦，1950年，第464頁。

教会机器在全世界各国展开对他的“奇迹”的宣传，和出售表示尊崇他的各种物品，召号信徒捐献款項为这个新的“創造奇迹者”修建教堂、小礼拜所、祭坛、养老院和学校。这种建筑工程同时也为与教会当局分享利潤的建筑师和包工头带来好处，使梵蒂岡企业生产的教会用家俱和类似的产品有銷售的处所。

基督教內对“圣者”和遺物崇拜，是接受古代非基督教的各种宗教和拜物的传統的。梵蒂岡在很久以前就把崇敬遺物列为教规之一。教会法典要求，在每一所教堂的祭坛上必須保存着某一“圣者”或“德僧”的遺物。梵蒂岡垄断着遺物的买卖。因此，当为每一所新教堂或祭坛举行祓除礼时，信徒們不得不掏錢向教皇办公厅購买对于教堂來說如此重要的物品。

美国是現代銷售梵蒂岡制造的遺物和遺骸的最大市場。最近 15 年来 (1939—1954)，美国新建了 11511 所教堂。① 每所教堂平均有 4 个祭坛，因此在这一期間內为近 5 万个新祭坛举行了祓除礼，这意味着需要購买同等数量的遺物，而信徒們則为每一件遺物得付出相当数目的美元。

梵蒂岡經常組織的“圣年”和“紀念年”，至今为梵蒂岡国庫带来不少好处。在最近的一次“紀念年”时(1950 年)，有二百万巡礼者、旅行者和猎奇者訪問了罗馬。他們之間的許多人捐錢給圣彼得大教堂，或者投一个金币到教堂內专門为此而設的小箱中，或者从梵蒂岡制造的种类繁多的商品中为自己挑一件作紀念：念珠、圣象、贖罪券、带着小鏡框的鑰匙圈(鏡框中嵌着旅行者的保护神圣赫里斯托弗尔的画象)、圣彼得大教堂的导游手册或者梵蒂岡博物院的导游手册等。

“圣所悔僧”——教皇的忏悔部門——現在仍旧存在着，并如同以往一样地販卖着贖罪券。② 現在修道士和教士們不再在市場上出售贖罪券和在讀經台上大做广告了，象十六世紀戴采

---

① “新聞周刊”，紐約，1954 年 5 月 24 日。

里时代那样，然而在罗馬任何一个梵蒂岡設立的出售崇拜紀念品的商店里，信徒或旅行者可以用适当的价格为自己买一张有紅衣主教尼古拉·卡那利（大听悔僧）签名的贖罪券，其上書明，当贖罪券持有人突然死去或不及在临終的病床上行塗膏礼时，“圣父”将赦免他所有的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这种贖罪券特别暢銷。現在它主要的需求者是美国的游客。贖罪券的价格从5元美金起，根据图案、印在每张贖罪券上面作为裝飾用的教皇肖象和紙質的优劣而定。贖罪券也有值价数百美元的，它出自无名的艺术家之手，燙金的字和摩洛哥山羊皮的封面。总而言之，只要你有兴趣买，有供富翁买的贖罪券，也有供穷人买的贖罪券。

受理离婚請求的“洛脫”审判厅繼續为梵蒂岡国庫带来可观的利潤，如同在中世紀时期一样。在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中，法律只承認在教会中登記的婚姻，而教会法典只准許罗馬的“洛脫”审判厅解除婚約。因此，一个天主教徒，无論住在澳大利亚或是拉丁美洲，如果要离婚的話只得到梵蒂岡的“洛脫”审判厅去。虽然教会法典只在极少数的情形下允許离婚，可是在“洛脫”审判厅中活跃的律师們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施展妙計以达到目的，所有一切都取决于当事人的慷慨与否，因为审判厅在判决的时候，对于事先曾为梵蒂岡国庫“慷慨輸将”的請求者，不是一点也无动于衷的。关于梵蒂岡每年从“洛脫”审判厅得到多少錢是很难說的。有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天主教会在許多国家中为反对国家頒布离婚法而頑强地斗爭着。

梵蒂岡的僧侶在榨取信徒的錢財方面的創造性是无限的。下列事实即为明証。在梵蒂岡的电报局內設有一个专門的服务

② 教会至今尚利用着中世紀教会的“过剩神恩說”这一“理論”。教会法典中有25条条款是关于贖罪券的，其911条宣称，教会当局有权发售贖罪券，因为“教会在上帝的面前儲有功勛”。教士在受教阶时所作的誓詞中，以及在我們上面提及的教会法典上，一开卷就有下列几行話：“我确信，耶穌基督賦与教会当局发售贖罪券之权，并且使用此贖罪券将为基督徒带来极大的益处”。参閱“宗教法典大全与补充教規”，第43，338—346頁。

处，只須付給一定数目的錢，它就可以为你以教皇名义发給新婚夫妇一封祝福电报，或发給病人和弥留者一封免罪和授予临終圣殯的电报！

信徒在遺嘱中規定将遺产贈給教皇的事現在仍然象以前一样地多，这为梵蒂岡带来数百万的收入。意大利"欧罗巴"杂志在1954年报导說，意大利著名的商人列維在遺嘱中規定把自己值40亿里拉的全部財产贈給教皇。①

梵蒂岡每年从如此众多和不同的来源得到的巨額收入，是为誰服务的和用作什么的？教会的頌揚者們断言，梵蒂岡的錢主要是用在救济穷人和維持教皇厅两宗事上。然而这不符合事实。梵蒂岡的慈善事业由所謂"教皇援助委員会"統筹其事的，它有着自己的收入来源。委員会从工厂主那里募得捐款和实物（衣服，罐头食品等等），意大利政府并且撥給它輔助金，此外还移交給它一些前法西斯青年同盟"里都利奥"②的休养所、运动場和其他产业。教皇援助委員会从梵蒂岡得到了什么呢？而教皇援助委員会是不公布自己的資产負債表和年度总結的，这显然是有意的。因为梵蒂岡如果有什么可以吹嘘的話，它早已向全世界宣传了。所以应該这样推测，委員会根本沒有分得梵蒂岡收入中的一杯羹，或者为数极可怜，因此梵蒂岡不得不隐瞞其事。梵蒂岡預算中的另一个大項目，是与它的外交活动有关的各項开支。但是圣使的供养費用是由他駐节的国家的主教会提供的。

因此，自然得出这样的結論：梵蒂岡的收入决不是耗費在慈善事业上，甚至也不是用之于維持梵蒂岡的外交机构的，而是花在其他目的上的。梵蒂岡收入的极大部份被教皇、他的亲屬、紅衣主教和其他教会显貴們所据为已有。教皇厅中的紅衣主教

① "欧罗巴"，米兰，1954年10月10日。

② 卡尔洛·法尔康尼："教廷在意大利的救济事业"（"新論"，第11期，1954年，罗馬）。

們"賺得"最多。他們的薪俸每年达10万美元，此外每逢节庆日教皇还为他們送来所謂"紅衣主教的一盘菜肴"，有时候这盘菜价值2万5千美元(例如，逢到"圣年")。教皇厅其他高級教士的薪俸較为普通些，然而也很可观，他們是：仅有头銜的主教、大主教和高僧。然而这只不过花去了教皇厅收入的一部份。数目更大的錢用于进行反对进步陣营的思想意識上的战爭，用于反对共产主义和先进科学；用于維持教权派組織、教权派的报刊和各种宣传机关；用于进行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內其他国家的破坏工作。教皇厅的不少收入用于繼續扩大梵蒂岡的資本：購进新股票和有价証券，以及作其他的投資。可是梵蒂岡連一文錢也不发給以依靠信徒施舍为生的，或者根据国內法可向本国政府領錢的普通僧侶。

耶穌会徒渥泰維奥·麦凱蒂，他所屬的教派拥有不可胜数的財富，在自己的一篇关于"道德"的論文中說服教会中的普通执事們說，"財富是万恶渊源，它給德行敗坏者以食物；而貧困則是无数美德之所由"①。根据麦凱蒂的理論，只有当資本家、教会的大公們和各教派的将軍們掌握了財富以后，它才会带来好处，至于在人民手中，以及在普通教士手中，財富是"万恶渊源"。意大利的普通教士是不受这种"万恶渊源"之害的；1953年时，普通教士每月只有10,510里拉的薪俸，即不足18块美元。乡村教士們的处境特别貧困，他們常常和他們的信徒們一样地穷。然而梵蒂岡在这方面也企图为自己博取資本，但这一次是博取政治資本。穷极奢侈的梵蒂岡高級教士們在談到这些教士时，以他們特有的伪善口吻說道：你們看，上帝的侍奉者們生活得如何地貧困和正义，教会是如何地穷呀！今日人士們以嘲弄的口吻談論着教会的穷困这一神話。普通教士不相信这一神話。意大利报紙曾报导过，貧穷的乡村小教区的修道院院長們要求梵蒂岡把

① 渥泰維奥·麦凱蒂："耶穌会——教士良知的考驗"，罗馬，1946年，第21頁。

所有教区的收入汇集成一堆，然后按比例地分配，取消"肥教士"和"瘦教士"的区别。① 事态甚至发展到这般地步，当发生罢工时，乡村教士們請求工会把教士要求增加薪俸一項也列入工会提出的要求之內。甚至于教皇的宪兵也在1952年宣布罢工，要求增加薪俸和增加粮食配給！

这就是梵蒂岡帐目的秘密，它被一复核时就露出資本主义的原形来了，而决不是神圣的。

現代的僧侶不单是宗教活动家，他們同时是大資本家，股票持有者，銀行、工厂和公司的老板。他們和自己的亲屬們同資本主义世界关系密切。

作为大資本的伙伴的梵蒂岡，同时也是他的思想上的同盟者。这在受梵蒂岡鼓舞的現代教权派政治运动中表現得极为明显。

---

① "世界报"，米兰，1953年5月9日。

第五章

梵蒂岡的政治蜘蛛网

梵蒂岡鼓舞着西欧和美洲为数众多的教权派政党（天主教民主党，天主教社会党，"人民党"）。"天主教行动"这个群众性組織是受梵蒂岡領导的，其活动对于一系列資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局势有着重大影响。教廷今日的世俗权力，表現在梵蒂岡通过教会組織在許多国家控制着分枝繁多的群众性組織，及在思想上武裝教权派政党。

教权派政党和教权派群众性組織是在为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理想所鼓舞着的革命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的条件下，在上世紀下半叶在法国，比利时，德国和奥地利，即在高度发展的資本主义国家开始建立起来的。在这一时期麇集于教权派陣营周围的主要是封建貴族集团，地主，农民中的富裕阶层和不參加社会生产的小資产阶級。当时尊崇教权运动的特征为：仇視社会主义，企图巩固教会在工人阶級中的地位以削弱各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散布沙文主义，支持开拓殖民地和捍卫資本主义秩序。随着时代的演变，尊崇教权亦成为工业資产阶級的旗帜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各个国家中的尊崇教权运动是完全支持"自己的"資产阶級，要求将战爭进行到"胜利結束"。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时，由于出現革命危机和許多有传統的資产阶級政党的垮台，在某些国家內資产阶級中最反动的阶层都聚

集到教权派的旗帜下面来了。教权派正是依靠了他們在这些国家中掌握了政权，例如在德国，奥地利和比利时。同一时期內在意大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拉脫維亚，西班牙和葡萄牙各国中出現了教权派政党。所有这些政党的主要任务为同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作斗爭。随着法西斯主义出現在政治舞台上和資产阶級对法西斯主义愈来愈信任和支持，教权派政党或者法西斯化了，如在奥地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或者执行对法西斯讓步而敌視反法西斯同盟的政策，为法西斯执政开辟道路。所有这一切都得到梵蒂冈的同意和贊許。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許多資产阶級的政治組織由于和法西斯侵略者合作而完全声名墮地时，反动派再一次乞援于教权派，因为反动派把教权派視作自己天然的后备軍。教权派在这一次是以"基督教民主主义者"的假面具出場的，蠱惑性地答应进行社会改革，保卫和平和給予其他种种好处。实际上当他們在意大利，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执政以后，教权派破坏了在抵抗运动期間建立起来的人民陣綫，开始反对民主权利，反对共产党人，变成美国侵略集团政策在欧洲最忠实的执行者。"天主教政党已充当起业已一团混乱和走下坡路的資本主义最后挑起担子的人这一事实本身——陶里亚蒂指出——就足够明白地說明这些政党，說明它們的思想体系，它們的主要社会基础及其領导者执行的路綫；說明这些政党不仅是保守的經济和社会势力，而且还是反动势力，它們为了挽救全人类今日号召去消灭的穷困和被压迫的世界，什么都准备干"①。

教权派政党对于統治阶級說来，其宝貴之处在于这些政党依靠了"天主教行动"和类似的与教会有关系的群众性組織，依靠了教会当局，他們能够动員信賴教会的群众；在于教权派政党与其他資产阶級政党不同，他們通常在工人阶級之中拥有自己

---

① 陶里亚蒂："爭取劳动、自由与和平的政策"，"眞理报"，1950年4月18日。

的代理机构，即"基督教"职工会；最后則在于他們是进行政治上两面手法，进行政治性和社会性蠱惑宣传的老手。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就是很明显的例子，天主教民主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使大資本家的政权在意大利重新恢复，并以花样百出的两面手法遮盖自己的反动政策。正如陶里亚蒂指出的："一方面它（天主教民主党——作者）宣称自己是忠于'北大西洋公約'的原則，即忠于保卫資本主义制度原則，它詛咒左翼人民力量，特別詛咒我們（共产党人——作者），它追随美国麦卡錫主义的后尘，唆使工业家迫害工人积极份子，利用全部国家机器以图阻挡我們前进。它在另一方面为了使自己在群众間的影响不致丧失殆尽，被迫宣称自己是資本主义的反对者，答应进行社会改革，它既发誓又賭咒，說它是願意尊重民主的。然而保守势力和反动势力在党內占有压倒优势的地位，决定該党的实际政策的終究是他們。"①

教权派在"第三种力量"的旗帜下出場，企图欺騙劳动群众，他們断言他們毫不偏袒地既反对資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他們的政治目标为建立一个以基督的社会学說为基础的"公平的社会"。然而在事实上教权派政党的政策表現为支持"冷战"，保卫資本主义剝削制度，保証独占資本家获得利潤，以及迫害工人运动。

教权派的政治手腕以善于随机应变見称，根据情势可以同任何一个資产阶級集团結成联盟。例如在葡萄牙和西班牙教权派支持法西斯，在意大利他們和天主教民主党人共掌政权，在奥地利則于长时期內对部份工党領袖有着巨大的影响，在英国則与莫斯莱法西斯分子共同行动等等。

天主教教权派在一系列西欧国家中擎着資产阶級民族主义大旗出現。教权派民族主义运动在过去就往往带有法西斯主义

① 陶里亚蒂："三十五年的生活与战斗"，"眞理报"，1956年1月21日。

色彩(例如在斯洛伐克的刘道夫主义者，克罗地亚的鳥斯泰主义者，比利时的弗莱門民族主义者)。由于历史条件形成的势力，天主教会还对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主义者运动起着作用。两次世界大战之間一段时期內，西欧各国教权派民族主义集团除了少数例外而外，背叛了他們本民族的民族利益。梵蒂岡不止一次地利用这些运动，好象利用兑换用的零錢一样，来向更大的掠夺者为自己换取各种特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与日益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相抗衡，在梵蒂岡和天主教会的积极参加下在拉丁美洲各共和国中成立了教权派政党。梵蒂岡热切地力图扩大自己在拉丁美洲各国的政治影响，从而抬高自己在美国統治集团中的身价。

現代的教权派政党乃是天主教会与資产阶級联盟的政治表現，乃是梵蒂岡与金融資本利益相同的表現。教权派政党在思想意識方面則以梵蒂岡的"社会綱領"馬首是瞻，这个綱領的主要內容为捍卫資本主义和敌視革命运动、敌視社会主义。

每个天主教政党受梵蒂岡影响的程度，和依附梵蒂岡的程度各相迥异。必須注意的是，每个国家中的天主教政党首先是代表自己資产阶級的利益的。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对梵蒂岡的依附程度比其他天主教政党为甚，它的主要支柱"天主教行动"是直接受罗馬教皇指揮的。"天主教行动"掌握着分枝繁多的，积极活动着的，和紀律严密的群众性組織，教权派沒有这些支持是不可能在大选中获得成百万选票的。

"'天主教行动'究竟是怎样的組織呢？'天主教行动'是一些群众性組織的联合会——如职工会，各阶层的协会，文化团体，科学团体和体育团体等等；它根据宗教的特征而建立起来，并受教会的領导。意大利'天主教行动'的章程(它是其他国家中同类組織章程的藍本)中，对这个組織的宗旨有下列簡要陈述：'天主教行动'是世俗的天主教徒的民族性組織，它的宗旨为同教会进行密切的和直接的合作。'天主教行动'本身組織或者通过其

他屬于它的或受它监督的天主敎組織，关怀自己成員灵魂上的和宗敎上的敎养，指导他們在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中传布和保卫基督信念。'天主教行动'把传布信仰和服从基督的全权代理人(即罗馬教皇)認为自己首要的职責"。

"在'天主教行动'的帮助下——意大利进步历史学者基奥尔奇·凱特罗洛写道——教会在过去和現在都是首先保卫和巩固作为政治組織的自身，同时保卫和巩固同教会发生关系的統治阶級。'保卫和传布基督信念'——这祗是主要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而已。最近数十年来，虽然'天主教行动'这組織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急剧地提高了，然而群众的宗教观念毫不活跃，也并未更为加深，这就是最好的証明"①。

"天主教行动"这一术語首先見諸于庇护十世在1905年发表的一个通諭中，庇护十世号召意大利教权派份子建立一个名为"人民联盟"的政治組織，其任务根据当时"天主教文明"的报导，为"在社会生活領域中保卫基督秩序和同社会主义的学說及其破坏傾向作斗爭"②。1908年时，一些天主教政治組織組成了名为"意大利天主教行动"的联合領导机构，这机构直接听命于教皇与教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天主教行动"急剧地扩展了，它企图把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置于自己影响之下。意大利在法西斯統治时期，"天主教行动"仍旧是天主教会的主要政治基础，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天主教行动"和法西斯合作，虽然有时候在教权派和墨索里尼政府之間发生过形式上的很尖銳的爭执。由于"天主教行动"这組織及其干部的存在，意大利的教权派份子有可能在法西斯崩潰以后迅速地組成天主教民主党。

庇护十一世，他被称为"天主教行动"的教皇，曾把这个类型的組織在其他国家加以推广。

① 基奥尔奇·凱特罗洛："意大利的天主教行动"，第5頁。

② "天主教文明"，第一卷，罗馬，1905年，第129頁。

梵蒂岡力图将各种"天主教行动"的組織联合起来，使具有国际規模。为这目的服务的有下列联合会，例如"国际男子联合会"，成立于1948年，在27个国家中有其組織；"罗馬世界"，它联合着47个大学生和学生青年的民族性組織；"天主教女子組織世界同盟"；"国际天主教少女协会"；"国际基督教职工会联盟"，成立于1920年，由12个民族性組織組成，盟員有3百万；"欧洲基督教劳动者运动"，1949年成立；在紐約設有所謂"中欧基督教职工会联盟"的領导机构，而在巴黎則設有"国际基督教劳动者——流亡者与难民联盟"的領导机构，这些流亡者和难民不过是一小撮从社会主义陣营逃亡出来的反动份子。上述两个組織均成立于1951年，由美国当局撥給經費。教权派政党联合成为一个"黑色国际"——"国际基督教民主主义者同盟"，它成立于1947年。所有上述的以及其他的教权派組織，同时又加入"国际天主教組織会議"，該組織成立于1927年，会址設在瑞士的弗里堡，以及"国际天主教組織情报中心"，該組織成立于1950年，会址設在日內瓦。① 这就是教权派政治上的蜘蛛网，它在同等程度上既为天主教的利益服务，又为帝国主义資产阶級的利益服务。

教权派陣营在意大利有着很大的势力。教权派在意大利直接受到梵蒂岡的监督和依靠天主教会。"意大利政治性的天主教——天主教民主党的領袖迪諾·鮑写道——乃是今日世界上最强大的基督教政党。" ② 同一作者承認"如果在意大利有着一个統一的天主教徒的政党，如果教徒們总是积极地参加竞选运动，那么首先应归功于天主教会，僧侶和主教們积极干涉。意大利的天主教徒已經习惯于接受自己修道士、教士、紅衣主教、以至教皇的引导，他們指导教徒們在政治活动中应該运用那些方

① "国际組織年鉴"，布魯塞尔，1954年。

② 迪諾·鮑："意大利天主教的危机"，罗馬，1954年，第86頁(迪諾·鮑在1955年时曾任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

法和手段”。

因此，更詳尽地研討梵蒂岡的現代政治方針是恰合时宜的，尤其因为梵蒂岡的方針不仅影响到意大利教权派的政策，并且还影响到其他各国教权派的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梵蒂岡是作为“冷战”的鼓舞者出現的。教皇庇护十二世在1947年8月間曾与美国总統杜魯門交换信札，在信札中他們彼此保証在与共产主义作斗爭中互相支援。同年9月7日庇护十二世在罗馬彼得广場向“天主教行动”的积极份子发表演說，他在演說中声称：“每一分鐘都是宝貴的。沉思熟慮和籌划策略的时期已經过去。現在是行动的时候。你們准备好沒有？两个敌对的陣营在宗教和道德方面表現得愈来愈明显。正是考驗的时候了。”① “紐約时报”多年駐梵蒂岡的記者卡密尔·欽法拉兴奋地写道，紧接着发表演說以后“庇护十二世开始肩幷肩地和基督教国家一起和共产主义危險作斗爭，他运用教会道德声望作为斗爭的武器，同时也运用教会的物質(!)力量。根据他的行动可以确信，在天主教教会和莫斯科之間取得和解是不可能的。他已經不是中立的了(好象他曾經守过中立似的！——作者)……他开始为建立强大的反共联盟而斗爭”②。

的确，不能說庇护十二世是公开而笨拙地奉行这一路綫的。教皇是个外交家，是熟知西欧各国人民政治情緒的，他知道軍事联盟，軍备竞賽和战爭歇斯的里，是被世界公众輿論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群众所斥責的。这就是为什么庇护十二世在发表反对社会主义陣营演說同时，还保証他是贊成和平斥責战爭的。然而这种保証有什么价値呢，只要看他直接监督下刊行的“天主教文明”杂志的內容就明白了。耶稣会徒勃罗柯萊里在教皇厅这份刊物上毫不忌諱地声称：“不幸的(?)是所有人都談論和平，所有

① 卡密尔·欽法拉：“梵蒂岡和克里姆林”，紐約，1950年第47頁。

② 同上。

的人都要求和平，然而那些叫嚷得最凶的，只不过是为了想遮盖自己的犯罪意图。（这个耶稣会徒不是指眞正的战爭販子——帝国主义者而言的，而是指国际和平运动的拥护者而言的——作者）。召开各种大会，建議举行各种国际会議，緩和国际緊张局势的建議愈来愈多，到处人們号召走向和平，但是难道不应該和先知耶利米同声高呼——和平，世界沒有和平嗎？”① 勃罗柯莱里在 1952 年时还在“天主教文明”上写道：“对于古老欧洲的命运而言，另一件事的政治意义更为重要，即建立欧洲軍……我們（？）能够很快地使它实現嗎？”②

另一个耶稣会徒安东尼奥・密西尼奥亦写有相同的文章，他是“天主教文明”杂志外交政策栏的編輯。

1955年时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企图誹謗苏联的和平政策。他在一篇文章中“証明”西欧軍事同盟的目的，只不过是“自卫和在經济，社会及文化領域中进行合作”③。密西尼奥厚顏无耻地声称：“如果在巴黎草拟并在倫敦获得协議的协定引起俄国的不滿的話，那么这就是协定对欧洲及和欧洲联合的各国有利的最好标志。”④

“天主教文明”杂志（即罗馬教皇，梵蒂岡）攻击于 1955 年举行的日內瓦会議。“共存是烏托邦，它会麻醉西方——教皇杂志在緊接着日內瓦会議閉幕之后写道——把已出鞘的宝剑重新入鞘是危險的空想……西方正面临着危險的和平攻势……当还沒有在教皇指示的基础上解决所有主要問題之前，应該提防和东方取得和解。”⑤ 难道断言共存是烏托邦，而宝剑重新入鞘是危險的空想，不是証明梵蒂岡繼續奉行“冷战”政策嗎？

---

① “天主教文明”，罗馬，1953 年 11 月 21 日，第 386 頁。

② 同上，1952 年 3 月 21 日，第 601 頁。

③ 同上，1955 年 1 月 15 日，第 162 頁。

④ 同上，1955 年 2 月 19 日，第 365 頁。

⑤ “消息报”，莫斯科，1955 年 8 月 11 日。

許多年来罗馬教廷进行反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活动，进行反对这些国家中贊成建立国家与教会間正常关系的天主教团体活动。在庇护十二世直接領导下的"圣办公厅"将贊成国际和平的匈牙利天主教杂志列入"禁書目录"之中。(如"匈牙利天主教公报"，"十字架")。

捷克政府和波兰政府使天主教主教会各种願望得到滿足，因此这些国家的天主教报刊欢迎教会与国家間关系的正常化。梵蒂岡"圣办公厅"的回答是，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天主教报紙"天主教消息"和波兰天主教杂志"今日与明日"列入"禁書目录"，梵蒂岡是故意在举行日內瓦会議的时候作出这一决定的。誰迫害人民民主国家內的天主教报刊呢？难道是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是的，是梵蒂岡"圣办公厅"在迫害它們。

庇护十二世禁止天主教僧侶参加和平运动。意大利教士茄什洛因敢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因此被革除教籍和褫夺教阶。"罗馬观察家"曾譴責在和平呼吁書上签名的天主教徒。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阻碍世界和平运动蓬勃开展，不能阻止"日內瓦精神"的产生，日內瓦精神把对美好将来的希望扎在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心中，也札在数百万天主教信徒的心中。庇护十二世应該在其1955年圣誕文告中承認这个事实，在这一文告中他表示贊成停止試驗核武器，和在"对軍备确立监督的条件下"禁止采用核武器。庇护十二世声言："朕毫不怀疑地断言，总体地实行这三个措施是各族人民及其領导者良知上的責任"。

庇护十二世的这篇演說受到了所有和平眞正的朋友們的欢迎。它在基本上是和不仅受到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支持，也受到資本主义国家千百万劳动人民——天主教徒和非教徒——支持的苏联的建議相符合。

然而庇护十二世文告的其余部分与上述引文不相吻合，他在文告的其余部分发表了一系列梵蒂岡代表人物共同的攻击共产主义的言論，他反对抱有"共处实际可能性的幻想"，反对"不

論代价如何与所有的国家共处"，虽然就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和罗馬敎皇在象禁止热核武器这样重要的国际政策問題上观点相同而言，这事实本身就令人信服地証明社会主义陣营和資本主义陣营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不能不同意大利"团結报"在評論庇护十二世談論禁止热核武器的演說时所发表的意見，"团結报"写道："这就是共产主义国家苏联所提出的建議，苏联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一建議，并且还要繼續提出……禁止試驗原子武器和热核武器的問題是个有局限性的問題，然而問題的提出是由于明显的正义性的要求，由于对全人类是必要的。'共产主义'站在为它的实現而斗爭的队伍的前列。各族人民期望的是正义的胜利，也就是期望庇护十二世所繼續在詛咒的共产主义的影响能够传播和增强。"①

庇护十二世在圣誕文告中非难在具有进步情緒的天主敎徒間的得到广泛流传的一种意見，"根据这种意見（敎皇在文告中說道）基督徒应該把共产主义視作为历史发展中的一种現象或一个阶段，几乎視为历史进展中必不可缺的一个'时期'，差一点就要說成为上帝所預見到的"。社会主义制度今天已經普及于人类三分之一，而罗馬敎皇却仍旧不願意承認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中的"現象或阶段"，把資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和平共处視为社会主义世界对資本主义世界的投降。在这一方面，庇护十二世的圣誕文告和帝国主义集团代表人物类似的說法不謀而合。誰不明白呢，在这种"条件"之下不可能使国际紧张局势得到絲毫緩和，提出类似这种的"条件"只能妨碍資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間正常关系的建立。

庇护十二世在同一文告中号召西方列强把社会主义陣营內国家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他恳求殖民地各族人民"承認欧洲在进步事业中的功績和拒絕譴責殖民主义"。

---

① "团結报"，1955年12月28日，罗馬。

不言而諭，这类声明是对殖民者有利的，而不是对正为自己獨立而斗爭着的各族人民有利的。

所有的事实都証明梵蒂岡在战后建設問題方面的政策，是和最大的資本主义国家統治集团的政策相吻合的。

資本主义世界内所有国家中教权派政党和組織，在国际政策問題上是追隨梵蒂岡的反动路綫的。

在意大利教权派組織特别众多，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和意大利資产阶級利益有密切关系的天主教民主党。

領导着法西斯崩潰后建立起来的天主教民主党的人物，原系天主教“平民党”的首領，墨索里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願和他們合作。同时和他們进入該党領导集团的还有“天主教行动”的首領們，他們在墨索里尼統治时期以同情法西斯著称，例如杰达即是。加入新党的有“天主教行动”青年組織的領导人范范尼，拉·庇拉，佐席比·陶采蒂，他們以“左傾”見称，虽然其中有些人过去公开支持过法西斯，例如范范尼即是。天主教民主党的領导机构中尚有意大利最大的壟断資本和托辣斯代表，他們由于和法西斯分子合作而发了横財，例如毕拉、康披里、万諾尼等。

“天主教行动”的首領們在教权派政党内演主要角色。“由于在法西斯时期保存了党的干部——教权派历史学者馬里奥·叶諾迪写道——‘天主教行动’才能够在天主教民主党内占有很大的势力。結果‘天主教行动’的首領之一路易澤·达今日認为自己是全权代表，时常声明自己有监督党（天主教民主党）的权利。对直接受教会监督的世俗組織‘天主教行动’的依附，是現代基督教民主政治沉重的負担。”①

天主教民主党客观上代表着意大利資产阶級和天主教会上层分子的利益。

---

① 馬利奥·叶諾迪与法朗索·郭甘尔：“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基督教民主”，諾特尔丹姆、印第安納，1952年，第26頁。

教权派一面利用社会民主党，一面依靠了教会机构的支持（而在战后还依靠英美占領軍当局的帮助），他們才能够将相当广泛的小資产阶級和中产阶級，富农和政治上落后的工人与雇农吸引到自己的一方。这使教权派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然而这基础本身之中存在着尖銳的矛盾。

1946年时，根据庇护十二世的指示，对意大利“天主教行动”的組織形式进行了改革，以使适合战后的条件。“天主教行动”的最高領导机构为教皇任命的指导团，由六个主教和大主教組成，指导团由一个紅衣主教領导。指导团之下有执行机构——主席团。主席团的成員包括：主席一名，副主席二名（男女各一人），書記和司庫——所有这些人都由教皇任命，参加“天主教行动”的各个組織的主席亦然。此外还有一个专門机构在指导团領导下进行活动——中央委員会，参加該委員会的有主席团成員，“天主教行动”各組織的主席，一些由这些組織常委会选出的代表，以及由主席任命的人士。“天主教行动”各教区和乡村小教区常委会的主席由当地主教任命。这种領导形式允許梵蒂岡，准确地說——教皇，完全控制这一政治性群众組織。梵蒂岡領导着該組織中央机构，并通过作为政治顧問常駐于所有“天主教行动”組織內的权限范围很大的僧侶代表，它可以按照教会的願望指导“天主教行动”的活动，輕而易举地击敗該組織中任何反对派。

参加“天主教行动”的有七个群众性組織，其会員总数根据1956年的資料为三百万人。上述組織中有四个单位与“天主教行动”并行地进行活动，即拥有自己的教区和乡村小教区常委会。首先为“男子联合会”（成立于1922年），会員为已婚男子和年令已达三十岁的男子；在它的領导下有“兒童天主教行动”，会員为四岁至十岁的兒童。

其次为“青年联合会”（男青年），在1868年为庇护九世所創立。1948年时，这組織拥有24,000个基层小組，15万名会員和

25万名候补会員。

在“青年联合会”領导下有一系列各个不同社会阶层的組織：“意大利基督教青年工人”(男青年和女青年)，成立于1941年，会員分为两类：积极会員(同时参加“天主教行动”)，贊同会員(非“天主教行动”的成員)；“农村青年”(男青年和女青年)，成立于1946年；“青年大学生”(男青年和女青年)，成立于1944年；“意大利天主教少女”，联合着資产阶級和保守派的子弟。

“天主教行动”的第三个大組織为“青年女子”(为从四岁到三十岁的少女和女子)，成立于1918年。它有五个分部：幼兒部(四岁到六岁)，“女孩部”(六岁到十岁)，候补会員部(11岁到13岁)，青少年部(14岁到18岁)，正式会員(19岁到30岁)。1948年时，“青年女子”在意大利所有教区和18,500个乡村小教区中設有分支；参加的少女和兒童达874,404人。[①] 这是“天主教行动”最大的群众性組織。

此外参加“天主教行动”的有“意大利天主教大学联合会”，成立于1896年，隶屬于該会的有“毕业生运动”(高等学校毕业者)和“小学教师运动”。

“天主教行动”系統内尙包括一系列运动組織和文娛組織，例如“意大利天主教童子軍协会”(男孩)、“意大利輔导員协会”(女孩)、“意大利运动中心”和“联誼会”(在妇女間活动)。

从屬于“天主教行动”的职业性組織如下：“意大利天主教教員协会”，“意大利天主教中学教員联盟”，“天主教大学教員委員会”以及“意大利天主教技术人員同盟”，“意大利天主教法律工作者同盟”，“意大利藥剂师同盟”，“意大利天主教徒出版者同盟”，“大众图書中心”(主持教权派宣传鼓动图書的分配工作和組織“人民”图書館)，其神学顧問为“天主教文明”杂志編輯之一耶穌会徒，柴可摩·馬蒂可尼。

① 奧古斯汀諾·契卡薩尼：“教会百科全書”附录，米兰，1953年，第135、136、286頁。

"天主教行动"主席团下有领导宣传鼓动的中央局，負責道德宣传、教育和电影的秘書处，以及"戏剧中心"、"无綫电中心"和"社会活动所"。

近年来"天主教行动"領导的"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在教权派組織系統內的影响开始愈来愈大。

"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是罗馬从德国占領者解放出来的次日，根据梵蒂岡的指示而建立的。"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的主要組織者是律师路德維格·蒙蒂尼，他是現今米兰大主教的兄弟。天主教职工会的首領們同意在当时加入統一的职工联盟时，預先为自己保留組織"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的权利，这似乎只是为了关怀工人"灵魂上的安宁"，关怀他們的文化活动和組織互助。左翼工会活动家为了希望使职工会的团結能成功，同意了这个条件，虽然明知"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成立后教权派和資产阶級一有机会便会依靠这組織来分裂工人运动。陶里亚蒂在 1944 年評論統一的职工会中央成立时說："我們不应当，也不願意和天主教群众不和，我們必須和他們在今日和明日为协同行动找到共同的活动范围……我們知道在天主教政党队伍中有着工人、农民、知識份子、青年和劳动群众，他們最終有着和我們相同的願望，因为他們和我們同样地希望在今日建立一个民主和进步的意大利，在这个国家中工人的要求将会得到实現。我們要求和这些天主教群众行动統一。我們知道在过去存在着妨碍这种行动統一的心理上和組織上的因素。我們至今为止，为了鏟除这些障碍做了一切必須做的事……今日我們在这个新的共同的劳动联盟中走了实現这种統一的第一步。我們为职工会的团結而庆賀，因为它是意大利民主化和政治进步道路上的一个大进步。"①

表現在統一的职工会运动中的劳动人民行动的統一及其成

① 維多利奥·高利雷："世俗的权利"，馬杜拉，1951年，第31—32頁。

就，在資本家和梵蒂岡之間引起了极大的不安。耶穌会徒勃罗柯萊里在一篇登在1946年的"天主教文明"杂志上的文章中相当公开地暴露这种不安的原因："这对于誰都不是秘密，在我們的（即天主教的——作者）工人与农民間，只要一提起共产主义就会引起的敌意或者甚至恐怖感，已經減弱了，因为現在他們談論着：既然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已經联合在一个組織之中，那末說共产党人是与宗教不相容的敌人是謊話：兩者之間的差别应該是不大的。"①

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同意統一职工会的教权派們，同时开始准备分裂，他們把共产党人抱无神論观点提出来作为反对与共产党人合作的主要論据。

共产党人作出了一切努力不使因宗教誘因而导致职工会运动的分裂。他們甚至于准备投票贊称把拉特兰条約也写在新的意大利宪法中。陶里亚蒂在議会中評論共产党时对这一問題的观点时說："工人阶級不希望因宗教問題而使国家分裂。工人阶級不希望，我們也不希望，在工人間发生冲突——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为一方，而信奉天主教的工人为另一方。不仅如此，我們的責任为作出一切可能使冲突不发生。"②然而正如众所周知，教权派們竭力設法把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排挤出政府，将政权攫到自己手中。分裂派們下一步行动将为分裂"意大利总工会"是极明显的。

为了保証劳动者的团結和击敗教权派的分裂活动，共产党人作出了新的讓步。共产党人同意当在"意大利总工会"的領导机构中发生意見分歧时，少数派有权利公开表示自己不同意多数派的立場；有权利不执行領导机构通过的决議。这一提議保証了"意大利总工会"中天主教派系的充份行动自由。但是教权派們害怕劳动人民的团結。

① 維多利奧·高利雲："世俗的权力"，第3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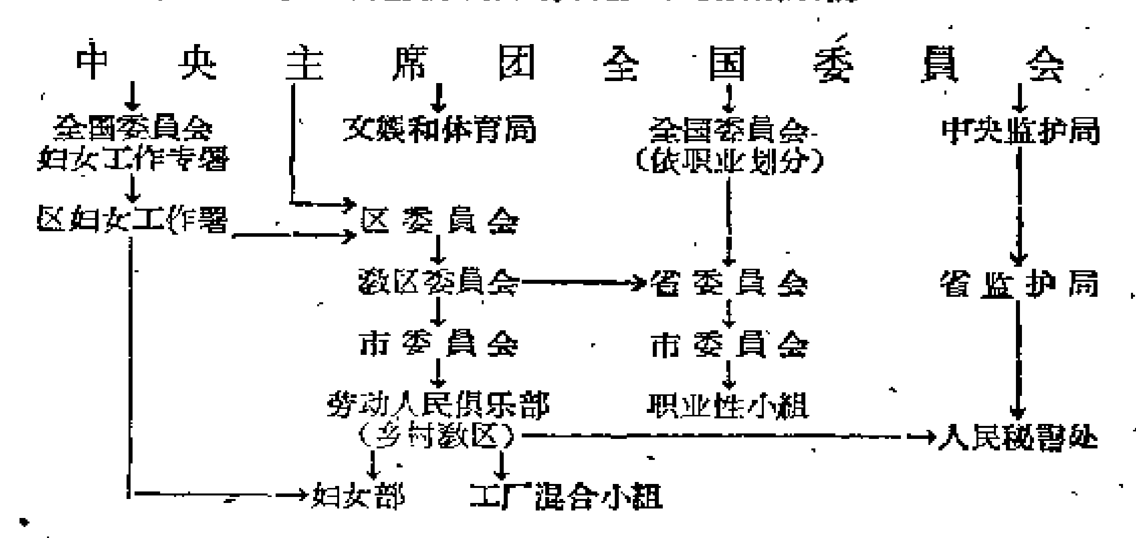
② 同上，第45頁。

1948 年时，"意大利总工会"因陶里亚蒂受到敌人的謀害而宣布总罢工，教权派首領們便以之为借口退出总工会（追随着他們的有社会民主党人），他們憑借了"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組成了自己的分裂派职工会組織，大多数天主教徒沒有跟从他們，仍旧留在总工会內。

"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以中央主席团为首，下面有各委員会——区委員会（包括几个省），教区委員会（省委員会）和市委員会。市委員会領导乡村教区俱乐部，而俱乐部則領导該会会員根据工作地点而組織的小組（工厂，机关等等）。乡村教区俱乐部中亦有根据职业划分的小組，妇女部和經管互助工作的"人民秘書处"。

同时各职业性小組亦組成以全国，省和市委会为首的独立性系統。"人民秘書处"也組成独立性系統，以中央和省监护局为首。妇女部則直接隶屬于"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全国委員会"之下的妇女工作专署。

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的組織系統



"意大利基督教劳动者协会"受僧侶的监督和操縱。中央領导机构受耶穌会徒的监督，中級和下級組織則受主教和乡村教区教士們的监督。

1949 年时該协会拥有 92 个省委員会和 7,012 个乡村小教

区俱乐部。1953年时会員的数字不到15万，同一时期意大利总工会的会員超过300万人。

“天主教行动”另一个重要环节如在1948年建立的“公民委員会”，当时梵蒂冈为了进行大选前的斗爭，它通过在“天主教行动”組織內的耶穌会徒隆巴尔琪提出建立这种委員会的主意，使天主教会影响下的所有組織的政治活动彼此协調，包括各个教派和天主教民主党在內（在意大利有850种教会組織或直接从屬于教会的組織）。

1948年3月前，距大选前二个月时，意大利被“公民委員会”的蛛网所滿布，它們依靠着教会和亲教会的組織以及警察的支持，对进步陣营进行肆无忌憚的謾罵和誹謗，規模之大为意大利前所未見。

从此以后“公民委員会”积极参加所有的竞选运动，它对天主教民主党的影响与日俱增，与此同时，这个党在群众間的威望和影响却开始下降了。現在大家都承認，天主教民主党人沒有“公民委員会”的支持，它无法在大选时保牢自己的地位。

“公民委員会”究竟是怎样的組織呢？这是一个以“全国公民委員会”为首的中央集权組織，所有的“公民委員会”受它管轄。“公民委員会”的領导由上級指定。1954年时“全国公民委員会”中的領导人有紅衣主教庇雅察，耶穌会徒隆巴尔琪和“天主教行动”的代表杰达，他們代表着最反动的同美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教权派集团和梵蒂冈。“全国公民委員会”設有刊物局，“心理局”（計划进行宣传鼓动）和区监督員局。

“公民委員会”的低級机构为区监督局，它通过“区公民委員会”进行領导地方公民委員会（乡村小教区的）。地方公民委員会的义务为执行全国公民委員会的訓令，指示和命令。地方公民委員会由所有在該乡村小教区內活动的教会組織和世俗的教权派組織的代表組成。地方公民委員会的成員有：“天主教行动”乡村小教区常委会及其各組織的領导人，“意大利基督教劳

动者协会”乡村小教区俱乐部的主席，天主教童子軍組織的专員，“直接生产者”(地主富农的組織)地方分支的主席，各教派、宗教团体和兄弟会的代表，当地天主教民主党組織的代表等。

“公民委員会”担負着調查該地区工人的政治信念和他們对那一職工会表示同情，监視他們在工作地点的政治行动的責任，实質上就是担負进行监視工人及其組織的間諜的責任。

“全国公民委員会”在1951年时发出一件名为“地方公民委員会的組織和活动計划”的指令，責成所有的地方公民委員会搜集有关“各政党公开的或隐蔽的活动的情报，以及引起公众关心的地方和全国性問題方面的社会輿論”。指令責成地方公民委員会經常注意社会上流传的消息，监視报刊，并从因地位关系而掌握必要的情报和文件的人士处設法获得它們。①

1949年时，杰达和耶穌会徒通过公民委員会开始“为伟大的召喚进軍”，目的为将意大利共产党人“呼回”教会的怀抱中去；实际上是一次反对意大利共产党的进軍。

美国在罗馬和梵蒂岡的大使館为这次宣传运动撥付了大宗款項，杰达依靠了这笔錢組成了一个专門机构，它以“为伟大的召喚进軍”中央局为首，发行为宣传运动服务的报紙和杂志，并雇用了一支宣传鼓动者大軍。教权派虽然动員了“公民委員会”这一机构和大宗款項，但是結果他們完全白費心机。这次进軍为期二年半，可是杰达甚至无法夸耀說他已經“呼回”了一个人。結局是梵蒂岡在政治上极为难堪：成千万美元付与东流。“进軍”在1952年偷偷摸摸地結束了。

1952年的市政选举，1953年的議会选举和1956年的市政选举时，“公民委員会”和“天主教行动”这两个組織都动員起来支持教权派，与进步力量作斗争。从1956年市政选举前进行的竞选宣传活动中可以看出动員的程度，当时教权派召开了八万

---

① 湯迪："耶穌会徒"，第280—281頁。

次大会和各种会議，这些会議的主題都是与共产主义作斗爭。然而意大利教权派的势力終究是在削弱着，正如选举結果所表明的那样。任何对共产党人的誹謗与誣蔑，不能使劳动人民看不見这一事实，即教权派政府奉行的是为金融資本和地主利益服务的政策，政府的政策使人民的民主成果受到威胁。"这种危險并不是什么遙远的事——陶里亚蒂指出——它巳經开始以現实的、严重的、惊人的面貌出現。这就是：由于教权派当局以及强大的宗教团体或半宗教团体的干涉，現在巳經产生出一种要改变我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基础的危險。

此外，在組織国家的各种活动的政治方面，在工会活动方面，在社会保險、教育和提供就业机会方面，我們看到那些披着宗教的外衣被人利用来达到某些社会目的和政治目的的团体和权力，正在进行变本加厉的、日益普遍的、頑强和压迫性的干涉。

我們必須明确地公开地揭露这种危險。我們必須公开說明，如果这种現象繼續下去，意大利国家就会逐漸改变它的性質。事实上，我們的国家就不会再是一个各派政治势力可以活动的自由民主的国家，而只会是一个新式的教权派国家"①。

我們詳細地分析了意大利教权派的組織，是为了指出梵蒂岡是用怎样的政治蜘蛛网纏住了这个国家。教权派組織的这张蜘蛛网是反动力量进行統治的支柱。

現在簡要地叙說一下在某些資本主义国家中教权派运动的状况。

法国在十九世紀末期产生了德·梅伯爵領导的"社会"天主教运动，其目的为与工人阶級队伍中的社会主义影响斗爭。

法国的教权派們一致地敌視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他們使資产阶級确信，只有教会能够把他們从社会革命的危險中拯救出来。修道院院长康倫琪西尔在1892年时公开地制定教权派

① 陶里亚蒂："共产党为复兴意大利社会而斗爭"（"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6年2月3日）。

的綱領："誰能遏止革命战爭呢？……这甚至連宪兵也办不到，因为有人說得好，宪兵本身也需要受监视……不要迫害僧侣，不要使无神論变为国家的最高法律，还是給教会以权利吧，讓教会来塑造孩子們的心灵，彻夜不眠地坐在病院中将死病人的床边，接近工人，以宣传上帝恩宠的机会来安定他們的不滿情緒，于是就沒有必要开枪了。在上帝面前的恐惧——搀合着爱的恐惧——这就是精深奥义的始末……沒有一种力量能够抵抗住社会主义的强大攻势，沒有，除开天主教而外。"①

德·梅和他的同道者們建立了天主教"法国青年协会"，"基督教劳动联盟"以及其他組織。然而他們既在教权派中間并不得到特别成功，因为大多数教权派梦想君主政体和不願同资产阶級共和国和解，在劳动人民中間也得不到成功。德·梅不希望工人們从資本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他希望联合工人在教会的监督下与社会主义作斗爭。"在我們所写的一切文字中——其后德·梅承認道——你們首先找到的是同革命作斗爭的号召。"②

以馬尔克·桑尼为首的"基督教民主"的代表人物是从另一个立場对待工人阶級的，桑尼是"左翼"天主教組織"播种者"的奠基人。桑尼要求讓工人参加管理企业。"播种者"的領导人物反对反动份子和保守份子，他們試图和工人組織建立友好的关系。馬尔克·桑尼曾向俄国1905年的革命致敬。③然而"播种者"領导人物的进步方針不合梵蒂岡的脾胃。庇护十世在1910年时正式譴責"基督教民主"运动。桑尼解散了"播种者"。1911年时他和他的朋友們組織了"青年共和"社，繼續捍卫"播种者"的綱領，可是沒有得到特别的成功。教会阻挠他的活动，然而馬尔克·桑尼的組織一直存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为止。1936

① 康倫琪西尔："天主教的法国"，巴黎，1892年，第51—52頁。

② 庫洛汶："作为現代世界政治因素之一的天主教"，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第21頁。

③ 馬利奥·叶諾迪与法朗铵·郭甘尔："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基督教民主"，第26頁。

年时"青年共和"社参加了人民陣綫，而在法国被占領期間其擁护者們参加了抵抗运动。战后許多成員参加了天主教政党人民共和党，其余的人則团結在自由主义情緒的天主教杂志"趋向"，"双周"，"基督圣書周刊"和"灵魂月刊"的周围。（头两种杂志不久前被梵蒂岡禁止，已停止发行）。

梵蒂岡譴責"播种者"是为了博取法国資产阶級的欢心，梵蒂岡在政教分离以后（1904年）力图和法国資产阶級建立友好关系，虽然幷不成功。梵蒂岡另一这样的行动为譴責"法兰西行动"，法国教权派最反动的势力是麕集在这組織周围的。[①]"法兰西行动"与共和国进行斗爭，梵蒂岡对該組織抱否定态度应足以証明教廷垂青于資产阶級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教会和資产阶級更为接近，在战爭期間法国主教会一致支持資产阶級的帝国主义政策。战后法国政府和梵蒂岡之間重新建立外交关系。法国主教会开始热心地推广"天主教行动"型的組織，特别是天主教职工会，青年运动以及其他等等。当时成立了教权派的人民民主党，該党是代表法国資产阶級最右翼的立場的。党的喉舌为"震旦报"，人民共和党未来的首領皮杜尔即在該党工作。虽然作了一切努力，可是教权派陣营一直到希特勒击潰法国之前，在扩大自己的影响方面毫无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1939年时梵蒂岡取消了对"法兰西行动"的譴責，示意它贊同怀亲法西斯情緒的教权派們的路綫。叛国賊貝当成为他們的英雄，貝当使耶稣会合法化幷鼓励教会和教权派各組織的活动，"罗馬观察家"說他"把十字架归还給了法国"。

法国主教会支持貝当，然而大多数普通教士和青年共和派的成員及人民民主党的某些首領們积极地参加抵抗运动。大多数参加对希特勒占領軍进行斗爭的教权派們，他們不是力图革新法国的政治，而是力图阻挠进步力量取得政权。

---

① 梵蒂岡是在1914年时譴責"法兰西行动"的，然而这一决定保守秘密。

希特勒垮台以后，法国資产阶級，它的某些政党已破产了，支持在解放最初年代中玩弄社会改革辞句的教权派們(只說一点就足够了，即被选为人民共和党名誉主席的为曾經因"左傾"而被梵蒂岡譴責的馬尔克·桑尼)。这就是人民共和党在战后最初年代中成功的原因，然而这种成功是短暂的，因为人民共和党的領导者們在执政期間显示出自己是"冷战"和重新武装西德的信徒，对印度支那和法屬非洲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进行残酷的鎮压，使法国小学教育教权化。所有这一切使人民共和党成为阴謀反对法国人民和法兰西共和国的政党。这导至人民共和党勢力的削弱，导至教权派陣營发生深刻危机，以及促使教权派在1956年选举中慘敗。人民共和党这次选举中仅在阿尔薩斯、洛林两省和反动勢力的老窠布勒塔尼和华戴保住自己的席位。

人民共和党是法国垄断資产阶級的政治支柱之一。垄断資本所信托的人士参加了它的領导机构：莫里斯·舒曼(人民共和党1949至1953年間的主席)，他代表法国和美国大銀行的利益；罗伯尔·舒曼——他不止一次地当过外交部长和两次出任总理，为工业家温台尔家族亲信人士；安德烈·戴布雷——巴黎—荷兰銀行經理之一；讓·列多諾——摩洛哥的煤矿主，与紐約"中央汉諾威銀行"有联系；皮埃尔·歇汶埃——"米拉鮑"銀行的亲信人士，以及其他人。

法国天主教主教会积极地支持人民共和党，同时該党的領导机构与梵蒂岡，西德，意大意，比利时以及其他資本主义国家中的教权派政党有联系。許多在梵蒂岡勢力下的法国銀行都在經济上支持人民共和党，首先是"通用工商信貸銀行"①。

人民共和党的反动政策在教权派运动內部引起愈来愈大的不滿。由于对人民共和党支持西德軍国主义化表示憤慨，1954年时有一大批由被开除出人民共和党的議員安德烈·德尼領导

① "共产党人杂志"，№3，巴黎，1954年，第295頁。

的青年共和派成員脫离人民共和党。一位法国天主教灵修方面的領导者法朗索·莫里阿克，他脫离了人民共和党和支持梵蒂岡的反动报紙"費加罗"的編輯部。有声望的天主教杂志如"灵魂月刊"和"基督圣書周刊"也刊文批評人民共和党和梵蒂岡的政策。

梵蒂岡不仅支持人民共和党的反动領导集团，最近以来，它对布热德份子的法西斯运动也开始予以眷顧。庇护十二世在1956年7月隆重地接見了这些法西斯份子的首魁——皮埃尔·布热德，这除了是政治性示威而外，不能作别的解释。

"天主教行动"在法国的广泛性不及在意大利。法国"天主教行动"組織的主要目标为在工人和农民青年中扩展其势力。"法兰西天主教青年会"为法国"天主教行动"的主要基地，該会成立于1886年，成員有五个群众性組織(工人的，农民的，資产阶級青年的，大学生的和青年水手的)。"法兰西天主教青年会"的領导权在不久以前是属于"天主教青年工人"和"天主教青年农民"的。1956年时，由于"天主教青年工人"的領导机构拒絕屈从于"法兰西天主教青年会"的反动首領們，因而使該会发生分裂。1950年时成立了"工人天主教行动"一組織，参加該組織的有在群众性工人組織中工作的教权派积极份子。在"天主教行动"的下层組織中，要求和共产党人共同为和平与社会进步而斗爭的傾向是非常强烈的。

"天主教行动"在法国的另一个支柱为天主教的职工会——"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会員人数在1956年时在30万人左右。"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中有左翼，虽然不是始終一貫地，但他們贊成所有的劳动群众行动統一。

法国教权派运动的历史証明，虽然天主教会为了使自己在受到法国革命的打击后能恢复元气而作了一切試图，然而教会在这方面沒有获得任何眞正的成功。为了爭取广大群众的拥护而提出进步性綱領的教权派們，例如，桑尼，他們的这种試图受

到法国主教会和梵蒂冈无情的压迫，这只能促使法国天主教陣营內部的矛盾更为尖銳化。

在比利时天主教运动起始于十九世紀下半叶，它起着王国政权的支柱和防止社会主义的堤壩作用。这个国家的主教会比較早地开始建立天主教职工会（在1867年），然而教权派的主要力量在于它对农民群众的影响，由于社会主义者对农民問題沒有充份的估計，所以农民讓教权派操縱了。1890年时，教权派組織了"农民同盟"，它不仅包括地主和富农，連大部份中农和小农也参加了这組織。"农民同盟"的各种团体，如互助金金庫，合作社，銀行，保險公司，体育和歌咏团体等，网罗了农民生活从生迄死的各个方面。

教权派在工人中間就不能获得这样显赫的地位。1920年时，社会主义职工会的会員为71万8千人，而天主教职工会只不过拥有会員6万5千人。美国教权派历史学者馬廸在談到二十世紀初期比利时天主教职工会时写道，天主教职工会缺乏贏得劳动群众信任所必需的典型的工人精神。"天主教徒害怕社会主义者所宣传的阶級斗爭，他們不敢組織由工人們自己領导的純粹的工人組織。"① 資本家們領导着教权派的职工会。"天主教的社会組織缺乏具有积极性的，进步性和建設性的綱領——教权派份子馬迪証明道。——他們仅不过起着反对社会主义的防护工具的作用。他們主要关心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可是这不能算作是綱領……他們的首領热烈地捍卫宗教主义，对根本性的和迅速的經济改革畏縮不前。天主教政党中占优势地位的保守派們对社会党天主教徒看不順眼，甚至怀着敌意。他們准备和社会主义作斗爭，但不願意对于他們有利的社会条件作某种改变。"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害怕革命运动发展，教权派們改換

① 馬迪："比利时的天主教社会运动"（"教会与社会"，第304頁）。

② 同上。

了策略。他們把工人出身受过专門訓練的积极份子安置在教权派职工会的領导位置上，这些人开始提出各种蠱惑民心的要求。結果教权派得以大大地增加天主教职工会会員的数目。

除了"农民同盟"和教权派职工会以外，在比利时"天主教行动"的領导下，工人和农民青年的組織也积极地活动着("天主教青年工人"，"天主教青年农民")。

比利时教权派的天主教社会党早已变成为比利时資产阶級的一个反动的大政党。正如比利时自由党主席迪斯津耐所指出，"天主教社会党的队伍內有着所有各阶层的代表——从資本家以至工人和农民。然而这个党的特征在于参加該党最适合的是拥有巨額財产和爵位的人"。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比利时的教权派政府支持对侵略者的綏靖政策，和指望希特勒胜利。教权派政党非正式的領袖比王利奥普三世曾得到德国占領者的庇护。战后比利时的教权派們曾一度使利奥普三世复位，但并不成功。他們支持"冷战"政策，北大西洋同盟和其他侵略性軍事集团。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实，即比利时法西斯运动(基督国王主义)是教权派組織"基督国王"的成員所发起的。佛来米民族主义者(前綫党，1940年时改名为佛来米民族同盟)的亲法西斯运动也是在天主教会影响之下的。

比利时的天主教会是梵蒂岡在西欧的一个重要堡垒之一。比利时的天主教会为进行传教工作提供了大批的教士。在受梵蒂岡监督的比利时天主教最大的路汶大学中，設有为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而訓練传教士的专門学校，甚至还設有为苏联訓練传教士的专門学校！

荷兰的天主教徒占少数，在上世紀末时在荷兰成立了罗馬天主教国家党，該党至今还存在，已改名为天主教人民党。这是一个公开的反动政党，它支持荷兰資产阶級的帝国主义政策，特

① "新时代"，1956年7月19日。

别表現在对印度尼西亚方面。它和教会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它依靠着荷兰大部分天主教徒参加的地方性和全国性的各种教权派的联合会和协会。在荷兰天主教徒之中有不少眞誠的和平拥护者，和关心改善劳动人民境况的人士。但是教权派政党的領导是由好战的反动份子組成的。

德国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产生了教权派的政党——中央党。这个党代表着天主教領城內这些資产阶級和地主們的利益，他們以尊崇教权作为对抗社会主义的武器，作为遏止普魯士企图在全德意志事务中占执牛耳地位的这种野心的手段。俾斯麦期望在政治上击敗教权派，期望在反对扩张教权的声浪下使工人們离开同資本主义和君主政体的斗爭。

俾斯麦的期望沒有实現。他的"文化斗爭"运动仅仅燃起了教权派的狂热和促进他們的团結，工人們也沒有上反对扩张教权运动的圈套，他們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团結起来了。

俾斯麦为了巩固反动势力对抗社会民主党，最后和教权派取得和解。

1890年时，德国的教权派們建立了"人民协会"①群众性組織，它拥有自己的互助金金庫，銀行，养老院，啤酒店，运动团体等，受到魯尔大工业家的撥款支持和受警察与德皇的庇护。"人民协会"的主要任务为与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級的影响作斗爭。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二十五年期間中——梵蒂岡历史学者阿芙乐·曼汉頓指出——如果把和別洛夫宰相发生冲突的短短时期不算在內，在德意志帝国議会中有着最强大的議会党团的天主教政党，是从高根洛哀起直到別特曼—霍尔威格止所有帝国总理的最有势力的同盟者，也是支持德意志帝国主义主要力量之一。"②

中央党欢迎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支持布列斯特和

① 全名为"德国天主教人民协会"。

② 阿芙乐·曼汉頓："梵蒂岡"，莫斯科，1948年，第151頁。

約。当德皇威廉的德国垮台的时候，德国資产阶級由于害怕工人阶級得到胜利，因之将自己的前途付托于中央党。資产阶級的打算沒有落空。中央党的"左翼"首領們（例如爱尔茨貝尔格以及其它人）签訂了凡尔賽和約，然后偕同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首領們作出一切可能，以妨碍工人阶級得到胜利。当他們达到这目的后，中央党"左翼"的首領們即讓位給右翼份子——高級教士路德維格·卡斯，勃柳宁和馮·巴本，后者最后为希特勒执政开辟了道路。1933年时，中央党的議員——其中許多人为現今西德总理阿登納的同伙，例如雅柯波·凱撒，亨利·福凱尔，亨利·克房伯，叶琳娜·維佩尔等——投票贊成希特勒掌有非常的权力。卡斯当时在議会中是这样地为教权派支持希特勒的决定辯白的："德国中央党总是力求民族团結。当在这一个历史緊要时刻，当应該忘記所有次要政治糾紛的时刻，中央党意識到自己在人民前的責任，不管所有党及政治上的任何其它的信念，它拥护团結（同希特勒团結——作者）。总理先生（即希特勒——作者）对国家生活中重要問題以及对法律和文化方面重要問題所作的切实保証，允許我們——关于这一点我公开地和极为欣慰地声明——能对因在这里討論这个法律而产生的情感予以公正的評价。由于注意到总理的保証将作为政府将来立法活动的基础，德国中央党同意投贊成通过非常权力的法律。"①

当时任科倫付市长一职的阿登納也站在同样的立場上。阿登納領导的科倫市政厅的中央党党团，在1933年3月30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中說：

"我們在任何情势下不应妨碍总理先生引导走上执政地位

① 阿历山大·洛茄尔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天主教"，华沙，1952年，第42—43頁。

甚至于当卡斯脫离德国政治舞台，定居于梵蒂岡以后，他还繼續在称赞"元首"。"希特勒懂得如何駕馭国家"——卡斯在1933年年底在罗馬对記者說（同上，341—342頁）。

的政府，这个政府是在胜利的国民革命过程中組成的。这种反抗可能会引起严重的和无法預測的后果。由于考慮到已經形成的局势，应該为这个政府建立起它能够依靠的尽可能广泛的基础。

我們欢迎消灭共产主义和鎮压馬克思主义，现在这一行动規模之大是战后所有期間內无法办到的。从1918年起，社会主义思想滲入德国人民意識中这一事实，妨碍我們至今不能着手建立一个符合我們观点的国家，因为天主教少数派的能力只能防止社会主义最有危險性的影响。"①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仇恨，以及对德国劳动人民的敌視，这种情緒在中央党的領导集团中高于其他一切的考虑。这就是为什么希特勒份子对于中央党的右翼領导者而言，是他們理想的同盟者的原因。

1933年7月5日，中央党的領导机构为了不妨碍希特勒份子起見，解散了自己的党。中央党的領导机构在解散該党的宣言中声称："前中央党的成員，不管是誰，滿怀着为建設新国家和建立起新的国民共体而貢献出一份力量的眞誠願望"。就是这样，正如德国历史学者奥托·溫朵尔所指出："在自动解散的时候，这个党公开地表示和希特勒团結。现在中央党已改称为基督教民主党，它是波恩政府联盟中的主要政党。当时天主教中央的右翼份子和重工业大資本家們联合在一起，聚集在巴本、克洛克納、費尔德門格斯等人的周围，和希特勒共同奋斗。于是为他們带来巨額利潤的軍备竞賽就开始了。"②

德国天主教会当局也和重工业大資本家們，銀行以及垄断資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敌視进步的工人运动，为了巩固希特勒的血腥独裁制度干出了一切可能干的事。德国的主教会在1933

① 奥托·溫朵尔："十二年为反对法西斯和战爭而斗爭"，莫斯科，1956年，第35—36頁。

② 同上，第47頁。

年为降灵节而写給信徒的文告中說:“我們天主教徒是易于对在德意志国家中坚定地出現的新政权予以正确評价的，我們准备服从这个政权。这种准备不仅是人的天生美德,但也是上帝的訓諭。因为我們在任何一个人間的权力中,都能看出上帝天国的反映和看出它是依附于上帝永恒的权力的……我們天主教徒对新的国家政权为了保护我国人民的自由而追求的目的，也表示拥护。”①

梵蒂岡对希特勒表示友好,如同对墨索里尼一样。1933年时,庇护十一世和希特勒締結了宗教条約,这个条約被世界輿論解释成为梵蒂岡和納粹的同盟条約。前梵蒂岡国务院工作人員,因反对梵蒂岡和法西斯合作而辞职的教士埃涅斯脫·鮑納犹蒂指出,在签訂宗教条約之后“教皇厅正式承認这个按其实質是一种偶象崇拜的制度,并为它祝福。无怪乎‘人民观察者’要急于把宗教条約的签訂,解释成教皇无疑地已承認納粹制度,而教皇厅派外交使节駐柏林是贊同德国政治的发展”。② 正如奧托·溫采尔正确地强調的那样:“納粹党人在签訂宗教条約之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試图消除德国天主教广大劳动群众的不信任,和摧毁他們的反抗。”③

宗教条約第三十一条对希特勒最为有利,这条规定准許所有教权派的組織和納粹的組織合并（統一）。

教权派的領袖們以馮·巴本为代表和其它等人帮助希特勒重整軍备,积极参加对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活动,而教会当局在同一时期則作出一切可能,帮助納粹党人扼杀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我們只要引“现代宗教問題手册”为例就足够了,該手册初版在1937年,1940年毫无修改地再版,两次都是得到天主教主教会的贊同和許可的。“手册”毫不掩飾地为納粹兽

① 奧托·溫采尔:“十二年为反对法西斯和战爭而斗爭”,第48頁。

② 埃涅斯脫·鮑納犹蒂:“庇护十二世”,罗馬,1946年,第126—127頁。

③ 奧托,溫采尔:“十二年为反对法西斯和战爭而斗爭”,第48頁。

性的思想体系辯护。"在对于我国人民决定性的时刻——'手册'的作者弗里堡大主教康拉脫·格累貝尔写道——教会的領导者們特別忠誠地肩并肩地和国家活动家站在一起(即和希特勒及其党羽——作者),准备对共同的敌人予以反击。他們在为基督教,为我国人民对上帝眞正的信仰而斗爭的时候,以自己的力量巩固了元首在我們祖国筑成的反对布尔什維克主义有效的障碍物"。① "手册"中全部文章是以这种对納粹主义表示忠心耿耿的笔調写的。

战爭时期中,僧侶和教权派們在希特勒还有获得胜利的可能时,一直支持他。当他們明白納粹德国一定要战败,他們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一样,企图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中。他們参加将軍們的密謀,希望建立一个为西方强国所接受的反动的"反布尔什維克"独裁政体,他們和西方强国的談判是通过梵蒂岡,通过战爭时期內住在瑞士的美国諜报机构在欧洲的領导人亚倫·杜勒斯进行的。

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巴伐利亚州为基督社会联盟),是战后西德資产阶級主要的政党。阿登納領导着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周圍,聚集着中央党和一系列德国其他資产阶級政党的残兵敗将。这个政党最初試图取得厌倦战爭和对法西斯失望的群众的支持,所以曾提出民主性的綱領。例如阿登納在1947年1月1日对德国人民发表演說,他肯定地說:"我們同意我們的国家完全解除武裝,同意消灭我国的軍事工业,并且同意在条約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規定对我們进行广泛的监督。我将說得更多一些:我确信德国人民的大多数将会同意我国在符合国际公法的原則下仿照瑞士的榜样恪守中立。"②

这种保証应該使社会輿論有利于教权派。然而阿登納和他

① "今日的宗教問題手册",大主教康拉脫·格累貝尔博士編。德国主教会推荐讀物,夫顆堡,1940年,第36頁。

② "灵魂月刊",巴黎,1955年5月,第807頁。

的朋友們的复仇主义政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參加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約，推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所有这一切都証明战后最初年代中阿登納的演說是如何地虛伪。阿登納不仅禁止德国共产党，还迫害那些由于过去悲痛教訓，因而反对軍国主义化和拥护东西方取得和解的天主教徒。民主主义天主教徒的机关"終結和开始"，建立于1946年，被西德当局所查封。只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內，进步的信徒团結在基督教民主联盟之中，他們和所有的民主力量手携手地为在民主基础上統一德国而斗争。

西德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是大資本家的政党。該党在联邦議院中的党团之中的三分之二为垄断資本家，工业家和容克貴族[①]。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領导人物之一为西德著名銀行家費尔德門格斯。他在經济上資助基督教民主联盟。1953年大选时，他为基督教民主联盟张罗了1亿5千万馬克以上的选举經費。費尔德門格斯是联邦議院的議員和阿登納的亲信顧問，阿登納有一天說过："我們的党把費尔德門格斯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②]費尔德門格斯为現代"基督教民主"的典型代表，他拥有西德最大的科倫銀行，是22个康采恩和公司监事会的监事，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联合鋼鉄公司"，蒂森，克洛克納和其他曾經資助过希特勒的康采恩。

西德沒有如同"天主教行动"型的群众性組織。天主教会在西德服从教权派政党的統治集团，不打算在政治舞台上充当独立的角色。

必須指出，基督教民主联盟不仅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也受到新教的支持。根据1956年的資料，基督教民主联盟中央委員会40个委員中有16个是新教的积极活动者，其中包括联邦議院議长格斯登美尔，基督教民主联盟議院党团付主席希林，希林

① 庫尔脫·普里兹庫拉："教会的权貴們"，慕尼黑，1955年，第298頁。

② 彼得·席克巴哈："波恩民主幕后"，柏林，1954年，第58頁。

为西德和其他一些国家新教中央机构的顧問。同年份联邦政党11个教权派部长之中有4个是新教徒。①

从这些事实可以明白，为什么西德天主教会对发展"天主教行动"型的組織不关心，因为它恐怕对天主教会的政治野心抱不信任态度的新教份子退出基督教民主联盟。

西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几年中，沒有成立独立的基督教职工会。教权派的职工会积极份子参加了由社会民主党人領导的統一的工会联合会。教权派在該組織中为右翼。他們以分裂作为威胁，在对他們有利的方面对工会联合社会民主党的領导施展压力。这种情况一直維持到1955年，当阿登納的軍国主义政策遭到了工会联合会方面反击的时候。教权派当时示威性地退出了該組織，組成了分裂派的基督教职工会中心，其第一届大会是在1956年7月在埃森举行的。

教权派运动在奥地利的发展途径与在德国稍有不同。奥地利的天主教会尚在十八世紀末期时已是君主政体順从的工具。隨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为了同它們作斗爭，在1887年产生了教权派政党，該党的社会基础是城市小資产阶級、地主和富农。奥地利的教权派們以反犹太主义見著，他們在这方面比希特勒先行了数十年。他們为了反对社会主义者，曾进行了无耻的宣传运动，在各方面支持奥匈帝国主义。

1918年共和国建立以后，教权派成为資产阶級反动派的主要支柱。1934年时，教权派首領陶尔斐斯，舒什尼格，許塔林貝尔格和高級教士柴毕尔建立了教权派法西斯专政，以血腥的恐怖手段鎮压工人反抗。正如前舒什尼格政府社会保障部长約瑟夫·道勃立斯別尔格所承認的那样"政治上的天主教有意識地破坏了奥地利的民主"②。不过，奥地利教权派的首領也不否認

① "改造"，巴黎，1956年6月23日。

② 約瑟夫·道勃立斯別尔格："岐路上的天主教社会政策"，格拉茲，1947年，第480頁。

这一点。例如，舒什尼格和他的同伙朵諾都(前教权派法西斯組織“爱国陣綫”的执行秘書和舒什尼格內閣中的部长)，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驕傲地記述他們是如何扼杀奥地利的民主的。

“应該平靜地一頁又一頁地讀完这些書，以便了解它們的作者是如何厚顏无耻地公开地夸耀自己的极权政体的，这种政体似乎‘站在民主政体和法西斯政体的中間’；以便了解他們如何詭辯地企图援引基督传統和教皇的通諭为自己的計划辯解。”①天主教徒亚历山大說的真是一針見血。毫无疑問，教权派战前的政策为希特勒侵占奥地利开辟了道路，同时促使奥地利参加了貽禍至今的战爭，这种政策在現在受到許多天主教徒的譴責。

1955年时，由天主教政党活动家領导的奥地利政府宣布奥地利遵守中立，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它証明部份奥地利天主教徒的路綫有着根本性的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梵蒂岡在拉丁美洲积极地开展政治活动。今日在所有的拉丁美洲共和国中，都有“天主教行动”的組織，这些組織联合成为“天主教社会行动泛美协会”，会址設在华盛頓。在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秘魯、巴西、委內瑞拉和墨西哥，都有教权派的“基督教社会党”在活动着。在哥倫比亚，厄瓜多尔和智利諸国，保守党受到教会的支持，这些党反过来也予教会以最大的支持。哥倫比亚，委內瑞拉，多米尼加和中美的反动独裁者夸耀自己和梵蒂岡的关系，并依靠教权派份子和天主教会的群众性組織。

美国政府和美国天主教主教会与拉丁美洲的教权派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1955年时，美国付总統尼克松在危地馬拉对当地的大主教馬利安·洛賽尔說“天主教会是全世界各处共产主义最强大的障碍之一”，——梵蒂岡的杂志“天主教文明”是乐意

① 爱尔加·亚历山大：“德国的教会和社会”(“教会与社会”，紐約，1953年，第485頁)。

登載这番話的。①馬利安·洛賽尔曾反对阿本斯民主政府和协助阿馬斯上校攫取政权。

数以千計的美国传教士們在拉丁美洲經常工作。在巴拿馬，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海地，梵蒂岡的圣使是由美国天主教教会的代表担任的。斯毕尔曼經常在拉丁美洲各国作視察旅行。随着美国主教会对拉丁美洲天主教会影响的增长，后者愈来愈甚地服从于美国統治阶級的利益。

对西欧和美洲某些国家的教权派政治运动的簡要分析指出，这一运动在战后年代中，首先为与美国金融資本有密切关系的資产阶級集团的利益服务。依靠着梵蒂岡領导的“天主教行动”和其他群众性組織，依靠着教会和教会僧侶阶层，以及在美国独占資本的支持下，教权派在許多国家領导着和进步力量作斗爭的最反动的集团。

梵蒂岡的政治路綫，教权派政党和教权派群众組織的活动，揭露了天主教会的眞面目，它是資本主义秩序的支持者之一，是众所周知的企图攫取世界霸权的美国統治集团的同盟者。因此就要来研究一下天主教陣营在美国的发展过程及其現状。

① “天主教文明”，罗馬，1956年2月18日，第3頁。

第六章

美国的天主教

在去認識美国天主教会的活动的时候，应注意到教会当局对美国有势力集团侵略性外交路綫的支持。尙在1946年时，美国教会活动家乔治·海特莱在“教会和有組織的运动”文集中写道：“今日美国和欧洲的天主教宣传机关願意接受那些堅持說和俄国发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和受那些因此希望立即发动战争的人的吩咐。”① 六年以后，美国教会評論家布兰却，他显然不是对苏联抱好感的，指出“虽然教皇呼吁和平的辞句是很动听的，然而天主教在同苏联和共产党中国战争問題上流传极广的观点，比起任何一个社会团体的观点还要富有侵略性。在美国这种观点已近于歇斯底里。它毫不掩飾地鼓吹发动神圣战争，充滿着宗教十字軍所特有的夸张情緒”②。乔治·舒斯脫在“美国的天主教”（紐約，1954年）一書的序言中写道，許多美国天主教徒只要听得共产党人說一个“贊成”，便条件反射地說“反对”。这种情况不止一次，天主教活动家們所以要反对职工会、种族平等和消灭人口擁腫城市中的貧民窟，只是因为共产党人贊成的

① 乔治·海特莱：“反鴉片同盟”（載“教会和有組織的运动”，第二卷，紐約，1946年，第74—75頁）。

② 保罗·布兰却：“共产主义、民主和天主教的权力”，倫敦，1952年，第298—299頁。

缘故①。

庇护十二世的朋友，紐約大主教，紅衣主教斯毕尔曼是美国天主教会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他是“实力政策”的拥护者。只須提起他在1954年在巴黎的演說就可以了，他号召法国人“結束犹豫不决的态度”，加强在印度支那的軍事行动。法国“战斗报”当时是这样評論美国紅衣主教的演說的：“斯毕尔曼为奠边府提供了思想上的掩蔽所……法国人将永远不会忘記，当他們的历史处于最危急的时刻，有一个披着紅衣主教袈裟的外国人来向他們发表演說，而这些話是他們不习惯从一个奉侍神的人那里听到的。”② 1956年初，斯毕尔曼訪問了西德，在那里他发表演說，号召德国人和“共产主义”作斗爭。

民主陣营内批判梵蒂岡的人士指出，天主教会以自己最有权威的人物为首，和垄断資本集团共同执行侵略政策。这些批評者們这样地說，是以众所周知的事实为根据的。共产党人認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可以和平共处，他們贊成全世界和平，拥护“日内瓦精神”，反对“冷战”。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再一次向全世界肯定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所以共产党人以及一切眞誠希望和平的人們不能对这种現象置之不理，即对国际反动集团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宗教，以及对天主教会——特別是美国的主教会——的某些代表人物和上述集团的合作現象置之不理。

美国的教会虽然在形式上和国家分离，然而教会所有的做法都和国家合作，以保卫資本主义秩序。天主教历史学者弗兰西斯·唐宁承認，从国家方面来說，它对待宗教和僧侣如同对待政权的輔助机构一样③。

---

① “时代”周刊，紐約，1954年5月17日。

② “新时代”，第22期，1954年5月29日，第17頁。

③ 法兰西斯·唐宁：“天主教对美国工人运动的貢献”（“教会和社会”，周廸主編，紐約，1953年，第849頁）。

美国的教会为統治阶級焚香祝祷，統治阶級的代表們則公开地起誓，表示忠誠于宗教。

美国的資本主义在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內，在上世紀期間，推向西部，与之伴随着的是几乎把土著消灭光、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以及对美国劳动者残酷的剝削。为資产阶級效劳的美国历史学者們則靦腆地称这个时期为“命运中不可避免的”，为“全能的上帝的意旨”。根据这一“理論”，洛克菲勒，梅隆，福特和其他金融資本的代表人物也根据上帝的命令而来到了这个世界。美国的百万巨富們不但在剝削劳动人民事业上大有成績，并且在“虔信”的領域中，他們的事业也不坏：他們修建了各种教派的教堂，宣諭道德訓誡，規劝人民要順从和信仰全能的上帝，他們希冀使人民相信，資本家們所以有他們今日的地位和財富应該感謝上帝。美国的某些国家活动家的言行正与之相同。麦金萊总統（美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他的命令而侵占菲律宾的）曾經說过，在采取侵菲这一步驟之前，他曾不止一次地“跪下祷告，祈求全能的上帝”为他指引道路。于是如同麦金萊所說的那样，真的产生了“奇迹”：根据“上帝的启示”他突然明白了，“对于我們来說（即对于美国資产阶級——作者），正应該占有所有菲律宾島屿，教导和提高它，并使它文明化，給他們灌輸基督理想，因为他們也是我們的人类弟兄，耶穌基督也为他們而死的”。根据“上帝的启示”西奥多·罗斯福“占有了”巴拿馬，威尔逊企图“占有”墨西哥和西伯利亚，而柯里士和胡佛向拉丁美洲派遣了武裝干涉部队。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宗教領域中亦甚为活跃。

杜勒斯是一个长老会派牧师的兒子，大垄断資本和托辣斯的律师，他在共和党的領导机关中占着重要的位置。金融—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的結合是杜勒斯的特色。杜勒斯是新教世界运动的倡議者之一，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将所有的基督教会联合成为一个全世界性的教会。杜勒斯是屬于新教活动家中对天主

教明显示弱的蜕变份子之群的。1955 年时，他的兒子之一爱弗莱·杜勒斯改信天主教和加入了耶稣会。在爱弗莱·杜勒斯被接受入天主教的典礼上，老杜勒斯曾发表演說，他声称“我因幸福而十分激动，因为我的兒子信奉了天主教。”①

每逢星期日杜勒斯在华盛頓保守的长老会派教堂作布道演說，这些演說其后由美国国务院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官方文件印发。

在杜勒斯发表的这种布道演說之一，1953 年 10 月 1 日以“我們祖先的信仰”为題的演說中，他发展着一个論据，即資本主义文明如果沒有对上帝的信仰来巩固它，将不能生存。布道者杜勒斯使他的由銀行家，工厂主和大公司的律师組成的听道者們确信：“我們是理想主义者，我們有着道德原則，而我們的反对者共产党人是唯物論者，他們否定道德規則”。“美国政府——杜勒斯随后宣称——所信仰的首先不是物質財富，而是精神財富……我們的反对者們最大的弱点在于他們是坚信不渝的唯物論者。”② 大家知道，杜勒斯及其听众們的反对者是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是正在建設着社会主义或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斗爭着的各族人民。很明显，杜勒斯因为人民希望自由地生活和如人地生活，而称他們为“坚信不渝的唯物論者”，而称自己和自己的拥有巨額資金的朋友們为理想主义者，献身于道德者。难道这不是顚倒黑白嗎？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一届內閣中有十个百万富翁和一个水道工人——职工会首領托平。內閣閣員們（其中包括“理想主义者”杜勒斯）和 86 家大公司有着正式联系，这些公司的資产超过 200 亿美元。美国大公司在 1954 年时的純利为 178 亿美元。有代表在政府中担任职务的各大公司和壟断資本，其利潤特别巨

① “改造”，巴黎，1956 年 7 月 14 日。

②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我們祖先的信仰”，美国国务院，华盛頓，1954 年，第 5、9 頁。

大。通用汽車公司的純利在1955年時打破紀录数字，达10亿美元，該公司的前任經理威尔逊曾任国防部长①。在美国百分之一的人拥有全部国家財富的59%，而87%的人却只分得全部国家財富的8%②。

这就是美国的实况，在美国，政权掌握在信仰"精神財富"的百万巨富——"理想主义者"的手中。在劳动者—"唯物論者"領导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各国中，所有的国家財富归屬于劳动人民。这些国家中沒有資本家，沒有人剝削人的現象。是的，共产党人是否定資本主义"道德"規則的。他們的理想符合人类絕对多数的利益，可是資本主义制度捍卫者的理想，不論他們如何向上帝祷告，只符合一小撮剝削者的利益。

这一情况是值得注意的，即在反对各族人民利益的侵略政策問題方面，資本主义集团中的代表人物，不論是信奉新教的，其代表人物之一为杜勒斯，或是信奉天主教的，他們的观点是一致的。

1955年4月間，杜勒斯在华盛頓举行的耶稣会各高等学院的校友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說。他演說的主旨在为战争不可避免这一論調辯护。他声称，和平有利于共产党人，所以他排除各族人民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在某种条件下时""精神財富"的捍卫者杜勒斯断言，"和平可能导至人类的衰退和使人們的精神堕落到这般程度，即消灭了作道德上和理智上判断的能力"。这位布道者对这一点認为还是避而不談的好，即持久和平的确立，会使靠軍备竞赛发財的美国垄断資本家的巨大利潤减少。

1956年2月公布的英美两国政府首脑的共同宣言是同样地伪善，这一宣言的本文象教皇的通諭，而不象出諸于現代国家

---

① 索林："近年来美国施行的經济措施为美国垄断資本带来了什么？"（"經济問題"，1956年第1期，第85頁）。

② 契波拉柯夫："現代資本主义的某些問題"（"共产党人"，1956年第1期，第106頁）。

活动家之手的文件。这一宣言甚至連美国資产阶級报紙“每日新聞”也評之为“外交上伪善的典范”，宣言是以下列夸大其辞的声明为开端的：“我們意識到，在过去的1956年間，在認为人是上帝所創造的和人的命运是由上帝安排的人們，与認为人只是生来为国家机器服务的人們之間的由来已久的斗爭，仍旧汹湧未平”。类似这种的論据是用来为“冷战”政策辯护的，和“提高”北大西洋同盟主要伙伴們的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質。难道为自由而斗爭着的塞浦路斯島上的爱国者們是沒有信仰的？难道起而反对巴格达条約的約旦人民，和捍卫自己独立的埃及人民都是沒有信仰的？同时，被剝夺了自由的危地馬拉的人民，譴責“冷战”的印度人民以及为和平而斗爭着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劳动人民，难道他們都認为“人应該作为国家机器的工具嗎？”为了了解英美两国国家活动家将全世界分成为有信仰者和无信仰者的企图仅不过是一张幕，用以遮盖住主要帝国主义强国所奉行的政策的利己主义性質，只要提出上述問題就足够了。这种理論的毫无根据仅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清楚，即根据美国官方統計，48%的美国人民不屬于任何教会①，或至少是对宗教表示冷淡的。在美国虽然宣称信仰自由，不信任何宗教的人在权利方面却受到限制。例如在阿肯色、馬里兰、密士失必、得克薩斯各州，法律禁止选举不信有上帝存在的人担任公职。在某些其他州中，这类人不准作証人和陪审員。然而48%的美国人宁願不領受因隶屬于某一教会而得享受的好处。按照杜勒斯的說法，难道他們希望做“国家机器的奴隶”嗎？

上面提到的共同宣言企图使人相信，即按照共产党人的意見，人似乎生来为国家机器服务的，虽然大家知道，共产党人恰巧抱着与之相反的观点。共产党人認为，国家机器（政府，法庭，警察，軍队）应該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保护他們。难道苏联

① 赫伯脫·舒納特："二十世紀美国的宗教"，劍桥，1952年，第92頁。

和社会主义陣营其他各国的国家机器保护着資本家的利益嗎？难道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为了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質福利和刷新他們的精神面貌，沒有作可能作的一切嗎？又难道資本主义各国的国家机器沒有把“小人物”——工人和佃农——压个粉碎？

在资产阶級国家之中，国家机器是作为与劳动人民对立的敌对力量的，而且常常借口說这是天意来作辯护。难道美国的安全法律，国会和其他迫害异端份子的法庭不是在追求着这一目的嗎？这些法庭的导演們要使人相信，他們“猎逐巫女的行动”是得到上蒼支持的。法国多米尼加会徒布吕克伯尔格尔在1950年訪問美国后談到，有一个著名的美国法官說，他每次判决共产党人服苦役后，上帝都来訪問他，对他表示感謝。甚至于連老于世故的布吕克伯尔格尔也无法掩盖他对这种假仁假义透頂的行为嫌恶的心情①。

在美国資本和教会的联系是如此地多样化和牢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如此肆无忌憚地利用宗教，这在任何其他国家中都不能与之相比。这一情况同时也說明了現代美国和梵蒂岡間关系的性質。

讓我們来看一些事实。首先援引象里斯东·朴伯的“工厂主与布道者”这样一本无偏見的研究著作中的資料，这本書于1942年在美国出版。朴伯当时在耶魯大学神学院担任社会倫理学講师。根据他的某些論点来判断，他是共产主义的反对者，换句話說——是个“毫无可疑之点”的人。

朴伯专事研究美国的資本和宗教間的关系，他以哈斯康尼的历史为例，該地是北卡罗来納州的紡織工业中心，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初已出現最初的紡織工厂。几乎全部工厂主和工厂的創办人，自1870年起至1900年为止这一时期內，93个工厂主中有91个是各种宗教团体的积极会員。最初的紡織厂老板們使

① 布吕克伯尔格尔：“金字塔式的美国”，巴黎，1952年，第189頁。

人相信，工厂事业对于他們而言与其說是个人致富的途径，毋宁說是提高自己受苦的"弟兄們"福利的源泉。工厂主們将工厂事业視作为"上帝的事业"，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們迫使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或者更多一些。所有这一切使某些研究者有口实硬說，哈斯康尼工业的产生具有宗教上共立勳业的性質。

然而事实駁斥了上世紀七十年代工业家們，和他們現代的頌揚者們的伪善的高談闊論。"虽然有着对他們工业家們而发的許多頌贊詞，把他們描繪成基督的慈善家——朴伯指出——然而在分析他們的工业活动以后，关于他們无私的評价被迫作根本性的改变。工业家們在自己的企业中广泛采用童工，他們在社会輿論严厉地譴責这种作法以后，还繼續使用童工。他們常常付出极低的工資，如每日工資仅为1毛錢，他們为这种低工資和自己收入之間的高低悬殊而辯护道，工人們的这一工資和他們原先在农业中工作时所得的工資相比，已經高了"①。朴伯得出結論說："显然可以这样說，获得利潤的願望在工业家的活动中起着主要作用。至于論到宗教，則不过是一张假面具，自始就为工厂主的經济利益服务的，不管他們是有意識地为此目的而利用宗教，还是无意識的"②。

宗教在客观上帮助工厂主致富。究竟通过何种方式呢？朴伯解释道：僧侶們不发表談話反对或譴責工厂主采取的剝削工人的方法，——僧侶們頌揚工厂主的活动；教士們和工厂主不但在精神上共通，并且在物質利益上也休戚相关，因为僧侶們拥有紡織公司的股票，常常拋掉袈裟而直接到工厂主那里去工作。

僧侶們使自己信徒的注意力集中在要求頒行"禁酒法規"上面——要求禁止出售含有酒精的飲料。朴伯認为，僧侶們要求頒行"禁酒法規"的宣传有利于工业主，因为教士把工人們一切的不幸——貧困，职业病等——都归結为工人們嗜酒，而不是由

① 里斯东·朴伯："工厂主和布道者"，紐約—倫敦，1942年，第18頁。

② 同上，第20頁。

于資本主义的剝削所致。"要求頒行'禁酒法規'的斗争使工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問題上，使这問題成为社会的中心問題，因为人們对'禁酒法規'发生兴趣，因之几乎所有其他形式的社会活动都在暗中被抽掉了。"① 这种宣传在今日仍然是南方各州僧侣們的中心工作，用以把劳动者誘离反对剝削者的斗爭。

"教会对工厂主无疑的忠心"朴伯繼續写到，"对于教会的內部生活和寺院的修建有着重大影响。紡織工业的先驅者(工厂主)，其大多数在自己的居住区中出錢出力，帮助宗教組織发展成长，他們常常是設立主日学校和牧师协会的倡議者，聘請布道师和建筑教会。"②

工厂主予教会团体和教士个人以金錢。教士們恐怕自己收入的来源被揭露，特別在人們指責他們是"工厂主出錢雇用的代理人"以后③。工厂主通过邮局将支票汇給教士，或者在工厂的办公室中亲手交給他們。作者引用了各种証据和数字証据，以此为根据作出了下列結論，即工厂主付給教士們的錢等于他們平均津薪的20%④。

在許多情形下，教会的房屋和土地是属于工厂主的。工厂主們領导着乡鎮小教区的牧师会，或者在其中占着重要的职位(通常为司庫)。朴伯援引一位名为斯考羅尔特的教士的声明，这位教士是1929年罢工风潮席卷茄斯东尼亚时少数站在工人方面的教士之一，他在声明中說道"毫无疑問，教会是工厂主的財产和受他們控制的"，而僧侣們則演着"为工业显貴服务的道德警察"的角色⑤。

1929年茄斯东尼亚市的紡織工人总罢工期間，教会的阶級

---

① 里斯东·朴伯："工厂主和布道者"，1942年，第36—37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40、151—152頁。

④ 同上，第149頁。

⑤ 同上，第283頁。

性質表現得特别明显，在当时政府按照工厂主的要求枪杀工人，把最积极的罢工工人投入监獄。朴伯指出，几乎全部当地的僧侣(一百个以上的教士)，除去两三个教士是例外，都站在工厂主和当局的一边。作者写道，僧侣們的意見由一个教士代为表达了，这个教士要求“把罢工的組織者推倒瀝青中，四周倒上鵝毛，然后投入最近的湖泊中去”①。罢工被鎮压下去以后，工厂主們确定每月和僧侶們开一次会，会上討論与工人运动作共同斗爭的方法。教士每参加一次这种会議可得5块美金。

罢工被鎮压后，业主們开始只雇用持有教士介紹信的工人来工作。这种介紹信与政治上可靠的証明文件毫无二致，教士們在出具上述介紹信的同时，从而起了有利于工厂主的警察功能。

作者在結尾作出了下列結論：“教士不仅允許利用教規的力量与反对現存經济制度的人作斗爭，并且在上述路綫方面本身也参加利用这一力量。僧侶在改变經济生活方面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教士們到处絕对地和坚決地贊揚現存的經济制度，这根据他們的言行就可以判断出来。”②

朴伯在关于茄斯东尼亚工业区丰富的事实資料的基础上提出的問題，是与整个美国有关連的。在茄斯东尼亚和紐約，在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在芝加哥和华盛頓，資本家和神父們大致是这样議論着：“宗教是牛油。我們在潤滑生活机器的时候愈是用得多，那么零件的摩擦愈少，机匠的活兒愈輕松”。高尔基作品中美国的“国王—共和主义者”就是这般地議論的。柯里士总統当时也曾这般地議論过，他說“如果在人民中間沒有服从法律的坚定准备——这种准备是宗教的虔敬所教导的，那么警察欲将秩序导入生活中的全部艺术都是徒然无效的”；杜勒斯今日也是这样地議論着，他在所著的“战争或和平”一書中断言：“当人民变成物質財富的奴隶时，不幸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① 里斯东·朴伯：“工厂主和布道者”，第283頁。

② 同上，第330頁。

"宗教是牛油"——这一观点被美国資产阶級理論家和教会理論家用各种不同的調子重复地唱着。美国科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学院1922年出版的"工业关系与教会"論文集中，資本家卡兰亨(路易斯威尔油漆公司的經理)指出，教会对資本家与工人間关系的干涉，"能够阻止鐘摆摆动到最边緣处去，以及不讓如同俄国今日那样的情况出現，在这种情况之下从前的特权阶級将被推翻和消灭"。卡兰亨随后教导說，只有教会能够扑灭劳动群众反对資本主义奴役的抗議。"无論街头防寨，无論枪弹——他写道——都不能抵抗汹湧的群众……"。按照他的話，只有教会才能做到①。

美国科学院政治与社会科学学院在1948年出版的同样題目的另一文集中，即在出版我們上面援引过的論文集的26年后，我們已經熟悉的观点用新的調子重复地弹着：宗教是牛油，資本主义社会这部机器上这种牛油愈是用得多，那么資本主义社会将愈为牢靠。这一次是資本家赫芙发表他的权威性意見了。他写道："宗教在社会发生动蕩、慘禍和危机时期特别重要。当发生自然灾禍——水灾、旱灾、瘟疫和地震——的时候，或者当人們由于他們自己造成的灾禍、战爭、革命和經济蕭条而受苦难的时候，宗教个别地和集体地給与他們伟大的慰借"②。

美国的工业家和銀行家們并不停留在議論宗教对"社会"的益处上面。这有事实說明，即在美国制造商协会的領导机构中設有与教会合作委員会，該委員会起着教会与大商人之間的中間人作用。委員会的主席在不久以前是約斯柏尔·克萊恩，他是杜邦康采恩的副經理。

美国統治阶級的世界观，他們对工人阶級和进步陣营的仇恨，以及他們将宗教和教会視作为資本主义輔助力量的这种观

① 卡兰亨："从雇主观点来看教会在工业中的作用"(載"工业关系与教会"，費城，1922年，第107頁)。

② 赫芙："教会組織"(載"美国的有組織宗教")，費城，1948年，第8—9頁。

点，就是促使这些阶級和梵蒂岡以及天主教会亲密的原因。

美国天主教史学者呂根在1930年指出："当新教，犹太教和其他教派破灭的时候，天主教被人們賞識(在美国)，它被視作为社会保守势力的强大組織和巩固的堡垒，它特别受到那些比起其他人愈发感到必需有社会秩序的人們賞識，这种社会秩序在今日使他們有可能无忧无虑地运用领导者、财主和金融家所具有的权利。常常可以找到有一些矿場主和工厂主——新教徒或非教徒，他們出錢修建天主教堂或者小礼拜堂，而爱尔兰的、波兰的和意大利的工人們在其中学习'依法'尊敬和顺从他們的老爷們。对于他們而言，天主教首先是宪兵。"①

現代的天主教会，它鼓舞着和支持着西欧各国亲美的政党，它在美国是一个最强大的教会組織，正愈来愈得到美国統治阶級的垂青。美国进步杂志"政治月刊"在1950年指出，当美国的資本尚处于襁褓阶段时，它需要持宿命論的新教的支持，这一学說在自由竞爭时期曾很好地为它服务过。現在当它成为腐朽的、帝国主义性質的垄断資本的时候，它依賴全世界反动經驗的支持，依賴普遍主义哲学或世界主义哲学和天主教会实践經驗的支持，依賴教会对各族人民的解放独立不可調和的仇視传統②。

梵蒂岡和美国的亲密，还决定于梵蒂岡总是竭力和每个历史时期中最强大最反动的国家友好，和它結成联盟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証。中世紀早期，教廷勾引的这种力量是弗兰克国王，其后为德意志的皇帝，十六和十七世紀时为西班牙，随后为奥地利，十九世紀上半叶为法国，十九世紀末期为德国和沙皇俄国；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是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起为資本主义陣营的主导国家——美国。甚至于象美国政論家約翰·麦克奈这样一个显然对梵蒂岡怀好感的作

① 呂根："美国的天主教"，巴黎，1930年，第144頁。

② 謝依曼："美国的教会与国家"(載"宗教与无神論历史問題"，第2期，莫斯科，1954年，第82頁)。

家，也写道："罗馬的敌人和友人一致发表这种意見，梵蒂岡期望在美国的保护中找到强有力的世俗界的支持，这种支持天主教会总是在找寻着的，从康士坦丁大帝起一直到墨索里尼"①。与这个世界上的强者結合在一起——这就是梵蒂岡数百年来外交路綫的主要原則；不同不幸的、弱的、被压迫和被侮辱的在一起——把"天国"送給它們；而同最强大和最反动的在一起，无論是法西斯也好，或者是信新教的帝国主义者也好。

天主教会成为美帝国主义者理想同盟者的过程不是頃刻之間完成的。

殖民地时期天主教在英国北美領地上的作用微不足道。当时只在馬里兰有天主教会。总的来說殖民者是蓄意反对天主教会的，他們怀疑教会。殖民地每年庆祝"教皇日"，在这一日要把罗馬教皇的画象在一定的礼式中付諸火中②。耶穌会徒特别使人不信任。約翰·亚当斯于1816年因恢复耶穌会問題写信給共任美国总統杰弗逊說："耶穌会徒的复活我不喜欢。难道他們在我們这里不是成群地轉来轉去，甚至于任何一个吉普賽流浪者的头目都要羨慕他們嗎？他們假裝成印刷工人、出版者，作家和小学校的視学。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会社在人世間或者在和地獄中要受到永世的非难的話，那么毫无疑問这个会社就是耶穌会。"③哲斐逊在回信中完全同意亚当斯的意見。他們連想都不可能想到，有一天美国的总統竟会是耶穌会徒的朋友和庇护者。

美国的天主教会在十九世紀中叶还是奴隶制的积极捍卫者④。梵蒂岡現在使人相信，似乎天主教会一直要求解放奴隶，要求种族平等。可是事实揭穿了这一神話。梵蒂岡在十九世紀时在各种借口之下不但拒絕譴責奴隶制，还拒絕譴責販卖奴隶。

---

① 約翰·麦克奈："教廷——新的估价"，紐約—多倫多，1952年，第322頁。

② 威廉·福斯特："美国历史中的黑人"，莫斯科，1955年，第215頁。

③ 阿芙乐·曼汉頓："梵蒂岡"，第348頁。

④ 賽勒："耶穌会的权力与秘密"，第430頁。

庇护七世的国务卿紅衣主教亢薩尔維于1815年在維也納会議上报告教皇說，对于喀斯戴尔里爵士要求反对販卖奴隶的請求，他支吾其詞地"不損及我們"(即梵蒂岡)地搪塞过去了。"我考慮到，"亢薩尔維解释道，"一旦譴責販卖奴隶，我們会得罪坚持保存这一为它們带来巨額金錢利益的信奉天主教的国家"①。"宗座"关于販卖奴隶和奴隶制度問題的政策，就是由这种"对宗教虔信"的考慮决定的。

內战前时期的天主教报刊一致支持奴隶主們。波士頓教区的机关刊物"前导"，它反映着美国主教会的观点，在1857年写道："奴隶主拥有奴隶的权利和他們拥有任何其他財产的权利，是同等地重要"。1862年时"前导"断言："解放黑奴在理論上很好，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則是另一回事；不容置疑，馬里兰的黑人当奴隶的生活比获得自由时来得好"。

天主教历史学者約翰·墨菲在他的以美国天主教徒对待外来移民和黑人的关系为題的論文中被迫承認："总的說来，天主教的报刊一致認为奴隶制是一个在当前条件下应該讓它存在的制度。奴隶制的废除論者和他們的綱領，不消說是受到了反抗，其口实为他們的要求太趋于极端，和支持这些要求会使国家的統一受到威胁。一些为保存奴隶制而辯护的經济学上的論据也出現了，有一点被断定了，似乎被解放的黑人的境况完全証明自由沒有为他們带来好处。有一些人甚至談到要宣布奴隶制是黑人生存所需的自然条件，对于黑人而言处于奴隶状态比較有利。"② 墨菲在其他一处写道："天主教会的領导者們否認黑人受到嘲弄，他們說，总的来說奴隶主是公正地对待奴隶的。他們断言，奴隶制度的敌人在誹謗奴隶主。"③

---

① 卡罗·斯福栄："現代意大利"，第67頁。

② 約翰·墨菲："美国天主教徒对移民与黑人态度的分析"，1825—1925年，第77頁。

③ 同上，第137頁。

天主教僧侣們在內战时积极地站在南方奴隶主的一边。当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南方各州的僧侣們派出以查理斯敦主教林欽和耶稣会徒約翰·范农为首的使节团前往欧洲，說服信奉天主教的国家的政府予南方奴隶主更积极的援助①。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为林肯的被暗杀，凶手鲍斯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耶稣会徒的学生。

美国的天主教会在內战以后仍繼續对黑人抱敌对态度。有色人种牧师協会的首領，天主教教士約翰·斯拉戴恩在1903年的一次演說中抱怨道，教会当局阻碍黑人获得神职②。甚至于"自由主义的"紅衣主教吉朋——他的传記作者亚倫·辛克萊是这样称他的，也"因为成百万黑人有着选举权，然而其教养却不足以了解他的意思而深为不安"③。为了反駁那些声言美国天主教会以友好态度对待黑人的人，墨菲写道："說天主教学說有利于人們承認黑人和白人是平等的这种說法，在有着許多事实証明这种平等在現实生活中不能实行的条件下，收效很小。在这一方面，著名的黑人領袖杜波依斯的声明是值得注意的，他說'美国的天主教会比起任何其他一个教会来，更为拥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視'，我們同意不同意他的話呢？……"④

北方战胜南方以后，这正是教皇的世俗权力开始被剝夺的时期，美国的天主教会漸漸地轉变它的政治路綫。天主教会愈来愈坚决地支持資本主义的剝削制度，它力图成为一个根据时代精神的"眞正的美国教会"。現在它的主要攻击对象已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第一个美国紅衣主教麦克洛斯凱即由于他詛咒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而知名于世。

① 西奥图·梅納："美国天主教史"，第372頁。

② 約翰·墨菲："美国天主教徒对移民与黑人态度的分析"，1825—1925年，第120頁。

③ 亚倫·辛克萊："紅衣主教吉朋传略"，紐約，第一卷，第383—384頁。

④ 約翰·墨菲："美国天主教徒对移民与黑人态度的分析"，1825—1925年，第144頁。

紅衣主教吉朋使进行社会性蠱惑宣传在美国的天主教圈子中得以流行，他曾得到許多美国总統和百万富翁的讚美，他頑固地奉行使美国的天主教成为現存制度的堡壘的路綫。吉朋在1882年时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群众性的天主教組織——"哥倫布騎士团"，以与工人組織"劳动騎士团"相抗衡。他是頑固地劝說里夫十三世提出自己的"社会"綱領，以与"共产党宣言"相抗衡的一小撮人之一。有一些历史学者甚至認为吉朋是"新事物"的共同起草者。① 十九世紀末期，不論在美国还是在梵蒂冈，天主教会的势力如此地扩张，以致于法国的研究者馬克思·勒克勒尔克在1891年时这样說："現在盎格魯撒克逊人刚毅和庄严的声音可以在天主教会的領导集团中听見了。美国的教会从前是罗馬教会的一个普通的外部附加物，远离罗馬教会，并且同它关系不密切，現在已成为它主要行动力量之一了。"②

美国天主教势力和財富的增加，在当时沒有引起梵蒂冈特别的热忱，因为梵蒂冈担心美国的教士們和它决裂，成立独立的美国教会。这种忧虑促使里夫十三世在1899年时写信給吉朋，教皇在信中非难美国天主教会的"美国主义"。里夫十三世的所謂"美国主义"，是指美国天主教会适应資产阶級的风尚、习慣和传統。"所有这一切令人疑心，"里夫十三世写道，"在你們之間有人在筹划和希望在美国創立特別的教会，使它和現存的世界其他各国的教会不同。"③

在以美国主教会名义的复信中，紅衣主教吉朋同意上述的傾向应受譴責，然而他否認这些傾向是美国所特有的，即否認受到"美国主义"的感染。梵蒂冈与美国主教会間的"冲突"就此結束。

---

① 吕根："美国的天主教"，第18頁。

② 馬克思·勒克勒尔克："美国紀事（1890年美国經济危机及宗教危机）"，巴黎，1891年，第289—290頁。

③ 乔治·賽尔特："梵蒂冈——过去、現在与未来"，1934年，第304頁。

从那时起到今日为止，敎皇再也不曾对美国的敎士表示过不滿。“梵蒂岡对美国敎会如此抱好感的原因”，敎权派历史学者泰林預測道，“显然是因为美国提供給梵蒂岡的金錢和传敎士愈来愈多的緣故。”①

十九世紀末期起，美国天主敎会的主要力量用以同社会主义运动作斗爭。“在这个国家之中每个紅衣主敎，每个大主敎，主敎和敎士在同社会主义作斗爭”②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首領卡尔松在1912年时指出。美国左翼社会主义者的領袖丹尼尔·里翁系統地揭露了天主敎僧侶們的反工人阴謀。資本家的代表人物讚揚天主敎主敎会的反工人宣传。塔夫脫总統曾說过：“我認为，天主敎会是这个国家中反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堡垒之一，所以我欢迎它在美国存在。”③

天主敎的僧侶們对职工会运动特別重視。紅衣主敎吉朋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改良主义者首領塞繆尔·龔柏斯保持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吉朋和主敎会的其他一些代表人物，曾不止一次地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大会上发表演說，宣传工人和資本家的合作。自1910年起，耶穌会組織“基督敎救世軍”开始在美国劳工联合会中活动着。

二十世紀初期时，在美国各大工业中心遇見天主敎士一蠱惑家已是件极普通的事，他們效法哈本的手法，一方面批判現存的資产阶級秩序和呼吁改善工人的境遇，同时却捍卫資本主义和攻击社会主义。敎士約克就是二十世紀初期轟传一时的这种“改革家”之一，他的活动地点为旧金山。实际上这位“工人之友”追逐着什么目的呢？这只要一讀他的传記的作者克劳宁的下列証言就清楚了：“如果約克神父有时对工业家和民政当局严厉得

① 戚廉·泰林：“参与政治的敎皇”，第150頁。

② 丹尼尔·德·里翁：“新苦修主义（在行动中的罗馬天主敎政治机器）”，紐約，1928年，第43頁。

③ 西奥图·梅納：“美国天主敎史”，第539頁。

有些不当，那末这完全不是因为他对他們抱敌对情緒。他的行为可以从他的信念得到解释，他認为統治阶級缺少社会宇宙观和忽視他們的社会責任意味着威胁和平与秩序，并使急进主义者有借口向群众提出他們自己的綱領。"① 从而可知，約克神父及与他沆瀣一气的"工人"活动家們的社会活动，目的在于妨碍社会主义思想在劳动者中得到传布。

天主教僧侶們一方面从事社会性蠱惑宣传，同时向資本家們証明，他們依靠天主教会比依靠其他教会有利得多。紅衣主教吉朋最亲信的顧問約翰·爱尔兰在1913年发表的一篇演說中講得再明白不过了，这篇演說的标題为"天主教与美国主义"。爱尔兰断言，天主教不抵触美国金融寡头的利益。"传布天主教，"爱尔兰劝說道，"不会給美国的民法和政治制度（即指美国的統治阶級——作者）带来害处。不但如此，天主教为这些制度带来了对于它們的生命和发展而言极端重要的、积极的和有权威性的宗教因素……教会教导人們說，不服从法律是反对上帝之罪行……最后教会以来世幸福生活这一动人的教义来代替人間的斗爭……天主教会是現存社会的救星，它是以上帝的名义和权力如此做的，同时它是宣揚上帝的权力和捍卫上帝的威望的最强大的代理人。"② 在爱尔兰的演說中，天主教应作为拯救資本主义，使它免遭复亡的一种力量。爱尔兰的演說詞已經被收入教会的官方刊物"天主教政治原理"一書中，該書由耶穌会徒賴恩和蒲倫于1948年在紐約出版。这証实天主教僧侶們在今日仍繼續認为爱尔兰的演說詞是他們的綱領性文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助于美国天主教会地位的进一步巩固。为了动員社会輿論支持美国参加帝国主义战爭，威尔逊政府广

---

① 伯納·克劳宁："約克神父与旧金山的劳工运动，1900—1910"，华盛頓，1943年，第228頁。

② 約翰·爱尔兰："天主教与美国主义"，（見約翰·賴恩与法兰西斯·蒲倫："政治原理"，紐約，1948年，第358—359頁）。

泛地利用所有教派的宗教組織，其中包括天主教在內，以作为自己綱領的传布者。

以紅衣主教吉朋为首的天主教僧侶們支持美国政府的軍事計划，从而更进一步地巩固了与最大的金融寡头間的关系，为共同反对社会主义而斗爭。在战爭时期，梵蒂岡在美国的代表頑固地号召同社会主义作斗爭。例如，传教士約翰·旁沙諾于1917年在美国对資本家发表演說，他說："一个最危險的禍根，由于欧洲战爭的結果正在蓬勃地成长——这就是社会主义学說的传播，而天主教会应該反对这些学說。我們应該准备阻挡社会主义的传布和起来反对它。"①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天主教会对威尔逊的帝国主义政策积极支持。1917年时"全国天主教欧战后援会"成立，参加的有主教会和最大的天主教世俗組織的代表。这一組織存在到1919年为止，它和国防部和国务院之間交往密切，动員天主教徒参战。天主教教会人士由于他們比其竞争者新教徒組織得好，他們的軍事活动也因而远为积极。

随着战爭接近結束，梵蒂岡一片惊惶不安。梵蒂岡恐惧革命运动在欧洲胜利，它急于巩固与美国財閥間的关系。貝尼奇克脫十五世在1918年以接待国王的荣誉接待了威尔逊，在他面前逢迎諂媚。他請求威尔逊允許梵蒂岡参加国联。貝尼奇克脫十五世靠了美国人的帮助，在凡尔賽会議上和意大利的代表奥兰杜取得联系，并試图商談解決"罗馬問題"。美国的高級教士愈来愈多地占据教皇厅中的高位。值得注意的是梵蒂岡任命美国主教华尔許为派往布伐洛什賑灾的天主教使团的首长，而不是任命别人。众所周知，这个使团的反苏活动却比它原来职责所規定的活动要干得多。二十年代时，教皇的国务卿任命許多美国高級教士担任外交工作，其中有斯毕尔曼，哈萊等人。庇护

---

① 辛克萊："宗教的利潤"，1918年，第121頁。

十一世将美国紅衣主教的人数自二名增加到四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梵蒂岡国庫主要靠美国捐献。传教士基金、“圣彼得一枚捐”基金，以及教廷各厅各处各种名目的其他进益，大部份是美国天主教徒的献金。

庇护十二世在締結拉特兰条約之前不久，曾以騎士称銜和梵蒂岡的奖章授与一大批美国資本家，因为他們的財政援助使梵蒂岡有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将自己的財政正常化。这批人之中有：考尔涅里烏斯·凱利——安那康达銅公司經理；弗里特里克·約翰·斐希尔——通用汽車公司付經理；約翰·貝尔納——爱里鉄路公司；約翰·思希——密苏里州圣路易“商业銀行”經理；約翰·繆林——科罗拉多矿业公司經理；弗兰克·考梅尔福特——新英格兰动力公司經理；約瑟夫·格兰斯——格兰斯公司經理；阿密吉奥·基安尼尼——美洲銀行經理；杰姆士·法立尔——美国鋼鉄公司經理①。美国資本家中新教廷貴族的名单証明，在当时梵蒂岡和天主教会的利益同美国最雄厚的金融資本的利益如何支干交错，不能分离。

紅衣主教巴契里在 1936 年的美国之行，使梵蒂岡和美国金融寡头間的关系更加巩固了。巴契里当选为教皇后于 1939 年第一次致美国天主教徒的信件，美国統治集团对之很为滿意。新教皇在这封信中好象在作第二次宣誓似的。他确信，以剝削劳动人民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对于他以及他的前任教皇們而言，是完美的制度。教皇在他的信函中声称：“全部历史教导我們說，世間总是有富人和穷人的——这就是我們能从人的本性不变的特点中得出的結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內梵蒂岡和华盛頓間直接外交关系的奠定，和战后时期罗馬教皇厅和美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一致——这就是美国—梵蒂岡友好关系发展的阶梯。

---

① 約翰·希萊：“教皇或墨索里尼”，紐約，1929 年，第 156—157 頁。

美国的天主教会既和民主党在政治上合作，又和共和党在政治上合作。

当罗斯福执政期間，天主教会的某些人物为了适应时代精神，練习向劳动者傾吐爱慕之情。

紅衣主教蒙德莱在1938年公开地为美国天主教会“过去”的罪过而忏悔。“我們的不幸在于我們过去太頻繁地和不正义的一方締結同盟，或者被迫締結同盟”，这位紅衣主教承認道，“利己主义的业主們向教会献媚，称它为伟大的保守势力，接着要求教会象警察般进行活动，同时他們付与为他們工作的人可怜的几文錢。我希望，所有这一切将永不回复地过去了。我們的位置是与工人在一起。”① 这些話发表的时候，美国的天主教会在进行疯狂的宣传反对西班牙共和国，受福特和其他財閥津貼的天主教士考夫林在号召支持希特勒，而耶穌会徒則在滲入产业工会联合会，以图从内部破坏它。

紅衣主教法兰西斯·斯毕尔曼代表着今日美国天主教最反动的集团，他是美国主教会的首脑。

斯毕尔曼是一个爱尔兰籍小鋪老板的兒子，他是他的出生城市惠特曼（馬薩諸塞州）的拳斗冠軍，毕业于非宗教的学院以后他进了耶穌会的福特汉大学。神学院結业后，这个年青的教士到了罗馬，在罗馬他讀完了耶穌会的格里哥里安大学和梵蒂岡的外交学校。学校毕业以后，梵蒂岡派斯毕尔曼到美国一家有势力的天主教“前导”报館担任編輯。1925年时庇护十一世召斯毕尔曼到罗馬，任命他为国务卿助理高僧布尔賈契克一杜克（其后为紅衣主教）的助手。斯毕尔曼是第一个能在教皇厅获得如此高位的美国高級教士。

斯毕尔曼在梵蒂岡正合他的脾胃。他在罗馬也繼續从事体育活动。“哥倫布騎士团”根据他的主意撥款百万美元在梵蒂岡

---

① 西奥图·梅納：“美国天主教史”，第433頁。

修建了一个上流社会的运动俱乐部，以供梵蒂岡的高級教士作体育鍛炼用。教皇庇护十一世眷爱这个年青的美国外交家，这位外交家正如摩根所說的那样“善于把美国生活的各方面——至少看来是令人奇怪的，假使不算狂暴的話——的好的一面，介紹給教皇厅中許多稳重的高級教士們看。”[1] 1929年时，斯毕尔曼和已被任命为国务卿助理的巴契里共事。在这些年代中，斯毕尔曼参加了梵蒂岡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之間的拉特兰条約的准备工作，参加了庇护十一世于1930年发起的反苏“十字軍”的組織工作，参加了1931年为“工人問題”而写的“四旬斋告示”的起草工作，参加了1933年梵蒂岡与希特勒之間的宗教条約的簽訂工作以及梵蒂岡的其他措施。

1933年时，斯毕尔曼被任命为波士頓主教。1936年时，他伴随巴契里作旅美視察。1939年时，当庇护十二世当选为教皇后六星期，他擢升斯毕尔曼为紐約大主教，而在1946年則为紅衣主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斯毕尔曼的头銜又多了一个，他被委为少将官銜的美軍随軍总牧师。一直到朝鮮战争結束为止，他仍旧是美軍随軍牧师的首脑。

随着职位的高迁，这位有进取精神的高級教士的个人事业也飞黄騰达。斯毕尔曼在被任命为主教后不久，即收到洛克菲勒的一笔为数达6,542,421美元的“慈善基金”，这項款子每年的股息就有50万美元[2]。这一基金由斯毕尔曼經管，不受任何人过問。斯毕尔曼从他的著作所得到的进益即超过50万美元。他是美国最大的壟断資本的股东：美孚油公司，通用电气公司，通用汽車公司等等。

斯毕尔曼积极参加“冷战”政策。为此目的，他經常出国鼓动社会輿論和对社会輿論施加压力。天主教新聞記者弗列德里

① 湯麦士·摩根："监視哨"，第438頁。

② 兰特別尔格："美国的六十家族"，莫斯科1948年，第387—388頁。

克·霍夫尔指出："斯毕尔曼在許多国家中拥有真正的自己私有的外交网。"①

美国的黄色报刊已預定斯毕尔曼为将来的教皇。尙在1937年时，泰林問道："美国人满意地接受意大利人教皇的命令和付給他錢将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在教会的法规中沒有任何根据只能选意大利人为教皇，和到罗馬去朝拜他"②。今天，美国的高級教士們比过去任何时期还要經常地提出这一問題，尤其是当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是由于这个庇护十二世的眷顧，才能高据梵蒂岡的一些要职。在战后年代，教皇駐爱尔兰、西德、日本、南朝鮮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的圣使位置，落到美国高級教士的手中了，而这些高級教士則同时又是下列有势力教派的領导人物，如弗兰西斯教派（有两个分支），卡尔曼里教派，多米尼加教派和馬里安尼教派③。耶穌会将軍約翰逊的副手——汶生·麦克米克，現在在耶穌会中据着首要地位，麦克米克是耶穌会"美国省"的首領。

美国的天主教会由所謂"全国天主教福利会"領导的，这一教会組織是在"全国天主教欧战后援会"基础上于1920年成立的。形式上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活动由每年举行的主教会議决定，然而主教会議的首脑事实上是斯毕尔曼。"全国天主教福利会"通过隶属于它的世俗組織和教会組織，計划和推动美国天主教会的群众性政治工作；它通过"走廊議員"（即短期派在国会的为了"改造"众議員和参議員的非正式代表），对国会和政府施加压力，使通过有利于教会的决定，并通过报紙、杂志、无綫电广播、电影和戏剧影响社会輿論。这种压力是以美国政治风尙的传統方式施行的：威胁，賄賂，敲詐和恫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年代中，当希特勒已攫得政权

① 弗列德里克·霍夫尔："新教帝国主义"，巴黎，1948年，第235頁。

② 威廉·泰林："参与政治的教皇"，第157頁。

③ 約翰·麦克奈："教廷——新的估价"，第333—334頁。

和資本主义国家資产阶級集团的法西斯傾向日益浓厚的时候，“全国天主教福利会”开始提出最反动的口号。“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积极参加攻許墨西哥进步政府，反对重建美苏之間的外交关系，支持福林神父的法西斯組織“基督陣綫”。西班牙内战之初，它开展有利于佛朗哥将軍的宣传活动。

1937年时，“全国天主教福利会”开始在全国展开反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活动，它公布了关于美国共产党人“破坏”工作的挑衅性总結报告。接随着这一事件，在每个教区內建立了教士委員会，监視共产主义的发展情形和将自己的結論报告“全国天主教福利会”。所有的教徒有責任将有关共产党人的活动的所有情报报告委員会，而供給他們反共的書籍小册子和电影。至于最干練的教士則被选派到設立于华盛頓的天主教大学，学习社会科学的专門課程。在天主教的报刊上充斥着反共的宣言和文章，而信奉天主教的工人和大学生們則經常被預先警告不得和“赤色分子”合作①。

“全国天主教福利会”鼓吹和贊揚慕尼黑协定，反对美国参加反对希特勒的联合陣綫。战爭时期中，“全国天主教福利会”反对援助苏联和开辟第二战場。战后它支持軍事同盟政策和美国侵略性对外政策的其他表現。

“全国天主教福利会”和臭名远揚的国会各調查委員会合作。主要的“巫女的狩猎者”之一麦卡錫，就是过去耶穌会的学生和“天主教行动”的积极分子。95%的美国天主教报紙支持麦卡錫，其总印数达1,600万份②。

在1954年的紐約警察大会上，警察牧师約瑟夫·麦克弗莱将麦卡錫捧成为“一个眞正的，伟大的美国人”。麦克弗莱的演說受到4千个警察听众的喝采。鼓掌者之中有出席这次集会的紅衣主教斯毕尔曼。斯毕尔曼在同年10月的一次記者招待会上声

① 阿芙乐·曼汉頓：“梵蒂冈”，第355頁。

② 保罗·白兰却：“爱尔兰人与天主教的权力”，波士頓，1953年，第293頁。

称："国会所进行的各种調查活动有着重要的原因。感謝上帝，当采取措施还不算迟的时候，这些調查活动已經开始了"。根据"新聞周刊"的报道，其他的高級教士和教区机构也发表同样观点的宣言支持麦卡錫①。

"全国天主教福利会"尙領导着"职工会会員天主教徒协会"，(成立于 1937 年)以及"工人学校"网，这些学校专事訓練在职工会中进行分裂活动的骨干分子。

进步的职工会活动家弗里曼指出，"职工会会員天主教徒协会"和天主教的工人学校的出現，正当"美国的劳动者开始在工业基础上广泛地和有效地組織起来的时候"②，就是說当美国的职工会运动升向更高阶段的时候。"职工会会員天主教徒协会"力图推翻进步分子領导着的职工会。"职工会会員天主教徒协会"攻击进步組織，从事挑撥离間和工賊活动③。

"职工会会員天主教徒协会"和天主教的工人学校憑借天主教僧侶和資本家的支持，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活动。例如，在 1948 年时天主教的工人学校已达 100 所，其中的 24 所由耶穌会徒所領导。

"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立意加强天主教在美国的势力，它使社会輿論相信，它拥有多数，在某些选区中拥有决定性多数的选票。由此可見，許多議員只有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才能期望选举得胜，議員們有了天主教会的支持即能稳操左券，但必需听从"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訓令。

"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中央領导机构設于华盛頓。它由 8 个部(管理局)組成，其中有：(1)执行部，其下設有外国移民服务处、教义处、情报处和出版处；(2)教育、报刊和社会活动部，其下有工业关系处、家庭生活处、农业生活处、世界和战后問題处、信

① "新聞周刊"，1954 年 5 月 24 日。

② 杰姆士·弗里曼："劳工之敌"，紐約，1948 年，第 3 頁。

③ "政治月刊"，1949 年 4 月号。

貸卫生和法律处(管理"走廊議員"及与立法机构联系)；(3)"天主教行动"局；(4)青年組織部。"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系統中尙有下列机构(括弧中是成立年份)：后备兵和难民服务处(1936年)；国民虔信联盟(1934年)；天主教紐約国际种族委員会(1934年)；美国国籍取得协进会 (1930年)；全国天主教公益服务会 (1940年)以及其他等等①。

教会評論家赫伯脫·舒納特在評論"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活动时指出："不单是'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法律部，它的其他部也是为了政治活动的目的而設立的，这些部門使主教們可以經常对立法者施加压力，因为'全国天主教福利会'是在主教們的直接监督下行动的……"②。

"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綱領及其工作方法，也諸于耶穌会徒約翰·克劳宁所著的書籍中，克劳宁是該会"天主教行动部"的付部长和"天主教社会研究学院"的領导人。

克劳宁在其所著的，得到美国主教会官方准許的"天主教社会行动"一書中，闡述了美国天主教会社会活动的原則。他开始时声言："在欧洲資本主义似乎已經死亡"和"沒有人能够相信，我們(即美国)将会避免严重的动乱和不怀疑自己的未来"。克劳

---

① 天主教会几乎企图滲入美国生活的所有环节，这可以根据下列名单就可以知道，名单中列有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依賴于"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各种組織，然而名单中远非包括全部这类組織：全国天主教教育协会，美国天主教社会学协会，美国天主教哲学协会，天主教图書館协会，美国天主教历史学学会，天主教人类学协会，天主教徒大学生全国联盟，学校天主教协会，戏剧团体天主教运动，爭取文学具有道德价値全国局，天主教新人俱乐部，天主教兒童書籍俱乐部，天主教演員协会，天主教作家协会，天主教报刊协会，天主教无綫电广播协会，天主教电影与无綫电协会，天主教記者协会，天主教童子軍，全天主教与全美足球队，天主教美国青年女兒，天主教音乐教师全国协会，天主教邮政职員同盟，天主教法院职員协会，天主教律师同业公会，美国軍事学院天主教学員合唱队，美国天主教飞行員，天主教經济协会，天主教工业問題研究会，青年天主教工人，天主教医院协会，天主教医师联合会，女护士全国委員会，社会医院服务协会以及其他等等。

② 赫伯脫·舒納特："二十世紀美国的宗教"，第 56 頁。

宁确信，只有利用教会的社会哲学才能捍卫美国的資本主义，因为只有教会能对群众起"鎮靜"的作用①。教会的"社会哲学"的实質是什么呢？是在于使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取得和解。耶穌会徒克劳宁建議，应該說服工人和資本家作出共同的讓步，于是所有的社会問題都将解决。

克劳宁繼續說道，为了对社会事件的发展过程起影响，教会应該掌握力量和威望，这一点教会是能够作到的，只要在自己周围建立起与各社会集团有着連系的組織网，依靠着它們影响社会輿論。"教会在今日可以与軍队相比拟，为首的有：总指揮——教皇，将軍——主教們，下級軍官——教士。然而，"克劳宁警告道，"熟习軍事科学的人都懂得，为了組織軍队除了士兵以外尙需要一种人。后备軍官——这是为了使任何一个軍事行动取得胜利所不可缺少的。教会中俗界的积极份子便起着这一作用。他們不以自己的名义宣传政治路綫，也不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可是他們所受的訓練已足够进行独立活动。他們遵循着总的路綫和各种指示，領导和組織起受他們影响的教徒"②。

耶穌会徒克劳宁号召建立起天主教的工人組織，訓練积极份子，为天主教工人和天主教商人創办专門学校，克劳宁建議教士們巩固与工业家之間的連系，而在职工会之中則同共产主义影响作斗爭。

克劳宁忠告天主教会人士同新教和犹太教建立关系，以进行对抗共产主义的共同斗爭。"天主教徒認为，"克劳宁声称，"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們应該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保卫基本准則"③，即保卫資本主义秩序。

"全国天主教福利会"的活动即以执行这一綱領为目的，特别是它的"天主教行动"部。克劳宁报道，在"天主教行动"这組

① 約翰·克劳宁："天主教社会行动"，密尔窩基，1948年，第13—14頁。

② 同上，第38頁。

③ 同上，第158頁。

織中“对民族的和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行深刻的研究。对这方面的研究，常常为主教和僧侣們提供极宝貴的情报，而这些情报却远在值得正式公布以前就为他們所获知了”[①]。由此可見，“全国天主教福利会”并不鄙夷充作暗探。

在另一本著作“天主教社会原理”中（这本書的出版也得到教会当局的許可和被推荐为天主教积极份子的課本），克劳宁闡述天主教对待資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对資本主义的任何一种責难在美国将会被曲解”——他警告道。这个耶穌会徒不余遺力地捍卫資本主义制度。“天主教徒只能討論改革資本主义，因为教皇断然譴責的不是資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克劳宁宣称[②]。

美国天主教会最积极的核心与其他各国相同，是耶穌会徒，現在三分之一的耶穌会徒（約1万名会徒）在美国，或者在美帝国主义者侵占的土地上。美国天主教会的全部“教育”工作（学校，大学，出版事业，无綫电和电視宣传），受耶穌会徒的統制。他們領导着这样一些巨大的学术机关，如下列城市中的天主教大学：西雅图、斯波康、密尔窩基、新西納蒂、克利夫兰、底得律、华盛頓、俄馬哈、圣路易、新奥尔良、紐約。許多耶穌会办的大学为美帝国主义者提供与美国和国外的进步运动作斗爭的干部。在福特汉天主教大学中設有所謂“現代俄罗斯問題研究院”，在这个大学的教員名册中，著名的为联邦調査局服务的奸細路易斯·布金斯和菲尔勃里克赫然在焉。他們是所有反共审訊的当然証人。这一“学术机关”的首脑是安德烈·烏魯索夫，从前的白俄公爵，現在是天主教僧侶。上述“研究院”中訓練些什么“学者”是不难揣度的。在华盛頓的耶穌会办的乔奇頓大学中，設有国务院正式的“外交”学校。

耶穌会徒受到美国政府的特別信任。例如：杜魯門曾委任

① 約翰·克劳宁：“天主教社会行动”，第175頁。

② 約翰·克劳宁：“天主教社会原理”，第267頁。

耶稣会徒派脱里西奥·楊西雅为“国家科学研究院”的領导人之一，該机构从事研究与制造原子和氫武器有关的問題。杜魯門并任命耶稣会亲信的人士湯姆斯·梅萊(前“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經理，他的两个兒子在耶稣会中居要职)为政府原子能委員会的委員。

阿拉斯加、菲律宾、夏威夷群島、波多黎各以及下列美帝国主义的世袭领地：如古巴、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中美各共和国，都受到耶稣会的“庇护”。在这些区域和国家內，教会的最高职位由耶稣会徒担任。最后，美国的耶稣会徒尚活跃于台湾和南朝鮮，积极地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活动。

梵蒂岡的传教活动全然落在美国僧侶的控制之中。根据1949年的官方資料，有着49个美国修道士僧团和73个美国修道女僧团在国外进行传教活动。

美国的传教士同年尚在下列各地活动：非洲、阿拉斯加、澳大利亚、新西兰、緬甸、加拿大、中南美、西印度、錫兰、中国、印度尼西亚、夏威夷群島、印度、巴基斯坦、泰国、日本、朝鮮、近东和中东、菲律宾群島、琉球群島、以及塞浦路斯和馬尔他島、英国、瑞士、荷兰和芬兰①。

美国的天主教会是梵蒂岡最富有的一个分支。沒有人知道，教皇从美国人手里拿到多少美元，然而有一点是毫无疑問的，即进入教皇国庫的大部份錢是成百万的美元。“新聞周刊”曾經不无自夸地这样說过②。

美国的天主教僧侶們被貪財慾所魅，他們对此并不諱言。

美国主教会这一組織的活动，犹如資本雄厚的垄断資本或托辣斯一样。“新聞周刊”在1954年时写道，紅衣主教斯毕尔曼“从其位于第50大街和麦廸逊路轉角上(在紐約)的灰色摩天楼里的住所兼指揮所里，教士們不无根据地把这里称作为‘权力

① “全国天主教年鉴”，彼得逊一新澤西，第356—357頁。

② “新聞周刊”，1954年5月24日。

的堡垒'，象指导做大生意似地领导着自己的大主教区。"①

在美国教会的主要基层組織，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是村鎮小教区。美国研究者却尔斯·菲斯克指出："城市教区——这是一个巨大的金融企业。供养它的人們将其与工业和金融业混为一談……"②

为数众多的与大銀行有連系的专业化金融組織，根据主教会布置下的任务，为教会金庫征集款項而进行的宣传活动作出計划。在美国，"罗馬观察家"写道，为教会"需求"而征集款項不是一件热忱者办的事，而是一宗"科学"事业，其技术問題是要由专业化的大商号負責設計的。这些組織的专家們从事研究和确定进行宣传活动的特别方式，广泛采用无綫电广播、电視广播、报刊和其他宣传手段，以达到說服信徒慷慨輸将的目的③。

根据这些公司刊登在美国天主教会官方参考手册上的广告性声明，可以看出，他們曾为教会征集到巨額款項。披尔斯·赫特立克·契尔胡金融公司把一封新奥尔良大主教的信函公布出来作为例子，大主教在信中感謝該公司募得了3百万美元。劳逊公司宣称，它募得了628万1,000美元，华特·威尔斯·德莱許曼公司——1,000万美元，費尼公司在加拿大募得1,500万美元，在美国则募得400万美元等等④。

根据商务部的官方資料，天主教会在1936年时为各种开支和慈善事业共花費了1亿8,000万美元。如果它在慈善事上（維持学校、医院和其他非教会內的开支）用了1块美元，那末为教会本身需要則花了6块美元⑤。如果估計到上述的統計是以教

① "新聞周刊"，1954年5月24日。
② 杰隆·合維斯："資本主义及其文化"，莫斯科，1949年，第410頁。
③ "罗馬观察家"，1956年6月23—24日。
④ "天主教規大全"，紐約，1950年，第2、4、35、59、87頁。
⑤ "美国商务部，宗教团体財产調查局，1936年"，第1卷，华盛頓，1941年，第29頁。

会僧侶們自己提供的資料为基础的，僧侶們为了有利于博得社会輿論的良好反响，完全有可能把資料加以修飾，然而就是这样，上引数字也将梵蒂岡的关于教会“为了穷人”而撥出巨額金錢的神話全盘揭穿。1块美元給穷人(也不是全部，大部分用作为教会的宣传費)，6块美元塞在自己的口袋中——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慷慨”的天主教会給予穷人的“援助”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甚至还是根据官方資料得出的結論呢！

每年归入美国天主教金庫的錢究竟有多少呢？关于这一点只能猜測，因为美国的天主教会同其他各国的一样，是不公布自己的預算的。美国的研究工作者杜依德·斯密斯所援引的数据可以用作为大概的指标，根据他的数据，美国的每一个小教区要从每一个在教堂登記过的信徒手中，每年平均征收27元1角2分美金①。假使将这一数据作为計算时的基础，又假使教会官方統計所称美国在1954年时的天主教徒达31,648,000人一事确实不誤，那么应該把教会的平均年入推測为8亿美元。根据教会所提供的資料，其中只有3,000万美元用作于慈善事业，而其余部分則漏到美国天主教僧侶們的无底口袋和梵蒂岡国庫中去了。

根据公布在“罗馬观察家”和美国的“新聞周刊”杂志上的資料而制訂的一张表，使我們对战后年代的美国天主教会有了一个明确的概念。

但是，我們所援引的一张表不能反映出主要之点，即在实質上能表示美国天主教影响的标准。我們是指美国的僧侶和百万巨富、大商人、銀行家和壟断資本，以及与政府集团間的关系而言。

美国的天主教会在政治和經济上得到下列这些大壟断資本代表人物的支持，如福特(他現在通过“福特基金”慷慨地撥款支

---

① “教会与有組織的活动”，紐約，1946年，第75頁。

持一些天主教机构)①，凱尼廸(貝脫萊造船公司)，法尔萊(可口可乐)，杰姆斯(第一国民銀行)，約翰、沙里汶(沙里汶—里特銀行)，爱里沙·华克(庫恩—罗比銀行)，彼得·泰蒂尔巴哈(国际油漆公司)，威廉·康諾利(辛克萊石油公司)，杰姆斯·契利(霞飞石油精炼公司)，华倫·凱利(美国国民石油公司)，基安尼尼(美洲銀行)，赫斯特和露斯(报刊杂志托辣斯)，約翰·拉斯考伯(通用汽車公司，銀行业信托公司等)，以及其他諸人。上述大資本家中的大多数有着馬尔他騎士团，梵蒂岡圣格罗勃或圣格里哥里僧团騎士的头銜。从前教皇是将这些头銜賜給大封建主，国王或俄罗斯皇帝的。梵蒂岡现在用来奖賞美国百万富翁。

美国的天主教会(1934—1954)②

	1939	1942	1952	1954
紅衣主教……………	3	—	—	5
大主教………………	19	—	—	33
主教…………………	111	—	—	164
教会…………………	18,757	—	—	30,268
村鎮小教区…………	—	13,315	15,653	—
教士…………………	33,540	—	—	45,451
修道士………………	—	140,566 (1947年)	156,696	—
教会中学校学生……	16,747	—	—	33,448
軍中牧师……………	50	—	—	1,206
天主教大学和学院…	—	207	233	—
学生数…………	—	116,500	204,937	—
天主教中学…………	—	2,071	2,440	—
学生数…………	—	384,588	558,491	—
天主教小学…………	—	7,701	8,898	—
学生数…………	—	2,065,198	2,776,856	—
教会管轄的医院……	—	95	117	—
床位数…………	—	7,852	10,141	—
全国天主教徒数……	—	21,406,507	31,648,424	—

天主教会与美帝国主义間关系的巩固，使一些梵蒂岡亲信的天主教徒政治家得以占据政府中的高位。他們特别被欢迎担任执行“冷战”政策，反对进步陣营各国的職务。至于福萊斯特③，林貝尔格和麦卡錫已經臭名远揚，不待贅言。屬于这一类活动家的还有斯密脫将軍，他是前中央調查局的首脑和杜勒斯的助手；克萊尔·布·卢斯夫人，前美国駐意大使，出版界巨子亨利·卢斯的妻子；前駐苏大使海軍上将柯克和乔治·凱南，駐埃及大使哲弗逊·凱弗里；前“哥倫布騎士团”首脑法兰西斯·梅蒂犹斯，在杜魯門政府中曾任負責海軍事务的国务秘書，他是美国活动家中最先要求先发制人对苏作战的一人（在1950年）；托平，艾森豪威尔政府中的劳工部长，他劝告工人們研究教皇的通諭，不要去讀“革命的書籍”；霍华特·麦克格里斯，杜魯門时的总检察长；台尔金，天主教工会联合会的副主席，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劳工部长；前北大西洋公約欧洲盟国联軍总司令格倫瑟将軍，以及其他等人。

美国的高級天主教僧侶参与战爭歇斯底里的宣传与筹划。軍队中的教士（随軍牧师）在軍队中煽起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其他国家的仇恨。天主教士在随軍牧师中占领导地位。

1949年8月，根据国防部长約翰逊的命令，成立了随軍牧

---

① 1955年时，“福特基金”捐輸給美国天主教机构的錢达3,700万美元。（見“国际天主教通报”第15期，巴黎，1956年）。現在福特公司的首脑亨利·福特第二已改宗天主教，而他的兄弟爱特賽則仍为新教徒。这种在宗教上的“分工”是美国垄断資本家族的特色。

② “罗馬观察家”，1953年6月13日；“新聞周刊”，1954年5月24日。

③ 美国耶穌会杂志“阿美利加”把福萊斯特发瘋的原因，推测为他讀了同事們所写的題为“辯証唯物論如何影响苏联的外交政策”的报告。福萊斯特这一件致罗馬教皇、丘吉尔和西方其他政府人士的报告，如“阿美利加”杂志所称，其內容使他极度震惊，以致于弄到发狂的地步。耶穌会杂志訓导美国的未經世面的老百姓說，你看，辯証唯物主义的学說对于一个“不曾体驗过它的滋味的人”，会产生这样“可怕的效果”。（“阿美利加”，紐約，1951年12月1日）。

师事务委員会，以領导三軍中的随軍牧师。該委員会拟訂的特别訓令規定軍中牧师的任务为“在智、德、体三方面訓練兵士，使他們在战时能战胜任何敌人”。

在总統特設的“美国武裝部队中宗教与福利問題委員会”的报告中說(1950年)，宗教在美国軍队中的思想訓練工作中起着极重大的作用。这一报告指出，軍队中的宗教課程和礼拜仪式应該有助于軍队总的道德状况的改善，有助于軍事訓練質量的提高，有助于美国的安全和国防的巩固。为了挑撥兵士們反对进步陣营，报告要求僧侶們在兵士的思想中造成关于这一陣营虛假的印象，提示他們說，“对方”不顧“道德規范”，而美国在保卫着以“宗教原則”为基础的社会秩序①。

天主教的僧侶們特别热衷于执行这一綱領。他們教导兵士說，他們的长官恰好就是“上帝的代表”。随軍牧师团出版的一本名为“我們为了上帝和祖国而团結在一起”的小冊子教导兵士說，軍官們是在上帝給予的权力基础上，要求兵士服从他們的。“假使你意識到，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上帝，那么你就更易于服从軍事命令了，”上述的小冊子中这样說道，“你不要把軍官認作为力图能迫使你做多少就多少的一个人。你要把他認作为上帝的代表。因为这在事实上是如此，甚至于当軍官自己不知道，或甚至于不相信这一点时也是如此。”②

随軍牧师与司令部的軍官，以及与諜报部門和反諜部門合作。他們亲自监視兵士們的政治傾向，或者通过經过特别审查的兵士中的情报員和下級軍官进行监視。随軍牧师为每一个新兵設一张履历卡，其上記載着有关这一兵士的政治傾向和行为的資料。因为兵士們在同随軍牧师談話时，远較同反諜人員談話时坦白，因此随軍牧师在这方面也为指揮官作出了不可估价的貢献。

① “随軍牧师”，报告書，华盛頓，1950年，第1—33頁。

② 卡尔浦維奇：“美国軍队是美帝国主义的武器”，莫斯科，1952年，第127頁。

天主教僧侶們甚至于不想遮掩自己在美国武裝部队中的代表們的卑鄙活动。天主教高級教士，少將銜随軍牧师路易·派克在一篇刊登在耶穌会杂志“阿美利加”上，标題为“美国軍队中的宗教課程”的文章中公开地写道：“随軍牧师是司令部的一个成員，他是討論一切有关兵士的宗教、道德状况和行为問題时的參賛和顧問。在許多方面他是指揮官的‘眼睛’和‘耳朵’，随軍牧师通知他有关部队的情况和提出有益的建議。”①

在美国的天主教陣营中，是否存在着反对教会僧侶們反动路綫的力量呢？这种力量是存在着的，然而他們現在还薄弱，他們的呼声被“全国天主教福利会”和耶穌会組織反动的宣传声所淹沒了。自由主义的天主教徒团結在“国民”杂志的周围（該杂志每次的发行数为25,000份）。“国民”杂志非常謹愼地反对弗朗哥和麦卡錫，反对战爭的歇斯底里。教会方面容忍它是有打算的，因为这一个相对地抱自由主义的，总的来說是忠誠于梵蒂岡的組織，其存在有助于抑阻那些不滿教会的反动政策的教徒們的憤怒情緒。

但是，教会当局对教会中那些敢于直率地，甚至于只不过是畏畏縮縮地賛成进步的人物，則采取严厉的处置。芝加哥市主教貝尔納·謝尔的遭遇即为一例。謝尔被称为罗斯福总統的朋友，称为一个同情工人运动的人。他反对基督教和反动派混为一体，反对教会与銀行家、工业家和政客結成同盟。謝尔斥責法西斯神父考夫林。1954年时，謝尔在作完一次反对黑暗蒙昧主义者麦卡錫的演說后，收到了2万多封信徒表示拥护的信。謝尔在1946年的一次演說中說：“如果印度尼西亚人处于荷兰人‘好意的’管理之下，那么自由对他們来說意味着什么呢？对于处在法国人庇护之下的越南人或对于被英国人警惕地监护着的印度人，自由又意味着什么呢？……当你换了主人以后，奴隶制度仍

① “阿美利加”，紐約，1951年3月1日；“神职与特务”，华盛頓，1951年。

然还是奴隶制度”，

謝尔的这种演說既不合斯毕尔曼的胃口，又不合美国統治集团的胃口。經过长期同教会当局冲突以后，謝尔在 1955 年被迫离职退休，而他所領导的組織，因为过于“左傾”而被解散。接着卖淫式的資产阶級报刊开始誹謗謝尔[①]。

美国的教会当局就是这样懲戒那些祭坛的侍奉者，虽然他們还是畏畏縮縮地，然而終究是企图对教会隶从于資本的利益表示反对。

英国作者阿芙乐·曼汉頓于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著的“梵蒂岡”一書中写道：“实質上天主教会力图将美国变成为純然的天主教大陆，这一大陆将抵償它在欧洲大陆上所失去的一半势力。”[②] 我們所引述的事实指出，虽然梵蒂岡暂时还沒有征服美国，然而它和美国的天主教会目前已經是影响美国統治阶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

① 瑪丽·卡罗尔："謝尔主教——失却荣誉的先知"（"哈泼杂志"，1955 年 11 月号）。

② 阿芙乐·曼汉頓："梵蒂岡"，第 346 頁。

第 七 章

天主教陣营內的危机

天主教会和天主教陣营在今日整个来說，在經历着深刻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危机。

构成这一危机的因素是极多的各种各样的。教会失去了对工人阶級的影响为其中的一个因素。在"新事物"公布后的四十年，庇护十一世被迫在1931年发布的"四旬斋告示"通諭中承認，教会"失去了"工人阶級。这一事实，庇护十一世宣称，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醜事"。

不但是工人們拋弃了教会。最近几十年来广大的农民阶层也开始离开教会，对于象意大利和法国这种国家这事特别典型，在那里不久以前农村还是僧侶們的堡垒。"农村离开了教会。这是残酷的眞理"——教士柴伐尼·鮑拉在修道院院长布拉尔所著的"法国农村中传教問題"一書的意大利版序言中这样承認，在这本書中有着大量事实材料說明教会影响在法国农民中下降①。

根据法国修道士范·列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布的材料，在西德有50%以上的天主教徒不奉行宗教仪式，而在意大利，根据耶穌会徒考尔蒂的資料，80%的居民不做礼拜。罗馬的

① 布拉尔："农村教区"，1948年，第10頁。

情况还要糟，只有1%的居民上教堂①，而罗馬还是梵蒂岡的所在地，虽然有着梵蒂岡、教士及修道士大軍駐在那里，还是不管事。

法国乡村小教区的走向衰落，是群众对宗教日益冷淡的結果。我們看看修道院院长斯密特—厄格兰是怎样評論的，他著有一本专門研究分析現代法国乡村小教区活动的書，書中說道："乡村小教区中的教士們在断定自己的活动毫无成效时，向自己提出問題道，是不是自己的职业是錯誤的。假如他們不到'超自然'的領域中去求慰借，那么他們将会明白，他們的教士头銜对于社会是沒有益处的。他們甚至于会接受說他們过着寄生虫生活的这种責备，或者至少願意接受装飾品这一称号……所有这一切发生得好象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地下暗流，不断地和不可避免地将我們的乡村小教区带入非基督主义的漩渦中去……我們企图修建，而房屋却繼續在毁坏，我們竭力想支撑它，但是不得不后退。我們奋力在划游，但是水流却将我們带走；我們采取破釜沉舟的措施，但是病情在恶化。"②

教权派陣营現时危机的原因何在呢？其原因之一在于教会将自己同資本主义連在一起，已成为它热烈的捍卫者，从而注定了使自己同資本主义一起腐朽敗亡。美国社会学家保罗·赫金森在过去曾正确地指出教会危机和資本主义危机之間的关系，赫金森在其正当世界經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出版的"世界革命与宗教"一書中，关于这个問題写道：

"有組織的宗教（即教会——作者）在世界許多国家中是和統治阶級的利益融成一片的。当全世界发生变化和統治阶級有被推翻危險的时候，許多这些特权阶級垮台的可能性，对于与他

① 卡罗·法尔康尼："意大利乡村小教区的危机"（"新論"，罗馬，1953年，第13期）。

② 保罗·斯密特—厄格兰："非基督教主义的机械論"，巴黎，1952年，第10—11頁。

們共命运的宗教而言，决不是什么好預兆……

有組織的宗教在竭力开展活动，以保卫行将死亡的社会或已經不存在的社会，或保卫已失去自己思想意义的社会观念的同时，在为自己掘墓。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期望教会采取其他的政策，因为每一种宗教按其本質来說是保守的，它不可能有另外的做法。

基督教虽然在传教方面有成就，总的来說它是白种人的信仰，由白种人在其他种族中传播开来的。白种人世界霸权的行将败亡，相应地引起了白种人宗教权势和影响的衰败。一个宗教如果不能解决因世界观发生变化而提出的精神上的問題，那么它注定要随着人們教育程度的提高而衰败。除此而外，一个宗教如果不能解决新文明的倫理問題（在此处为机械世紀的倫理問題），它不能期望将那些全然和新文明連在一起的人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①

赫金森指出的这些因素，当几乎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已經組成社会主义陣营，殖民地各国正在掙脫帝国主义桎梏和全世界各族人民要求执行和平和社会进步政策的今天，特别显得明显。

历史上最早的对天主教会的最沉重打击是反封建运动和宗教改革，其后为启蒙运动。法国 1789 年的革命使政教分离，并且强烈地动搖了法国天主教的地位。由于法国革命的影响，天主教在其他各国的地位也不稳了。拿破侖一世第一个取消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天主教会只有靠反革命的胜利，及在王政复辟和"神圣同盟"时期时才能稍稍恢复因受这些打击而丧失的元气。意大利的統一使世俗的教皇国終于寿終正寢。梵蒂冈仅在带了自己的全部中世紀思想武器，投入了自己不久前的敌人的陣营——資产阶級陣营以后，才能恢复起教会的某些势力。資

① 保罗·赫金森："世界革命与宗教"，紐約，1931 年，第 186—187 頁。

产阶級需要天主教会的帮助，以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作斗爭。二十世紀初期，在法国和意大利兴起的旨在对抗社会主义的“基督教民主”运动，是教会声东击西誘人到迷途去的策略，然而这一运动在欧洲天主教圈子內引起了深刻的思想上的紛扰，这显然是不利于反动派的。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这一思想上的紛扰特别加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全世界劳动人民，包括对天主教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成立的天主教政党“平民党”党內，发生了尖銳的內部斗爭，而根据梵蒂岡和資产阶級的計划，这个政党原应遏止因十月革命胜利而激起的革命浪潮的。要求推翻資本主义的左翼天主教徒，他們是屬于工会領袖米尔奥里一派的，他們同“善意的”教权派政客們一起要求有自己生存的权利。于是梵蒂岡指望法西斯份子成为自己的同盟者和保护者。然而梵蒂岡却不能說服天主教群众相信法西斯份子是上帝所賜与的。1936 年时，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許多天主教徒，不顧梵蒂岡的訓令，支持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綫，因而引起新的危机，新的分裂，新的反“共产主义”的教皇通諭（1937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深刻地震撼了梵蒂岡廊柱下的基础。虽然教会在近百年来对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曾尽力詛咒，虽然教会曾經和法西斯份子結过同盟，然而梵蒂岡在盟軍解放罗馬以后，由于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情緒和意志，不得不同意讓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在国民陣綫的政府中共同合作。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教廷仍旧是忠实于自己的反动观念和反动目的，同反动力量团結在一起反对人民群众的解放运动。因这些行为使教廷的眞面目为人民所看清了。梵蒂岡在同美帝国主义結成同盟之后，即将共产党人逐出教会。这一措施在中世紀时对于封建主和农奴主而言，无异被目为邪教徒，后果十分可怕，但是在二十世紀采取它却引起正好相反的效果。“教会宣布逐出共产党人一

事——前美国駐意大使克萊尔·卢斯夫人，一个得到庇护十二世好感的女教权派份子証实道——是一場恶梦，教会直到現在还不能够摆脫它。成百万人离开了教会并且从此再也不会接近它了……总之教会应为自己所干的事而痛哭。"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教权派政党在一些西欧国家中的长期执政，促使許多信徒改变了他們对教会和社会的看法。天主教政党的活动証明，所謂"天主教社会綱領"实質上是保卫剝削阶級的利益的。教权派政府的政績只在一个方面是"卓著的"——即在积极支持"冷战"政策一方面尙在日內瓦四大国会議之前很久。这一政策的宣告破产，不能不在天主教組織和政党的所有环节內引起混乱。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建設的成就，以及苏联与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坚决执行的和平政策，对于天主教群众产生的影响日益强大，而梵蒂岡許多年来正是在这些人中間进行着反苏和反共宣传的。

許多天主教徒在对梵蒂岡路綫的正确性不再相信和失望以后，便轉向馬克思主义，轉向这一直到今天为止由于受教会宣传影响，因而見了就躲避的世界观。今天，当教会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而发布了不知多少通諭，作出了不知多少革除教籍和逐出教会的决定后，教权派的理論家們被迫承認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对許多天主教信徒有着"不可思議的誘惑力"②。

現在在天主教的杂志上不但可以常常讀到对馬克思主义的詛咒，还可以常常讀到这种論調，例如："这一事实对于我們基督徒来說似乎是惊人的，而对于僧侶們来說似乎是不可思議的，即馬克思主义在其唯物論体系中具有神圣的革命精神。无神論的馬克思主义是上帝新发現的辯証因素……无神論的馬克思主义是反对資产阶級和具有革命性的。这是否定的否定，是引向基督主义的"急进葯剂"③。

① "欧罗巴"，米兰，1954年3月25日。

② 迪·鮑："意大利天主教的危机"，第53頁。

列宁指出，历史的辯証法是这样的，即馬克思主义的胜利迫使它的敌人改裝为馬克思主义者[④]。教权派份子之中有着这种人，然而通常天主教徒轉向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們在馬克思主义里面找到了那些磨折他們的問題的答案，而教会的思想体系无法为他們作出这种答案。法国主教会的活动家之一，修道院院长拔埃尔就說出了这一观点，他是无論如何沒有同情共产主义的嫌疑的："共产主义能满足群众，因为它給与群众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观，因为它試图解释所有的問題，不論是社会的、經济的、文化的、文学的甚至哲学的……从另一方面而言，虽然神学家們在作着种种美梦，但是应該承認，基督教无力提出一个能被現代人接受作为自己的对世界統一的看法。"[⑤]

当天主教徒开始客观地将教会的思想意識与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相比較的时候——是生活本身促使許多天主教徒去比較的——他就会对共产主义得出下列的結論，前耶穌会徒阿里格罗·湯迪就是一个例子。

"归根到底——湯迪說——在我看来共产主义是唯一能答复生活中所有問題的科学，这一科学奇妙地解释各种現象，說明它們之間的联系，它不怕新的、正在成长和发展着的东西。共产主义是生活的解释，同时又是生活本身。共产主义不仅是人类文明伟大的成果，同时又是正在实現着的文明"。

正如教皇庇护十一世在題为"四旬斋告示"的通諭中所承認的那样，即假如僧侶中的某些人倘且得出这种結論，那末天主教徒的工人定将成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因为他們"認为教会縱容富人，忘記了工人們的利益，不关怀他們"。

教会当局看到，天主教的群众也开始認識到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优于資本主义的世界观，因之用尽一切它能采取的手段，企

---

③ "世界报"，1954年3月9日。

④ "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546頁(俄文版)。

⑤ "灵魂月刊"，第89期，1946年，第257頁，巴黎。

图不讓在天主教运动的积极份子和共产党人之間建立起友好关系。"因为經常把自己活动与共产党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法国紅衣主教修尔承認——天主教徒敢于，常常甚至于并不意識到这一点，主张实行被教会所譴責的学說。"①

工人們全体不相信教会，不怕它的詛咒，愈来愈广的劳动阶层确信教会的活动不利于人民，而有利于剝削者。

庇护十二世在1955年5月1日对工人发表的演說中，把人們称教会是資本主义的同盟者这种肯定的說法認为是"可怕的誣蔑"。

"可怕的誣蔑"？那末为什么一些老老实实地想說明教会对群众的影响所以在低落的原因的教会人士和教权派的活动家，也承認这一"可怕的誣蔑"是眞情？为什么信徒們愈来愈多地相信这一"誣蔑"呢？

法国天主教杂志"灵魂月刊"承認道，因为"資产阶級世界与天主教世界的关系是这样的，这两个世界对于許多人而言已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結果是一个人要抛弃第一个世界，他必然与第二个也脫离"②。

"人民害怕僧侶的势力——根据法国修道院院长米兴諾的話說——因为人民認为这势力有利于特定的人和特定的阶級，这些人是剝削他們的……甚至对于信教的工人而言，教会是教士和富人們的政党。"③

"教士嗜錢，他只想如何致富——布拉尔神甫援引在法国天主教徒間广泛流传的意見說——神甫从来不会'因飢餓倒斃街头'。人們成为教士，正如他們成为律师、医生等等，只因为这为他們带来收入。"④

---

① 爱弥勒·傅尔盖："共产主义与基督徒的責任"，巴黎，1951年，第199頁。

② "灵魂月刊"，第12期，1954年，第716頁，巴黎。

③ "灵魂月刊"，第8、9期，1946年，第231—234頁，巴黎。

④ 布拉尔："法国教权的上升或沒落"，巴黎，1950年，第267頁。

"法国人民中广泛流传着这一确信不移的意見，教会是富人們的工具，即教会是业主們、有权势者和政府的工具——修道院院长繆夫确認道——人民中認为僧侶的代表人物是資产阶級和死亡一方面的人……普通人相信教士只对金錢感覚兴趣。"①工人們异常明白——另一个法国主教会的代表人物霍兰說，1848年时法国的僧侶除了少数例外，支持所謂秩序党，这秩序就其結果来評判，和基督秩序相似之点非常之少②。教会当局在巴黎公社时期的行径，或者它对貝当及其政权的态度，或者就法国紅衣主教們支持"冷战"这一事实而言——难道所有这一切不促使工人們离开教会嗎？

农村中教会和剝削者之間的关系比在城市中表現得更为明显，虽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农民不象工人那样快地意識到这一点。但是如果当地主或富农在雇用雇农时要求后者必須去做弥撒——在法国的許多省份中是如此的——那么这个雇农甚至是瞎子也会明白，教会是为誰服务的，修道院院长布拉尔煩恼地这样提到③。这就是为什么甚至連他也被迫承認，教士在农民心目中是地主的朋友，而教士的职位是个"肥缺"④。

"自从貴族地主的家成为許多乡村小教区的中心，和教士們不止一次地証明他是为地主家族服务的，而不是为全体信徒服务的那时起——布拉尔繼續写道——农民中間这种信念就愈加巩固了。所以'宗教祗是对于富人說来是好的'这一著名的成語漸漸地贏得了农民的心"⑤。

我們在比利时也遇見这种情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比利时教会当局对天主教組織的积极份子进行了一次提問

① 繆夫："无产阶級的使命"，1947年，第88—89頁。

② "无产阶級的基督教化"，夏里洛叶会議的报告，1950年，第175頁。

③ 布拉尔："法国教权的上升或沒落"，第68頁。

④ 同上，第82頁。

⑤ 同上，第84頁。

測驗，題目为“工人阶級对僧侣和教会的眞正关系是怎样的？”。下面是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答案：

“人們繼續相信上帝，然而群众和教会之間彼此脫离。人們把教士当作資本家同盟者的代表”。

“人們認为教会同政治和金融集团連結在一起”。

“我生活在群众中間，和他們共患难。工人在宗教方面是冷淡的。工人反对僧侣，因为他相信僧侣支持富人”。

“工人們看不到天主教会的代表人物具有基督的苦行精神”。

“工人們从教士的行为、他所代表的文化、論調和居住条件看来，認为他是和资产阶級相联系的”。

“工人們确信，基督教是保护富人和业主的”①。

“僧侣和資产阶級因其利害共同，其利己主义和资产阶級精神正亦全然相同”——多米尼加会徒哈因承認道②。比利时大主教卡尔登·維亚尔公开地說：“难道我們（指僧侣——作者）不以自己的行动，为那些把教会变成他們的防卫武器和保險柜的人們辯护嗎。”③

甚至于西班牙“天主教行动”的机关报“爱克列齐亚”在1954年也被迫承認，大多数工人对教会怀敌意，因为他們認为教会是剝削阶級的同盟者。

事实就是如此。当然，如果生活本身不是时刻向劳动人民証明，教会是保护統治阶級的利益的，那么任何“可怕的誣蔑”，任何无神論和反对教会的宣传，不能使他們离开教会。

另外一个在現代条件下加速宗教衰敗的极重要因素是科学的进展。教会的理論对人們周围事物的解释是歪曲的和反科学的，在无綫电和原子能时代，它在愈来愈多人的思想中站不住脚

① “无产阶級的基督教化”，第11—13頁。

② 同上，第140頁。

③ 同上，第188頁。

了。不管教会如何努力地通过僧侣們領导的学校和其他学院来統制青年一代的思想，它的努力終归是徒劳无益。在这一方面，法国高級教士讓·列克萊尔的自白是可作为例証的，列克萊尔写有专門研究現代宗教和科学的关系的著作。

在天主教学校中受教育的青年，列克萊尔說，一进入大学后就开始对上帝的存在抱怀疑态度。那些曾在僧侶那里受过教育的学生把宗教世界观与科学世界观一加比較后，覚得前者簡直是孩童的幻想。列克萊尔把在科学界占統治地位的气氛描摹成这样："許多科学家确信，传統理解中的宗教問題再也不会使現代人感到兴趣。有利于宗教的論据和反对宗教的論据都是属于无法証明的范畴的，因此不能予以注意。学者們認为，所有的宗教是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令人感覚兴趣的現象……他們認为进步的道路，人类发展的道路，是通向与宗教相反的方面去的，祗有科学精神能答复文明人的願望……天主教圈子中出身的青年人一进入大学，就处于这种科学气氛的影响之下。实驗室中被实驗所証实的科学方法，对他們而言象天启般正确。自从这一时刻起，在他們于大学念書的整个时期中，他們經常被提示，不应該同意未經检驗过的結論，科学教育首先在于作出良好的检驗方法。于是他們就想到，他們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所接受的宗教訓导缺乏堅实的基础，他們接受的是未經証实过的公式，他們相信的是无根据的議論……他們在青年时代所認識的基督教，由于不曾和其他宗教比較过，因之是非凡的、独一无二的宗教。現在在他們面前展列着其他二十种与基督教有着許多相似点的宗教，这使他們感到惊异了。这些宗教也有着自己的拥护者，宣称他們的宗教优于基督教，于是青年人得出了下列結論——归根結底說来不是他們自己选定基督教的，他們有这一信仰是环境所致，因为沒有可能把基督教与其他世界观相比較，他們之所以成为基督徒仅是由于生長在基督教的环境中，如果他們生在其他一个国家中，也会成为很好的伊斯

兰教徒或印度教徒的。于是他們問自己道，說他們的信仰是真实的，究竟其保証何在。难道一个宗教不与另一个是平等的嗎？"①。列克萊尔不由得不承認，僧侶們无法对这些問題提出令人信服的答复，虽則如此，教会当局繼續捍卫着传統的教会理論，它不經过战斗是不会交出自己的地盘的。天主教內为耶稣会徒所鼓舞的所謂复古派的代表人物在这方面特別热心。复古主义者是科学与进步、工人运动与共产主义的死敌。在意大利复古派由"天主教文明"所代表。在法国复古派麕集在"法兰西天主教徒"杂志的周围，这本杂志在德国占領法国时期称为"明日"杂志，它受到見当的支持。現在"法兰西天主教徒"主张繼續"冷战"，并且要求法国也制造原子弹②。复古派反对进行社会改革。根据复古派理論家之一、高級教士勃魯諾·塞拉茲——他是土魯斯市天主教高等学校的校长——的說法，"基督教的解脫不在于消灭貧困，而在于消灭罪恶。"③

法国天主教杂志"灵魂月刊"認为复古主义是天主教会中的主流。这一杂志宣称："复古主义者在西班牙和加拿大教会中占着优势，他們在罗馬，在美国和德国教会的代表人物中間有着特別的势力。复古派的势力在'圣办公厅'中占統治地位……教皇私人办公厅主任德国高級教士萊依別尔亦以复古主义者的拥护者見称。"④

僧侶中意識到在現代条件下教会坚持"异教謬論"原則是决无好处的代表人士，是不滿意复古主义的。寻覓和坚持其他解决方法的僧侶們，組成了一个虽然非占优势的但相当有影响的現代主义派，这一派的成員可以分为溫和派現代主义者和"急进

① 列克萊尔："二十世紀智識份子間的信仰問題"，第二版，巴黎，1950年，第9—12頁。

② "灵魂月刊"，巴黎，1955年5月号，第805—806頁；1955年7月号，第1183—1184頁。

③ "世界宗教近况"，巴黎，1955年1月1日。

④ "灵魂月刊"，巴黎，1954年3月13日。

派現代主义者”，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間有着严格的区别。溫和派和急进派贊成改变教会的路綫，首先出于为了战胜共产主义影响这一考虑。

溫和派現代主义者要求教会“干預生活”，积极参加社会生活，最大程度地发展如“天主教行动”一类的群众性組織。他們贊成在政治上玩弄戏法和随机应变，他們宣传要依照美国教会的方式和模样使教会的活动現代化。“如果教会空虛无內容，它还有什么价值？——屬于这一类型的現代主义者之一、意大利高級教士鮑拉惊叹道——我們至少应該做到讓教会兼足球場，教会兼弹子房，或教会兼电影院。如果教会中沒有这些娛乐，年青人不会到我們这里来，或者来了以后，随即到其他会戕害我們在青年心中所播下的种子的处所去。”① 現代主义者的溫和派是教权派陣营中和資产阶級臭味最相投的一部分人。

現代主义者中的“急进派”認为，教会应該提出急进的綱領和为其实現而斗争，从而拯救自己和“防止共产主义胜利”。教士帕里莫•馬佐拉里常常在意大利教权派报刊上发表政治論文，他宣称：“共产党人在几年后将在选举中得到多数票而执政。因之或者是由我們来实現共产主义綱領的大部分，或者是由共产党人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至今为止，政府和統治阶級及大資产阶級在保护着富人的自由。現在該是保护穷人的时候了”②。正如意大利教权派份子廸•鮑所指出，这一派的信徒們为了打算战胜共产主义，“因此把經济財富的意义問題作为重点，他們断言，国家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是屬于这类財富的。他們为了打算战胜共产主义，因而利用共产主义所固有的武器，共产主义所固有的各种論据，辯証唯物主义，虽然这里边有着心理上的困难和违背教理”③。

① 布拉尔：“乡村教区”，第18頁。

② “欧罗巴”，米兰，1954年1月3日。

③ 廸·鮑：“意大利天主教的危机”，第62頁。

倡导这种"急进的"和蠱惑人心的策略以与共产主义作斗爭的理論家不是別人，而是布尔什維克主义的"专家"和东正教"哲学家"白匪份子別尔茄也夫，近年来他以天主教会的"拯救者"之一的身份活跃着。

別尔茄也夫理論在法国的追随者之一高僧哈因，承認共产主义学說巳获得"世界性成功"。哈因同意这一說法，即"馬克思主义生在工人阶級的心中"。他在研究一个問題：用什么办法能把馬克思主义从工人阶級的心中赶出去。"这将来可以办到——他断言——如果教会的領导人物能引导基督教的教义比共产主义更走向极端的冒險和极端的牺牲"。哈因确信，进行社会性蠱惑宣传是摆脫目前窘境的出路。

"超过馬克思主义——这就是基督教的任务"——別尔茄也夫的另一个拥护者、法国教士台尔明这样声称，接着他又补充道："为了离間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应該作出一切努力"①。然而对共产主义进行一般性誹謗以图达到离間的目的，对于反动派来說，其可能性愈来愈小了，这一点台尔明也了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繼續教导道——应該擷取共产主义中有益的核心：經济結构对人的道德行为的影响，对物質的正确估价，历史辯証法，贊美劳动，把无产者从一切使他隶屬于其他人的制度中解放出来，工人团結精神，必須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僧侶制度，使財富和遺产再也不会成为它的主要因素，发展工人文化和树立工人的人道主义。"② 台尔明說，应該采取共产主义的"实践部份"，抛弃它的革命性理論和哲学。台尔明"革命性"綱領的目的，不在于把工人阶級从資本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是在于"消灭共产主义"。

梵蒂岡根据形势和各个国家中教会所处的地位，有时利用复古主义者，有时則利用急进派或溫和派的現代主义者。

① "无产阶級的基督教化"，第64頁。

② 同上，第54—55頁。

法国教会对人民群众的影响是极其弱的。梵蒂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考虑到每一种流派都会把屬于一定阶层的人引向教会，所以它同时既支持复古主义者，又支持現代主义者。梵蒂岡特别期望"急进派"現代主义者能打破工人阶級对教会的不信任，从而使教权派在劳动者中間争得地位，这亦将巩固人民共和党的地位。所謂工人教士运动就是追求这一目的的，这一运动的簡短历史已經异常明显地反映出正在腐蝕着現代天主教陣营的一些矛盾①。

工人教士运动产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这一运动的首倡者为多米尼加教派僧侶繆夫、戈登和丹尼尔。繆夫以前是个律师，戈登和丹尼尔是"基督教工人青年"的牧师。法国淪陷时期，他們根据主教会的指示落戶在馬賽和巴黎的工人居住区，以监視工人阶級的情緒。繆夫有一时期曾經在馬賽港做裝卸工人，因此他有可能亲自尝試資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妙处。他們这种躬自亲行"走向工人阶級"的結果是出版了二本書，書中他們对自己的观察所得作出了結論和建議，这些結論和建議其后成为他們追随者的綱領②。

繆夫、戈登和丹尼尔在工人中間住过一时期后发現了些什么問题，又得出了什么結論？他們看到了工人阶級是生活在怎样黑暗恶劣的条件下③，如何地遭受残酷的剝削；他們深信，工人們是把教会看作剝削者的奴僕的，而把僧侶則看作是資本家的走狗；他們認为僧侶所进行的反共宣传对工人沒有起应有的影响。他們警告道，如果首先沒有获得工人群众的信任，那么企图影响他們是徒劳无功的。

---

① "宗教与无神論历史問題"，第3期，1956年，第145—151頁。

② 戈登与丹尼尔："法国——教会之国？"巴黎，1950年(初版在1943年，巴黎)；繆夫："无产阶級的使命"。

③ 繆夫把本世紀四十年代的法国工人阶級的生活条件，和一百年前恩格斯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級状况"一書中所說的英国工人阶級的生活条件相比較。

“首先应該博取群众的信任——繆夫劝导僧侶們說。現在在人民与教会之間横着不可踰越的鴻沟。人民确信教会的利益是同富人、业主們的利益相一致的。”[1] 为了博得对教会怀敌意的工人們的信任，繆夫建議利用法国教会在过去曾用以籠絡杜亚列人的老方法[2]。杜亚列人对天主教传教士特別不信任。长时期以来，所有欲使他們信仰基督教的尝試都遭失敗。于是在本世紀之初有一个名为富考尔的修道士决定試行一下以下的方法：他落戶在杜亚列人之中，数年間和他們一起劳动，同他們一样地忍受各种苦难，然而并不試图劝說他們信奉天主教。因之他博得了杜亚列人的信任，随后使他們信了教。多米尼加教派的这些教士建議对法国工人阶級也采取这种战略。他們認为在工人阶級之中有一群教士落戶其間是合理的，这群教士与其說是以言辞影响工人，还不如說以自己的行动影响他們。这些教士們的衣食住行应該同所有的工人們一样，和他共同劳动，至于对待資本家問題上亦应与工人抱同一态度。

“这是事实——繆夫写道——在我們的工人教区中教会（教士，主教，梵蒂岡）有着坏名声：教会被指責不和劳动者的生活相关連，教会利用人民的信任靠信徒来生活……但是，假使教士在工厂中工作，則所有这些責难都化为烏有了。証明能以自己的劳动为自己换取面包的教士，是不可能被責为寄食者的”[3]。

法国主教会在事先得到梵蒂岡的准許后，同意了繆夫及其同伴們的建議。工人教士的活动計划拟訂好了，同时預計到，工人教士的活动要收到效果至少在50年以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年代里，成立了工人教士組織。同多米尼加教派平等地参加这組織的有弗兰西斯克教派、耶稣会和卡普青教派以及其他教派的僧侶。1951—1955年間正当該

---

① “无产阶級的基督教化”，第155頁。

② 杜亚列人为居住在中部撒哈拉和法屬苏丹的巴巴尔族人。

③ “无产阶級的基督教化”，第214頁。

运动处于发展高潮时，参加該运动的教士和修道士約有300人，他們在巴黎最大的工厂中工作，其中包括"雷諾"和"雪鉄龙"工厂，和在位于巴黎近郊所謂"紅色"区域內的企业中工作，如伊夫里、蒙忒、克里姆林—皮赛尔、蒙脫罗兹諸区；以及在位于列黎、里昂、馬賽、土魯斯、波尔多和其他工业中心的工厂中工作。

工人教士居住在工人区中，最好是在工人家庭中租一个角落或一个房間。他們在大工厂中工作，参加統一的工会，服从工会的紀律，参加工会的斗爭。

单独活动的工人教士被称为侨民。每区的侨民組成一个"法兰西传教士团"，它同教区和当地的群众性天主教組織保持联系，首先是同"天主教行动"保持联系。所有的传教士团由"巴黎传教士团"領导，它向法国枢密紅衣主教修尔負責。准备作工人教士的僧侣在設在里士育、里蒙兹和庞蒂尼等地的神学校中受专門訓練。

工人教士規避反共宣传。教会当局忠告他們要象天使般的謙虛，不作自我宣传，以避免造成工人教士的行为是在追求着某种"秘密的"——即政治性的——目的的印象。

这些被資产阶級报紙戏称为"穿着工人工作服的上帝的侍奉們"，其行为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們把自己在工厂中賺得的工資分与周围的人們，以及免費为人举行圣礼，后一事在教会史上是聞所未聞的。"如果我們眞正希望成为誠心誠意为好的教士，希望别人也認为我們是这样的人，那么我們在金錢問題上应該有明确的立場——繆夫关于这个問題写道——我們（即繆夫領导的传教士团——作者）解决了这个問題，我們在教会的大門上悬挂下列通告：

"上帝面前不分穷人和富人。

在这个作为所有人的避难所的教堂里，举行圣礼对于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和免費的。

我們沒有秘密的預算。

任何一个願意担負教区支出的人，可以不具名地尽你一份力量。

每月底我們的預算貼在教堂的入口处"①。

1947年，教会当局在比利时煤矿中心沙勒尔瓦召开了工人教士运动大会。在大会上除了有人发表演說，提醒說工人教士的首要責任为教会服务和忠誠于教会領导外，还听到这种呼声：号召同工人阶級忠誠合作反对資产阶級。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教士保罗·布尔齐的演說，他号召天主教徒"或者与迄今已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伟大的工人解放运动合作，或者起来保卫以現金存款为基础的侵略性經济制度，在这二者之間，作出最后的选择"②。根据布尔齐的意見，教会假使与业已日暮途穷的資产阶級連結在一起，那是个錯誤，它应該指望无产阶級，因为未来是屬于他們的。布尔齐說：

"資产阶級不是起源于上帝的；現在的革命将要审查統治阶級的干部。假如为了保証工人群众的解放和为了工人群众的安全，必須改組統治阶級的結构时（即以工人代替資本家——作者），我們不知道根据哪一条基督的原理有权利禁止这样做"③。

教会当局起先对工人教士运动显然是表示眷顧的。縱令从这一事实也可得到証明，即沙勒尔瓦大会的会議速記稿在1948年以法文出版，其后譯成意大利文，并由勃列沙市的教会印刷局在1950年出版。

显而易見，梵蒂岡在将共产党人逐出教会以后，期望工人教士的这些"左傾"言論能証明教会对劳动者的专爱，能离間工人脫离共产主义。但教会的上层份子既然認为这些言論不过是权术，而以后的事件也証明，許多普通教士根本不想昧自己的良心，他們真誠地希望同工人阶級合作，参加他們的解放斗爭。

---

① "无产阶級的基督教化"，第211頁。

② 同上，第331頁。

③ 同上，第234頁。

1948年法国国民陣綫政府被拆散，这政府包括有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接着上台的是資产阶級—教权派政府。工人阶級經过无数牺牲而取得的国际工会团結，重新被破坏。同盟国在反法西斯和反納粹斗爭中的合作关系，被美国侵略集团及其欧洲附庸国的反苏反人民民主国家的集团組織、被复活德国軍国主义的計划所代替了。

所有这些变化使工人教士面临着一个問題：在新的形势下采取什么路綫？追随梵蒂岡的榜样和公开敌对共产党人呢？还是繼續留在統一的工会中，以証明不是所有的僧侶都反对工人阶級，也还有不理教会当局的路綫而支持工人运动的教士存在着？

教会当局命令工人教士仍旧留在自己的崗位上，不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因此，就产生了难以置信的情况：梵蒂岡号召同共产党人作斗爭，而在同一时期內工人教士就是同那些作为斗爭对象的共产党人，友誼地团結在統一的工会中工作，同时又得到梵蒂岡的支持。另一方面，工人教士繼續参加統一的工会所領导的罢工，贊成禁止原子弹，反对在越南进行“骯脏战爭”和反对人民共和党的首領及工会的分裂派份子。工人教士的这种活动愈来愈引起法国統治集团的恼怒。这反映在反动报刊上，原来对工人教士的讚揚，說他們是“上帝的首先贊成者”，現在被对他們的斥責所代替。法国壟断資本的报紙“震旦报”特别暴跳如雷，它对工人教士和支持他們的活动的多米尼加教派进行了有計划的攻击宣传。这家报紙甚至宣布巴黎的多米尼加寺院是“馬克思主义的窠穴和共产主义的溫床”，而工人教士則是“共产党情报局的代理人”。美国的反动报刊也参与对工人教士的討伐宣传。

1952年5月28日，巴黎人民走上街头反对臭名远揚的美国將軍李奇微来到法国首都，李奇微在朝鮮战爭时期的行径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憤怒。教权派份子皮杜尔手下的警察以武器对付憤怒的巴黎市民。警察暴行的受难者之中有两位工人教

士布凡和卡恩，根据警察的声明，他們是"同一群抗議示威的共产党人"一起被捕的。两位教士虽然曾向警察說明他們是僧侶，然而仍被警察残忍地痛打了一頓。

受难的教士們在談到他們在警察署的遭遇时，叙述說："我們一到那里，他們既不問又不看我們的証件，就开始打我們。将近有二十个警察冲向我們，用拳头、橡皮棍和脚乱打乱踢，主要是打头部。我們被推倒在地板上，又被强迫重新站起来，不管我們已經血流滿面，繼續毆打，直到我們混身是血，面部青肿得不可辨認，差不多失去知覚和根本无力反抗时为止。以后我們被沿着楼梯拖到地窖中。我們之中有一个人，他的臉被打得連眼睛和嘴巴都张不开……

我們漸漸地恢复了知覚。有一个警察专員走来問，'覚得好些沒有？我覚得抱歉，連你們也挨了揍'。'什么，如果可以打别人的話'，貝尔納說（教士中的一人——作者），'那么我們即使祇有一次能够同那些总是被拷問和被磨折的人們在一起受难，也是滿意的……'。

此后我們被領到一楼和其他十三个同志监禁在一起。其中有些人臉上青肿不堪，淤血斑斑，有一个人衬衫上全是血（因在警察署或警車中被打）。警察不給飲食給我們，并且不准将自己的情况通知任何人。并不是所有被捕者都是示威游行的参加者，可是大家全被警察打了。

有两个共和国保安軍的宪兵走到监禁室的鉄檻旁嘲笑我們：'难道教士可以这样嗎……暴徒……脏貨……堕落者……'等等……

我們由于疼痛而变得迟鈍了，坐在长凳上过夜，一方面听着对自己的'工作'表示滿意的警察們快活地談笑……

早晨九时，貝尔納被喚到一个警官面前：

——这也算是个神甫！我以前是教会中学校学生，是个基督徒。你是暴力的拥护者，不是友爱的拥护者。

他立刻取了鉄板①，用它打貝尔納的背。

貝尔納：——我从来不曾宣传过用暴力。可是我了解他們，当他們被煽动的时候。

警官：——你沒有受到足够的教訓，下賤貨，紅色神甫，你的圣父在莫斯科，現在我給你看。

他从架子上拿一根橡皮棍，狂暴地用来打貝尔納，一面說：‘我尊敬教士，但不尊敬人’。

——应該尊敬人。

这时候在場的一个穿民警制服的說：

——您听着，我們都是弟兄，您也是我們的弟兄。

——我同意。我和昨晚和我在一起的同志們每天都在証明我們应友爱，因为我們生活在一起。可是当我在这里被你們打了以后，我能相信你們的友爱嗎？我覺得最伤心不过的是你們称自己为基督徒，大概你們是上教堂行弥撒礼和受圣餐的，然而却毆打我，毆打一个教士（在这天早晨其他的同志們沒有挨打。挨打的只有我們，教士們）。

我将这事通知高僧菲尔頓（巴黎大主教、紅衣主教菲尔頓，他是紅衣主教修尔的侄子——作者），——警官說。

——好吧！他会听你們的，然而也会听我們的。

——共产党人！

——昨天在示威游行中我看見了許多基督徒——他們根本不是共产党人——和其他一些工人教士。

——我贊揚过工人教士，然而現在，不管我在哪里，我将尽力地伤害你們。

貝尔納再也不回答警察的話，因为恐怕继續挨打。

另一个教士被带了进来……

——你昨天在哪里？

① 这是指示威游行者撕下来的商店挂在外边的招牌，用来挡警棍的。

——昨天我和我的同志們在一起，我是在帮助受伤的人的时候被捕的。

——废物！你宣传暴力，而不是友爱。

警察給教士看一小块鉄板，繼續問道：

——你贊成这个嗎？

——不，我不贊成，然而我了解。

——你不贊成嗎？

警察用鉄板打教士的腹部。

——滾出去，滾出去……

教士轉着身子躲讓，警察用尽全力用脚踢他的腰部。这是所有毆打方法中最厉害的一种"①。

教士布凡和卡恩的眞实而簡短的故事証明，当教士站在工人一方时，他在"基督秩序"的守护者眼中便变成了政治犯，警察可以为所欲为地用橡皮棍打他，象毆打保卫自己权利的工人一样。

巴黎大主教、紅衣主教菲尔頓被迫对警察罪行提出抗議。除此而外，出来保护布凡和卡恩的还有法国主教会書記夏罗哀，"巴黎传教士团"的領导人修道院院长霍兰，巴黎教区的教士和其他教会活动家。

1953年8月，法国碼头工人举行罢工，要求立即結束印度支那战爭。天主教各工会的領导者反对举行罢工。当时有一批工人教士发表了一个声明，痛斥天主教工会的主席泰西叶是叛徒和工賊。泰西叶的答复是到法院去告状，控告声明的作者們誹謗他。环繞着这一事件所进行的論战，迫使泰西叶辞职。

这些事件使梵蒂岡当局感到忧虑，梵蒂岡早就不安地注視着工人教士們的活动，和企图緩和他們的"热忱"。1953年9月，紅衣主教披薩尔杜根据教皇的訓令发給法国主教会一份通

---

① "工人教士"，巴黎，1954年，第193—197頁。

知，命令立即解散"法兰西传教士团"和召归所有在工厂和其他处所工作的工人教士，其理由为工人教士这一制度未曾証明自己是正确的，它沒有为天主教会帶来益处，相反地却帶来了害处。

梵蒂岡的迫害是出于政治原因。"工人教士們被指責不够反共——雅克·杜克洛关于这一决定写道——梵蒂岡提出这种責难显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看得很清楚，我們的党首先是保卫劳动者和反对复活德国軍国主义的。梵蒂岡的非难并不是出于宗教的前提，而首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①

1953年10月5日，工人教士通过了一份致紅衣主教菲尔頓的宣言。我們从这一个在今日仍不失其現实性的文件，适当地摘录以下一些文句以供参考：

"我們处身在工人之間学得了許多东西。我們的僧侶們因只从一方面观察問題，所以这一点他們很难了解。

我們已經懂得，工人阶級为了要在这个社会中获得即使一点点的自由，他們的活动必須是有組織和有意識的，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有利于进行剝削的条件統治着一切，个人自由不过是一种欺騙。我們現在懂得，无产者沒有阶級覚悟、沒有自己的組織是任何时候也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敌人从四面八方围攻他，如果敌人不是在質和量两方面比他强百倍的話，那么至少在拥有进行奴役和压迫的工具方面比无产者强：从进行公开和残酷的斗爭一直到进行伪善的友爱宣传和散布宗教麻醉剂。我們想到，我們的責任是同意有阶級覚悟的工人的观点，和参加他們的有組織活动……

我們已經懂得，教会所鼓吹的社会学說常常是引向出卖工人阶級，引向出卖工人阶級的合法利益的……

我們已經懂得，正与某些断言相反，工人阶級的斗爭既是由

---

① "共产党人杂志"，第3期，巴黎，1954年，第189頁。

于純粹的物質要求所引起，同时又由于对于人的尊严的焦虑所促使，因为工人阶級同时又为新的人与人之間的关系，为改变生活条件和建立新的人类社会而斗爭……

我們因积极地参加工人斗爭而被譴責，这只是因为教会及其大部份制度和僧侶所保卫的制度，正是我們和工人阶級所全力反对的，認为这制度已經腐朽和不合理；

应該勇敢地面向事实：教会是支持这一制度的……

教会只不过在理論上譴責資本主义。在实际活动中教会不仅承認这个制度，并且还同它合作。工人們是不会对这事实抱任何怀疑态度的。我們更不必談到教会的学說、政策和教会当局的措施是支持資本主义的。难道一个其全部教养被資产阶級文化所浸透的教士，是天然不对資本主义表示好感的嗎？

有人对我們說，应該承認資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罪恶，因为教会是在資本主义世界中存在着和活动着的，正如教会过去曾在封建社会中活动过一样。然而那些抱这种論調的人极为清楚地知道——虽然也感到深深的不安，世界上有一半人口实际上已抛弃了这一制度……要知道甚至資本主义各国內部的广大无产者群众，在他們的心中也不承認这个制度，他們是这个制度的犧牲者。

教会感覚到人們将把这制度連同教会一起抛弃掉，它开始惧怕工人阶級，惧怕无产阶級的胜利，惧怕无产阶級的胜利在社会制度、生活、人們的意識各方面发生的变化；教会对鼓舞着无产阶級胜利的步伐、激励着无产阶級的革命力量和为无产阶級指出美好前景的共产主义特别恐惧。"①

大多数工人教士所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些。关于这些教士，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員罗伯特·貝尔納斯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地談到：他們是被謹愼地挑选出来和受过严格訓練的，教会当

---

① "工人教士"，第230—234頁。

局曾認为他們是“可靠的反共分子”①。当他們自身經历了資本主义剝削的一切残酷以后，他們的反共思想就化为烏有了。

法国主教会在收到如此慷慨淋漓的宣言以后，通知梵蒂岡說，突然解散工人教士运动将受到他們的反对，和引起法国天主教广大阶层的憤慨。

事实上果眞如此，披薩尔杜的通知在报紙上传播以后，引起了天主教阶层对教皇决定广泛的抗議。著名的天主教作家和活动家法朗索·莫里阿、丹尼尔·劳泼斯、爱汀·鮑恩、乔治·戈登和其他人在报刊上著文为工人教士辯护。

甚至某些資产阶級报紙，如“費加罗报”和“世界报”也站在工人教士一边。

自由主义天主教徒办的一份有相当影响的杂志“灵魂月刊”积极支持工人教士。这份杂志的編輯部在評論教皇取締工人教士运动的命令时，据說工人教士被共产主义精神所感染了，嘲諷地要求教皇也制裁資本家—教士，即制裁那些为資本家集团服务的牧师，因为他們早巳感染上資本主义精神了，不但如此，其中許多人巳經自己成为資本家。“广大公众——‘灵魂月刊’写道——可能只知道一些由資本家—教士領导的企业，資本家—教士和选择剝削者地位的那些人一样，为了更好地了解工人阶級，为了更好地对他們进行估价，他們决定挤身于資本主义集团之列。資本家—教士有着优越的条件，以証实教皇在通諭中所宣布的教会社会学說是有根据和实际可行的，不过这些通諭早被人們忘記得干干凈淨了。然而，可惜得很，同样的原因会引起同样的后果，同时最善良的意图会引人入地獄。一些工人教士落入了共产主义的圈套，而許多資本家—教士則忽然发覺自己处身在一般資本主义的捕鼠机中……似乎資本家—教士中的某些人早巳身为資本家了。他們不但付給被他們看作自己僕人的職

① 罗伯特·貝尔納斯：“法国工人教士”（“国际新聞”，紐約，1955年1月号，第33頁）。

工們以极低的薪金，同时还利用自己的神职身份更好地剝削他們。工人监工为了尊敬这些資本家一教士的袈裟，极願意把心怀不滿的工人的姓名报告他們。工会运动，甚至基督教的工人运动，在他們的企业中是被禁止的，但資本家一教士自己却不拒絕参加制造商同业公会……”①

如此亲近教会的人士們的这种言論，迫使梵蒂岡声明，关于工人教士的最終决定目前还沒有作出，尙待仔細研究后再作最終决定。梵蒂岡随即撤換了法国多米尼教派的领导人②（包括修道院院长兴拿、波阿賽洛、康茄尔、菲列）。1954年1月召开的法国主教会会議上，主教会根据梵蒂岡的訓令宣布“教士的职业是和工人的职业相抵触的”。主教会会議命令工人教士立即辞去被工人們选上的“世俗职务”（即指工会中的工作），而在工厂中的工作则保留到1954年3月1日为止。主教会責令教士們在今后如要进行“体力劳动”时，則每次应得到教会当局特别許可，特别許可规定的劳动时数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会議的决議还指示道，研究工人問題的教士今后受乡鎮小教区教士的管轄，并且不得和工人住在一起，而住在乡鎮小教区的教士只有在得到教会首长的同意后才能离开教区。

虽然有着最后两段“妥协性”的规定，事情很明白，主教会的决定意味着取消工人教士运动，而他們在政治上同情工人阶級是引起这个决定的原因。正因为这一点已經是众所周知，所以主教們否認他們的决定有着政治背景。他們劝說工人教士們“不要听信說我們的决定是由于政治問題的原因的那些人的話。你們不要怀疑你們的主教們的忠誠。他們是站在上帝面前，上帝将审判他們，他們断言决无政治原因在內，而全然出于宗教原因……”。七十三位工人教士——其后差不多所有的工人教士都

① “灵魂月刊”，第12期，1954年，第788—789頁。

② 1954年多米尼加教派的将軍如謎地死去以后（他是因汽車失事身死的），接替这一位置的是英国人麦克合尔莫。

参加了（除了七个耶稣会徒和一批在列黎工作的工人教士）——公布了他們对主教們的答复信，这封信如同他們以前发表的宣言一样，証明在僧侶的某些阶层中在思潮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教士們在答复信中写道：

“当法国和国外千百万工人为自己队伍的团結一致而斗爭，以保卫自己的面包、自由与和平的时刻；当工厂主和政府加强剝削和迫害，企图不惜代价保証不失去自己的特权和堵塞工人阶級进步的道路的时候——教会当局想强迫工人教士脱离劳动，使他們脱离和所有自己的同志們团結一致地进行着的斗爭。

主教們断言这不是政治措施，而是宗教措施。然而我們認为，我們的工人生活从来不曾妨碍我們的信心，妨碍我們的教职。我們不能理解，为了福音的緣故如何可以禁止教士同千百万被奴役的人們共甘苦，如何可以禁止他們在斗爭中表示和工人是团結一致的。

工人阶級需要的不是那些确認它是处于貧困状态的人們，而是需要那些能和它共同斗爭，抱同一目的的人們。”①

1954年2月7日，250位天主教徒—工人运动活动家也发表了宣言書，反对解散工人教士②。

其他許多牧师也支持工人教士，他們不怕在报紙上发表声明，为志願同工人連結在一起的同行們辯护。下面所援引的一篇文章，可以很好地說明今日在法国外省僧侶中占統治地位的一种情緒。

上加隆省的一个乡村小教区的司祭裴波阿，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封信，写道：

“工人教士現在被譴責了，可是对那些官員—教士，記者—教士和政治家—教士又該如何对待呢？为什么允許教士对‘資产阶級的道德’讓步，而教士与工人之間的互讓却認为是不可能

① “团結报”，罗馬，1954年2月4日。

② 吉尔柏·馬利：“工人教士的任务”（“国际新聞”，巴黎，1954年5月号）。

的呢？

全是废話，——阶級斗爭——这才是事实，虽則是值得遺憾的事实，但是究竟是事实……"①

从拥有亿万美元的梵蒂岡来說，它对教士的責任的理解，和依靠自己教区內信徒的贈金为生的上加隆省普通乡村教士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梵蒂岡对天主教报刊中凡同情和平运动与工人教士运动者，也都橫加迫害。法国天主教"双周"杂志在1955年1月29日被梵蒂岡列入"禁書目录"之中②。

"双周"杂志創刊于1950年，它很快地博得了工人教徒和知識分子教徒的同情。这本杂志与梵蒂岡和法国主教会的官方路綫相对抗，它反对在越南进行的"骯脏战爭"，反对重新武装德国，贊成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与共产党的工人所領导的工会团結一致，贊成天主教徒参加国际和平运动。然而"双周"在其他許多問題方面，仍然抱着教会传統的观点。

"双周"杂志的工作人員是屬于战后一代的天主教活动家之列的，其中的某些人曾积极地参加过抵抗运动。他們全都是宗教界人士，决不是否定教会的信条和罗馬教皇威权的人。这只要从他們服从梵蒂岡的决定，和停刊了自己的杂志一点就可以看出。但是他們以此为出发点的，即他們对天主教教理的信仰和忠誠，与同共产党人站在統一战綫上为爭取和平和社会进步而斗爭这回事是完全可相容的；他們認为教会能够保持它对群众的影响，如果天主教徒在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劳动者中(大部份这种劳动者是在法国)不是孤立的，而是同他們共同为和平与社会公平而斗爭的話。

---

① "团結报"，罗馬，1954年2月9日。

② "双周"为法国天主教第二大杂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梵蒂岡所查禁。1948年被列入"禁書目录"的尚有进步的天主教杂志，"教会的青春"运动的机关刊物"趋向"。

"双周"既沒有得到法国主教会的支持，又沒有得到梵蒂岡的支持。尙在1952年11月时，法国的紅衣主教和大主教会議曾执行梵蒂岡的訓令，警告"天主教行动"的成員不得追隨該杂志的路綫。

1954年3月11日，主教会議又一次譴責"双周"杂志。1954年4月9日，"罗馬观察家"著文攻击这本法国杂志，責备它在討論"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的合作这样一个复杂的問題时"，沒有考慮梵蒂岡关于把共产党人逐出教会的指示。

"双周"不管梵蒂岡对它抱着明显的敌对态度，繼續勇敢地拥护和平，贊成工人教徒，同共产党人在为劳动者的权利而斗爭的时候行动一致。梵蒂岡的答复是把这本杂志列入"禁書目录"。

"双周"的編輯部服从了梵蒂岡的决定，并停止刊行这本杂志。然而在最后一期中杂志的編輯部指出，它認为杂志所抱的政治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不放弃自己的理想。編輯部在"致讀者信"中声言："我們忠实于教会，我們同样程度地忠实于我們对自己的在劳动和工作中的同志們所負的一切責任，不管他們是誰。对于我們来說，放弃我們已經发表过的观点，或者放弃我們認为工人应团結一致的主张，是不可能的。在工人阶級或殖民地人民的解放問題上，在爭取和平或爭取教育的民主化問題上——在这些旨在提高人类福祉，促使社会公平和广泛传播文化的巨大的努力面前，二十世紀的基督徒沒有权利做一个袖手旁观的观众。"①

該杂志的編輯安利·爱尔芒登載在同一期杂志上的文章是值得大为注意的："統一各种人民力量的行动是劳动者唯一的希望"。文章作者說道："我們曾极明确地断言过，反共显然不是走向民族独立的最好途径，相反地却是失去民族独立的最好方

① "双周"，第98—99期，巴黎，1955年3月。

法。我們同样断言过，脫离群众的和缺乏明确主义的知識份子运动，是注定要遭到失敗的。至于論及民族独立問題，則只有在所有的各种人民力量，在所有的党派及其代表——包括共产党在內——的通力合作之下方能贏得。

我們在最初就是以这种立場为依据进行我們所有的政治性宣传的。現在象我們这样地在議論着的人，要比开始时多得多。当然路途上滿布障碍物，使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接近我們不是那么容易，所有的不信任和宿嫌不可能立刻消除掉……。

因此，应該作出結論說，不管所有各种人民力量在联合过程中将会碰到困难，然而所有各种人民力量的联合在将来仍旧是劳动者的唯一希望。我們将沿着这条道路繼續我們的政治活动。"①

"双周"杂志和工人教士运动的被梵蒂冈所譴責，并不使人惊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实，即在天主教陣营中产生了一些如此进步的团体，它們坚持着与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友好以及共同进行斗争这种理想。

工人教士和"双周"杂志的历史，再一次地証实了在法国教权派陣营內有着一股进步的潮流，屬于这流派的人士正在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最富有侵略性的集团的忠实走狗、法国主教会反动的多数派和人民共和党的首領們而斗争着。

法国天主教徒中的进步派不顧种种迫害繼續在发展着。法国天主教杂志"灵魂月刊"、"快报"和"基督圣書周刊"上刊登的拥护禁止原子武装、反对殖民主义、贊成国际合作的文章就証实了这一点。

意大利天主教陣营也經历着如同发生在法国的那种危机。在意大利天主教徒对教会当局和天主教民主党的右翼首領們的反动政策，愈来愈强烈地表示不滿和憤怒。

① "双周"，第98—99期，巴黎，1955年3月1日。

为了正确地理解今日天主教民主党党内的矛盾，必须知道該党內部各种力量間的关系。这些力量可以划为四派：保守力量，天主教民主党的領导权掌握在他們的手中；相信天主教民主党領导机关的人民力量；不相信天主教民主党領导机关的人民力量，然而这一派認为他們能在党內改变党的現行战綫；最后一派的人民力量認为必須建立新的同盟来改变党的現行方針①。最后几派的影响正在不断地扩大着。

意大利的报紙宣布，梵蒂岡的上层人物分成两派：一派是传統政策的拥护者，其首脑是国务卿助理塔基尼；一派是"新的"更具有弹性的政策的拥护者，其首脑是塔基尼以前的同事、現为米兰大主教的蒙悌尼，教皇据說是傾向于他一方面的。至于在天主教民主党中，則第一种傾向的領导者是加斯貝利，而第二种傾向是以現总書記范范尼为代表。

"新方針"的拥护者們将自己打扮成工人的朋友，然而完全不想牺牲資产阶級的利益。例如，蒙悌尼警告教会中的"社会"活动家們說："揭发劳动或生活方面某些不合理条件的人，应該随时謹防可能因他的言行而使原来的事实被夸张。爱护自己的劳动弟兄或为他們而工作，甚至于有时甘为他們而牺牲自己职位的人，同样应該抛弃对阶級精神有致命性危险的坚信不渝的态度。"②

梵蒂岡懂得，在一个經常有二百万失业者大軍和存在着强大的共产党以及强大的工会运动蓬勃开展着的国家里，进行基督教的以社会問題为內容的蠱惑性宣传是利弊相兼的。然而以社会問題为內容的蠱惑性宣传是教会手中的武器，教会依靠了它方能希望保持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因此，梵蒂岡被迫运用它，可是其效果却每況愈下。

---

① 隆哥："意大利共产党人为自由、和平与向左轉而斗爭"（"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5年8月5日）。

② "罗馬观察家"，1954年6月2日。

我們援引几个典型性的例子来說明。

差不多抱着与法国僧侶組織工人教士运动同样的目的，在大多数居民投左翼政党票的爱米里省里，在1950年时根据当地大主教、現紅衣主教列卡洛的倡議，成立了一个由經过特别挑选的修道士組成的組織，以与共产主义对工人阶級的影响作斗爭。这一組織称"兄弟会"，它以主教会为据点，拥有汽車、无綫电广播設备、活动电影放映設备和其他宣传工具。"兄弟会"乘着車輛在各省間穿梭地巡行，它主要在发生罢工和业主停閉企业的地方活动，罢工和业主停閉企业是今日意大利的平常事。人民因为这些修道士的机动性高，就給他們起了个"飞行教士"的綽号。他們的手头常用書不是福音書，而是一本就其書名而言即类似某种綱領却不象書的"基督教革命教义問答"。的确，这本書根本沒有談到革命，然而它和其他以社会問題为內容的現代教会書籍比較时，就从它要求工人和业主間的关系应以"絕对公平"为原則，而不以"基督的美德"为原則这一点而言，就远为特出的了。"基督教革命教义問答"認为，信徒应該支持"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

資产阶級教权派的記者們与他們的法国同行最初对待工人教士的态度一样，起初讚揚"飞行教士"的活动，誉之为"反对共产主义的自由之箭"、"教会的突击队"、"紅衣主教列卡洛的别动队"和其他意义重大的别名。資产阶級报刊对"兄弟会"的热情不久就下降了。过了一个时期以后，关于"兄弟会"流传着一些"不体面"的謠言：与其說"兄弟会"在与共产主义影响作斗爭，还不如說它在协助共产主义得到流广。紅衣主教列卡洛本人也惹得梵蒂岡不滿起来，因为他发表了一个号召禁止使用原子、化学和細菌武器的宣言。（罗馬教皇直到1955年年底方才发表同样的宣言）。"飞行教士"的首領貝納索牧师对"前进报"記者所作的新年談話（1953年年底），引起了梵蒂岡上层人物更大的不滿，貝納索說，"在通向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者（左翼人士——作者）

合作，以解决在革新我們的社会体制时所遇到的最根本和最恼人的問題的道路上”[1]，他認为沒有什么障碍。

意大利的教会当局同其他各国的一样，惧怕从事社会工作的教士們卷入劳动者为达到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斗爭中，惧怕他們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1953年，梵蒂岡当时的国务卿助理蒙悌尼向教会中所有从事社会工作的神职人員发出一封信，写道：

“讓所有对社会問題深感兴趣的教士們不要在馬克思主义理論的誘惑面前讓步，不要認为馬克思主义理論从学說和实践两方面看来都是唯一正确的。”[2]

如果意大利尚有在“馬克思主义理論的誘惑前”讓步的教士，那么在人民民主国家之中千百位普通教士欢迎社会主义建設，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資产阶級宣传机关成年累月地攻击共产党人，似乎他們用武力强迫社会主义各国中的僧侶們贊成人民政权，这种誹謗和讕言难道不是只消引用蒙悌尼的这一封信就可以揭穿的嗎？

在工人教士問題上和类似的从事社会工作教士問題上极明显地表現出来的种种矛盾，不仅在劳动者之中使梵蒂岡的眞面目被迫自行揭穿和使梵蒂岡的威信低落，即在僧侶間情况也是如此，在慈善事业活动領域內也感覚到存在着这些矛盾，大家知道，梵蒂岡在經营慈善事业方面累积着数百年的丰富經驗。

过去年代里，教会的慈善事业在不小的程度上有助于僧侶在社会各阶层中維系他們的威望，有助于隐瞞教会权貴們所固有的为大家所熟知的恶习，例如崇尚奢华，揮霍无度，貪婪无厌，自私自利等等。教会对僧侶中个别人物的善行大为宣传，以为僧侶們普遍的淫蕩生活辯护。

然而慈善事业早已衰頹不振了。在現代条件之下，群众要

① “前进报”，罗馬，1953年12月31日。

② “紐約时报”，1953年9月13日。

求的是社会公平，而不是施舍救济。那些仍然决定用布施这种办法医治資产阶級社会各种毛病的教士們，他們迟早会不得不向自己提問：能不能既保护了被剝削者的利益，又不責备他們的剝削者呢？意大利的一位叫做齐諾·薩尔蒂尼牧师(在意大利人們通常称他为頓·齐諾)的历史，証明了不可能不产生这种問題[1]。

1953年在都灵出版了一本不大的書，書名为"我們不同意"[2]。書的黄色封面上印着几张照片。中央印的是我們前面提到过的頓·齐諾，一側印的是几个宪兵，另一側印的是典型的集中营的小木板房和几个形容憔悴的兒童。这些人象征性地以梵蒂岡旗帜的顏色作为衬底（梵蒂岡国以黄色为其标志），是与書的內容有着直接的联系的。这本書引起了意大利天主教界相当热烈的討論。

齐諾·薩尔蒂尼牧师是在已相当成熟的年令时开始其宗教活动的——在1931年，当时他是一个律师并有着相当多的主顧，他决定做一个牧师，献身于教养孤兒和所謂"非婚生嬰兒"的事业，后者在意大利通常是被弃放在寺院門口或教堂的入口处的，这样做的不但有未婚的母亲，也有許多在穷困的逼迫下感到絕望的父母們。

頓·齐諾是在战后始获声名的。战后他收容了近千个无家可归的兒童和几百个无資財工具可以为生的难民，和他們一起定居在爱米里省的一个叫福斯考尔小地方的前德国人筑造的集中营中。

頓·齐諾把自己的"家庭"——他是这样称自己組織起来的公社的——分成几个工作队，每个工作队中有着成年人——"使徒"和兒童——"小使徒"。这个公社中禁止利用姓氏，私人財产是被废除的；这样一些字也是被废除的，如"您"、"你的"、"我

① "頓"这个头銜在意大利一般是僧侶和貴族所有的。

② 頓齐諾·薩尔蒂尼："我們不同意!"都灵，1953年。

的"、"金錢"。公社开設了一些手工艺工場，和在頓·齐諾用自己募捐得来的錢买来的土地上种植蔬菜，然后卖出換錢。所有的收入归公社的公共金庫所有，并在其成員們中平均分配。这个"家庭"的領导是以頓·齐諾为首的由所有"使徒"选出来的委員会。公社定名为瑙瑪台尔斐亚(取自希腊文，意为"友爱城")。

公社的活动起初是在天主教神秘主义和宗教"灵感"的标志下进行的。頓·齐諾認为，在瑙瑪台尔斐亚之中，他有可能使以四海之內皆兄弟和社会平等为基础的早期基督教公社重見于世。

梵蒂岡的宣传机构也广为传播关于瑙瑪台尔斐亚的这种思想，并对薩尔蒂尼的奇思十分欣賞。教皇和教会中的权貴們曾不止一次地在梵蒂岡接見他。每次接見伴随着广告性的喧嚣，其热烈程度应足以表示出教会和教皇对瑙瑪台尔斐亚的眷顧。天主教民主党的領袖們，其中的某些人頓·齐諾尙在他执行律师业务的时候已有友誼关系，也不惜紙墨对他大事頌揚。甚至于当时的米兰大主教、紅衣主教舒斯脫，一个著名的反动份子和倫巴蒂亚百万富翁的朋友，也对薩尔蒂尼表示善意。以披列里公爵夫人为首的上流社会的夫人們和工厂主及銀行家的太太們組織了一个支援瑙瑪台尔斐亚的委員会。同頓·齐諾交往和訪問瑙瑪台尔斐亚一时成为名流社会中的风尙。

薩尔蒂尼在梵蒂岡和米兰資本家集团中能得到成功，其中有着隐秘的內情。我們前面已經提及过，瑙瑪台尔斐亚設在爱米里省，它因系意大利最"紅色"的省份之一而見称。"飞行教士"就是在这一省中活跃着的。依据教会当局的意图，頓·齐諾的活动应成为一个明显的例子，它能証明天主教会和天主教民主党政府不但眷顧穷人，并且还实行"眞正的"共产主义，何况是通过"和善的"途径进行的，不"委屈"資本家，甚至于几乎不用資本家帮一点点忙。

可是不多久以后，那些贊美过薩尔蒂尼的报紙开始暗中誹

謗，說他对自己的任务自我陶醉和当真以“使徒”自負，說他憑借梵蒂岡和有产阶級的財政支援，揮金如土和开空头支票。有一个資产阶級的新聞記者宣称，頓·齐諾对为他所討厌的債权人慣用的答复是：“請您感謝上天，因为我沒有付还您錢。穷人們欠您的債愈多，您愈是容易进入天国”。

这就是頓·齐諾的庇护人对他的热情开始低落的原因。

意大利各地区的孤兒和无家可归的人因为受教权派报刊天花乱墜的宣传所迷惑，群相湧至“友爱城”。頓·齐諾异常热烈地欢迎他們的来到，齐諾使他們相信，“圣灵”将会养活所有人。然而“圣灵”表現了不可原諒的吝嗇。事情在于无論梵蒂岡，无論天主教民主党政府，无論米兰的百万巨富們，都不准备为实現頓·齐諾的意向而花大錢。他們原先准备捐助一些錢，其数額仅足以維持一个不大的、“很体面的”示范性的济貧院，而連贍养一千个意大利的弃兒和无家可归的人都不願意。

終于有一日頓·齐諾在經济上入不敷出，无法保証供給“使徒們”以每日的面包了。虽然瑙瑪台尔斐亚的奠基人竭尽全力为公社的成員們建立正常的生活条件，可是飢餓开始經常地訪問他們。

頓·齐諾对自己的公社忠心耿耿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报紙上曾报导过，有一天公社中的一个成員在祈祷时因飢餓而昏厥过去，頓·齐諾脫下了自己的袈裟連同教会的家俱一起送进当鋪，以換得的錢为自己公社中的成員买面包。然而这些英雄行为不能解决瑙瑪台尔斐亚的穷困問題。公社因为沒有貸款，很快就要破产了。薩尔蒂尼請求自己的施主增加捐款，他用地獄威胁他們，又用共产主义会来到进行恐吓，他要求的不是数量微小的施舍，而是上百万的錢（瑙瑪台尔斐亚在1953年初的赤字为4亿3千6百万里拉，約合75万美元），然而人們对他揮手，象赶走討厌的蒼蝇一样。

最后頓·齐諾忍耐不住了，他率領了全公社的人到最近的

城市靡登納去，在那里冲进了省长的官邸，要求立即付予一千万里拉，并以“革命”来威胁。省长召集了宪兵和軍队以防万一，并打电話給当时的內政部长謝尔巴。謝尔巴答应付給一千万里拉，然而决不原諒薩尔蒂尼的这一举动。

这个瑙瑪台尔斐亚的倡办人早就不合謝尔巴的脾胃。警察曾不止一次地报告他說，薩尔蒂尼不积极地反对共产党人，說他縱容“革命活动”；說在瑙瑪台尔斐亚“共产党的代理人”在領导一切。謝尔巴有一次曾亲自訪問瑙瑪台尔斐亚。这次訪問使他失望了，因为飢餓的“使徒們”毫不热情地接待这位教权派部长。謝尔巴为了对他們再进行一次測驗，所以在瑙瑪台尔斐亚設了一个选举区。选举后計算选票时，竟沒有一个“使徒”(1)投天主教民主党的票。这次选举的結果最終地决定了“友爱城”及其創立者薩尔蒂尼神甫的命运。

庇护十二世先前曾声称“教皇支持頓·齐諾”，可是他任命一个以紅衣主教勃尔貢契尼·杜卡为首的委員会对瑙瑪台尔斐亚进行調查。頓·齐諾被召到“圣办公厅”(宗教审判厅)秘書紅衣主教披薩尔杜面前受审問。意大利报紙报导說，披薩尔杜企图說服薩尔蒂尼不要因他們錢似乎不够而坚持要梵蒂岡和政府給予援助，即使有錢，也应用之于进行反对共产主义的活动。甚至当确有多余的錢的話，花来帮助需要者也是毫无意义的。披薩尔杜这样断言，因为企图根除貧穷現象和上帝为了懲罰亚当和夏娃的原罪而降之于人間的其他罪恶，是徒劳无益的。

这位紅衣主教和宗教审判官教导頓·齐諾說，企图在人間建立公平合理的社会是“共产主义的”邪說，因为在人間果眞能使各种事情公平合理，那末就沒有必要贖罪，从而教会本身的存在也是多余的了。教会的教理教导說，应該对罪恶忍耐和相信来世的公平。你在人間所受的苦难和地獄般的折磨在天国中将百倍地以幸福重报。对于这一点頓·齐諾半信半疑地問道：如果这是事实，那末为什么教皇和紅衣主教們，特別是紅衣主教披薩

尔杜本人，总是千方百計地逃避人世間的苦难宁願享受人間的幸福——难道他們不相信天国和不願意进入天国嗎？

这番談話的結果是对頓·齐諾不利的。資产阶級的报紙繼續刊登反对他的恶意宣传。有人散布謠言說頓·齐諾“被恶魔迷住了”，簡单地說，他是个疯子。債权人到法院控告他蓄意不还債，而早先百般捧他的紅衣主教舒斯脫发表了一个声明，譴責公社社員“不良的”思想和禁止天主教徒支持他們的“反教会的計謀”。1953年3月，紅衣主教勃尔貢契尼·杜卡召瑙瑪台尔斐亚的創办人到罗馬，当面宣讀了“圣办公厅”(宗教审判厅)的决定，命令他立刻把瑙瑪台尔斐亚交給沙立齐安教派的代表，而自己則到遙远的僧院中去忏悔。当頓·齐諾在听判决書的同时，一队全付武装的警察根据謝尔巴的命令冲进瑙瑪台尔斐亚，动手搗平“友爱城”。宪兵們把成年人驅上載貨汽車，押解着运到“紅色的”爱米里省境外。如有反抗的，不分男女老小一概痛打。未成年的强迫分送到各寺院的孤兒院去。“使徒們”蜷縮了达九年的前集中营可怜的茅屋被謝尔巴的“基督教”警察統統拆光。

瑙瑪台尔斐亚及其居民們的历史到此結束。至于說到頓·齐諾，他还給梵蒂岡添了不少麻煩。

薩尔蒂尼牧师在听宣讀“圣办公厅”剝夺他对瑙瑪台尔斐亚的領导权的决定时，他順从教廷的意旨和答应照办，可是后来知道宪兵們摧毀了他的公社后，他从僧院中逃了出来避在朋友們的家中，写成了前面提到过的辯护書——“我們不同意！”。这是一本眞正的起訴書，它揭露了梵蒂岡和教权派政府在所謂社会問題上的伪善。

梵蒂岡支持的天主教民主党人統治意大利已有八年了，頓·齐諾写道，他們統治的結果是什么呢？教权派政府“不承認所有公民的生存权，鼓励剝削人民和以人民的劳动果实度奢华的日子；对公民的民主权利橫加摧残；甚至于允許：濫用法律保

护私有財产，同意在雇用工人时可以根据思想意識和所屬党派决定取否；欺騙人民，允諾給所有人以住屋，事实上只有微不足道的少数人領到房屋；兴建大多数公民住不起的华丽大厦；在意大利經济落后地区核准奴役工人，工厂主以飢餓折磨工人，迫使他們为300里拉或400里拉的工資每日工作10小时；付与自己的部长們和高級官員們以高薪；伪托基督的名字来哄騙穷困的天主教徒，用共产主义的危险进行恐吓，警告他們投他們的票，以及迫害不利于政府的政党。"[①] 教权派政府的面目已彰彰明甚，不用多說的了。

齐諾·薩尔蒂尼确信，僧侶們和梵蒂岡对天主教民主党人的反人民政策同負完全的責任。

薩尔蒂尼把梵蒂岡和天主教民主党政府是意大利資产阶級的走狗这个真面貌揭穿了。他在致蒙悌尼高僧——当时梵蒂岡的国务卿助理和对庇护十二世有相当影响的一位顧問——的信中写道："六百万意大利人处于穷困和半飢餓状态并不是因为国家財源不足，而是因为这些資源为統治阶級的利益服务了，特别是因为它花在供养以强迫飢餓者不得反抗为职責的警察和宪兵身上。閣下，請您不要忘記，肚子是有着根本意义的。如果教皇陛下周围的貴显們也象瑙瑪台尔斐亚的成員們一样地半飢不飽地过日子，他們不知道成什么个样子，这倒是很有趣去瞧瞧的。"[②]

"你們将回答道——頓·齐諾繼續写道——如果我們不得到很好的薪俸，我們又如何能在我們的宫殿中过活和工作呢？可是，当我們生活得象奴隶似的，那末你們的宫殿又关我們什么事？如果你們不是在言論上，而是在实际生活中是我們的神甫，那末拋却你們的宫殿来同我們一起生活，一起受飢餓吧。古代的神甫們都能在地洞中过活，你們又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① 頓·齐諾·薩尔蒂尼："我們不同意"，第13—14頁。

② 同上，第23—24頁。

頓·齐諾的話不但击中了蒙悌尼的要害，同时也击中了罗馬教皇的要害。瑙瑪台尔斐亚的創立人其后繼續責問蒙悌尼道："为什么梵蒂岡不把謝尔巴和天主教民主党政府革除教籍？請不要对我說：'可怜的'天主教民主党政府啊，难道它能够比現在还做得更多些嗎？而謝尔巴却有能力派遣載重汽車連同宪兵来反对孤寡无靠的兒童，把无罪不幸者們流放各处？一个政府推行着充滿弒子、弒母和弒父事件的社会制度，难道能把領导这个政府的人称作天主教徒嗎？"①

可是，如果教权派政府和資本家們拒絕帮助飢餓者們，梵蒂岡又为什么不帮助他們呢？

"請告訴教皇——薩尔蒂尼繼續痛斥道——讓他派自己的会計們到'圣办公厅'的大主教会去；他們在那边将会找到必需的基金的。穷人說：飽汉不知飢汉餓。把这句来自人民的箴言印在所有教义問答和教会書籍以及寺院的帐簿的封面上，雕刻在所有基督受难象下的跪台上，将不是件坏事。"②

頓·齐諾呼吁教皇脫下他的金質王冠贈与受苦的人們。他无所惧怕。

"至多公正的敌人把您和我們一起吊起来而已——頓·齐諾安慰庇护十二世道。这种結局对于教皇、紅衣主教、主教、牧师和基督所有的战士們而言，难道不就是他們最願得到的王冠嗎？或者还是挑方便的做，宣揚一番圣殉难者們的业績和受他們余蔭的庇护，不去学习他們的榜样？"③

頓·齐諾憤懣地抨击教皇宮廷中奢侈浪費和揮霍无度的現象，永远是心怀奸計和道德腐敗的梵蒂岡权貴們和教廷中的任用亲戚的慣例，这些丑事变本加厉地随着年代的发展而发展，正与人民駭人听聞的穷困成反比例。如果这就是基督教义所生的

---

① 頓·齐諾·薩尔蒂尼："我們不同意"，第30頁。

② 同上，第32頁。

③ 同上。

果实，则就不需要基督教了——齐諾·薩尔蒂尼对梵蒂岡和教权派政府的起訴書中最后的邏輯結論就是这样。

梵蒂岡要求薩尔蒂尼背弃自己的言論。对他施遍了各种威吓，答应他在被控蓄意不付債款的法庭上获得无罪的判决。

最后頓·齐諾終于屈服了。他发表声明承認自己所写的書是"錯誤的，不好的和有害的"，于是法庭宣告他无罪①。然而这种"供詞"有什么价值呢？尚在加利略的时代起，梵蒂岡宗教审判厅早就以逼供的能手为众所周知。这种"供詞"絲毫沒有降低頓·齐諾揭发性言論的意义，相反地却証实了它的眞实性和正义性。

薩尔蒂尼事件的典型性在于事件不局限于他一人，而在于其他的牧师和意大利天主教会的許多活动家都支持薩尔蒂尼，在其他国家中也有人贊同他的观点。

瑙瑪台尔斐亚不仅吸引了許多需要面包果腹和房屋蔽寒的孤兒和无家可归者。許多渴望作有益于人的事业的年青牧师和修道士都傾心于瑙瑪台尔斐亚，因为頓·齐諾創办的公社是有益于人的事业的象征。当时修道士和牧师自行脫离修道院和教区来到瑙瑪台尔斐亚和頓·齐諾合作，这种事情曾发生过数十件。志願軍們一直捍卫薩尔蒂尼的事业到底，而梵蒂岡則如同处罰瑙瑪台尔斐亚的創办人同样严厉地懲戒了他們。

甚至于某些教会当局的代表人物也贊同薩尔蒂尼的观点。例如，米兰大教堂布道师和意大利北部有势力的高級教士之一台維德·都洛尔杜牧师，也因同情頓·齐諾而被撤职和远謫至意大利境外。維尔齐尼奥·苏阿納主教也支持頓·齐諾，瑙瑪台尔斐亚即在他的轄境內。虽然这位主教年已耄耋，在頓·齐諾的案件結束后仍被庇护十二世命令撤职，并禁閉在卡普青教派的一个寺院中，据說，他在"圣办公厅"的检察官长期审訊和数

---

① 齐諾·薩尔蒂尼于 1955 年抛弃了神职。

度絕食(强迫斋戒)的折磨下死去。

齐諾·薩尔蒂尼及其朋友們的命运不是独一无二的。台尼洛·杜利契是一个二十七岁的建筑系学生,热忱的天主教徒,他离开了大学决定献身减輕失业者苦难的事业。他曾一度在瑙瑪台尔斐亚和頓·齐諾合作,其后在离巴勒摩(西西里的首府)不远的一个叫派尔悌尼可的小地方建立了一个移民屯居地"神的城市";派尔悌尼可处于盜賊橫行和以貧穷出名的地区內。"天主教行动"的青年报紙在最初贊揚他的事业。許多教权派报紙和杂志上也登載关于他的报导。杜利契似乎已得到政府和教会当局的支持。突然在1954年2月間的报紙上出現了一个新聞,它报导說宪兵們已解散了"神的城市",杜利契則被拘留在米兰,并且逼迫他在不再回到西西里去的文件上签字。原因在于他的事业不合西西里地主們和黑手党的胃口,后者是意大利南部地主阶級的秘密恐怖組織,是教权派和教会在西西里的社会支柱。原来杜利契帮助雇农和貧农,"煽动"他們,他的行为有利于"赤色份子"!西西里的地主們要求自己的同乡謝尔巴終止这場"搗乱",后者欣然地同意了(謝尔巴是西西里人,他早就和黑手党有着关系)①。

然而要制服杜利契不是那么容易。杜利契写了一本書,書名为"派尔悌尼可的土匪們",这本書呼吁人們把西西里的农民从貧穷、飢餓、地主和政府官吏的暴行中拯救出来。謝尔巴政府倒台以后,杜利契重返派尔悌尼可,他在那里繼續从事启发农民的工作。1956年1月間,派尔悌尼可地区的失业者写了令人感动的呼吁書要求政府和意大利人民援助他們。許多組織、社会活动家、作家和演員响应了他們的呼吁。派尔悌尼可的失业者从他們那里收得了汇款、衣服、日用品邮包和書籍。天主教民主党政府也响应了他們的呼吁,派了300个輕騎兵和警察到派

---

① "团結报",罗馬,1954年2月20日。

尔佛尼可。1956年2月，台尼洛·杜利契和其他六个失业貧农的領导人被捕了，并被投入监牢。由于意大利各阶层人民的憤怒和抗議，杜利契和他的朋友們才免于受法庭严厉的懲罰。

梵蒂岡領导对开始醒悟起来的和站在工人阶級一边爭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教士和天主教活动家的对策是，孤立和誣蔑他們，以至剝夺他們的圣职。可是生活本身愈来愈經常地要求僧侣們对燃眉的問題作明确的答复。在他們間許多人之中这些問題引起了“良知上的危机”，促使他們对使广大群众必然不免于忍受貧困和匱乏的煎熬的資本主义制度表示抗議和憤慨，促使他們对为資本主义辯护和享受着人間种种福祿，另一方面却要求普通人民节慾和順从的梵蒂岡当局，表示抗議和憤慨。

下級僧侣因其社会成分关系，所以同农民和小資产阶級有着密切联系，农民阶級和小資产阶級是資本主义垄断資本的牺牲品，他們是长期地經受着精神危机和思想长期处于分化状态中。这两个阶級政治上的願望和情緒也不能不反映在下級僧侣的情緒上。这方面群众性的天主教組織表現更为显著，天主教民主党也不例外，随着資本主义世界政治和經济总危机的加深，在这些組織中愈来愈明显地出現了一股潮流，它拥护和平，要求拒絕教权派政党的亲美路綫，要求执行积极性的社会政策，以及同共产党重建友好关系。

天主教民主党党內的这股潮流是由佛罗倫薩市长乔治·披拉領导的。披拉在1953年年底因轟动意大利的佛罗倫薩“皮昂涅”工厂停閉事件而声名大譟。“皮昂涅”工厂屬于与美国大垄断資本“杜邦公司”有联系的意大利大托拉斯“斯維亚·維斯科薩公司”。梵蒂岡是“斯維亚·維斯科薩公司”股票的持有者之一。“皮昂涅”工厂制造机器設备和軍事裝备。1953年年底，美国人借口“皮昂涅”工厂的大多数工人是共产党人而命令閉厂。“斯維亚·維斯科薩公司”順从地执行了命令，于是2,500人以上的职工——包括家屬将近一万人——流落在街头。共产党人、左翼

社会党人、意大利总工会和佛罗倫薩的人民起来保护“皮昂涅”工厂的工人。佛罗倫薩市长披拉也起来保护工人，他是天主教民主党的議員和領袖之一。他向意大利所有的主教和所有政党的領袖——包括左翼政党——发出呼吁書，請求他們支持“皮昂涅”工厂的工人和不准停閉工厂。披拉的倡議得到了紅衣主教列卡洛和其他一些主教以及群众性天主教組織的积极分子的支持，不消說，当然也得到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党人的支持。这在事实上建成了从天主教徒到共产党人的广泛的国民陣綫，为“皮昂涅”工厂工人的权利而斗爭的陣綫，最終它保証了工人获得胜利和迫使“斯維亚·維斯科薩公司”重新开工。

上述的事实証明，在天主教陣营中有着两股主要的潮流：一股执行反动政策，另一股要求改变这一路綫，准备同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党人一起，尽管他們已被逐出教会，来共同保卫人民的权利。許多征象足以証明第二股潮流的势力正在增长。

意大利青年天主教运动組織中对教权派政党和梵蒂岡官方路綫的不滿情緒也在发展着。1954 年“天主教行动”青年組織的主席露西主张联合各种力量爭取和平，爭取禁止热核武器，为当局所不容，因而辞职。1956 年天主教民主党总書記范范尼因該党青年組織的領导机关“同情共产党”，故予以解散①。在“天主教行动”的青年中，新的思想正愈来愈寬广地为自己开拓道路，当这些青年一旦从“灵魂上的輔导者們”的监护下解放出来时，将会看清意大利的社会实际。

陶里亚蒂于 1954 年 4 月在分析天主教运动中的这些新趋势时写道，如果稍微站得离教权派上层分子远一些，那么“你会遇見一些人，他們看到和意識到現今人类面临的严重問題，然而应循什么途径去解决它，他們沒有信心，所以他們表示悲观和不信任。如果你去注意中层分子和广大的天主教群众，那么你

---

① “前鋒”，罗馬，1956 年 7 月 8 日。

会发現，他們的情况則完全不同。他們之間的大部分人已經同我們在一起，追随我們和投我們的票。然而就是那些不和我們站在一起，仍旧敌視我們的天主教徒，他們也感觉到有那种必要，如同我們所領导的群众所考虑的。可以这样說，在有組織的天主教世界所依靠的群众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所領导的群众之間，現今有着比他們的領导者之間較多的相同的观点。因此，相互諒解、相互接近和取得协議有着很大的可能，我們应該循着这一途径前进。我們的活动就应該根据这一方針，我們意大利共产党人是居住在天主教世界的中心，我們担負着历史和历史演变这一异常重要的任务。

这是一个新的情况。一个新的問題。因此应該有新的指示和决定。"①

陶里亚蒂在另一篇演說中声称"我們不要求天主教陣营支持我們的一切要求……

我們建議天主教力量同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所有的进步力量达成具体的协議，以解决国际政策方面和內政方面的主要問題。例如，可以就反对原子武器的斗爭，就消除国內政治紧张局势的社会性措施方面达成协議"②。

1955 年，天主教群众对"冷战政策"的反对声加强了。天主教陣营內的危机无論在上层或下层，都加深了。不仅是謝尔巴政府的下台証明了这点，为范范尼—謝尔巴集团所反对的格隆基当选为意大利总統也証明了这点。

1955 年年初，意大利議会中有两个天主教民主党議員巴尔戴柴基和梅隆尼起而譴責批准巴黎协定，他們立即被开除出党，然而他們繼續为和平而斗爭。

天主教組織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在覓求和共产党人联系

---

① 陶里亚蒂："爭取意大利所有民族力量的大团結"（"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4 年 6 月 23 日）。

② "真理报"，1954 年 6 月 3 日。

的方式，和奉行或开始奉行显然不是天主教民主党領导所希望的路綫。

奥地利国家条約——它保証奥地利的独立和在中立的基础上和平地发展——的签訂，不能不对意大利天主教集团的情緒发生影响。天主教民主党米兰組織的書記卡米罗·里派蒙蒂为此曾写了一篇文章登載在米兰教权派的"展望"周刊上（这个周刊支持格隆基总統的路綫），作者在文章中批評"愚蠢的、討厌的反共路綫"，要求把前战犯密席元帅从天主教民主党議会党团中清除出去和贊成奥地利中立。里派蒙蒂希望"天主教陣营和亚非两洲的中立国家并列，同样成为新的国际力量中的一个領导者和决定性因素，这股力量的特点应該是爭取眞正的局势緩和以及同各族人民和平共处"。反映参加前抵抗运动的天主教徒意見的天主教杂志"自由和幸福"，和国会議員巴尔戴柴基和梅隆尼出版的"政治評論"杂志也发表同样的文章①。

佛罗倫薩市长拔拉坚决要求在国内施行进步性社会改革和緩和国际紧张局势。1955年6月，拔拉向"眞理报"駐意大利記者发表談話，贊成改善意大利和苏联間的关系②。

拔拉对"眞理报"記者談話中所表示的思想和願望，以及他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机关报的代表談話这一事实，引起了梵蒂岡統治集团的不滿。"罗馬观察家"在6月末刊文譴責拔拉对"眞理报"記者发表談話。梵蒂岡官方刊物的攻訐引起意大利和法国一些著名的天主教活动家的抗議，他們声明和拔拉是团結一致的。其中法国天主教活动家法朗索·莫里阿克声称："随你們怎样說吧，可是我是支持拔拉的，因为首先我服从自己的良知，我認为良知高于其他一切权威。"③

梵蒂岡对根据拔拉倡議而召开的"爭取和平和爭取基督文

① "新生命"，罗馬，第24期，1955年6月12日。

② "眞理报"，1955年6月21日。

③ "新論"，第14期，罗馬，1955年，第96頁。

明”会議抱否定态度，特别是对1955年7月在佛罗倫薩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議。这次会議上第一次响起了号召結束“冷战”，号召东西方之間走向合作，号召天主教徒和共产党人之間互相諒解的呼声。耶穌会徒达尼耶隆和莫里阿克的演說最引人注意。

达尼耶隆号召天主教徒勇敢地站在工人一边，工人們的目的是从“奴役和剝削中解放出来与爭取在經济和政治上成熟”，和支持“亚非两洲年青的刚刚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各族人民”。“社会主义者——他說——应該欢迎天主教徒参加斗爭，以实現社会主义者已为之奋斗百余年的理想，基督教在許多情况下对这种理想是抱敌对态度的。如果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最終証明是正确的，这意味着他們祈祷得比基督徒好（指行动而言，达尼耶隆解释道——作者），意味着上帝欢喜社会主义者較欢喜基督徒为深。然而主要不在确定誰是第一，而在于使被压迫者获得解放，在于把潛在的人变为眞正的人。”①

耶穌会徒达尼耶隆的演說是一个新的証据，它証明甚至在耶穌会內部，也絕非全部会徒都支持“冷战政策”。它同样証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对天主教教会奉行的对于資产阶級和帝国主义有利的“社会”政策的批評，是完全有根据的。莫里阿克在这方面的演說也是同样地激昂慷慨和坚决。

他承認資产阶級把宗教視作馬勒，靠了宗教它能够使人民順从。“宗教是必需的，但只是对于人民而言”，这句話是欧洲資产阶級所有創作当中最坏的一件——莫里阿克說。莫里阿克承認，宗教已被有产阶級利用来欺騙穷人，来散布“我們自己也不相信的关于来世的神話，使穷人甘願在人間做个被剝削的人”。有产阶級是根据这原則活动的，即“宗教之所以好不是因为它是正义的，而是因为它能減弱奴隶們对解放的渴望，所以是有益的”。“太多的基督徒——莫里阿克繼續談到——認为自己容忍

---

① “新論”，第14期，罗馬，1955年，第104頁。

現存的生活条件是正当的。他們以相信来世的公正为借口，很容易和不正义的事情和易相处”。莫里阿克号召天主教徒改变現存的社会秩序和反对“在我們民主国家中占統治地位的所有諸神之中最残忍的一个——英国的、美国的、意大利的、法国的金錢之神，它什么罪恶都干得出来，无休止地洒穷人的血”①。

誠然，莫里阿克远非彻底的人，也不理解共产主义思想意識的本質，然而这并不貶低他对高級僧侶批評的意义。

左翼天主教徒的言論引起了梵蒂岡和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反动領导的迫害。1955年7月，范范尼对該党青年組織領导机构的人員翁貝尔托·扎波里、法朗哥·勃雅尔奇和朱席披·克雅拉蒙悌予以紀律处分，因为他們以观察者身份出席了在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扎波里因此“罪”被罰不准参加党的任何政治活动12个月。在同一时期，“展望”杂志的編輯蒙别罗·麦凱蒂、天主教民主党华列席省党組織的領导人之一，被开除出党。天主教民主党領导机关的决議中說，因为他所領导的杂志执行的路綫“与党的路綫相抵触并損害党的威望”。我們前已提及，“展望”杂志批評“实力政策”。

如果范范尼在1955年年初能够相当輕易地将巴尔戴柴基和梅隆尼逐出党外，因为他們反对无条件接受巴黎协定，那末这一次同样的决定則遭到了許多教权派組織强烈的抗議。“展望”杂志对中央領导机关决定的答复是召开了一个专門会議，出席的有天主教民主党各省委員会和都灵、斯比塞、波倫亚、威尼斯、华列席、諾瓦拉、那不勒斯和其他各城市委員会的許多委員。会議的决議書中說，开除麦凱蒂出党“使外省的党組織惊异，如果不說憤怒的話，因为我們認为“展望”杂志始終一貫和忠实地表达了自己的要求”。米兰的天主教民主党省委員会，天主教徒游击队員协会和一系列其他教权派組織也作出了同样的决議。

---

① “新論”，第14期，罗馬，1955年，第105—106頁。

意大利报紙在評論这些事件时表示疑問道，天主教民主党領导机关难道能以残暴的方法击敗天主教群众对党执行的政治路綫的日益增强的反抗嗎？报紙的推測是正确的。

1956年3月，意大利总統格隆基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說，他号召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陣营国家和平竞賽。他說："无論誰，无論个别的人，无論国家，无論国家集团，都不能不异常忧慮地探討着世界的前途，世界的和平发展只依靠着軍事力量……"。格隆基說，軍备竞賽"对于意大利是个悲剧性的奢侈行为"。必須以发展国家經济和进行社会改革来代替軍备竞賽。格隆基示意道，美国侵略力量要求对共产党人进行警察迫害，是毫无效果的。格隆基的演說証明，即在天主教民主党內部，对教权派領导机关数年来执行的反动路綫的反抗也在增强着。

共产党人对教权派陣营內的危机又抱什么态度呢？天主教民主党人队伍中任何一点进步現象都使我們高兴，隆哥說道，可是我們应該指出言与行之間的每一个矛盾处，指出前提与結論之間的每一个矛盾处，因为光揭露是不够的，应該行动，光有很好的綱領是不够的，应該拥有能实現这綱領的社会力量，光知道什么叫做力量是不够的，而应該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动員和投入行动①。

今日的共产党人和昨日的一样，仍旧毫无例外地向所有的信徒伸出手去，建議共同为和平、进步和自由，为各族人民間的友誼，为人类的幸福而斗爭。共产党人認为，哲学和宗教上的分歧不应該妨害人們共同为实現这些目的而斗爭。

陶里亚蒂在关于苏共二十次党代表大会总結的演說中声明：

"象往常一样，我們特别向天主教人士发出呼吁。在过去，每当一群疯子要把人类投入恐怖的、毁灭性的原子战爭这种危

① 隆哥："意大利共产党人为自由、和平与向左轉而斗爭"（"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5年8月5日）。

险的特殊严重的时候，我們就发出呼吁，这种呼吁必然是有效果的，虽然沒有收到所需要那样大的效果。現在的情况可不同了，我們最近听到，天主教会的領袖在圣誕节那天提出了一些旨在改善国际局势的建議。他的建議涉及到禁止試驗原子弹，开始进行即使是局部的裁减軍备，建立对軍备的监督。在提出这些建議的时候，还認为这都是应当立即实行的一切措施。我們当时說过，这些建議提供了在国际舞台上采取行动的合理的基础。

这很好；在我国政府中，天主教政治运动的代表占大多数，我認为社会民主党人和自由党人不会在这个問題上反对政府。那末，政府中的多数派为什么自己不提出天主教会領袖所作的建議呢？他們为什么不根据这些建議来使意大利政府采取主动，促使国际紧张局势繼續緩和，帮助改善国际关系并解决人类当前的一些最严重的問題呢？天主教人士怎样看待亚洲几个最大的国家所制定的并为苏联所接受的五項原則（互不干涉內政，尊重国家主权，互不侵犯，进行經济和文化合作，和平解决一切爭端）呢？难道說佛教徒、回教徒以及信仰其他亚洲宗教的人民能够做到的事情，天主教人士在这方面却不能做嗎？天主教人士难道应該墮落到只是来保卫美国生活方式嗎？在这方面說来，美国生活方式也就是意味着'实力地位'政策，即把全世界引向战爭边緣，从而使帝国主义者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攫取更大利潤的政策。这些就是我們要提出的实际問題，我們要求确切的答复。"①

天主教运动队伍中准备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們为保卫和平和社会进步而共同斗爭的这种力量的加强，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朋友們的欢迎。

① 陶里亚蒂："爭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斗爭中的新条件"（"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1956年3月29日）。



譯者后記

八十二岁的罗馬教皇庇护十二世已于1958年10月9日因患脑充血逝世。10月28日，由五十一位紅衣主教在梵蒂岡教皇选举密議室投票选出了精通梵蒂岡外交的意大利人、七十六岁的安杰洛·米塞佩·朗卡利紅衣主教为新教皇。新教皇原来是威尼斯的大主教，他当选后立即选择了約翰二十三世这个称号，这是罗馬天主教会及其信徒的第二百六十二位最高統治者。